

文革史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目录

代序 5

第一卷 历史 7

第二卷 交锋 80

第三卷 红色风暴 117

第四卷 全面内战 190

第五卷 革命终结 251

第六卷 余音绕梁 308

代序一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

风华正茂，求学北大。父母骄傲，同窗榜样。意气勃发之时，可有问自己一句：寻找新的人生辉煌，应该去哪里？

百日维新时的京师学堂，五四时民主与科学的摇篮，八九时学运的尖兵。一国最高学府，几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圣地。你终于来了，上课、泡图书馆、锻炼身体，甚至再赶赶时髦，去西门吃鸡翅膀，去上品折扣买东西。可有些许失望：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北大精神，到底在哪里？

晚清洋务派的自强运动，算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改革开放，最后在甲午的海面上随风散去。民国政府的“黄金十年”，算是中国近代第二次改革开放，结果在日寇的枪声中又成泡影。无论是晚清重臣，还是民国高官，均曾自我感觉良好，也不乏走狗文人鼓吹太平盛世，今日看来尽似笑谈。如果压迫多数劳动者的满汉地主、四大家族幻想的现代化失败了，那么今日的官商权贵们能成功吗？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劳动人民的出路在哪里？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古巴卡氏兄弟连，朝鲜金家父子兵。曾经的斯大林模式，要说社会保障，还差强人意；论及民主政治，则尚需正名。抗美援朝，自卫反击。中越兄弟又对手，今朝市场变朋友。共同的旗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都被戏称为官僚资本主义。昔日国家主人，如今弱势群体；当年社会公仆，转眼政商精英。马恩重生，或续写《资本论》；主席在世，定重上井冈山。社会主义不解决官僚问题，不解决与内外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就不能持续。这些问题能否解决？社会主义有无前途？全世界劳动大众会不会解放？

面对这四个问题，北大学生有三种典型态度：有的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升官发财，或游戏人生；有的人关心国家，同情工农，却或困惑迷茫，或止步书斋；还有的人，决心在认识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并改变自己。我们学会谢辞第一种人，欢迎第二种人，共同努力成为第三种人。换言之，这四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只有一起实践，才能共同解决。

这就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它提倡朝气，拒绝颓废；提倡思考，拒绝虚无；提倡理想，拒绝功利。它希望在塑造一代新人的基础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中华民族的复

兴、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再次崛起，贡献一臂之力。

个人成长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迷惑时需要良师，困难时需要益友。社会改造更不是个人的事业，分散的斗争将遭到共同的失败，只有团结努力才有望成功。如果你是一名有志青年，正在思考着人生、国家和历史，我们将热情地提供给你同志所能给予的一切：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代序二

这是美好的日子，也是苦难的日子。

这是才华横溢的年代，也是愚昧无知的年代。

这是信仰坚定的时期，也是怀疑一切的时期。

这是灿烂辉煌的季节，也是黯淡无光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拥有选择一切的机会，我们其实一无所有。

我们走在通向天堂的道路上，我们正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狄更斯《双城记》开卷语

第一卷 历史

第一章 现代民族国家

第一节 文明的前提

当我们把历史事件理性地整理出来的时候，如何确立历史之中的因果关系，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一些人在解释“极权国家”的历史时倾向于认为一两个领袖人物的意志就可以翻云覆雨，以此证明“独裁者”个人的欲望和民众的被“洗脑”被“利用”是多么可怕（在解释自己国家的历史时就没有这么非理性了）。但是，极权也好，民主也罢，如果忽略了社会存在，如果没有社会上不同有组织的公共集团为了各自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利益而进行的博弈和较量，也就无所谓历史。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有多重因素，但关键的还是不同利益集团为现实社会的掌控和领导而展开的博弈。而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也就是马克思所说：“有文字记载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动摇传统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总体性革命”，当是在 1919 年以后。从 1919 年至今的历史又鲜明地分为四个时期：1919 年——1949 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9——1978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继续革命”时期，1978——1992 年的计划与市场并行的改革时期与 1992 年至今的市场化改革时期。本文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分析，那么首先就必须先回顾第二个时期从 1949 至 1966 年的历史。

“先富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在 19 世纪初建立了使全球资本流向自身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在西方国家取得优势的同时，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可能会受到西方垄断资本和本国落后的经济政治秩序的双重影响。在帝国主义阶段中心国家进行强大的资本输出，尤其是二战后由于西方国家内部的竞争趋于缓和，西方全面对世界的资本输出全面加强。由于西方资本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人力进行生产，在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控制的同时大大减轻了对本国无产阶级的盘剥。由于实现了矛盾转移，同时，由于西方无产阶级的不懈斗争和西方资本力量的增强，国家可以为无产阶级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待遇，同时，

由于简单劳动很多都被转移到了国外，国内可以有更多的人力从事管理层和服务业的工作，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发展赖于它们在 20 世纪初建立并不断强化的，能够在全世界创造资本和财富并使大部分财富和资本流向自己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中，边缘国家的内部矛盾由于国外强大的垄断资本和国内落后体制的双重剥削而大大激化了，尤其是在工业化起步的积累时期。由于受到双重的挤压，边缘国家的矛盾往往会超出资本主义所能容忍的限度。

一般来说落后国家的结局有以下几种：一种是成为发达国家的矛盾与资本的转移对象，由于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真正建立，因此社会矛盾很容易急剧激化导致无法稳定发展生产力。导致的结果不是动荡不安的局势，就是强力的威权甚至独裁统治。二是建立了现代民族政权，但资本积累困难重重。资本积累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非常惨重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拥有通过世界市场转移矛盾的机制，但仅仅是部分的内部资本积累所需的成本就非常不易。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英国工业革命对爱尔兰经济与社会造成的灾难性破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英国工业革命导致爱尔兰 1/8 的人口死于饥荒，1/4 的人口逃往海外。这些国家由于民族主义和历史教训产生的迫切的工业化的愿望却与其国内薄弱的积累承受能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旦自由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资本积累加于薄弱的经济条件之上，必然导致国内的阶级矛盾激化而不得不选择放弃独立工业化的目标，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体系之中，忍受贫富悬殊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一些国家沦落为第一种，有些“进步”为第三种。第三种是成为“依附型国家”，或“半边缘国家”，也就是放弃民族国家一定的独立性，以发达国家广阔的市场和军事庇护为基础，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发展轻工业作为原始积累，再逐步向重工业和高科技领域迈进。但是成功的依附型国家的模式一般都是资源贫乏、纵深小、具有一定殖民地工业基础的国家，而且它强烈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和军事力量。但是对于一个面积广大、资源丰富、纵深太大的大国来说，依附政策更多的是迅速产生沿海和内地，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严重不平衡。沿海与内陆的分化，城乡之间的分化，城市内部的贫富分化，这种畸形发展的后果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可见到，它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最终严重制约了现代化的进程。

总而言之，落后国家必须率先进行变革。就如曼德尔所说，“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像他们在西方曾经基本上做到过的那样，把奥吉亚斯的牛圈清洗干净。这本身就足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在第三世界的必要性，因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务和开始社会主义发展。”苏联实际上在 20 世纪初为开创了这一道路做出了初步尝试。那就是通过强大的，组织严密的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建立现

代民族国家。例如列宁在其晚年著作《论我国革命》中说：“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它一切国家不同的办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怎么办呢？……你们说，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通过强大的国内力量铲除封建制度，然后通过统一管理和有计划有控制地进行资本的积累，建立现代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具有了一定的独立的工业基础后，才能在资本主义列强掌控的世界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它对于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如中国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发生在帝国主义国家俄国的十月革命会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产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的效果。

具体到中国来说，情况就更加复杂一些。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建立在一个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乡村基层的管理到了明清时代基本掌握在乡绅阶层手中，这是连接农民与整个帝国最重要的纽带。乡绅从农民那里征收来的财富往往也用于农村本地的建设，如水利设施，宗族公共活动等等。但是盛世之下孕育着危机。一是清代在高度的君主集权下为了保证效率，在地方上采用的是行政与监察合一的制度，因此官吏贪污成风，国家机器运转越来越困难。和珅这样的超级贪官也应运而生。二是由于“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政策，在减轻了人民负担的同时，中国人口急剧膨胀，大大超出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一般承受能力。结果中国长期只能靠过量的劳动力投入即“过密化”来满足粮食需要，而劳动力投入已经接近极限。有人估计以当时生产力水平人均占有耕地4亩方可维持温饱，但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均耕地仅2.5亩，也就是说在19世纪相当部分人口已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而且由于长期依靠大量劳动力投入来维持农业生产，因此在生产力没有进步的情况下，一旦劳动力受到损失都有可能导致农业危机的产生。因此这使得农村经济基础十分脆弱，一出现大的天灾人祸就可能发生大面积的饥荒。中国在19世纪70年代，20世纪20—40年代，20世纪60年代所发生的饥荒，根本原因无不基于此。

自鸦片战争以后，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首先是西方国家的商品输出和战争赔款要求给问题已经趋近于饱和的中国又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西方资本和国内地主的双重剥削体制下，中国农村迅速凋敝。伴随着“耕织分离”“农民破产进城”这些“进步”而来的是农村严重的经济萧条，这终于成为清王朝的未能解决的一颗毒瘤。在19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丁

戊奇荒”之后，中国就一直饥荒不断，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得发展十分困难，步履维艰。英国资本在爱尔兰所做的那一幕又在中国上演了。而无论是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发现，尽管自己都非常致力于工业化，工业化进程一度也很快，民国“黄金十年”工业年均增长率达 8%，但是发展畸形，轻工业水平远远高于重工业，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工业化，而且不能给社会面貌，尤其是农村面貌带来根本变化。而城市化快于工业化的局面也导致了城市中的混乱，犯罪和财富高度集中（就像如今的印度、拉美国家一样）。经历了民国的“黄金十年”，可是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仍然还不如日本在东北扶植的满洲国：1935 年，国统区的钢产量仅为 5 万吨（并且 80%以上的钢铁生产由外资垄断），而同期的伪满洲国年钢产量为 76 万吨。1936 年，国统区的机械采煤量的 66%，发电量的 55%由外资垄断。1936 年，国统区煤产量不足 2000 万吨，伪满洲国为 1100 万吨，日本为 4300 万吨。1949 年以前，国统区的石油产量几乎为零。1949 年，全中国（不包含东北及台湾）的铁路总里程为大约 10000 万公里，伪满洲国 1945 年铁路总里程为 11400 公里；1949 年全中国（不包含东北及台湾）的公路总里程为 2 万公里，东北地区为 6 万公里。1945 年，国统区（不包括台湾）工业总产值仅为伪满洲国的 5%左右。尽管轻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消费市场集中于少数城市上层，而且过于依赖外国原料，重工业的落后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几乎没有独立性。工业化迟滞和畸形的原因不仅是外国资本挤压控制，政府的腐败和不断的战争，更不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制度设计”就能解决的。它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其根本原因就出在原本维系农村秩序的基层体制上。在过去，地主乡绅征收的租税相当一部分用于本地乡村的建设和公共秩序维持，而且自耕农亦为数不少。但是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耕织分离，大批农民破产，要么进城要么成为地主的佃农，或者是靠仅有的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简单再生产。结果大量土地集中到农村无数小地主（大地主其实比较有限）的手中。历史上，各个朝代由于自耕农是国家的支柱，因此国家一般会严格限制佃农的产生。但此时的政府既没有魄力也没有能力再干预此事，更何况他们之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地主。更致命的是此时许多地主乡绅也不再关心自己家乡的建设，因为没有人会把钱投到萧条的乡村。大量小地主只满足于地租收入，不愿将资本转移到现代化之中。而他们也没有能力和财力从事公共管理和建设工作。这使得无数小地主成为中国资本转移的最大障碍。即使是比较富裕的地主乡绅把资金投入工业和商业之中，对他们来说他们家乡的地产只是资本提取的来源。结果在农村经济生产逐渐处无政府的状态。原有维系乡村秩序的地主乡绅的退出导致的是土豪和劣绅的进入。他们利用土地所有者不再关心当地的发展，充当乡绅在本地的代理人，巧取豪夺，中饱私囊，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大地主不想管，小地主无力管，行政管理的真空使得出了问题也没人管，土匪、灾荒、瘟疫、毒品迅速泛滥。

每一次天灾人祸都会给脆弱的农村带来致命的打击。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发现中国农村在多重压榨下已经几乎无法从种田中获利。但由于生产力没有进步，要想不饿肚子农业上仍然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而农村的薄弱又制约了工业的发展。

当时农村受到的是好几层的剥削：一有外国资本的压榨，二有本国腐败的官员，三有地主乡绅的租税，四有土豪劣绅恶霸的巧取豪夺。结果导致的是工业越发展，农村就越萧条，越来越不能给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和资源，反而制约了工业的发展，使得每一次工业化都不可持续。实际上，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需要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落后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得积累成本全都被加到了农民的头，此时再加上外国资本的压榨，这么多层剥削下来，薄弱的农村经济就非常容易崩溃，最终制约经济的发展。这是几乎所有落后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难题。但是这些国家的统治阶层往往又都是地主，这就使得土改更加困难。而当年欧洲国家是资产阶级靠对外殖民掠夺积累起了资本，摧垮了本国的封建制度，而美国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进行了成功的土改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大多是外来因素的结果，与当地土地没有利益纠缠（如台湾、韩国）。对于中国来说，对内要以更强大的力量来摧毁传统的封建制度及其上层建筑，对外要阻止西方资本的入侵，最起码是在最艰难的积累阶段会对西方资本严格限制。也就是说，对农村进行资本提取是必需的，但是至少在原始积累阶段只允许一种提取，那就是国家的有计划地提取。

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不仅仅是摧毁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还要进行国家工业化。虽然中国有着广袤的劳动力，但是其薄弱的基础却根本不足以形成足够广阔的市场。中国萧条的农村的基础设施和人口素质也很难直接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保障。英国当年的工业革命前提之一就是形成了一个有强大购买力的绅士阶层。更重要的是，中国广阔的纵深使得发展非常容易出现不平衡，而一旦不平衡出现那么贫富差距问题就会非常严重。而高速发展轻工业成功的国家一般都拥有发达国家广阔的市场和强大的国外军事力量的支持，而且也都纵深偏小。其实无论重轻工业也好，作为独立民族国家最重要的是让谁来承担积累成本。西方是让别国人来承担，而中国当然只能让自己来承担。但是如果把积累成本都加到工人或者农民头上，官员、商人和知识分子等精英阶层或城市阶层消耗过多的资源导致社会不平等，又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因此，要进行工业化建设，理想化的方案是让精英阶层与普通人一起承担积累成本。那么，这就需要工人农民处在一个强势，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强势的地位，否则工人农民在面对精英阶层占据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并且把这种占有永久化，甚至变成对工农的剥削的时候就无能为力；那么就需要国家为了工业化建设而对农村的资本提取进行计划，不能让它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导致农村经济基础被压垮。

声称要最终完成这个任务的是共产党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开篇即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毛泽东明确认识到了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农村，在农民。正是农村基层的无政府状态和多重剥削是中国长期无法发展的祸根。那么要做的就是使强大的组织力量深入到农村基层填补这个空白，发动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才能彻底摧毁这一整套体制，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基础。

黄仁宇评价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底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中国今后的趋向，也能从这基础上发展。其目的是根据各地区的条件，使全民就业。”

正是有了一套现代民族国家必备的独立自主的财政货币体系、有权威的基层政治机制和崭新的文化意识形态，中国的现代化才正式全面起步。因此在这里，毛泽东给出的解答是一种“总体性革命”的思路，即必须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革命，根据对中国的历史特点和国际形势的分析，结论就是在国内打破中国传统的已经严重僵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组织结构，建立公平公正的新社会，至少保证进行工业化的积累成本不会无限制地集中在工农身上；在国际上进行合作的同时要警惕帝国主义国家将阶级矛盾转移到落后国家，在落后国家造成双重剥削，阶级矛盾严重激化导致民生凋敝；毛泽东对文化战线和阶级意识的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是少有的，反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建设新文化的目标：“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总之，这些论述继承了马克思晚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而他关于统一战线的战略又有独特的民族主义色彩。结尾处毛泽东豪迈地宣布：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第二节 分野

尽管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凭借着强大的组织性和在农村的巨大威望战胜了国民党和其它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建立起了一个真正的全国统一政权，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但是没有人否认新的政权会产生新的问题。尤其是在工业化起步的道路上，领导权的问题就会非常重要。因为谁能掌握领导权，谁就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取得更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工业化的起步需要巨大的原始积累，这需要一个国家付出的代价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谁都想充当那个积累的掌控者，谁都不想充当积累的承担者。也就是说，虽然共产党主张生产之中的公有制，生产领域是公共的，社会的，但是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会导致新的不平等，使得社会阶层仍然会为了利益的分配而发生激烈斗争。

许多人这一分裂起源于延安道路和苏联道路的分歧。这一说法似乎有一些道理。中共独特的夺取政权的方式带来的后果绝对不仅仅是一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就能简单概括的。我们看到，苏联的革命和建设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由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然后党由城市“扩散”到农村。列宁只带了几千名布尔什维克就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斯大林模式也同样是一个“扩散”的过程。从农村中提取充足的资本注入城市的高速工业化之中，这是苏联工业化最主要的来源和动力。如果从政权的权力分配上来讲，苏联自始至终是城市中的干部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有抱有平等的理想的“老革命”和科层式的技术官僚之间的斗争——这在 30 年代末发展为苏联的大清洗——但是农村在新政权中始终是没有发言权的。不仅是集体农庄要完成国家建设的沉重负担，甚至每一个集体农庄如何具体增产都由莫斯科来计划。也就是说，斯大林认为城市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无论它怎样剥削农村——都会使得现代化能够“扩散”至全社会。结果，苏联模式最终培育起来的不仅是高速的工业化奇迹，还有一大群享有极好的福利和待遇，拥有专业的技术知识，但刻板僵化，等级深严，以执行上级命令为唯一目标的城市技术精英和政治精英，“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工人农民只处于被计划，被管理的地位上。但这对于任何一个憧憬着人人平等的激进革命者来说，都不完全是一个想看到的结局，尽管斯大林坚称这样做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建设共产主义，是必由之路。因此，西方一些学者悲观地得出革命的“热月”的观点，即一场理想化的革命最终要与传统势力相妥协。更何况坐上了统治者原来位子的革命者也

会发现这个位置所带来的好处。这样的“既得利益”使他们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社会主义夺取政权之时，就是社会主义灭亡之日。”

但是 1949 年的中国与之有些不同。毛泽东独特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培育出的是一个与苏联有很大区别的干部队伍和党。尽管毛泽东从未怀疑过抽象上的苏联模式的原则对中国工业化有利，最重要的是国家干预下的，重工业为主体的高速工业化战略，这在“赶超式的**独立国家**”中是一种普遍战略。但是他那支以农村干部、延安道路为主体，吸收了大量其他势力的党似乎与具体的苏联模式又格格不入。更不用说他那支军队里很多人是刚刚由国民党甚至土匪“改造”过来的。王明曾经激烈批评毛泽东把党搞成了一个“大杂烩”而不是“先锋队”。但是毛泽东自信他的“统一战线”策略能够取得成功。

延安艰苦卓绝的环境使人们很难喜欢上这个地方。但是，他让毛泽东看到了继续他在江西所做的“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希望。对于国民党来说，利用地主豪绅对农村进行无限制的资本提取进行工业化的结果是，它的工业化成果太多不适合最广大的农村消费，更糟糕的是各地官僚的腐化堕落更是加剧了经济的混乱。随着富人们纷纷离开，原本由乡绅主持的农村的行政管理机构也日趋混乱。而日本侵略者的进入就更加剧了基层的混乱。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的农村干部们得以进入基层，去填补地主乡绅、国民党或日本人都不关心的基层权力组织的空白。共产党成功地各地（主要是中国北方的日占区）发动了农民，开辟了一个个农村根据地，同样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农村出身的干部和军事指挥员。他们许多人在游击战争中崭露头角。毛泽东不会相信一场不发动中国最广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的革命，会取得比以前革命更好的效果。但同时毛泽东无意让这些农民军队去进攻防备严密的城市，只是让他们在华北和山东去发动和组织一个又一个农村中的农民，不断地扩大根据地，不断地培养出更多地农村干部，不断地改变更多农村的基层结构。毛泽东在延安所推行的那一套独特的，前现代的管理方式，尽管与苏联的工业化经验格格不入，但是却能吸引许多出身社会底层的人的响应，才得以成为可能，使得传统观念上作为“现代性”的被动接受者的农村成为特殊的“现代性”的发源地。这是中国革命最大的特色。延安模式的具体表现有：在政治领域中减少官僚主义自上而下的命令，加强上下层互动的“群众路线”；压缩等级制的“扁平化”管理和“精兵简政”；为了给群众提供参政条件而实行分散的政治结构；以及干部、知识分子必须定期参加体力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下放”“下乡”等等。由于身处孤立的根据地中，因此并不十分强调领导人员的严密分工，强调的是素质的全面和“多面手”的角色。它与苏联模式中官僚与人民等级森严的分界，官僚之间复杂的等级关系，以少数专业技术官僚制订严密计划，一切按部就班甚至刻板僵化

的政治结构有极大不同。这种极力压缩官僚科层式的等级，竭力加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互动的模式，就成为后来被西方学者称为“毛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的雏形，这也是后来那场群众性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前奏。

在经济方面，由于受到封锁使得“自力更生”成了最响亮的口号。延安道路非常强调小范围内的经济体系的独立性。农产品无需多说，最重要的是军事产品和非农业产品生产。由于几乎没有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上要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土技术、就地取材，需要群众广泛的动员和参与。文化方面上，它强调文艺的非独立性尤其是相对于政治的非独立性，强调个人思想上的阶级性，也就是所谓“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它要求对现有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实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同时，需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半工半读的学校是其标志。在这里不仅是学习文字和技术知识，更重要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后来，毛泽东对延安模式的中意，也是在于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消除”：消除城乡差别、消除工农差别、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在革命的过程中，党的队伍逐渐产生了分化。也就是军事系统和政工系统这两大块。军事系统的干部，即农村出身的干部，更多地倾向于军事指挥方面。而政工系统的干部，虽说也有农村本地干部，但是相当多出身于城市，后来参加革命，到了农村。他们更倾向于政治动员方面。当然还有留在城市坚持斗争的地下党，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当中共凭借农民的支持在1949年夺取了全国政权的时候，军事系统、政工系统和城市地下党这三大系统的分野已经非常明确了。这是以往世界上任何一支革命力量就不曾同时拥有的。

军事系统的农村干部有这么几个特点：

首先，这些干部与军队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人不认为中共就是一只准军事化的革命队伍。他们不仅会去在他们所在的根据地中发动和组织起更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们还在游击战争中崭露头角，逐渐晋升为高级将领。能把军队的职能扩大到作战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些农村干部的功劳。中共的革命军队从来就不是一支职业化的军队，就如毛泽东所说，它还是生产队，还是宣传队。这同时带来的后果是，军事干部的在根据地管理中形成的“多面手”角色使他们是社会上一支非常强大的独立的利益力量。而且他们与枪杆子之间紧密的联系，使得军队始终无法独立于政治较量之外。这对共和国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二，除了那种纯粹的“老子打天下就是为了坐天下”的人之外，他们之中所怀的理想是非常简单朴素的。一般来说是一种简单化的“均贫富”的理想，即使对理论有兴趣的也可能会把“共产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联系起来（事实上这倒是一个宣传的好

方法而且用了很多年)，因此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执行毛泽东所要求的“说服教育”或政治动员的工作能力很低。他们并不擅长思想政治工作，这需要上面派来的政委来做。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热情有余但能力不足，尤其是在面对一个更加需要专业知识和现代管理经验的工业化进程中。这使得他们更加中意延安模式，对按部就班，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有很大的反感，这会让他们觉得这是对“革命理想”的背叛。

第三，这支强大的军事干部队伍既然是中国革命的既成事实，那么在建国之后干部之间的一些矛盾就围绕着他们暴露了出来。农村干部，当然还有进城之后产生的工人干部，我们可以合称工农干部，是中国革命的主体，更是“领导阶级”中的一员。但是他们在工业化进程中，尤其是在技术领域作为强势力量却不能发挥更多作用，反而作为“老粗”受到政工干部、留用的国民党公务员的排挤和嘲笑，不仅如此，建国以后为了反对“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再加上曾处于弱势的政工干部和地下党干部在权力分配中一度占了优势，力量最强的军事干部反而都遭到了刻意的忽视，在政工干部的掌控之下，甚至一些老军人的功勋问题无法得到落实，还有一些人生活艰难。电影《集结号》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后来在文革中，武汉的“老红军”们成了造反派的一支生力军，也是这些革命英雄们之前备受轻视的结果。

党中的另一股力量就是政工干部了。他们与军事系统的干部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简单来说就是指挥员与政委之间的差别。虽然在战争年代他们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和平友好关系，但是当它们进入城市之后，与现实中的利益沾上边的时候，它们的一些观点和价值观分歧就会暴露了出来。

首先，政工干部不少出身城市，一些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随着中共的活动范围从城市转向农村，他们也开始在农村组织工作；另一些人则是抗战时期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和相应的训练后形成。尽管大多是低级知识分子，但他们整体素质在革命队伍中是较高的，更加擅长政治动员和组织工作，管理能力较强。尤其是在根据地的管理和经济发展中更加积累了经验。其中最突出的是政治委员这样的角色，这类人最大的优势，就是横跨了军队和官僚两个系统，这使得双方都可以接受，因此经常能够坐上领导人之位。苏联的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中国的华国锋、邓小平都是如此。当然在政权初建之时，往往也只有同样有卓越战功的政委，如斯大林、邓小平而不是只会在案头后面舞文弄墨的政工干部可能被各方接受。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是邓小平而不是陈云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第二，他们的理论水平是相对较高的，最起码不会把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相混淆。但是理论水平高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平等待人，相反，有时候素质和能力的高反而会使一些

人的精英意识较重，对日常中的不平等甚至特权现象习以为常。在战争年代他们的这一观念可能被埋没，但进城之后随着专业技术领域的工作和等级森严、科层管理的官僚制度的推行，他们的知识优势发挥了出来，他们对所谓特权，官僚作风和按部就班刻板的工作习惯也往往并不看成是什么大事。他们对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的逐渐扩大也不是很在意（最后一点尤其）。尽管他们虽然更加有说服教育别人的能力，但是手中有权的他们有时候更讲求“效率”，也就是用行政命令去强制推动，也就是所谓用强制命令去“包办替代”群众的自发组织。“包办替代”这个词我们后面会多次讲到。

第三，在建国以后并不是所有的军事系统干部都被排挤，相反，在一些普通军人和低级军官受到打压的同时，许多人由于战功坐上了高位。而这些政工干部只能和被接收的国民党公务员，资本家，地下党系统的干部一道，接受这些不懂技术（但未必不懂管理）的“老粗”的颐指气使。这就产生了很特殊的情况，首先是政工干部与军事干部在党内的力量对比与在工业化建设中实际发挥的作用不很一致，使得双方摩擦不断，成为建国前 30 年政治斗争的一条主线。为了使自己的力量能够与自己的社会作用相吻合，政工干部开始谋求“统一战线”，和地下党干部、前国民党公务员、资本家、传统知识分子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因为即使把地下党和政工干部全部加起来，也不够管理复杂的城市。因此，解放以后留用了大量的国民党公务员（有 300 万之多）、资本家、企业技术工人，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绝大多数不是出身于工农家庭。并给予了他们不错的待遇。这使得他们与工农干部相比更加倾向于能够给予精英阶层以更好待遇和特权的新民主主义，而不是要求大家平等承担积累成本的“社会主义”。这这种联盟进一步加剧了与军队干部之间的摩擦。

当然还有三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即地下党，普通劳动者，以及知识分子。

对于地下党来说他们对于革命所做出的贡献不言而喻，而且最近关于他们的电视剧（红色谍战剧）也越来越多。但是相比农村出来的那两股力量相比还是要弱一些。他们在特点上与政工干部大同小异，“异”之处也在于他们长期处在城市，更习惯于官僚化运作，精英意识和等级意识更强，更加强调效率而不是平等。而且，他们与军队系统几乎缺乏联系，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军队的时候更加底气不足，根基不厚，矛盾更深。因为在敌后工作也经常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此他们也会比政工干部更加追求与传统精英，如传统官僚、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搞好关系，直至逐渐合流，从而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把政工干部、地下党和留用的国民党公务员、进入政府部门的资本家、出身原来统治阶级的大学生合称为党政文官系统（也就是社会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的联合体）。

富有戏剧性的是，有一个人一开始搞城市工作和地下党工作，后来短暂地成为政工干部，并在 40 年代的延安整风中迅速崛起超越他人成为了中共的领袖人物。他就是刘少奇。他在

中共七大上热烈赞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使人印象深刻，在毛泽东成为“中共在解放区正确路线的代表”的同时他成为了“中共在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但是，刘少奇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党内很难得到普遍支持。他几乎没有任何战功，在军队里很难赢得支持者，而这对于一个准军事化的组织的领袖来说是致命的。而且他也不是十分擅长农村工作（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很难说与他完全无关）。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就不用说了，邓小平在军中也有不小的威望，陈云自己无意于再往上走也没有人要他往上走。而对于在中共七大上成为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的刘少奇来说就很麻烦。因此，刘少奇在建国以后在将自己的老部下们授以高位的同时，主动向老精英们（国民党公务员、知识分子、资本家）示好（如“剥削有功”论，如新民主主义的主张），努力促成了地下党系统，政工系统与传统精英的合流。但这也激化了与军队工农干部的矛盾。**社会力量处于强势的军队干部在建国以后被边缘化，社会力量处于弱势的政工地下党干部却掌握了大权，这是建国后 30 年政局不稳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有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工农群众似乎不再需要另找别家来代表自己。因此 1950 年毛泽东批判了李立三的独立工会的主张。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对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发展。因为列宁强调的是先锋队党将阶级意识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但是列宁的这种单方面强调却给了他的后继者们（尤其是斯大林）以包办替代一切的理由。也就是把党由“先锋队”变成了党包办替代一切工作，最终党垄断了一切社会权力，阶级专政变成了党的专政。而党如何保持先锋队的本质呢？列宁提出靠“清党”来实现，即把堕落分子清除出去。但是党垄断一切后，这又给斯大林的大清洗制造了借口。因此到了毛泽东这里，在强调党的领导的同时，他更强调的是群众与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党当然要灌输阶级意识，当然要组织人民闹革命，**但这是为了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由党来包办替代一切。**同时毛泽东更加强调思想工作而不是组织处理，也就是所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整风这种形式，实现党与群众的互动，整顿和改造思想。

正是因为强调上下层互动，强调党的引导下的群众自发行动，因此工农群众在中国的政局中实际上成为一支有明确利益指向的群体。尤其是因为他们在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尽管不可能，毛泽东也不会容忍他们改变高积累的工业化格局的要求，但是他们还是可以使得这种积累更加公平。**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反对把积累成本全部加到劳动者头上，而官员知识分子们却可以不承担工业化的积累成本的状况。**简单来说也就是反对有知识有技术的生产资料的管理者

享有特权。因此毛泽东在进行“整风”时往往会寻求群众自发力量在体制外的推动。而且，当中国越过原始积累阶段的话，这些非包办替代的自发组织还有可能继续维护劳动者的各方面的利益，避免阶级专政堕落成一党专政，从而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可以把这种在党的引导下人民为了自身利益自发产生的，不是党包办替代的自我组织叫做社会主义的方向的话，那么这就是毛泽东赞同的“社会主义”。

但是，我们说群众有独立的利益指向，并不意味着其实力就一定很强。因此，在党对其引导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党包办替代的倾向。另一方面，群众运动如果缺乏引导时也会有无组织甚至无政府倾向。简而言之，中国的社会变化，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社会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群众自发和党的引导或异化产生的包办替代这两股合力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在政治运动中，既有党引导下的群众为了维护权益——**当然多数情况下是要求优势阶层削减自己的利益，公平地承担积累成本**——积极地自我组织，也有党的积极引导和动员。当后一种占优势的时候，党可能会进行包办替代强制组织，会有把积累成本越来越加在工农身上的倾向；当前一种占优势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群众运动不受控制和引导产生的无政府倾向。比如，三反五反中的问题主要是群众缺乏引导导致打击面过大，而人民公社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党政官僚的包办替代导致的强制。

由此我们可以画一个1949年中国的政治坐标系：

| | | | | |
|--------|-------------------------------|--------------|---------------|------------|
| 人群 | 前国民党公务员、资本家、大学毕业生 (合称为老精英) | 政工干部、地下党干部 | 工农干部(或军队系统干部) | 工人、农民、城市平民 |
| 政治倾向 | 右 | 中间 | 次左 | 左 |
| 社会地位 | 名义上最低 | 最高 | 次高 | 名义上很高 |
| 社会力量对比 | 较差 | 一般，包办替代的愿望最强 | 最强 | 最差，需要引导 |
| 技术知识 | 很强 | 一般 | 较差 | 最差，需要教育 |

但是还有一个阶层没有讲到。那就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作为一个自身意识形态与经济

政治地位最容易脱节的群体，几乎横贯了左中右所有阶层，四人帮里就有三位知识分子。但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和现在完全不能比，可是即使按照极低的标准（一些地方高中毕业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建国之时确认的知识分子阶层还不到400万。实际上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国家的意识形态也未必能把他们完全扳过来。因此他们多数倾向于中间派也就是党政文官系统或新民主主义这一边，自然他们与工农干部的矛盾就更加激烈。因此，与知识分子发生冲突主要是在与左派的一边。

第三节 文艺批判运动

我们讲述共和国的历史就从文艺批判运动开始。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基本上来说是他的革命思想的延续，也就是要求知识分子在党的引导下进行组织，同时也要深入群众，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宣传党的主张和意识形态的同时吸收反映工农兵的精神诉求。但是由于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特殊性，尤其是毛泽东赋予其“文化革命”的特殊任务，因此往往对其也是控制多于引导，批评也更加严厉，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之类。文化革命的内容不仅包括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宣传，还有60年代文化激进派掌权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再到后来“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激进口号。它也包括文化机制上的革新，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有组织的普遍参与的“大众”文化制度。实际上，毛泽东真正希望的还是从“重建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特别是从工人、农民中发现，培养作家。”这是文化革命的目标之一，但这个目标实在太过遥远。这也导致了毛泽东在“改造”知识分子过程中操之过急所带来的一些严重的弊病。

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周恩来宣称这次文代会实现了“会师”。事实上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分裂的文艺群体组合得并不顺利。最终的结果是“延安文艺”或“解放区文艺”凭借政治优势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苏联文学都被“批判性地吸收”。“现实主义”确立了“进步的”地位。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边缘化，或从文坛上“主动消失”。如朱光潜、沈从文、钱钟书等人。不过这也使得他们很多人后来避开了政治漩涡。而一些城市中有左翼倾向或同情工农的知识分子似乎无法适应“延安文艺”的要求而难以再写出好的作品。如老舍就表达过这种困难。结果现时代的“中心作家”与民国时期的作家群相比是整体性的更迭。以延安为中心的文艺作家占据了主流地位。

此外，所有知识分子都处于组织机构之中，实际相当于国家干部，有些甚至有更高的政治头衔，有固定的且很高的工资，社会经济地位有了极大地提高。一些人从政治权力中获得的利益甚至超过了他的文艺作品。文艺创作不再是谋生的手段。相反，由于极高的工资和稿费标准，在文革前，文艺是经济上最诱人的职业之一。但是这一职业政治上的不稳定性也影响了它的吸引力。

1950年底，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公演，它讲述清末山东的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当年武训依靠乞讨，并在当地乡绅的资助下办“义学”。影片中还有一个失败了流亡到此的太平军作为“反面人物”。在影片结尾处，借小学老师之口说武训的精神就是“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影片受到热烈赞扬。然而，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声称：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

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之后就是一场遍及全国的文艺批判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揭开了文艺批判运动的序幕。一些文艺界人士被迫做了检讨。1951年7月23——28日，《人民日报》连载了江青、钟惦棐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最终由曾经热烈赞扬《武训传》的周扬给其定了性：“反历史、反人民、反现实主义”。

对于毛泽东为什么会《武训传》大动肝火，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丑化太平军，宣扬改良主义，反对革命；有些说是它曲解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人说他是为乡绅说情，与当时的土改相抵触。

不管怎样，影片强烈的改良主义立场确实与中共的阶级斗争史观相抵触，自然带有“根本的性质”。通过这次文艺批判运动，改良主义遭到彻底批判，中共激进的意识形态得以在全国确立，同时其标榜的“延安文艺”的阶级斗争史观，人对客观世界改造的主观能动性，乃至苦行价值观等都得到了相当大的普及。

电影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革命是造成了文化教育的进步和平等，还是威胁、摧残了这种进步和平等？在这个问题上，革命者不能认同《武训传》的叙事是显而易见的。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与地主阶级联合宣传旧文化，歌颂和推行旧文化，看起来与刚刚结束的土改运动明显的背道而驰，而且更是因为，它与共产党正在农村进行的，包括推广全民识字率、现代生产、卫生、科技等在内的“新文化”工作背道而驰——这些新文化知识才是农村所需要的，而新中国废除土地地主所有制，就是要废除封建贵族教育的经济基础，使所有农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现代教育，而不是继续接受旧文化的束缚。

毛泽东本人多次强调：土地革命不仅是一场经济和政治革命，而更是一场新文化的革命，是将五四启蒙运动扩展、深入到中国广大农村去的新文化运动，其目标就是与地主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而废除旧的土地所有制的意义，不仅仅是追求经济的发展、甚至在经济意

义上的相对平等和自主，而且追求文化特别是教育方面的绝对平等。与这个现代运动相反，地方乡绅的所谓“义学”由于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正是这种所有制形式，从根本上剥夺了下层社会有受教育的经济能力。

最后，当时大量的评论将武训的“乞讨”与鲁迅的“工作”等同起来，甚至称之为“为人民服务”——这种歌颂本身更是十分可疑的。在现代性的方案中，“劳动”都是人类创造自我，争取自由的根本品质。人类的劳动是一种理性的活动和精神的的活动，这一点使得人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的生存。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世界。而与劳动相对，“乞讨”和“乞丐”完全是一种反常的，甚至是变态的，丧失“理性”的耻辱，是动物和奴隶的伦理。

如果说批判《武训传》是唯物史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的奠定，其内部的分歧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的话，那么之后的几次文艺批判运动就明显是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野在文艺领域上的反映了。

1951年新一轮批判运动开始，许多不符合党的意识形态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受到批判。其中都市通俗小说受到相当程度的打击。头号目标是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这个故事非常耐人寻味。它讲述在山东解放区，贫农出身的童养媳、支前劳动模范张英，和来自大上海的知识分子干部李克在革命环境中自由恋爱而结婚。上海解放后，他们被调入上海。自幼在农村长大的张英，一下子难以适应大都市的生活环境。为此，夫妇间的感情出现了障碍。一天，张英在舞厅门口目睹一个要饭女孩小娟受到舞厅老板的欺侮，便上前抱打不平，并收留了小娟，对此李克持有异议。接着，张英又擅自将李克的稿费捐献给遭灾的家乡，使李克尤为不满。于是，他们俩互相指责，各不相让，导致分居。后来，在老领导秦丰的批评教育下，两人开始有了重新认识。此时，因纱厂失窃，小娟蒙受冤屈而出走。李克与张英在寻找小娟的过程中，又言归于好。

对萧也牧的批判运动规模不大，但是这篇小说太过强烈的象征意义是许多人不愿意接受的。批评者多批评萧也牧“丑化工农兵形象”，“迎合一些小市民的低级趣味。”但这不仅仅是一个女主角形象的问题。它可以说是象征着以工农干部为主体的共产党在进入城市之中发生的一系列矛盾，也可以说是中共这种“非现代”的夺取政权方式与“现代”的追求之间的激烈碰撞。在战争年代农村人可以与城市人，平民可以与精英和平相处，但到了和平时期两者的关系就开始破裂。它预示着社会上以“平民”为主体的左派（社会主义）和以精英为主体的中间派（新民主主义）在革命胜利后蜜月期的结束。很多人不愿正视这一现实成为这篇小说遭到批判的重要原因。很快，这一碰撞就不再仅仅是小说中的夫妻之间，而且迅速进入现实世界，而且上升到整个社会上不同阶层之间，直至共产党内部之间，一

直上升到高层分歧。

1952年，俞平伯将他出版于1923年的著作《红楼梦辨》加以增删，修改，改名《红楼梦研究》出版。对于俞平伯的观点和研究方法，青年批评家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等文章中提出批评。认为“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的更为明显。”但是一些人以俞平伯是《红楼梦》权威为由拒绝发表其批评意见。最后文章登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1954年第9期）。在毛泽东了解到后要求登在最权威的《文艺报》上。然而，主编冯雪峰在转载此文时写的按语态度极其暧昧。这使得毛泽东非常恼火。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信中说：“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很快，《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表袁水拍的文章《可贵的第一枪》。针对胡适的激烈批判开始了。以郭沫若和周扬带头，大批学者投入到了对胡适的批判之中。1955年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多达200万字。但这样一次批判仍然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也就是“思想问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俞平伯由于承认“错误”，未受处分，他的版本的《红楼梦》也得以继续发行。

批判俞平伯《红楼梦》和胡适的问题，同样是在用新的平等的观念来改造中国传统的精英与“草民”之间的关系。处于弱势地位的“小人物”把握中国文化领导权的方向，才有可能保证这种观念上的平等深入人心。就像毛泽东说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克服种种敌对势力和他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之类的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属于权利问题……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人民就有保证。”也许考虑到对俞平伯的批判可能过激，因此就把矛头转移到了精英主义知识

分子的代表人物，已经离开大陆的胡适的头上。《红楼梦》事件暴露出的问题是，可以说在这里的文化制度已经把俞平伯的名望和能力变成了一种资本，把“专家”“权威”的头衔变成了一种“崇高的”资本，平民不许质疑权威，权威也无需对他的结论对大众做出解释。当然我们要听从“专家”，“权威”的意见，可是现代社会知识体系与储备不同的人之间必须要有平等的对话机制。如果无法建立一个精英与平民平等对话的机制，那么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就无从谈起。在学校教育中同样如此，如果老师得处处时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来维持其“尊严”，那么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这种气氛中难免不受到压抑。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公平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制度保障，就很难保证统治者，精英阶层不会利用专业的知识技术为自己谋取利益，损害多数人的利益，导致知识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产生。而这些都是可以用“必然规律”“不得不牺牲这些人”“我只接受专家的批评”来解释或搪塞的。有时候人们辩论时爱用“你多看点书吧”或“你多去实践实践吧”之类的话，可是一个人思想的转变不是看一两本书或者实践一两次就能改变的。那种“只要把《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往全国新华书店的书架上一摆，社会上重新评毛的行动就会立即启动”的言论，只能说是某些书呆子天真的梦呓（不仅指某个人，任何“天真的”左派右派都可以套用此公式）。这种文化或意识形态上的自我优越感显然忽视的是日常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忽视的是在精英和大众之中产生隔膜的潜在危险性。如果真的想致力于启蒙大众，那么首先就是以平等的姿态进行交流，而不是用“一两本书”就打发过去，那样只能“越启越蒙”。而如果没有让人民真正从头脑上“站起来”，没有从家庭伦理基础上的“臣民”变成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国民”，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就只是一句空话。所谓的“文化革命”，含义在这个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另外，《红楼梦》研究本身暴露的问题是，当清代以来过分地咬文嚼字的“考证派”走到尽头的时候，那么在一个新时代里，确实有必要扭转一下所谓“资产阶级烦琐哲学”，以更大，更广阔的视角来把握问题，才有可能为文化开辟新的道路。这也是毛泽东赞赏这几位“小人物”的观点的原因之一。

最起码，通过建国初期的几次文艺批判运动，基本上都是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意识形态上的变革，也就是从消极被动的“臣民”向积极主动的“国民”的转变。但是毛泽东采用的这种抓典型事件来扩大批判的办法（即“上纲上线”）确实也含有严重的问题。因为它对知识分子确实是伤害，至少是承担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毕竟不是每一场运动都能

把矛头指向已经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的。而且批判的强度也很不容易把握住。尤其是当知识分子的问题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较量而是上升到了现实中的制度和利益的时候，行政力量和社会阶层的干预就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只是在 1954 年问题还没有显露出来而已。

第二章 社会主义

第一节 谁战胜谁的问题

在经过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巩固了政权之后，毛泽东所掀起的第一个运动就是“三反”、“五反”。这两场运动后来长时期内成为基本成为中共官办政治运动的标准。“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于 1951 年 11 月底发起。当然它主要针对的是留用的国民党公务员，以及一些腐化堕落的共产党干部（虽说有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党内典型，但大头还是前者）。“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它主要针对的是城市中的资产阶级。经过这两场运动，国民党公务员和资本家实际上已经被纳入国家的监管之下。

所谓政治运动，在今天某些人看起来是与民主、法制完全对立的概念。这主要是因为其打击面往往偏大，而且打击程度较深，且脱离程序。但政治运动与法律手段相比还不仅仅是一个程度和力度的问题。实际上，它包含的是用体制外的因素来解决体制内的问题这一考量。因为如果仅仅是将这些人纳入体制之中，强大的共产党干部队伍和专政机器完全可以满足这一点，没有必要采取发动群众的方式。毛泽东之所以会倾向于对体制内问题采取体制外解决，也就是全社会解决，也是在于防止出现包办替代，培养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力量。也就是培养工农群众的自我组织和阶级意识，如果产生了一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利益集团，那么这支力量就能够将中国逐渐牵引到社会主义的轨道。

一些人在讲述政治运动时总是塑造这样一个二元对立：毛泽东和运动打击的对象。实际上这有一个预设前提，那就是毛泽东这一方完全是铁板一块，也就是毛泽东说啥就是啥。可是一讲到“权力斗争内幕”的时候，毛泽东的权力似乎又没那么大了。这样的历史观完全是对社会存在的拆解。任何一项政策不可能不符合社会上的某个集团的利益，否则它根本不可能推行。这时候我们就要看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到底代表了哪方面的人的利益，而利益受损的一方又是如何反对，如何阻挠的。现代的阶级斗争与古代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

是一场会涉及到全社会所有成员利益的斗争。根本不去考察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与博弈，这就是某些学者们的逻辑。更奇怪的是，有些人是要故意用一种非理性的视角去看待毛泽东时代，根本不愿赋予那个时代以结构，说白了就是根本不愿讲述那个时代真正的“历史”，无非只有历史事件选择性失明地堆砌。将其作为一个非理性的样板以衬托今天的“理性”，这是非常可笑的。

总而言之，三反五反运动是对社会上偏右的力量，也就是老精英们——他们由于他们的技术知识而不得被留用甚至被重用——进行的一次打击，从而把他们纳入党的控制之下。现在中国面临的困境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共产党干部以及政治运动中的劳动者都没有技术和知识来管理这个国家。而学校里的未来的“接班人”大多都不是工农出身。即使从现在开始从工农之中培养社会主义的管理者，那也需要至少十几年。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就只能依赖无产阶级监督下的这些老精英来进行管理。而这些掌握技术和知识的人却是不喜欢社会主义的，至少他们绝对不希望与工农承担同样的原始积累成本。那么将他们纳入控制之下就是必然的选择。这个控制（或监督）与反控制反监督的斗争就是毛泽东后来常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

前面也说了，毛泽东之所以使用群众运动这样的方式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他希望培养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防党内干部的包办替代主义。如果纯粹用党的专政力量去打压公务员和资本家的话，难保有一天党不会用同样的手段去打击无产阶级。因此三反运动打击的还有党的干部本身。如果让党的力量和群众自我组织的社会主义力量共同在运动中增强，那么以后双方都能够形成进行较量的资本。因此，这里还包含了一个党的包办替代主义，或者说对社会权力的垄断，与群众自我组织和管理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让工农监督党，让党监督资本家和公务员，让资本家和公务员用他们的知识技术“为人民服务”，直至在工农之中培养出自己的技术和知识队伍——这大概是最初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思路。

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也存在严重的问题。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它打击面过大，手段过重，而且非常容易会被官僚们利用来打击异己，比如“三反”运动中工农干部对地下党干部和前国民党公务员的打击，南下干部对本土干部的打击，这严重激化了官僚内部矛盾，也未能使平民获得足够的参与权。因此官办政治运动很难通过正常的官僚渠道达到目的，它在进行第一次实践时就暴露了这一个严重的问题。必须要有体制外因素的充分调动，要有更广泛的社会成员来参与和监督，否则它很容易愿意成为一批人清洗另一批人的借口。后来毛泽东在进行政治运动中越来越强调“发动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下而上”，反对包办替代，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三反五反运动的教训。

1953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正式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当然是把重点放在了重工业上，无论是出于国防的考虑，还是出于之前中国经济结构严重的不平衡（过去轻工业的发展严重依赖进口原料，因为中国无法获取自己的原料），重工业的发展都有其合理性。而苏联虽然援建了156个项目，并接受了6000名中国留学生和2000名工人来苏联学习，但是资金的援助十分有限。至少70%的建设资金得由中国自己筹集。但这就意味着农村的巨大压力。国家征收较高的农业税，同时农村自由贸易越来越受到限制。50年代中期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一五期间，城市人口由5000万增长至1亿人。因此城市一度出现了粮荒。因此，国家采取了统购统销的政策，农民以较低的价格将粮食卖给国家。同时国家也开始大幅加快了农业集体化的进程。总之，50年代中国的经济成就是非常杰出的，它甚至超过了苏联一五计划时期的增长速度。但和世界上的任何经济成就一样，它是建立在社会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剥夺的基础上的。

伴随经济高增长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完成了，尽管之前反复宣传说要在很长一个时间内实现。在建国之前毛泽东是主张在国有经济的领导下发展私营经济的。1948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提出：“**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在机械化基础上实现农民个体经济的集体化，达到社会主义才有可能。**”但是执政之后毛泽东逐渐意识到，后发国家在工业化上的急迫性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局限。薄弱的社会基础无法支撑起快速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精英阶层对社会资源的过度消耗。因此毛泽东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必要性。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从现在开始用10到15年完成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过渡。**”批判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对农业、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简单来说就是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国有化。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开始比较缓慢，但随着“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现，1955年毛泽东激烈批判邓子恢后，到1956年农业集体化以极快的速度里完成了。尽管穷困的底层农民（即“贫下中农”）确实有组织起来的愿望，但是集体化的动力更多地来自上面的包办替代和强制。

而在城市里，尽管未必资本家们都情愿，但是1956年全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国家按企业资本的股份额每年付给原工商业者5%的定息。实际上即使只有5%也使这些人的生活水平要超出大多数平民阶层之上。还有一些资本家被完全吸纳进了体制之内甚至进入高层，利用其管理才能与党政文官和技术官僚合流。我们可以举武汉的例子：

武汉市资本家公私合营后的去向：

上层资产阶级的新岗位：副省长 1 人，副市长 1 人，省局副局长 3 人，市政协副主席 1 人，市局副局长 5 人，省或市顾问 6 人，副区长 4 人，合计 21 人。

工业资本家的新岗位：董事会成员 12 人，大公司经理或副经理 14 人，大公司部门负责人 9 人，工厂厂长或副厂长 532 人，工厂科室负责人 282 人，技术员 40 人，普通人员 1839 人，合计 2728 人。

商业资本家的新岗位：区商业局副局长 6 人，大公司经理或副经理 17 人，大公司部门负责人 14 人，区商店经理或副经理 42 人，商店经理或副经理 1274 人，商店部门负责人 84 人，公司顾问 10 人，董事会成员 24 人，技术员 2 人，普通人员 2258 人，合计 3731 人。

可见，相当一部分资本家与党政官僚合流成为社会经济领域的关键力量了。他们在定息之外拥有高标准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甚至是超出标准工资好几倍的保留工资。更不用说他们宽敞舒适的住房和伴随行政级别而来的种种特权。这都是普通人所不能比拟的。

到 1956 年，中国农村实现了初步集体化，城市中私营企业被逐渐国有化。为什么毛泽东会迅速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某种程度上，这是看到在国家工业化的大背景下随着积累的进一步加剧，要想维持工业化的速度就必须平等地让精英与平民共同承担积累成本，避免精英阶层消费太多社会资源。那么无论是就社会主义的理论上来说，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的工人与在私营企业中比较，可以有更稳定的职业和福利保障，有利于社会的平等；还是就苏联模式来说，国家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地建立强大的，门类齐全的，可以保证国家经济独立地位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通过统一从集体化的农村有计划地提取资金和原料注入国有化的城市工厂，而不至于这种提取和注入陷入非理性和无政府的状态，因社会不平等导致社会动荡。精英和平民平等承担积累成本对于原始积累阶段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时代提倡节俭和奋斗的“资本主义精神”），对于一个处于赶超地位的独立民族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既然需要平等地承担积累成本，那么宣扬平等的社会主义就是理想的选择。而在当时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这就是 50 年代中国全面

引入苏联模式的原因。至于某些“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言论，不过是根本就不分析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所处的阶段就发出的梦呓罢了。首先一些人的利益保障“如此”未必**相对地**比“当初”好，而且一个是一穷二白处于原始积累阶段，一个是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支撑。二者完全不能比。

总而言之，当毛泽东等人看到有必要加快步伐以保证工业化的持续进行时，工农群众为了维护利益而进行自我组织的自发社会主义方向（如农村中自发的互助组）和党的包办替代与权力垄断的愿望这两股合力共同推动了向富农和资本家的进攻，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实际上社会主义改造是一次平民阶层与官僚主义的齐头并进，由于它把老精英全部吸纳进了体制之中（知识分子中党员的比例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那么社会矛盾就已由缺乏技术知识的统治阶级（党）与拥有技术知识的被统治阶级（政治和技术精英）之间的矛盾，变为了拥有技术知识的包办替代一切的党和缺乏技术知识，要求自己解放自己的工农之间的矛盾。至少是党中素质偏高的一批人实现了与原有公务员和资本家的合流。在 1956 年新的政治坐标系中应该是这样：

| | | | |
|--------|------------------------------------|---------------|------------|
| 人群 | 传统公务员、资本家、政工系统干部、地下党系统干部（合称党政文官系统） | 工农干部（或军队系统干部） | 工人、农民、城市平民 |
| 政治倾向 | 中间 | 次左 | 左 |
| 社会地位 | 最高 | 次高 | 名义上很高 |
| 社会力量对比 | 一般，包办替代的愿望最强 | 最强 | 最差，需要引导 |
| 技术知识 | 较强 | 较差 | 最差，需要教育 |

至此，10 年之后的那场政治运动的三大政治力量的社会基础都已近形成。有些急躁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主线就是：为了维持高速工业化的进行，必须使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承担积累成本，因此要引导和支持社会主义力量继续向前推进。但是社会主义力量本身实力太薄

弱，而党政官僚同样反对（如刘少奇），无法继续推进，因此不得不向党的官僚妥协，许诺党政官僚在承担积累成本的同时可以拥有更大的政治管理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党政官僚的包办替代和对权力的垄断。比如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由农民自发的互助组逐渐上升为党的引导下的初级社，再到1955年“社会主义高潮”中的近乎于强制的高级社。在这之中官僚的权力垄断逐渐盖过了农民自身的组织。总而言之，这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胜利，似乎更多是党政官僚们的胜利。尽管在社会主义模式下虽然他们的消费意愿受到抑制，要承担一定的积累成本（比如一视同仁的票证），但是作为妥协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也得到了体制的保障。最终建立起来的是一套苏联式的“无民主的公有制”。这是在社会主义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向党政官僚妥协的结果。但是这次妥协注定了这一体制是不稳固的。工农劳动者可以要求强化公有制民主（也就是扩大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去争取权益，如后来的鞍钢宪法；而党政官僚可以用公有制中民主的缺乏来强化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就是用“特权”即计划经济中的行政力量来“以权谋私”，扩大自身的消费，减少承受的积累，从而重新把更多的积累成本转移到劳动者身上，如缺乏监管的“物质刺激”和奖金制。总而言之，1956年以后的社会问题已经是党对政治经济权力的包办替代主义或官僚主义与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在1956年第一轮的较量中，获胜的是党政文官。伴随着经济建设出现的是政治后果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需要官僚化和规范化，“延安道路”简单扁平的管理让位于专业化机构和严密的科层制。随着大企业的建立，苏联极其推崇的一长制也开始在中国推行。在这之中，关键是一个有明确职责和权限的厂长，即“个人管理负责制”。他只向上级下达的经济指示负责，对工厂党组织的听命越来越少，党只负责思想工作。这种工厂中千万人的意志服从一个人的意志的做法又进一步增强了国家和社会的官僚化。而管理干部中实行的24级工资制和技术人员中的15级工资制都使得他们获得了相当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最终工厂中形成的是两个官僚精英集团：一个是作为企业单位管理者的政治精英，另一个是现代经济部门必需的工程师、科学家、厂长组成的技术精英。前者主要来自于政工干部，后者主要来自于老精英。

而对于工人来说，他们被要求服从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显然，这种集中式的高速工业化需要近乎专制的劳动纪律，专业的规划，社会的稳定。那么群众和群众组织的自发性和创造性就是次要的东西被扔在了一边，允许他们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空间越来越小。工人之间的工资和待遇由于8级工资制也开始拉大。工厂越来越强调物质刺激，但这当然更加有利于技术工人和有特长的少数人。因此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也日趋加大。同时，工会的独立性也越来越低。50年代随着苏联模式的推行，高效率的要求取代了最初“社会

主义”的平等的许诺。虽然工人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获取了不小的经济利益和福利保障，但是在一长制的工厂中工人所享有的发言权似乎并不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强多少。到1957年，工人党员只占全部党员总数的13%，其比率远远低于农民党员，甚至低于知识分子党员。工人要想争取自己的权利还需要更大的努力。

而在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正在进行合作化的农村作为工业化资本提取的来源，它的生产力“解放”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尽管合作化完善了从农村提取资金和原料转化为工业化资本的机制，但匆忙成立的“高级社”始终无法摆脱它的强制色彩。而薄弱的农村基础仍然无法应对普通自然灾害。1954年的天灾就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从而影响了整个工业化建设。城乡差距也越来越大。在合作化达到高潮的1956年，大批农民退出合作社涌向城市。

新的教育体制也在向有利于城市的方向发展。在一五计划期间，小学入学人数从2600万增长到6400万，大学入学人数从12万增长到44万（但此时全国招生名额在50万左右）。显然，中学和大学的入学考试十分有利于城市学生，尤其是特权阶层的子女：旧资产阶级、党政高级干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这些高收入家庭最起码可以拥有更好的学习条件和资源。同时与苏联的教育制度相似，中国的大学，尤其是新建的专科学校，他们的使命是培养出享受特权的技术知识分子。

而此时干部也在发生着变化。党的干部越来越要求摆脱“游击习气”变为管理者和职员，他们要听从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教导。而且因此他们要学会技能，要学会在办公桌后面进行统治。而此时连入党的标准都在变化。随着社会主义改造把非党人士吸纳进党内，越来越多有经验和专长的党外人士被吸纳入党。这不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而是他们在这个新国家之中具有的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党政文官系统在多股力量合流之后形成的强大势力无疑成为了社会的主导力量。对于那些工农干部来说他们处于被排挤的地位。因为现在的社会楷模是工程师而不是革命者。工农干部认为官僚化和权力垄断是对追求平等的革命理想的背叛，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政官僚们则指责说这些老革命的“乡村习气”和“游击思想”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和秩序。工农干部除少数人外，多数倾向于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和平均主义观念。在福利上他们只享有一小笔津贴，更憧憬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但是当1956年党政文官占据优势的时候，1956年的工资改革确立的24级工资制证明了他们的胜利。干部的24级工资制将月工资分成了45元到560元共24级。同时每一级都有对应的福利待遇。当时对每一级干部应该享有的住房的标准描述细致到了有些可笑的程度。尽管宣称是按劳分配，但是如此大的差距是否真的按劳分配是值得怀疑的，更不用说一些人利用公私合营中的一些漏洞来以权谋私，使得其工资远远超出规定的标准。有些

干部或“体制内的人”的工资甚至超过了他的标准工资的七八倍。尽管中国人一度向苏联专家质疑工资差距的合理性，苏联专家的回应是：“拉大工资差距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积极性。”“反对平均主义是列宁主义颠扑不破的真理。”伴随苏联模式的全面引进，政府部门也形成了两个官僚精英集团：一个是作为国家机关管理者的政治精英（即传统上的“官”），另一个是负责具体行政工作的公务员（即传统上的“吏”）。前者主要来自于政工干部（以及少数工农干部），后者主要来自于老精英。

许多人认为苏联模式的全盘引进是对共产党最初许诺的平等理想的背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反映到了现实中，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首先激化的倒不是群众与党之间的矛盾，而是越来越受重视，炙手可热的技术官僚和党政文官与备受冷落的军队干部、工农干部之间的激烈冲突。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将大大加强党政文官的实力，现在军队干部不仅在地位上受排挤而且连实际力量都受到了威胁，这场冲突最后一直蔓延到高层。

也许毛泽东等人对苏联模式一度产生过理想化的想法，但是这一理想几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就破灭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毛泽东一直在为改革甚至破坏苏联模式而努力。

第二节 高岗与胡风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过程中，虽然工人得到了经济物质利益，尤其是职业稳定和福利保障，农民也避免了贫富分化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这是一次为了高速工业化而不得不进行的社会主义方向上的冒进，结果导致党政官僚的包办替代也逐渐严重。他们虽然承担了一定的积累成本，但是很快他们就可以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来获取利益了。而苏联模式的建立使得生产更具有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党的官僚化和技术垄断。但是在这过程中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因此，首先产生的是党内两派力量的分歧，**也就是功勋卓著，在党内处于强势，但在权力分配中却“靠边站”的工农干部，和在党内处于弱势，但通过对工业化建设的技术和知识的掌握而处于权力分配的优势地位的党政文官。**这个矛盾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过，苏联的大清洗就是两者矛盾极端激化的产物。如今，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问题，并且反映到了高层斗争中。虽然两股力量的斗争没有像大清洗那样酷烈，但也轰动一时，这就是毛泽东时代仅有的两个至今未平反的“反党集团”之一的高饶事件（另一个是林彪集团，四人帮是在毛泽东逝世后才被捕的）。

现在有很多回忆录和史料显示高岗、饶漱石并没有什么“反党集团”和“反党阴谋”。这些结论基本上还是可靠的。但是问题不在于这里，问题在于高岗倒台的具体历史以及这

一事件与社会的关系。那就是，由于中国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全面引进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执政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再分配，而在这一分配中，党政文官与工农军队干部之间的矛盾首先走上了前台。

在1953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高岗、彭德怀等人坚决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但是在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工业化的形势使得社会主义成为必要但由于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低于毛泽东的预期，为了遏制党政文官在组织和技术上的包办替代，因此毛泽东倾向于让一度“靠边站”的军队干部来对政治局势进行平衡。其中脱颖而出的就是高岗。在根据地和军队系统的高级干部中，论资历、论能力、论功绩，以及论在军队中的人脉关系，高岗都非常突出，人气很旺。所以，多数军队领导人都表现了对高岗的支持态度。

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在抗美援朝中得到坐镇东北的高岗的鼎力支持，而且高岗出身西北一派，因此彭对他信任有加。高岗议论刘少奇等人的意见看法，彭德怀是“能够听得进而又信以为真”的。1953年7月彭德怀回国治病期间，曾向毛泽东极力推荐高岗当总参谋长。此后，他也想要把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交给高岗。彭德怀还专门就刘少奇、周恩来推行的政策向毛泽东表达过自己的不满。彭德怀对高岗的极力支持，也为他自己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也力推高岗。在财经会议期间，林彪与看望他的老部下谈论说：“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权力，很危险。中央的领袖，毛主席年纪大了，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是久经考验的。”

高岗与一野、四野都有很深的历史关系（高岗出身西北刘志丹部，后来长期在东北工作），得到西北和中南的支持是在情理之中。属于三野的华东，本是与刘少奇很有些渊源的，也出人意料地站到了高岗一边。华东局的第三书记，向有“谭大炮”之称的谭震林，面陈毛泽东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司令部掌握着党权（组织、人事部门）、政权（政法部门）和财权（财经部门）；另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他率直地向毛表示了“大权旁落”的担忧，说白区党有篡党的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很明显，这话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地下党干部来的。谭所说的“白区党”的司令部和“苏区党”的司令部，应是“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的最早版本。

而且，现在不仅是一个文职官僚和工农干部的冲突问题，即使在党政文官内部也存在利益分配问题。刘少奇掌握党务大权后提拔重用了一批经他营救出狱且有长期工作关系的中

共北方局的干部，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廖鲁言、胡锡奎等人，都担任了要职。彭真、安子文掌管了组织人事大权，薄一波掌管了财经大权。刘少奇用人上的狭隘引起了许多南方干部的不满。因此，冲突缘由固然是从毛泽东与刘少奇对社会主义的分歧而起，同时也反映了党内其它山头对刘少奇和华北山头占居中央权力中枢的情绪。其实高岗也不是一般地歧视白区干部，他和陈云的关系就极好。他反对的只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山头的干部。正如高岗后来在检讨中说：“在组织问题上，少奇有宗派、有摊摊，支持华北的干部；……中央组织部尽是华北的人，有的人能力很弱，军队干部对这些人不满意。”而且，作为“高饶事件”的主角之一饶漱石，本人就是白区干部，是刘少奇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1953年初从南方调到中央后，就马上站到了反对华北山头的立场上。中央文献版《刘少奇传》中说：“饶漱石一到中央组织部，就排斥和打击组织部原有的干部，开展对原来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的无理斗争。”这也是“白区党”内部对刘少奇宗派主义不满的表现。

总体来说，围绕工业化中的路线问题，党政文官和工农军队干部发生了第一次大分裂。而把这次分裂引爆为政治清洗的是地方行政制度的调整。中共建政伊始，实行中央和大区两级中央政府的行政分权体制。大区体制对消灭大陆的国民党残余力量和盘根错节的地方割据势力发挥了巨大作用，使中共新政权在广大地域牢牢地扎下了根基。1952年，经过剿匪、镇反和土地改革等运动，大陆上的敌对势力已经消灭殆尽，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朝鲜战争也进入停战期。中共中央开始准备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不失时机地把强干弱枝即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提上了日程。此时，如何平衡各山头的利益成为突显问题，并集中表现为中央高层权力分配的冲突。这便是“高饶事件”发生的体制背景。

1952年8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大区书记和一批干部调到中央工作，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从1952年8月到1953年初，各中央局主要领导人先后奉调进京。其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8月就职）；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年4月就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52年9月就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2年11月就职）；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2年11月就职）。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东北局领导人的身份，就任与周恩来的政务院平级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位高权重，远在其他人之上。故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或人民政府，成立大区行政

委员会。1954年11月，各大区被完全取消。

1953年2月底，毛泽东提出要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议一议调整中央书记处所属的办事机构的建议。刘少奇很快拿出了一份初步方案。接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草拟了一份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刘少奇提出的名单方案是研究“高饶事件”的一个关键性的史料。刘少奇最初提出的书记处名单是：彭真当政府党组书记，习仲勋管文委，邓子恢管农业，安子文管组织，刘澜涛管财经，饶漱石管工青。其中，彭、安、刘都是原来在中央工作的华北局干部，俱是占居要职。新进中央的各大区书记，都没有安排在核心岗位上。这势必让其他山头的人马感到不快，还很有些华北局包揽中央组织人事大权的嫌疑。这使得毛泽东强烈不满。

1953年2月，饶漱石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当年七月中旬，未经中央同意，饶漱石就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指责安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

建国以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政治上虽有多次冲突，但集中爆发还是在1953年6月至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认为社会主义过渡要从现在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以检讨“新税制”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倾”错误，并联系到党内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的分歧，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对薄一波的批判，不但高岗“跳得”很高，其他军队干部的发言也相当尖锐。如黄克诚批评薄一波有圈子；李先念说薄一波是“季诺维也夫”；谭震林干脆拍着桌子骂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饶漱石的发言也很激烈。会后，薄一波财政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交由副总理邓小平兼任。

这次对党内一些本来就对权力分配不满的干部无疑是一个鼓励。他们认为刘少奇政治上不成熟，用人有宗派，重用“白区党人”，忽视军队和根据地的干部。于是，党内高层关于“白区党”、“苏区党”的议论顿起，对“白区党人”掌权不满的各种传言不胫而走，一时形成了一股“倒刘”风潮。高岗在这个期间散布的一些言论，如“白区干部爱犯错误，有帮派。刘少奇对干部有私心，对华北干部的使用，在情绪上有偏向。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有圈子，对干部有偏有私。”在军队干部中很是有些市场。

到1953年6月，经过调整，中央实际形成了刘少奇管党务，周恩来管内政外交，高岗管经济计划的格局。进而，毛泽东提出了中央领导人分为一线和二线的设想。高岗开始积

极散布不利于刘少奇的言论。时隔 20 多年后，在 1980 年 2 月 26 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以高饶事件的历史教训告诫大家，说高岗是在分一线二线这件事上出了问题，“他要抢这个一线。”这表明了以高岗为代表的工农干部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后，正式对党政文官进行总攻，以解决“红区党”和“白区党”实力与地位不对等的问题。

11 月在高岗与彭德怀的谈话中，高岗说：“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还像话吗？他把某某安在华北，某某安在华东，某某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毛主席而代之。”彭说：“不会的，有毛主席在，谁也篡不了党。”高岗却说：“此一时，彼一时，难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彭说：“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高岗又继续说：“天津讲话站在资本家那边去了（指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引者注），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彭再未表示异议。后来高岗又找了林彪、陈云、邓小平谈话，煽动对刘少奇不利的言论，至少彭德怀、林彪都默认了高岗的观点。

1953 年 12 月中旬，许多人，尤其是邓小平、陈云陆续向中央谈了高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摆出了要和林彪决裂的架势。

这就有一个问题：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和对高岗的重用，是否意味要用高岗取代刘少奇的地位？在 50 年代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想法并没有成型，因此他更倾向于苏联模式，那么对刘少奇及党政文官、技术官僚就是非常看重的。他不希望技术官僚以此为资本垄断了社会权力，因此，他是想用高岗来牵制刘少奇，用工农干部的平等信念牵制党政文官的官僚主义风气和扩大的等级制。但是毛泽东是不会完全相信热情有余知识不足的工农干部是有能力独立完成工业化的任务的。最终，当实力强大的工农军队干部向党政文官的地位格局发起挑战时，毛泽东自然不会再支持。

12 月 24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 29 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并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

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当晚，毛泽东南下去杭州休息，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刘少奇对高岗当然不会手软。1954年2月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实际上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明确点出了高岗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个人主义野心家。但刘少奇也做了自我批评，承认了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4年2月15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陈云发言中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高岗甚为惊恐。最后，周恩来做结论说：“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8月17日，高岗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与会的发言者一致主张开除高岗、饶漱石两人的党籍。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高岗后来被指控在东北搞“独立王国”（这使得许多人认为高岗被清洗与毛泽东想铲除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有关）。高岗与苏联关系密切不假，但是密谋夺取政权就有些说不过去。总而言之，高岗急躁冒进的行为使得毛泽东不再支持他，最终促成了他的倒台。

高岗倒台的同时刘少奇也做了自我批评，认可了毛泽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后急剧加快的同时，党政官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权力得到了扩大，尤其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主导权。在1954年9月的一届人大上，原本由高岗负责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丧失了独立性，被纳入周恩来的国务院之下。某种程度上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结果，尤其是党政官僚权力的扩大也都与高饶事件有关。没有了工农干部的牵制和监督，而平民本身更加缺乏组织力量和监督能力，因此很难再阻止官僚力量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包办替代路线和对政治经济权利的垄断。我们之前说了社会主义改造最初是群众与官僚齐头并进，两股合力推动。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最终沾染了很强的包办替代性，最终党政官僚取得了更大的优势，这与高岗的倒台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到了1955年，一方面是工业化的任务要求向社会主义前进，另一方面就是党政官僚强大的包办替代和垄断权力的愿望。由于党政官僚占据了优势，毛泽东很难像在三反五反中那样动员群众来进行整肃。因此，毛泽东使用了斯大林式的方式来进行“肃反”——但是目的相反。斯大林的大清洗是为了巩固新生的党政官僚集团，而对“老革命”和军队进行的血腥清洗，而毛泽东1955年的肃反则是为了限制党政官僚，政治精英的权力，加强党的

中央集权。它以清除高岗的追随者的名义进行，以整风的方式，让被怀疑者坦诚交代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最大的案件即潘汉年案，这明显是对“白区党”的打击。它的力度比大清洗小得多，但还是牵连了不少人。约有 15 万党政干部受到审查，数万人被认为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送入监狱。不过到 1956 年中期开始国家开始陆续平反官复原职并正式向其个人道歉。在肃反运动中，厂长的权力被缩减，党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得到了加强。

但是，并不仅是工农干部怀有那样强烈的革命理想。还有人不仅对建国以后过分务实的政策导致的官僚化现象感到失望，从而更加坚持革命理想，而且还创立了自己的一套理论，这就是左翼知识分子。

建国以后原本的左翼知识分子都被吸纳进体制之内。而城市左翼和农村左翼知识分子的分歧似乎也不像干部之间那么剧烈。但是在文艺界同样有一批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官僚化，尤其是文艺界的掌控者的官僚化。在这之中作为鲁迅曾经的战友的胡风表现尤为突出。

左翼知识分子自二三十年代就有一系列的论争，如“第三种人”之争，“两个口号”之争（即 1936 年周扬、夏衍、郭沫若提出的“国防文学”和鲁迅、冯雪峰、胡风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艺”之争）、“民族形式”的讨论、杂文的作用的争论等等。到 40 年代后期，左翼中支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流”力量与强调“主观”的胡风之间的争论日趋激烈。胡风强调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引起主流左翼尤其是周扬的激烈批评。建国之时胡风写了热烈歌颂毛泽东的作品，他一直希望毛泽东接受自己的文艺主张。但是 50 年代以来胡风受到的批判越来越激烈，其中何其芳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最具分量。

如果说毛泽东 50 年代在经济政治领域相当程度上放弃了延安道路，承认了党政文官占优势的格局的话，那么在文艺上，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的理念的坚持是始终如一的。但是文化制度上苏联模式的引进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迅速官僚化。因此胡风始终坚持自己可以获得毛泽东等高层的支持。1954 年 2 月，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批评了高岗、饶漱石的宗派活动，并指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当时，高饶问题高度保密，知情者仅限于党内高层人士。胡风通过聂绀弩打听到这次政治斗争的内幕，在他看来，周扬等领导文艺的方式与高饶集团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感到

“身上的顾忌情绪在退却下去，对历史对党负责的要求在升涨起来”，决定乘此时机，提请中央将周扬等经营的“独立王国”一揽子解决。

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写成了长达30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经习仲勋转呈中共中央。

报告分4个部分：一是几年来文艺界争论的经过简况，尤其强调了他与周扬的矛盾。二是讲述理论问题，具体阐述他的文艺思想。三是事实举例和党性问题。四是作为参考的建议。由于报告太过冗长，尤其纠缠了太多他本人和周扬的历史恩怨，因此他同时写给党中央的关于文艺政策的信就更加简明扼要。

胡风在信中推断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政治结论。信中说：

“我完全确定了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宗派主义统治一开始就是有意识地造成的。以我的问题为例，是有着历史根源，利用革命胜利后的有利条件，利用党的工作岗位，有计划自上而下地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终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高度的。

我完全确定了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倾向和党的原则没有任何相同之点。我完全确信：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无论从事实表现上或思想实质上看，是已经发展成了反党性质的东西。”

从“有意识”到“有计划”，从“非党”到“反党”，这便是胡风为周扬等共和国文艺界领导所作的政治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胡风上书之前，报刊上所发文章对他的文艺思想的公开批评仅止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现实主义”，并没有超出文艺思想论争的范畴，而胡风在上书时却提出了周扬等“非党”及“反党”的问题，表现出将思想斗争政治化的明确意图。

胡风在信中着重分析了建国后阶级斗争形势及发展趋势，指出文艺战线本应紧密配合党的阶级斗争的中心工作，而周扬等文艺领导却表现得极不得力，因此激起了他的“痛苦和愤怒”，不得不采取直接上书中央的行动。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革命胜利了以后，阶级斗争展开了规模巨大和内容复杂的激剧变化的情势，但在文艺实践情况上反而现出了萎缩和混乱。这个反常的现象是早已引起了党和群众的普遍的关心的。许多使人痛苦的事实说明了这里面包含有严重的问题——到了今天，客观情况已经发

展到了再也不应该忍受下去的地步，而阶级斗争又正在向着更艰巨更复杂曲折的深入的思想斗争上发展，不会容许这个应该担负起专门任务的战线继续瘫痪下去；如果我们再不正视问题，就更不能有任何藉口原谅自己了。”

可以看出，胡风对建国后文艺实践的评价标准并不完全是后来的所说的“创作的自由空间”，胡风的“自由”是建立在“战斗”的基础上的，也就是“积极自由”，是要求紧密配合党的阶级斗争（或思想斗争）的工作。其实这与文革中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的批判十分相似。而胡风的所谓“阶级斗争正在向着更艰巨更复杂曲折的深入的思想斗争上发展”的预测，表现出他比周扬等具备更高的阶级自觉性。为了让中央领导对文艺界“萎缩和混乱”的局面有更深的印象，胡风在信中使用了“封建主义性的陈腐东西和资本主义性的或庸俗社会学的虚伪冷淡的东西取得了、进而扩大了支配性的影响”的极端说法。

“反动的《武训传》之所以能够在庸俗社会学的伪装下面打了进来，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而是由于宗派主义当时正在开始全面地依靠主观公式主义建立统治威信，用着全部力量排斥和打击对主观公式主义不利的、为反映斗争实际而努力的创作追求，因而对于用了和主观公式主义同一实质的庸俗社会学伪装起来的落后的反动的东西不能有敌性的甚至警惕的思想态度所招来的结果。”

胡风在“报告”中严厉批评的文艺宣传部门领导并非周扬等一二人，而是包括当时的中宣部、全国文联、全国作协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了使中央痛下人事变更的决心，他在信中甚至绘出了“后周扬时代”的美妙前景：

“清算了宗派主义的统治以后，就有可能也完全有必要把在最大限度上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和最大限度上发挥群众的创作潜力结合起来，把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作家的个性成长与作品竞赛和在最大限度上在党是有领导地、在群众是有保证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提高政治艺术修养结合起来，把在最大限度上提高艺术质量与积累精神财富和在最大限度上满足群众当前的广泛的要求结合起来……”

因此，当胡风断言建国初期文艺实践全面“失败”而要追究“责任”的时候，就不由自

主地陷入了两难境地：既然上书的主观目的是向党表示“要求在领导下工作”和“非.....担负起我应该担负的斗争不可”的热望，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思想与“党的要求和历史要求”具有同一性，换言之，即承认第一次文代会上制定的“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政策及文代会提出的“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的口号的正确性，否则，便失去了上书的必要性；然而，如果承认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难以解释建国初期文艺实践何以全面“失败”的原因。胡风是这样跳出两难境地的，他在党中央与基层文艺界之间找出了一堵“墙”，这便是周扬等打造的文艺界的“独立王国”，并指责它“封锁”了中央关于文艺的一系列指示，歪曲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蒙蔽了文艺界的干部群众。有意思的是，这个思路被文革中对“走资派”的批判完全继承。

但是这也就意味着他对现实中的文艺界的当权派，与文艺界的多数人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利益冲突。这不仅仅是一场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因为胡风此言一出，很大程度上已经上升为现有的文化制度的变革，这将涉及到无数人的切身利益。在如此众多既得利益者的包围下，很难想象毛泽东会去支持作为少数派的胡风，因为这意味着与文艺界多数人翻脸。起码50年代毛泽东没有这个想法。因此，形势不仅没有像胡风希望的那样以行政力量解决文艺实践重点为问题，自己反而被行政力量击垮了。

胡风写信3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发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继而扩展到反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周扬等因反应迟缓受过毛泽东的多次批评，胡风认为变革现有文化制度的时机已到，在文联的会议上发表了两篇措词激烈的讲话，将矛头全面指向建国以后的文化制度和文艺界当权派，用实际行动实践了他向中央保证的“非.....担负起我应该担负的斗争不可”的战斗誓言。愤怒不已的周扬发表《我们必须战斗》进行回应，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一场全国性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运动全面展开。1955年初，舒芜交出了胡风给他的信，结果在“肃反”的背景下，这些成为了“反革命”的证据。对胡风的批判急剧升级，上升为“反革命集团”。很快这些信件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公开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序言和按语。胡风本人于1955年5月18日被捕。最终被定为“胡风分子”的有78人。

关于周扬和胡风在文艺理论上的争论这里不再展开。但是胡风作为一位坚定的左翼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左翼中的异端知识分子，可以说他敏锐地看到了建国以后以文艺界为代表的官僚化现象，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解决方案。尽管这些方案并不算十分成熟，但是他对建

国以后的官僚化的批评不仅局限于文艺界，在很多领域都是适用的。因此党政官僚绝对不能容忍胡风这样的“异端”的出现。由于胡风涉及到的是体制的问题，超出了意识形态争论的范畴，因此感到切身利益受到威胁的党政官僚进行打击时就绝对不会手下留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讨论《红楼梦》问题中表现出的反权威的平等思想，在通过照顾工农干部来牵制监督党政文官的官僚化与包办替代的作风。这些都促成了社会上反对党政文官专权，反对革命理想被官僚化的政策埋没的社会力量联合了起来发起了反攻。结果，此时对社会主义的想法还没有成型的毛泽东不会完全改变苏联模式，不会改变依靠以刘少奇为首的党政文官、依靠以周扬为首的温和左翼知识分子来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一既定目标。因此，当毛泽东认为激进派过分了的时候就再次转变了态度。高岗被赶下台，交给刘少奇处理，胡风被打为反革命集团。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当毛泽东有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独特看法时，其思想和政策与高岗、胡风当时的观点都有相似之处。因此这两场事件可以看作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起步之时社会主义左派之间的两场悲剧性的内讧。在这场内讧中，高岗和胡风坚持革命的理想化目标，反对官僚化、不平等和权力垄断。毛泽东却认为还要与党政官僚保持合作关系，因此顺应了官僚的利益将他们打倒。这大大削弱了社会主义左派的力量，不仅无法遏制官僚权力的进一步膨胀，而且导致6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左派与党政官僚彻底翻脸时在体制内部处于绝对少数，很难找到合适的盟友（事实证明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笔杆子难当大任），而体制外因素，如造反派，由于缺乏体制内因素足够强大的引导和制约也容易失控，而这是文革最深刻的教训之一。胡风在左派全面失败后尽管表面上被吹捧为“向威权开战”的“自由斗士”，但他的文艺思想却再也失去了实践的可能。这大概是胡风终生不反毛的原因。

50年代是党政官僚的胜利。他们基本建立起了苏联式的经济政治体制。不仅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推动了工业化高速高效率的进行，但同时也在逐步扼杀社会上的其它社会群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向社会权力垄断迈进。而在与党政官僚做出巨大让步，铲除高岗与胡风后，毛泽东意识到不能再退却了，决定对党政官僚的权力进行限制，回到大众普遍进行公共参与，扩大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于是中国掀起了更大的风暴。

第三节 整风反右

整风反右运动是毛泽东时代仅次于文革、大跃进的第三大历史事件，同时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一方面是官方对反右不完全否定的观点，即所谓“反右扩大化”的说法使许

多知识分子不满，另一方面是毛泽东在反右的动机上被人大做文章。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意见认为：“**整风和反右实际上是一回事**”，发动整风就是为了反右，而且毛泽东一开始就设计了“阳谋”和“引蛇出洞”的策略。我们在这里进行详细的分析。

1956年赫鲁晓夫震惊世界的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也同样震惊了中国领导层。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社论非党笼统地谈到了斯大林的“错误”，透露了很少一点赫鲁晓夫谴责的内容。社论一方面称赞苏联新领导人“**对过去的错误勇敢地进行自我批评**”，另一方面又称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领导者，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章承认斯大林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更多地是含蓄地批评赫鲁晓夫未能解释这些错误是如何产生的。在解释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产生斯大林的问题这一点上，中国的评论至少比赫鲁晓夫的报告相对更使人感到满意。赫鲁晓夫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也很搞笑，他把苏联全部社会主义的成就和功绩都归功于党、群众和列宁主义，而把那个时代的一切失败和恐怖都归咎于斯大林一个人。他反复申明，罪恶是由于“**个人独断专行**”。另一方面，毛泽东坚持认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当然毛泽东私下里对斯大林的看法没有这样恭敬。比如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他说“**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按照斯大林的做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

毛泽东还对“个人崇拜”问题作了一种历史的解释，但是其目的与其说是要从政治上正视这一问题，不如说是要把它归咎于历史。毛泽东解释说：“**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是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大家知道，家长制就是小生产经济的产物。**”个人崇拜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被归之于“**旧社会带有毒素的思想残余**”，它“**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保存下来。**”由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贡献，因此“**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但可悲的是他过分夸大了自己的作用并受到“落后思想”的影响。无论如何，防止出现这种问题的必要措施是现成的：在“民主”与“集中”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党

的领导人要谦虚谨慎。讽刺的是，毛泽东这样尝试解决评价斯大林功过的思路在八十年代中国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时被照抄照搬。

要对整风反右进行分析就必须还要回顾 1956 年毛泽东与党内高层关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分歧。当时刘少奇和周恩来拒绝了毛泽东的激进主张反而要求“反冒进”。但毛泽东却增加了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评。他感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只会把 4 年城市工业化已经产生的那些社会、政治和思想上的不满集中起来。这意味着官僚机构的进一步膨胀和发展、专业化阶层与官僚阶层的巩固、现代化中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差距（即城乡二元体制）日益扩大，社会变革的推迟和意识形态的进一步退化。而刘少奇认为这是杞人忧天。1956 年，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和指示，其中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这些讲话描绘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虽然还像过去一样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将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投资；除利用和发展先进的大城市工业外，还要发展沿海与偏远地区的工业；除大规模的城市工业化外，重点将转向农村的中小工业；除中央部门的指导外，还要扩大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自主权；更多采用劳动密集型的项目作为资金密集型项目的补充，用精神鼓励和开放管理取代严格纪律和物质刺激。迅速的社会变革将与迅速的经济发展同时进行，二者决定因素是群众的普遍参与性、创造性与思想觉悟。这是之后 20 年毛泽东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总纲。

但 1956 年 9 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大批准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有关文件还是没有重视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一个庞大的常规的官僚机构，尤其是这个机构掌握生产资料时，很难听命于某一个人的意志，无论他可能享有多么崇高的个人声望。相反，刘少奇和邓小平提出了加强集体领导的新原则，新党章中删去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的话（当时认为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因此删除应是毛泽东本人的考虑）。八大后重新成立了自 1937 年被取消的中央书记处，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他开始对党的组织机构行使引人注目的控制权。中共八大后，中央正式实行了一线二线的配置。形成了政治局管大政方针，书记处管具体部署的格局。中共八大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与 1936 年苏联宪法的表述基本相同。而在毛泽东看来，对胜利的欢呼实际上是对党政官僚的包办替代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优势地位这一既成事实的承认。而他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绝不能停留在官僚包办替代的阶段，

最终要实现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因此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也就是他后来说的：“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现在，毛泽东认为党已经退化成为一个保守的因循守旧的官僚机构，已经不再能推动社会变革，而推动社会变革的途径是从体制外寻找力量。在1956年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的致辞中，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于5月26日宣布了这个新政策。这标志着“百花运动”的开始。

由于毛泽东为了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容许了党政官僚和群众自我组织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齐头并进。但是1956年党政官僚明显占据了优势。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现在就是一个党的包办替代与权力垄断和群众在引导下的自我组织“谁战胜谁”的问题。只有后者才是毛泽东所期望的社会主义方向。因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再次发动一次群众运动进行整风，绝对不是偶然的。而1956年10月在匈牙利出现的动乱，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因此，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更让他看到了进行整风的紧迫性。而此时，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陆续披露出党内工作作风的严重问题。如湖北省襄阳专区在夏收预分中“发现许多农业社干部有严重的贪污行为。”长春市企业领导机关“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平时只顾完成生产任务，不关心工人疾苦，妨碍了职工的积极性。”

毛泽东在1956年11月的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至于方法，“我们主张和风细雨。”

不过，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重点讲到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及少数人闹事问题。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这时毛泽东确实谈到了斗争策略：“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鉴于这种说法，有不少人认为，从这时起，毛泽东就在考虑用“引蛇出洞”的策略发动反右运动了。但是，在波匈事件中，毛泽东看到了对中共政权可能造成威胁的三种情况，即党内外知识界的“奇谈怪论”、群众闹事与党员干部的官僚化和特殊化，其中最令人担心和关注的是后两者。尽管谈到有人（特别点名是民主人士）可能会言辞尖刻，但那毕竟只是极个别的情况。而所谓“后发制人”的策略，则是毛泽东在处理这类问题时的一般方法和思维逻辑。从长期的发展看，执政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转入如何正确处理大量出现的新问题——群众不满情绪引发的社会动乱和干部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况且后者往往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讲话的政治意义在于提出了两个新的命题，事实证明，这两个命题是未来文化大革命的预兆。第一个命题，毛泽东列举了许多种矛盾，其中他特别强调“领导与被领导者”的矛盾。矛盾不仅一般地存在于政府与群众之间，而且尤其存在于“领导者”与“人民”之间。实际上这就是无产阶级的自发组织和党政官僚的包办替代“谁战胜谁”的问题。既然党甚至于党的领导人都有可能犯错误，那么党就应该接受来自人民的批评。毛泽东宣称“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另一个命题认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上的斗争的观点。毛泽东指出，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残余还存在。尽管与其说是剥削阶级残余不如

说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持续影响才是阶级斗争的根源，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两个阶级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已足以说明还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它也与几个月前的中共八大刚刚阐述过的官方观点直接发生矛盾。

令毛泽东担心的是，许多党的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了安抚干部的情绪，毛泽东又解释说，“现在我讲的是有些机关、工厂、学校、合作社连那样的小民主、小小民主都没有，就只有官僚主义，这样就逼出一个大民主，所以出来罢工罢课了。宪法没有罢工的条文是不好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提倡罢工罢课。我们是提倡用批评的方法解决问题。”

对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中进行的整风运动，党内外的反应却截然相反。

在党外，知识分子反应极其热烈。章伯均听了毛的讲话后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名义进行了传达，民盟还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讲话的传达稿后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傅雷在听了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甚至描述说：“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无疑，毛泽东得到了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正像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所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

然而，在3月25日召开的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很多干部对毛泽东的讲话表现出忧虑和怀疑。北京市委在报告中承认，对于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讨论，党内干部包括我们在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并且还有许多糊涂思想，许多同志对这一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的。”有人说：“百花齐放，放就是收，放了紧接着要收。”湖北省委的报告说，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以后，“有些党的干部大吃一惊，他们怀疑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着矛盾，他们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认为人民群众闹事要“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甘肃省委报告，在高级干部中，大多

数人“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与本单位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具体问题时，就不通了。”还有极少数人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革命几十年都没叫人监督，现在革命胜利了反倒要叫人监督了，真想不通。”甚至有人说，“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现在更嚣张了，不把他们整下去总不甘心。”山西省委的报告更加具体：认为“闹事没好人，好人不闹事”，“不承认闹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个别人甚至提出“这次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是否右倾了”，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替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资本家和过去的地主、富农说的话太多了，而替劳动人民说的话太少了。”

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怀疑、抵触和反对的情绪更加激烈。很多人都质问：“这个报告是否是毛主席起草的，是否传达错了？”有人说：“过去听了传达毛主席关于合作化的指示，日日印在心里，今天这个报告实在听不进去”，甚至认为“毛主席这个报告太右倾了”。大多数基层干部强烈抵触，都不同意把这个报告再向下传达或贯彻。由于感到“党给群众撑腰，不给干部留脸”，不少基层党员干部工作消极，想躺倒不干，有的甚至提出退党。

如果我们意识到当时的干部对于毛泽东把矛头对准党内的整风是如此不满，那么这对于我们理解后来发生的事件会有帮助。所有这些材料，无论是来自上层还是基层，无论是党内报告还是新闻报道，反映的情况都是一致的。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毛泽东感到，必须亲自出马，再次进行动员。但党内多数领导人，以刘少奇为代表，认为整风主要还是理论学习 and 思想教育，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在于具体政策的调整，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解决执政党面临的问题，而不想进行牵扯到体制的变革。

毛泽东决定到南方巡视，亲自进行说服工作。从3月17日到4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了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所到之处，都要召开座谈会，对当地党员干部发表讲话，走一路，讲一路，毛泽东抱怨说自己“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

从2月18日至4月14日，刘少奇也沿京广线一路南下，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此行对开门整风方面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他提出：“所有制解决了，生产关系的问题出在分配上，表现得很尖锐复杂”，“真正做到分配公平，讲清道理，人民是不会闹事的。”比如农业、手工业改造后，生产经营单位普遍过大，是农业社和手工业社社

员产生不满的原因之一。刘少奇同新乡地委负责人谈话时说：“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

在党的最高决策层，对于当时普遍出现的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现象，关注点是不同的，解决问题的主张也是各有侧重。同样是处理“少数人闹事”，毛泽东更倾向于动员体制外力量反对体制内的官僚主义，削弱党的包办替代，通过意识形态变革和整风增强社会力量的参与积极性；而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则比较重视调整政策，运用体制内力量解决人民当前利益，处理好人民的生活问题。不过，这并不说明中共高层存在着原则性分歧。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并不在这里，而在于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和着眼点。刘少奇强调的是进行体制内的改革，几乎不讲体制外因素对内部的推动，而这是毛泽东最强调的。刘少奇一直强调整风是一次学习运动，批评和自我批评也限于党内。他几乎就没有谈到过“双百”方针，更不用说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了。甚至到5月7日整风运动已经全面开展起来以后，刘少奇在高级党校的谈话中仍然认为，整风就是“联系个人思想问题，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同时也要“进行同志间的互相帮助和互相批评。”刘少奇还特别指出，“**凡是党内的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的，但如加上挑拨离间、破坏党的活动，也可以把这种矛盾搞成对抗性的**”。这与毛泽东的关于干部搞官僚主义就会把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的说法有很大不同。也就是说，刘少奇坚持认为进步力量来自党这个“先锋队”而不是来自党外，党如果出问题是由于“不进步”的外部力量对党的侵蚀。而毛泽东认为执政后党会利用权力产生官僚主义和包办替代，因此进步力量在不一定在党内。毫无疑问，刘少奇的这种态度和观点代表了当时党内多数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利益，而恰恰这一点，是毛泽东所不能赞同的。刘少奇主张在现有体制的框架下进行一定的修补和完善，实际上是要承认党政官僚掌控社会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整风，而毛泽东着眼于社会建设尤其是改变社会力量对比，这一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提前进行开门整风。

中共中央办公厅于4月30日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文件，文件批评党的干部，“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就在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当天，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

中共主要领导人和 26 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这次讲话，毛泽东重点在于鼓励非党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他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为了鼓励党外人士站出来讲话，对于当时正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教授治校”、“共产党有术无学、不能领导科学”等，毛泽东都表示这些允许讨论。章乃器批评中央统战部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的倾向，指责部分党员、积极分子怀疑和歪曲党的和平改造方针，执行得七折八扣，使工商业者受到无情打击。罗隆基、章乃器等提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不平等，党外人士怕党员，觉得自己比党员低一等。座谈中普遍反映对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十分不满，有人甚至说“现在官气之重，比国民党还甚。”不过，问题是虽然党外批评的力量被毛泽东发动起来了，但是党内多数人，也就是被批评者，原则上拥护但在具体操作上都始终不愿接受毛泽东的观点。所以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虽然说是共产党整风，但真正积极参与其中的却大都是知识界的非党人士。这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1957 年 5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之前说了快半年，一直不温不火的整风迅速升级，“鸣放运动”正式开始。

很快，在这之前在官方组织的会议上人们胆怯地发表不满意的涓涓细流，便在 5 月和 6 月初的会议上汇成了批评社会批评政治的滚滚洪流。中央强迫干部们不得压制这些言论，这似乎证明了党的领导人关于真诚地希望得到批评这种诺言的严肃性，由此，人们的批评越来越大，意见也越来越尖锐。报纸大量报道了有关批评的发言和讲话。人们用越来越严厉的语言表达长期受到压制的思想和感情。在允许知识分子表达他们意见的不长时间内，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见下至日常琐事中的不满，上至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全盘指责。许多人只限于呼吁学术专业范围内的自主权，但是其他一些人则直接论及根本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诸如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问题。

经常提到的是胡风事件。人们问道，为什么不按照法律经过审判就逮捕胡风？为什么胡风提倡的许多主张已为毛泽东 2 月 27 日的讲话首肯以后还继续把他关起来？有人还提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在三反和肃反运动中发生的非法逮捕和拘禁事件。

也许，最重要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批评是出自那些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判断现有制度的

人，也就是指责共产党人背叛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诺言和革命理想。结论是一致的：共产党人已经抛弃了革命传统，正在变成一个“新阶级”。共产党人正在制造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而不是致力于消灭不平等。如：

“党在过去领导群众进行革命的时候是站在群众中间；解放后，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不是站在群众中间，而站在群众背后统治群众……（领导的）职务不同不是身份不同。一些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当官的，就是在吃饭和看戏时他们也要有专门的位置。”

人们指责党的官员和干部采取传统达官贵人和国民党官僚的态度，并享有相似的特权；他们住在特殊的住宅里，雇有佣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贵族学校”就读，享受专门的度假胜地、娱乐设备和医疗条件——所有这些都与群众无缘并且以牺牲群众的利益为代价。一位批评者问：“那些享有很高生活水平的人是谁？”“他们是党员和干部，过去他们穿着草鞋，但是今天却坐着小轿车穿着是中山装。”一位老革命者在致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封长信中得出结论说：“存在着一个特权阶级，即便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阶级，这个阶级的萌芽也正在形成和发展。”一些人批评工人未能参加工厂的管理，没有自由工会，以及在城市无产阶级中制造分裂的工资差别制度和奖金制度。党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农民，以及党从劳动群众那里占有日益增多的社会的产品份额的权力，这意味着将产生一种存在于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新的分裂。实际上，这些与文革中造反派的言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无数人指出过 57 年的右派与文革造反派起码在言论上的相似性。后来党内高层也有人承认：“如果没有反右，文化大革命可能 1957 年就发生了。”

毛泽东的观点与这些言论是高度一致的。在 1957 年，毛泽东就抱怨说：“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长期以来，他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发展，特别是城乡之间的差别。在 2 月讲话中指出：“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而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各项政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用平均主义的运动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并打倒城市特权阶层。

除了抨击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现象外，百花运动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很快为毛泽东所采纳和支持。在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对苏联以及全盘采用苏联模式的批评。一些人抨击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拆除了东北的工业基地，迫使中国承担朝鲜战争

的费用以及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所附加的政治条件和高昂的利息。在反右中，这些人被痛斥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分子”，但是在几年以后，毛泽东却以更加恶毒的言论斥责苏联，并在文革中登峰造极。还有一些人批评在学校里机械照搬苏联的全部课程和教科书，盲目模仿苏联的科学与工业的理论与技术，这种批评正好发生在毛泽东抛弃苏联模式的前夜。教师与学生批评学校与大学中的等级差别的形式主义的作法，这与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对教育制度的攻击几乎相同。人们抱怨当局忽视群众的预防医疗工作，医生们的主要精力都用于照料党的官员，过分重视西医使传统医学被弃之一边。不久，毛泽东也发出同样的抱怨，并在文革中大大颠覆了一把。

在城市百花运动中，大学学生最为激进也最不受约束。著名的“大学风暴”于5月19日开始于北京大学，学生们在校园建筑和教室里张贴大字报表达自己的批评意见，教室里无人上课。“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可以说是这次运动最大的遗产。学生的批评意见与那些老知识分子的意见很多是一致的，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学生的“鸣放”运动带有更明确的政治性，学生中出现了一些准政治性的组织，这些组织发放传单，组织集会，出版油印小报。讨论会常常变成了斗争会，党的干部和大学管理者成为斗争的对象。一些学生领导人很快便在全国知名，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她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抨击“新阶级”制度，到6月初，日益发展的学生运动（这时已从大学扩展到中学）变得越来越好斗，有时甚至发展成暴力行动。学生占领了大学的办公机构，向政府和党的机关发动进攻，并扣押甚至殴打了学校干部和党的干部。学生们还企图“走向人民”，组织工人和农民参与斗争，但没有成功。

这几乎就是红卫兵运动的一次演习。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现象以更大的规模重现。1957年的“大学风暴”比起9年后毛泽东发动的学生运动真是小巫见大巫。

但是，这一次毛泽东没有像他在9年以后那样采取支持行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认为在鸣放中存在着不安定的因素。《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百花运动的结束。它宣称“右派”滥用他们的自由，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相继发表的社论具体驳斥了在“鸣放”时期出现的各种观点，还强调需要用阶级斗争来对付那些在运动中自我暴露的敌人。反右运动开始清剿党内外的鸣放人士，这场运动持续了半年时间。毛泽东最初估计右派有5000人左右，后来这一数字不断上升。邓小平在主持反右工作时批判“温情主义”，主张对右派严厉镇压。后来还出现了按指标划右派的状况。最终，55万知识分子，约占总数的10%，被划为右派。

6月19日的《人民日报》发布了删改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6月

的版本删掉了毛泽东大量鼓励鸣放的话，指责苏联暴力镇压匈牙利事件的言论更是荡然无存。补充的内容中是一个区别正确观念与错误观念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就跟后来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样，模糊得足以把任何一个批评者从“人民”的行列中清除出去。还添加了“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之类的话。强调需要辨别“香花和毒草”。这个修改版的讲话比2月的讲话口气严厉得多，目的也已经完全不同。

反右运动的打击对象首先严厉地指向了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尽管他们绝对不是右派中的典型代表。罗隆基和章伯钧是最公开的目标。后来历史书很喜欢拿他们说事，尤其是将他们树为“典型”以证明右派都是冤枉的。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严厉批判了民盟，正式提出了“章罗同盟”，实际上二人关系差到几乎不能同堂共事。经过无数次的报纸批判和整风会议后，他们被迫承认自己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反党联盟”，并且组织了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见不得人的阴谋”。这一切都与斯大林大清洗时的“自我坦白”类似。

唯一的进步是，在斯大林那里，自我鞭挞式的“坦白”通常被当作判处死刑的证据。中国则不同，在经过一段心理上的折磨考验后，惩罚一般也就结束了（尽管一些人认为这样的惩罚更糟）。1957年，罗隆基和章伯钧被撤销了部长职务，但还是恢复了他们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地位（大跃进中他们仍然在提出批评意见），1959年，又恢复了他们人民政协会议代表的资格。在文革开始前，他们一直有不错的生活待遇。（参见《往事并不如烟》）

学生在5——6月是最热烈最坚决的批评者。学生领导人被送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但是在夏季由党组织召开的斗争会上被定在右派分子的大多数学生仍然被准许在“党的监督”下留在学校（如北大的林昭，但她于1960年被捕）。唯一的例外是武汉的“汉阳事件”，3名学生因大学在城乡招生名额差距太大而抗议，示威最终演化为暴动。他们被公开判处死刑。10年后他们的后辈们会在武汉干出比“暴动”强悍得多的事。

实际上，受到最严厉对待的是那些提倡在现实环境中实现自由的作家和艺术家。周扬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战斗”成了对社会主义作家进行镇压的战斗。在反右斗争中，文学艺术界的第一个牺牲品是丁玲。她被开除出党，撤销了其在作家协会中的职务，并被发配到东北进行“劳动改造”。类似的命运也降临到其他知识分子头上，被划为右派的文学家还有冯雪峰、艾青、陈企霞、罗烽、白朗、秦兆阳、萧乾、吴祖光、徐懋庸、姚雪垠、黄药眠、穆木天、傅雷、施蛰存、陈涌、公木、钟惦棐、王若望、汪曾祺、刘宾雁、王蒙、邓友梅、

刘绍棠、蓝翎、公刘、白桦、邵燕祥、流沙河、高晓声、张贤亮、昌耀等人。作家协会几乎成了惩罚异端作家的警察局。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如郭沫若、茅盾、马寅初、巴金、叶圣陶、老舍、周建人、许广平、许德珩、朱光潜，王亚南、李达、俞平伯、吴晗、秦牧、翦伯赞等人都积极参与了反右，并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批判文章。有人说这些人是为了保护自己，迫不得已的。但是这些人使用的语言和方式却超过了仅仅是保护自己。或者说，攻击别人是“迫不得已”，但是他们攻击的“积极性”超过了“迫不得已”的程度。在当时的形势下，表态是必须要表的。可是有的人对自己的同事进行上纲上线的攻击就不仅仅是表态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多数人并不至于一定要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来“保护自己”。只要在本单位表态就够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同时就是“单位”领导人或在鸣放中受过攻击），因为除了个别的人外，划右派是在单位内搞的。显然反右已经演变为一场激烈的利益斗争，对于已经融入官僚体系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是不会轻易容忍对他们利益和特权的挑战的。

总而言之，反右运动加强了党政官僚对国家政权的垄断，巩固了他们在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的优势地位。这就是所谓“57 体制”。知识分子基本丧失了参政的信心，甚至丧失了思考另一种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和理论的愿望，他们更习惯于沉默。它造成的消极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当时在中国国内和国外都广泛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整个运动都是共产党领导层为清查其不同政见者而设下的一个圈套，是“引蛇出洞”，一旦他们自我暴露便立即给予惩罚。由于反右运动使得事实确实变成了这种情况，某些领导人后来宣称，这就是运动本身的目的。7 月 12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党是故意让“毒草”出笼的，以便摧毁它的栽培者。毛泽东则提出了“阳谋”论。1958 年 5 月，刘少奇在解释百花方针时说道：“我们允许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出笼，让人民进行比较，通过比较的方法人民就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毒草的实质，产生义愤，团结起来连根铲除它们。”

前面已经说了，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对百花运动政策持保留态度，而各级党的机构，尤其是基层干部则是强烈反对这个政策的。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是毛泽东绕开了党的官僚机构直接向知识分子发出的号召。批评者被鼓动起来了但被批评者却不愿接受。由于党在开始时实际上并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因而也就不存在党为什么违背自己的诺言这个问题。党政官僚为了自己的利益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斗争自然也在情理之中。问题在于，为什么毛泽东要做出这种允诺而在后来又要违背自己的诺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力量的对比。1957 年的形势分析应该是这样的。毛泽东希望遏制党的包办替代和权力垄断，因此他的主

要目标是当权的党政官僚，这与他在 9 年后的目标相同。也是同样的，毛泽东只能绕过整个官僚系统向知识分子发出号召。但是知识分子首先要面对的是他们头上的“领导”。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毛泽东不断地号召鸣放，知识分子响应了这一号召，但是党政官僚采取了压制态度。结果在毛泽东的不断鼓励下，知识分子由于受到官僚的压制因此鸣放地更加激烈。我原本只是提意见，没有想说别的什么，但是你不让我说话。这是 1956 年底的状况。但是，领袖是支持我的，于是，我就想对你提出更激进的要求。而你的压制也就越来越狠。这是 1957 年初的状况。于是我终于忍无可忍，质疑这整个制度的合理性。这终于使高层在巨大的压力下妥协，允许了官僚的镇压。憋了一肚子气的官僚顿时发动了强大反击。这是 1957 年夏季的状况。我把这种毛泽东时代特殊的政治循环称为“反抗——镇压”循环模式。它是领袖与底层实现了特殊的体制外互动关系，共同打击体制内官僚集团这一模式中产生的循环现象。这种循环模式后来在文革中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当我们了解到党内多数人对毛泽东发动的整风强烈反对，以及知识分子是在官僚的压制之中观点持续激进这两个事实后，对于“引蛇出洞”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解释：既然反右运动是党政官僚巩固权力的决定性胜利。因此，发起了这场对党的批判的毛泽东就必须对官僚们做出解释。官僚们认为，我们功勋卓著，我们呕心沥血，我们对党一片忠心……（官方讲文革的书都是这么写这帮人的）凭什么你要让知识分子和学生来批判我们？其实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打击官僚的质问都可以套用在这里。那么，对于失败了的花运动，“引蛇出洞”或“阳谋”或许就成了维护毛泽东的形象，也是维护党的“一贯正确”的形象的最好说辞。如果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圈套，那么毛泽东有什么理由不同党政官僚们事先商量好呢？

但是这并不是说反右仅仅是毛泽东向党政官僚妥协的产物，没有毛泽东本人的考虑。尽管毛泽东欢迎知识分子对官僚进行批判，但是老精英们趁机发起的攻击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也就是说，“右派”中既有左翼也有右翼（见 1956 年政治坐标系）。因为毛泽东真正不满意的是党政文官，即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不满他们的特权待遇和对工农积极性和自我组织性的压制。但是与传统知识分子矛盾最深的是工农干部。无疑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发生了严重冲突，工农干部偏低的文化素质也使他们与知识分子不能和谐相处。致命的是，不仅是传统知识分子，留用的国民党公务员甚至是资本家都加入了对工农干部的攻击中。这势必会引起工农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强烈反弹。当时“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之类的言论，无一不是针对被认为是“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的工农干部（但前面说

过，工农干部缺乏技术知识，但因为有根据地经验，因此未必不懂管理)。一些地方报纸刊载的国民党的留用人员的发言，干脆连民主都没有提，仅仅说工农干部没有知识，应该赶快下台。更有甚者说：“至少 10%到 30%的党员应该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这种对干部的批评的明显的倾向性刚好与毛泽东的预期相反。在工农干部看来，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老精英的这种主张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工农干部这时候也要进行反击，要讲技术知识，至少短期内他确实没有，但是他有管理根据地的经验，有对平等的追求，有工农出身的本钱，他就有理由以社会普通大众代言人的形象进行反击，指责老精英这样的想法会产生特权思想和不平等。这是巩固他的领导权的最好方式。因此在这之后，对所谓“成分”的强调就越来越重，从工农干部扩展至整个党政官僚阶层，再扩展至全社会。

1949 年以前上大学、上高中的绝大部分就是传统精英的子女，因为工农子弟大多没有机会上，连上小学的机会都有限（哪怕 49 年刚刚开始上小学，到 56、57 年，才小学毕业，所以高中、大学都轮不到工农子弟上），所以工农干部面对攻击更强调“成分”。原本“成分”仅仅是土改用一下，马上就会取下，但是 1957 年以后“成分”的作用被大大加重，这与反右有密切联系。后来“成分”不仅工农干部要利用，所有党的干部都利用上了。这直接导致了党政官僚特权的巩固与干部子弟的强大优越感（传统精英子女受“成分”压制，工农子弟受教育资源和经济条件限制，因此“成分”在教育中最有利于干部子弟）和文革中极端的“血统论”。

而工农群众也对知识分子的鸣放采取了漠然的态度。尤其是在 1956 年刚刚涨了工资的情况下。当时一位在北京的外国人说：

“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工人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

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

知识分子要么是在宣扬抽象的民主自由理论，普通人根本不理解；要么仅仅是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由于他们的极高收入和种种特权使他们被看作党政官僚的同路人，因此他们的行动被工人市民看作不过是在与官僚争权夺利的而已。简单来说，当时民众看待鸣放的态度就与今天多数人看待文革的态度是一样的。也正是由于脱离群众，知识分子在面对党的打击之时毫无抵抗之力。而且这也就是为什么 1957 年的学生与 1966 年的学生在言论甚至行为上都如此的相近，但是前者叫做“右派”后者叫做“造反派”的原因。

如果说反右标志着改革的失败和党的机构的胜利，这一胜利还扩展到了经济领域。由于大批涌入城市的农民被证明是鸣放运动中的社会不稳定因素，7月下旬在青岛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又决定把斗争从城市扩大到农村，目的是巩固合作化，反对农村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反对允许自留地和自由市场发展的右倾政策。那些退出合作社的农民也被劝说或强迫重新加入了合作社。农民进城受到了更严格的限制。党政官僚的包办替代性越来越强。

但毛泽东进行了最后的反戈一击。在鸣放失败后，毛泽东决定运用体制内手段来解决官僚主义问题——但这会使党的包办替代行为更加严重。他将反右派斗争转变成一场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一场大规模的清洗，对官僚主义发动了体制内的攻击。“反浪费、反保守”的整风运动随着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的“反冒进”的批判而迅速升级。到这场清洗运动持续到 1958 年时，又发展成了“插红旗，拔白旗”行动，有数百万党员受到了开除、留党察看和警告等处分。伴随而来的是毛泽东的激进的社会发展方案得到了党的最高层的认可。10月初，中央正式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激进的农业发展十二年规划，解决了关于经济政策长达两年之久的争论。实际上，这意味着放弃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并直接导致了 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到 1958 年初，八大关于基本矛盾的提法被否定，中共再次提出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这显然是符合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的。总之，毛泽东通过体制内的打击达到了他原本想利用体制外的普遍参与来达到的目的。但是此举更加增强了党政官僚的包办替代倾向，为大跃进的灾难埋下了祸根。

从双百运动开始，中国逐步抛弃了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宣布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方面实行自主，脱离苏联及其斯大林模式。然而，中国虽然很快打破了苏联式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却未能相应地在短时间内抛弃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内的苏联模式。这直接导致的是大跃进产生的消极后果。从 1957 年开始，中国走上了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这条道路并不是——起码短期内不是——通向曾允诺的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的目标。

第三章 大跃进

第一节 新思路

可以说社会主义改造后对苏联模式的失望是促使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本身尤其是“延安道路”中寻找可供中国进行独特的现代化建设的因素的主要原因。一些人认为大跃进只不过是一场鼓励人们多生产，“向自然开战”的宣传鼓动而已，与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和朝鲜的“千里马运动”性质完全相同，只是被“不懂经济规律”，“不懂自然规律”的毛泽东搞坏了。但这一解释无法说明大跃进背后激烈的体制变革以及它对中国后来的政局产生的影响。毛泽东在事后明确表述了大跃进的总体思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这是对落后独立民族国家赶超模式的一次重大发展。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所有人都相信，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要从城市工业化开始，为建立一个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而这种物质前提是资本主义无法提供的。然而到 1956 年，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导致了官僚主义的成长和官僚机构的逐渐僵化，产生了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和特权阶层，现代化中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差距日益增大。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目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的方法才能实现。毛泽东用来对付城市工业化弊端的方法是**农村工业化战略**。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结束之际，中国社会面临着三个主要问题，毛泽东独特的经济理论正是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一个直接和紧迫的问题是日益严重的城市失业与农村半失业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没有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其次，一个比较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加速“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进程。由于不太可能使用外国投资，这个问题就变成如何最有效地使用中国的主要资源即人力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人们普遍承认中国需要“技术革命”，但问题在于，在不产生官僚主义和社会不平等的前提下，即在不允许享有特权的技术知识阶层发展的前提下，如何才能迅速地掌握现代技术和现代科学，又如何才能获得这种掌握。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人口问题及失业与半失业问题。现代世界经济落后的国家的特

征之一就是城市化的速度比工业化快得多。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留给落后国家的诸种现代后遗症和恶果不仅是现代城市与落后农村之间的不平衡现象，而且还有城市经济本身的扭曲发展以及城市本身的畸形形式。城市建立了虚弱且结构不健全的工业基地，大量的人口堆积在一起，其中绝大部分住在城市边缘的贫穷和肮脏地方。在当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都市中到处可见这种可怕的社会后果，1949年前的中国大城市情况也是如此。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最初几年的统治中成功地解决了城市中最糟糕的社会混乱情况，如老舍的《龙须沟》就是对这一政策的歌颂，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问题。尽管50年代城市工业和城市无产阶级发展得很快，但许多进城农民在城市企业中还是无法找到工作。其结果，一是城市的失业与半失业人数的不断扩大，二是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农民进城的措施。

在现有体制下，仅有的办法是通过各种政策限制农民进城和各种各样把城市人送到农村去的下放运动，但这只不过是加剧了农村的半失业问题。农村拥有的人口已超出了现存农村社会经济组织所能容纳的范围。

1957年初，由于前一年秋季农业歉收，再加上农业集体化造成的问题使大批农民流向城市，城市失业问题接近于发生危机的程度，在夏季的鸣放运动中也确实发生了这种危机。同时，精简机构运动、部队人员的大量复员转业以及能够进入大学的中学毕业生人数的减少等，都加剧了失业问题。“二五”计划估计今后的失业率可能会越来越高，失业的人数可能会达到5000万人。在这样巨大的并且迅速增加的人口情况下，继续强调大规模的资金密集型的现代工业意味着至少在短期内要增加失业率，加剧长期存在的半失业问题。

1958年，毛泽东宣布进行的重大变革本质上是将发展的重点从资金密集的项目全部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的项目——即从重工业转到相对来说需要的投资较少且要求最大限度使用人力的农业、轻工业和中小规模的工业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这一方针的目的是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和农村中的失业问题。与此同时，宣布这一方针的本身还旨在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就像他后来说的，“人不要都挤在城市里。积极地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这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标准一定不要低于城市，……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地区人口过多的问题。”从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的经济发展战略来看，庞大的、不断增加的人口不但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障碍，相反，却是一笔经济财富。在1958年以前，毛泽东还热衷于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而到了1958年初，毛泽东却公开宣称：“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刘少奇也积极鼓吹人多的好处，原本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主

张控制生育的马寅初被指责为“马尔萨斯人口论”而受批判。

第二，劳动力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问题。在苏联，“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通过剥削农民实现的。斯大林采取的经济战略是有意识地从“集体化”了的农民身上抽取实行工业发展的速成计划所必需的资金，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完全服从于尽可能迅速地制造一个巨大的重工业基础这一压倒一切的目标。与这一决策相应的信念是，一个建立起来的现代工业基础具有一种“扩散”效应，它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的现代化。和苏联的情况相似，50年代中国工业化的资金也主要是从农村筹集。不过，中国是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大量农民依然处于生存的最贫困线的边缘的情况下开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农村承受剥削的能力比苏联还差。如果继续照搬苏联模式就需要采取日益具有强制性的剥夺农民的政策。而毛泽东相信，通过大规模地发动和利用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尚未发掘的劳动力就可以更快地积累资金、更公平地进行投资。

毛泽东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简单地说，毛泽东的结论就是，促进轻工业为农民的消费生产廉价的商品，这会极大地提高农民增加农业产量的积极性，农业产量的增加又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轻工业的发展，这是国家为重工业发展积累足够资金的根本前提。

没有人会对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产生疑问，但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统筹兼顾。人们一直认为，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只能以牺牲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为代价——大多数中国领导人能够接受这种观点的实施所造成的社会结果与经济结果。如果不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那么怎样才能为轻工业和农业的“大跃进”提供资金？毛泽东认为，同步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中国的人力，通过建立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和适当的思想指导，就能在一场全面征服自然的战斗中发挥和发动至今尚未利用或未充分利用的中国人力资源。毛泽东认为，只有人民群众在自己的组织中真正参加了经济规划经济决策，群众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因为中国的主要人力资源特别是那些尚未被利用的人力资源是在农村，所以迅速发展经济的新战略的重点是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如今，农村的人力将被充分用来促进农村的工业发展。农闲季节的大批剩余劳动力将转向发展需要资金很少的中小型工业企业和农田基本

建设中去。农村中诸如粮食加工业、工具制造、简单的消费品生产、煤矿生产以及小化肥厂这样的劳力密集型企业也将与农业生产一同发展。这些地方性的工业项目不仅会有效利用农民的人力资源，而且还将使工业企业更接近原料产地（因而减轻了脆弱的交通运输体系的压力），开发利用不适合城市重工业企业使用的质量较差的原料，并鼓励了立足于当地的需要和条件的技术革新，普遍地加快了支持大型建设工程和工业项目的资金积累。地方工业的发展将会促进中国比较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地区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农村的工业化被看作是消除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一个步骤。

分散化的经济格局与强调地方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放弃国家计划经济，国家甚至制定了更为宏伟的重工业发展规划。“两条腿走路”的新工业方针设想以本地技术与本地资源为基础，同时迅速发展国内大规模的现代经济部门与中小型工业。因为中小型工业是采取劳力密集型方式经营，所以人们认为它们不会影响到重工业的投资比例。

毛泽东“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战略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乃至落后国家赶超模式的一次极大的飞跃和发展。直到70年代西方学者才认识到农村现代化对于落后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在50年代斯大林模式遭遇危机的时候，爱沙尼亚（当时属苏联）经济学家雷格纳尔·努克斯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型，他认为在众多贫穷的农业国中典型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可以由负担变成财富，使用这些劳动力来提高产量，搞多种种植，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增加劳动密集和低技术的乡村工业。他还详细分析了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结论是增加农民的购买力可以创造驱动工业化前进的有效需求。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他高度一致。但是理论只是理论，想实现还需要体制的保障。

第三点，技术革命。事实上，大跃进许诺的巨大经济成就便是以大量地迅速地采用先进的技术并以科学教育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强调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需要。在发动大跃进运动时，毛泽东在欢呼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的同时，又对国家的经济落后感到痛惜，1958年1月他宣布：“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内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

但毛泽东关注的是怎样掌握和由谁来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毛泽东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國过分依赖于苏联的技术。在《论十大关系》中他警告说，对于外国的东西，“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这里说的“外国”无疑是指苏联。这个思想在1958年初表达得更为清楚，毛泽东当时说：“学习应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马

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 “

由于开始的是一种激进的、新奇而独特的发展战略，因此毛泽东决心打破中国对苏联的技术依赖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不仅仅是因为苏联提供的许多技术都不适用于中国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尤其是不适用于毛泽东最新强调的小规模的农村工业化，而且还因为毛泽东非常担心中国在经济技术上对苏联的依赖隐含着政治上的依赖。这预示了大跃进时代的主旋律之一：“自力更生”的原则。在经过了大跃进之后，自力更生成为人民共和国各项方针和实践的基石。

他在成都会议上还举了一大堆的历史上的例子证明年轻人在发明创造，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要求人们“敢想、敢说、敢干”。“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这是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引者注），完全必要”“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要老想看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他认为科学技术在政治上并不是中立的事物。如果放任自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会产生技术特权阶层，培养官僚主义和社会不平等。1958年1月，毛泽东就重提了科学技术与政治和社会的联系，他警告说，关于红与专的关系，容易产生不问政治的倾向，“**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的问题是，在不产生特权技术阶层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使中国获得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毛泽东对此的解决办法简单地出奇：**工人和农民将直接掌握现代科学技术**。而且他们将在日常的生产工作进程中掌握现代技术，在实践中学会必要的技能和专门知识，边干边学，并以适合于当地条件的方式把学习到的知识直接运用于生产实践。社会上将不再有“专家”，只有“又红又专”的具有政治觉悟的新一代能工巧匠，他们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既能够从事科学和文化工作又能够从事体力劳动。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在全国产生毛泽东所说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又红又专”是一种能够普遍地实现的理想，正如中国将要在技术上自力更生，不依赖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人民也将要在技术上自力更生，不依赖于走“白专道路”的技术知识阶层。技术发展被当成了一场群众运动，大跃进期间叫得最响的口号便是：“**群众必须自己掌握文化与科学**”，“**反对白**

专路线”。然而，对党的经济规划者来说，这种设想在经济上似乎是荒唐的，面对技术知识精英来说，这种设想则是一种职业上的威胁。这一带有乌托邦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的要求使运动有了陷入空想的危险。

第二节 实践

毛泽东明白新的经济战略必须以社会经济部门和政治领域的放权行动为前提。1957 年秋天曾实行了激进的分散化方针，将北京中央政府和各经济部门的相当程度的管理权限下放到省市一级的管理部门和大型经济企业。1958 年初毛泽东激烈批评高度集中的体制：“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大批的事交给省、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应该相信他们。”到 1958 年实际上权力被下放的企业占到了总数的 88%。连财政权力也都被从中央下放到了地方，直到 1994 年税制改革才被收回。这一次超级放权比东欧苏联的改革更彻底也更激进。它把经济的决策权交给基础的生产部门。运动在 1958 年初的几个里主要集中在增加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轻工业产品产量由于国家对劳动力的调动而出现飞跃。重工业和农业指标也越来越高。为了有利于地方当局和基层生产的单位的生产自主和决策的权威，解散了部分中央官僚经济机构。在新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由于官员们都被“下放”到农村和工厂从事体力劳动。用来鼓励工人和农民更加努力地长时间工作的不再是物质报酬，而是思想教育，以及“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的诺言，尽管后来多数农村干部和农民都会把那个“面貌”理解为大同社会的千年乐园。运动在组织上的主要特征是靠从社会上发动群众而不是由官僚指挥命令去从事劳动。大跃进带有越来越浓郁的军事色彩，它被人们比成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战斗，而且确实也成了一场“与自然界的战斗”，它需要人们具有同样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

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构成了工业大跃进的标志，根据这个方针，在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发展那些以土技术为基础的中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城市现代工厂，即“第一条腿”来说，这个方针意味着工人要延长工作时间（对某些工人来说还意味着降低工资）以适应更高的生产定额。新工业方针的“第二条腿”使得大量农村小工厂开始涌现。尤其是化肥厂和小煤矿往往能更有效地适应农村的迫切需要，并能有效地开展长期的技术革新。

但是，为了调动各方积极性，对苏联模式的颠覆首先破除了严密的经济计划。结果是“第一条腿”逐渐被越来越疯狂的生产指标压垮。由于要优先保证煤的供应，钢铁的生产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铁矿分布得非常分散而当时中国钢铁生产却过分地集中，而外运的运输线已经被运煤列车挤满。有人分析说：

“局部的和初期的一些成功使乐观情绪高涨，新闻媒体上的鼓动宣传更加推波助澜。计划指标被迅速膨胀。一些省级官员为了从中央得到更多的资金而抬高目标。大跃进战略的重点原本在于快速发展轻工业，因为毛泽东相信这样可以更快地回收资本，但是，除了劳动密集的项目之外，其他所有项目都需要机械工具，这样就加重了对钢铁的需求量，所以大跃进是对钢铁超出原计划的渴求。就不难理解。比起铁矿的广泛分布来煤矿的分布相对集中，所以当运输系统被运煤任务压到满负荷的时候，在全国调运钢铁的任务就被推后了。”

各地上马的工业项目仍然需要大量的钢材，更不用说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对钢材的需求了。而苏联式严密计划的破除也使得官员们随意打包票。这最终促使了8月份毛泽东在听取了薄一波、王鹤寿等人证明农村“土高炉”是可行的汇报后做出了用“第一条腿压第二条腿”的决策，也就是发动农村用土高炉大炼钢铁。这意味着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被按劳动密集型的方式处理。“土法炼钢”的可行性论据来自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国到处散布着零星的铁矿，开采利用并非难事。错误出在过于乐观，忽视了炼钢所必需的技术投入，而且天真地以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推广。这被认为是大跃进最糟糕的决策之一。很快，一级压一级的行政命令使得强行摊派的炼钢指标取代了原本农村因地制宜自力更生发展小工厂的行动。不仅农村劳动力被过量占用，而且资源遭到极大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它加剧了农村干部的包办替代而不是自发组织。如一位学者所说：

“更为根本的问题出在等级制的党政系统不应对群众运动的指挥，只有群众的能动性被调动起来才能使运动进入正确合理的轨道。中国的地方干部普遍受到来自上级领导的压力，不得已采用强制手段进行管理。悲剧性讽刺在于当中央破除了斯大林模式的同时，各级干部却在中国数以万计的村庄里复制出斯大林模式的缩微样本。当时的政治体制使全党的干部不是对人民负责而只是对上级负责。大跃进本来是要给予人民权利，结果却是地方干部截留了权力。”

在农村，家庭自留地的面积被缩小了，集体劳动的规模和强度日益增加。数百万城市干

部和技术人员被下放到农村帮助农民建立新的地方工业组织，浩浩荡荡的农民大军被发动起来修建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兴造水利工程运动”开始于 1957 年秋天，到 1958 年初的几个月其规模便急剧扩大，达到千万计的规模，并直接引发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干部和贫农自下而上的自发激进主义与省市干部追求政绩的包办替代主义构成了相互作用。与 1955 年集体化运动时的情况相似，这两股力量相互加强，使运动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运动发展的疯狂速度甚至远远超出了它的发动者的希望和预期。第一批人民公社于 1958 年 4 月出现在河南省的试验区。7 月初，当合作社合并为人民公社的运动迅速在河南、河北和东北一些地区展开时，起支配作用的更多是自发性和地方的创造性。但是很快它就为官方所认可，并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效途径。

7 月初，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37 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把人民公社的观念和理想也归功于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也就是说人民公社不仅是生产组织，而且是把工业和农业、教育和生产、经济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将**“工农商学兵融为一体”**的新社会组织。

8 月 29 日，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正式批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议。决议批准了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并承认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决议认为，“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的规模较为合适。决议指出，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防止强迫命令和急于求成，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此外，决议强调人民公社的性质依然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8 月 29 日的决议是一个比较稳健的文件，但建立人民公社却随着“插红旗，拔白旗”的展开变为强制行动。

到 9 月底，至少有 90% 的农户已正式加入了新建立的人民公社。年底以前，实际上所有的农村人口都被组织进由 75 万个合作社匆匆合并而成的 2.4 万个人民公社之中。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官方规定的要大得多，在“一大二公”的号召下，平均每个公社由 5000 农户（约 3 万人）组成。不过各社社员数量很不均衡，少的有 5000 人，多的超过 10 万人。许多人民公社无视 8 月决议的禁令，乌托邦幻想的膨胀导致了完全废除个人财产，实行社会绝对平均的要求，即所谓“共产风”。最典型的是把不同合作社强行拉平的“一平二调”。由于

绝大多数强劳力和妇女都参加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劳动，1958年初尚占耕地总面积7%的自留地实际上已被取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搞得最激进的地区，社员家中从锅瓢碗罐到钟表、家具都成了集体财产，上交给公社，或者投入到土高炉中炼铁。

很明显，人民公社被承载了过大的希望：农业上要求运用机械化精耕细作，密植深翻，此外还要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工业，大办交通，大办学校，大办绿化……如果这些做成长远规划可能效果会好得多（如70年代那样），但是在狂热的氛围下人的主观能动性被夸张到无限的程度，所有一切美好的蓝图似乎都要在3年之内完成，这势必要摧垮农村薄弱的经济基础，更不用说那个“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了。

比当时引人注目的激进措施具有更大和更长远意义的，是当时实行的工业政策和教育政策。最重要的政策是“农村工业化”，另一项政策是采用以“边生产，边学习”的原则为基础的新的教育体制。在当时劳动力从严重过剩骤然转到非常缺乏的情况下，土高炉炼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资源，但是它得到了最强烈的关注和吹捧。但更与此同时建立起来的声势不太浩大的其他农村工业却是富有活力的并常常是创新的。这些工业依靠当地的人力和原料，通常采用比较初级的技术，较好地适应了农村的直接需求，实现了发展这些工业的目标。它们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别处不生产的小商品，充分利用了原来有可能浪费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即使这些工业最初还有着浪费、低效和失败的现象，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通过公社经营的商店、农用工具的制造和修理、生产化肥和农药的小化肥厂、小规模电站以及地方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中国农村的确得益匪浅。并且，无论是农村社会还是国家经济都从地方煤矿企业、小炼油厂以及地方生产消费商品的企业中获得了利益。1960年公社一级的农村工业企业已经有11.7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总数的47%）。因此，如果没有用“第一条腿”去压“第二条腿”的决策，没有对大炼钢铁的幻想，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的战略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新的教育政策与强调农村工业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伴随着人民公社化的是由地方兴办各种教育机构的雄心勃勃的努力：“红专”大学、夜校、业余教育制度、以及各种各样的“半工半读”计划。地方办教育主要目的是为农民提供开办农村地方工业所必需的基本技术知识和基础文化知识，并推动在农业生产中进一步采用现代技术。地方教育计划是以近代中国关于基础教育的观念和经验为依据制定的。这些经验包括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半工半读”理想，以及延安时代的民办学校和其他教育经验。各种基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规划被描绘为“用来培养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有文化劳动者，保证他们在德智体方面全面发展，成为共产主义新人”的规划。

另外，人民公社这个形式带有明显的分散化，扁平化管理的趋势。这使得人民公社的作用扩展到了政治领域。消灭三大差别是它的使命之一，因此这种赋予了基层单位以极大权力的体制实际上也是对官僚体系的对抗。张春桥 1958 年因一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他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用的一个概念引申为现实中等级观念导致的不平等现象。后来毛泽东在会议上说：“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以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当然此时毛泽东更多地讲的是头脑中的等级观念，而不是后来的体制因素和现实中的官僚特权。但是这确实意味着人民公社化的现实对现存的党和国家官僚机构行使职权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官僚主义和扁平化管理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在这个问题上并未能把握住方向。

前面我已经说了党的体制问题是大跃进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在大跃进中，无论是高层急躁的催促还是农村干部“大同社会”的幻想，都使得这场运动彻底成为了一场官僚主导下疯狂的强制生产和乌托邦狂热。这与毛泽东最初设想的由群众自我组织和开办农村小工厂的计划背道而驰。这是因为毛泽东的设想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现在农民确实是按照“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方式组织起来了。但是社会主义改造原本就是自发组织与包办替代主义的合力推动。而在大跃进中，后者完全战胜了前者。当然在这其中毛泽东决策大炼钢铁是党的包办替代抬头的关键因素。如果我们说农村干部和群众缺乏知识，出了乱子还是可以教育的话，那么一些领导干部为了追求政绩而盲目“放卫星”“放大炮”，就已经是不可原谅的行为了（后来有人说“每一个省委书记都应该打屁股。”）。这很大程度上是反右运动后党政官僚的权力急剧膨胀的结果。而事实证明干部追求政绩的劲头已经达到了不顾人民死活的程度。大跃进的核心是强调农村利用当地条件因地制宜办集体小工厂，利用劳动密集的优势来化解资本筹集的困难。但是，为了促进这一点而进行的超大规模放权并没有如愿地增加农村的自主性，促进农村工业的成长；相反，这种自主性落到了干部手中，被追求政绩，缺乏监督的党政干部们当作了虚报产量，大搞浮夸风的最好武器。而刘少奇等人激烈的乌托邦鼓励更是助长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的蔓延。当然搞浮夸风的不仅是领导干部，记者们也在推波助澜。如《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将钱学森一篇探讨农业的理论文章擅自进行剪裁后发表，为“亩产万斤”造势。

到 10 月份，大跃进已经被党政官僚们折腾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人民公社的草率建立

引起了组织上的混乱。人们对如何管理公社心中无数，缺乏有才能的人来管理整个公社十分复杂的财务工作以及新型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来自富裕合作社的农民对于与贫穷低效的合作社合并产生的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十分反感。一些富社开始屠宰牲畜。农民普遍对任意摊派劳动、分配中的不公正、食堂的低效管理和公社的其他措施也非常反感。由于农业劳动力都被抽调从事工业、修水利和各种建设项目，原本过剩的农业劳动力突然短缺，造成了粮食丰产不丰收的局面。国民经济的计划和协调被普遍破坏，从而导致了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与分配物严重低效，普通运输过分紧张，工业所需的材料奇缺。地方实行的“命令主义”即包办替代主义使得公社的集体劳动整齐划一，为了完成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而尽可能地延长了劳动时间，农民被弄得筋疲力尽。人民公社化的现实与大跃进最初所依据的合理地利用劳动力的原则几乎背道而驰，而党的干部的包办替代更未能实现当初允诺的生活理想并使人们自觉地参加劳动。

于是，毛泽东开始发出各种各样的指示以阻止党政官僚的谎报政绩与工农干部的瞎干蛮干。1958年11月毛泽东激烈批判了陈伯达的废除商品生产的理论：

“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这一股风，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

1958年11月底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对“大跃进”的方向和步骤进行修正：“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

决议所颁布的比较重要的措施有，重新以生产大队为劳动组织和生产的基本单位，或者说是“基本核算单位”，实际上，这是恢复到公社化前的合作社，尽管工业企业还是归公社所有。决议详细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区别，坚决申明公社依然是社会

主义性质。与此同时，决议警告人们不要急于求成，过早地采用共产主义的措施，幻想超越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相应地，决议要求恢复诸如住房、家具、生活用品和小农具等财产的个人所有权，恢复自留地以作为粮食的补充生产，将小家畜和家禽归还给农民家庭。

毛泽东认为问题并不在不懂业务和技术的农村干部，因为已经有大量城市人员下乡进行指导了，而主要是省市干部强制命令推动了农村的混乱。中央的指令到不了基层，基层的情况到不了中央，问题的根源是省、地一级的领导机关，因此毛泽东说：

“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如果说毛泽东在 1958 年底还认为“气可鼓不可泄”，批评比较谨慎的话，到了 1959 年批评就更激烈了。1959 年 2 月，郑州会议开始着手解决“共产风”问题，毛泽东提出“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公社在 1958 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郑州会议确定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原则。

这一时期的工作目标是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以及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对“共产风”进行全面清算和退赔。但毛泽东越是试图强力介入地方事务，他就越是感觉到来自地方的或明或暗的抵制，这使他对现行权力结构的执行力产生了强烈的怀疑。1959 年 3 月 15 日，毛泽东发出了第一封《党内通信》。在中共历史上，采取这种以个人名义解决政治问题的做法是没有先例的。毛泽东可能认为日常的政令传输渠道已经失效，中央的正确决策在向下传达过程中被地方党政机构普遍抵制，不

同程度地存在着被地方政府出于自己利益需要“打折扣”的问题，因此必须通过直接交流的方式，打破决策管道的阻塞状况。

1959年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正式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刘少奇继任国家主席。但是，国家官僚作为决策执行机关出于自身利益抵制毛泽东扭转大跃进形势的努力，因此毛泽东决定运用党的关系解决问题。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致六级干部（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的《党内通信》。这封公开信具有非凡意义。一是它的交流对象深入到了最基层的党组织，因此在一个极大的范围内公开了对浮夸风进行严厉批评；二是他在这封信中，首次公开阐述了人民群众抵制党委、政府错误命令的合理性：

“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但是总体上说，毛泽东还是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认为这是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建成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有效途径。为了彻底解决官僚的包办替代带来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决定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将大跃进扳回正确的轨道。1959年6月29日和7月2日，毛泽东两次开会，确定了提交会议讨论的18个问题，并定下了“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基调。但是，谁也不会猜到这次会议最后的结局。

第三节 庐山疑云

如果我们了解大跃进的理论和进展情况，那么关于庐山会议只会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为什么原本一直积极纠正“左”倾错误的毛泽东会突然转向反右倾，批判彭德怀呢？

首先要明确的是，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坚信它探索的方向和开辟的道路是正确的，也就是所谓“前途光明”，因而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来纠正已出现的“左”的错误。毛泽东主张，在纠“左”过程中，各级都要承担责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不追究个人责任，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全党没有经验，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找到纠“左”的办法，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纳入正确的轨道。

本来庐山会议会期预计7月15日结束。彭德怀觉得自己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欲言未尽，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于7月14日晨将信呈送毛泽东。7月16日毛泽东将信印发大会讨论。有人说是彭德怀言辞激烈触怒了毛泽东，但吴冷西说彭德怀的信还没有他们起草的《议定纪录》尖锐。吴冷西转述田家英与毛泽东的谈话，也证实毛泽东开始只是不满意，也没有将彭德怀的信看得那么严重。而且此前陈云也写了一封不比彭德怀温和多少的信，但是只谈“技术”不谈“政治”，毛泽东就欣然接受了批评。而毛泽东视察湖南时，主管湖南农业的华国锋直陈大跃进的种种弊端，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意识到，当时不仅党内外，而且就是在庐山会议这样党内高层的会议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有着相当严重的分歧。况且写信的人又是一位政治局委员。彭德怀提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是彭德怀一个人，而是相当一批人有这种看法和认识，因此将信转发为会议讨论，便于消除分歧，以利于今后的工作。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拟标题为“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在批示印发会议讨论时，他既没有对信作任何评论，更没有对信进行定性。

7月16日，毛泽东找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议事，决定会期延长，通知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上山。彭真、安子文、薄一波均是刘少奇的北方局嫡系，都曾卷入高饶事件的漩涡中。在讨论中，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笏、一机部部长赵尔陆、财贸主任李先念、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总参谋长黄克诚支持彭德怀；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副总理贺龙则认为彭德怀观点不妥，尤其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7月21日，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肯定了彭德怀的信，为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做了辩护，系统阐述了自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并从理论上作了分析说明。7月22日晚，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议，准备第二天召开大会。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主要批评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了错误，但听不进不同意见，一触即跳的人，劝他们要听得进批评；另一种是动摇的人，毛泽东认为他们是从根本上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毛泽东指责这是右倾的表现。当然，毛泽东在讲话中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毛泽东还是相当慎重的。这表现在：毛泽东在讲话中，批的是彭的观点，但并未点彭德怀的名，而倒是点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了错误的领导人的名，如柯庆施、王鹤寿、谭震林；对彭德怀的信及一些人的言论，并未全盘否定，而是肯定其基本正确，但指出部分不妥；关键是讲话的方向问题，明确指

出他们不是右派，是中间派（“离右派 30 公里”，批判“反冒进”时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 50 米），就是说彭德怀等人不是敌我矛盾，而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然而，7 月 25 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提出了“既要**对事，也要对人**”。次日，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并拟了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对“右倾”批评更加激烈。毛泽东四点意见和这个批语的印发，使得对彭德怀的批判立即升级。小组会上的讨论，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彭德怀的思想实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党的总路线进攻**”；“**彭德怀的错误，不仅是立场问题，而且是组织问题，锋芒是对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想用他的思想来代替党的总路线。**”

原定 7 月 31 日会议结束，据李银桥回忆说，“会议结束后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8 月 1 日在八届八中全会的预备会上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 66 岁，你 61 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在全会上，彭德怀等人出口随意，态度不冷静，比如彭德怀之前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骂娘”的话，要“**请苏联红军来**”的话，被陈毅、贺龙等人揭发后，更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紧张。而之前在 7 月 23 日夜，周小舟、周惠、李锐到黄克诚处谈话的小组织活动被罗瑞卿揭发，在人们的追逼下，他们被迫地交待出“**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问题；彭德怀的言论又引起人们对其与苏联关系的猜测，赫鲁晓夫批评指责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彭德怀刚从苏联访问归来，他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某些观点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观点相似，他也说过“**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之类的话，因而被人怀疑为“**从国外取经回来**”，“**里通外国**”。这两者

使会议形势急转直下。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开始联系彭德怀与高岗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在高饶事件中的微妙表现，认为彭德怀是高饶集团的“余孽”，甚至提出“彭、高联盟”的说法。在批判中，刘少奇、贺龙、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罗瑞卿（他们在大跃进中都表现极为积极）等人的言辞尤其激烈。最终8月16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为反党集团。罪名是否定“三面红旗”，“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还有与高饶集团有染。刘少奇在8月17日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声称：“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有人借着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在中国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

毛泽东在谈到这场斗争的性质时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中写道：“庐山出现的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

大跃进结束后，国家为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但是刘少奇说：“所有同志都可以平反，唯独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后来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专门提到了彭德怀问题。一些人断章取义，说刘少奇的这个讲话说彭德怀问题没有国际背景，没有反党集团，是在给彭德怀辩护。实际上，这个讲话只是讲明了所谓“军事俱乐部”，所谓“反三面红旗”，所谓右倾，甚至那封信都是借口。排除了其他所有指控，那么剩下的唯一一个指控就可能是彭德怀被打倒的真正原因：

“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

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

毛泽东后来又谈到庐山会议已经是 1966 年 10 月 24 日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他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 1959 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而且毛泽东再次强调彭德怀的问题与高饶集团有关。在这时毛泽东完全没有推卸责任的必要。不管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话是否真实，但明显地，大跃进和彭德怀问题——至少在毛泽东看来——是两码事。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打倒与刘少奇有直接关系，但是彭德怀事件是 1954 年高饶事件的继续，这是可以肯定的。高岗与彭德怀都属于西北一派，而且在抗美援朝中合作紧密。虽说不至于“彭、高联盟”，但是彭德怀在 1954 年军队“倒刘”风潮中支持了高岗是历史事实。而在 1958 年毛泽东批准开展的“军事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运动由邓小平负责，彭德怀直接执行。结果彭德怀激烈地批判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和总参谋长粟裕，导致二人倒台。有些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在“狡兔死，走狗烹”，可是毛泽东不可能不先整外人而先整他的嫡系亲信粟裕，后来他提拔林彪也是证明。那只能说明，这次运动很可能是党政文官在利用邓小平或彭德怀来打压军队力量。建国以后党政文官和军队干部两者在政治实力和利益分配上的不对等一直是一个大问题，实力弱的政工干部身居高位，实力强的军队干部却靠边站，尤其是刘少奇本人在军队中几乎不能服众。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矛盾，毛泽东在高饶事件后提拔了邓小平作为两大集团的“缓冲器”。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一跃成为书记处总书记，负责具体工作部署。而在 1957 年反右以后党政官僚力量急剧膨胀，结果邓小平在 1958 年“反军事教条主义”中完全倒向了党政官僚的一边，更激化了矛盾，根本没有起到缓冲的作用。如今，高岗倒台，刘伯承倒台，粟裕倒台，林彪久病不

出，现在军队各大派系中还在台上并与政工干部关系紧张的就是国防部长彭德怀了。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的“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以及叶剑英对彭德怀说的“主席还健在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能管得了你？”谁会“顾虑”？谁会“管不住”彭德怀？显然是与实力强大的军队关系紧张却又身居高位的“白区党”。而且毛泽东在7月16日将刘少奇的三大嫡系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请上山，他们都曾是遭高饶集团极力攻击的人物，后来对彭德怀的批判也是由彭真主持，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

总而言之，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确实不满意，而此时党政高级干部已经被毛泽东认为是大跃进中犯错误的主要责任对象，因为在之前的会议中，在纠“左”过程中毛泽东已经明确认为问题不是出在农村基层干部，而是省地级领导搞浮夸风（问题最严重的河南、四川、安徽三省领导人吴芝圃、李井泉、曾希圣都是政工干部出身）的结果。正是在党政文官被认为是犯了错误，处于被指责的时刻，彭德怀的一封批评大跃进问题的信被人看作是军队干部向党政文官发起进攻的讯号，被看作是1954年高岗向“白区党”进攻的重演。尤其是彭德怀信中“我们处理经济建设问题不像平定西藏叛乱、金门打炮那样得心应手”这样的话，更被看作是对党政文官的执政合法性的质疑。这自然引起了党政文官的强烈反击，那么，利用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不满将他拉下马也就势在必行。有些人说大家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评都是毛泽东强逼或指使的，即使如此吧，可是我们注意到政工干部和军队批评的“积极性”是不同的。许多领导激烈批判彭德怀（参见李银桥回忆：“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尤其是刘少奇麾下华北局的彭真、薄一波、廖鲁言、柯庆施等人都批评激烈，刘少奇本人还拍了桌子，骂彭德怀是“是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又大讲个人崇拜的必要性，仅早已被边缘化的张闻天支持彭德怀；军队一方，已经与党政系统合流的人，如贺龙（他可能还有红二方面军派系的因素），以及马上要接替彭德怀位子的林彪批评激烈（林彪私下里同情彭德怀，而且他的攻击几乎都是谩骂，不涉及现实问题，认为对彭“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风，洗脑筋。”），而与党政机构关系较小，利益关系撇得清的（也就是以军职为主），总参谋长黄克诚积极支持，朱德、刘伯承等元老不愿批评，聂荣臻和叶剑英还去给彭德怀做工作。可见双方的态度和“积极性”是不一样的。最后毛泽东只是撤掉了彭德怀军事方面的职务（这也说明攻击确实是向着军事方面），既满足了党政文官铲除“高饶余孽”的愿望，同时也通过提拔另一个“高饶余孽”——林彪（林彪也曾积极支持高岗，高

饶事件前毛泽东曾威胁要与林彪决裂)来担任国防部长来安抚不满的将领们。

不管怎么说,原本解决大跃进问题的会议演变为文官和军队两大系统的较量。彭德怀倒台意味着毛泽东再次维护了党政官僚的屡受质疑的地位,但这也就意味着毛泽东之前8个月纠“左”的努力功亏一篑。决定历史的往往是个人意志和社会力量斗争的合力,因为毛泽东想扭转局势是需要社会利益集团支撑的。党政官僚当然是不愿意的,工农群众也已经被党的包办替代操纵。现在就只能依靠工农军队干部这一块了。因此毛泽东曾经号召农村干部抵制上面的瞎指挥。然而,彭德怀倒台和“反右倾”运动使得批判指责的对象从庐山会议前的党政高级干部变为庐山会议后的工农基层干部,使得原本是为了反对党政官僚权力膨胀的大跃进彻底被党政官僚的利益指向所操纵,许多反对“左”倾,抵制浮夸风的基层工农干部被批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唯一可能扭转局势的力量也垮掉了。没有社会利益集团支撑,毛泽东无法再将大跃进引向自己希望的轨道。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庐山会议的后果都是灾难性的。

现在中国人民不得不经历共和国历史上最困难、灾害最多的一年。1960年的自然灾害比上一年更加严重。台风在中国南部省份和辽宁省造成了巨大的水灾,而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则饱受旱灾之苦,害虫威胁着农村大片地区。全国60%的农田都受到涝灾或旱灾,农业生产直线下降。席卷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旱涝灾害及由于歉收接踵而至的粮食短缺使任何理想都化为泡影。由于经济作物被毁,效能运输情况的恶化,日趋严重的粮食短缺使工人的体力衰竭,工业生产情况进一步恶化。更糟糕的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国防压力剧增,大跃进最初“工农并举”“轻重并举”的设想被放弃了,现在国家的重点已经完全放到了重工业上,从1959年开始重工业一家独大,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是农业歉收的最主要原因。中国长期依靠过量的农业劳动力投入来维持农业生产,大跃进最初的设想也是利用过剩的农村人口和农闲时期。然而激进的政策和一系列失误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被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并被疯狂的指标压得精疲力尽。农业劳动力迅速由过剩变为匮乏。农业劳动者从1957年的1.9亿人降至1958年的1.5亿人。同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城市人口从1957年的9949万人增至1960年的13073万人,其中2000万来自农村。工业劳动者从1957年的1400万人增至1960年的4400万人,城市职工由1957年的3000万人上升到1960年的6000万人,几乎是爆炸式的。一方面是农业劳动力匮乏导致粮食减产,另一方面是大量人口进城导致商品粮需求暴增。更致命的是,在上级要求放卫星的强大压力下,农村干部极大地夸大了农业产量,从而使国家领导人们得到的已经被挤压出水分的产量数字仍然远远超过了实际的产量。在农村拥有大量余粮这种错误的假定下,国家放弃了一直采用的稳健政策,大幅度地增加了粮食征购定额。1959年,

尽管农业产量已经下降，国家征购的粮食却大幅增加了。直到 1960 年，中央才真正认识到形势的严重，削减了粮食征购数量，然而这时饥荒已经威胁着大片农村地区了。

1960 年夏季，赫鲁晓夫突然撤走了在中国约 200 个企业工作的 1400 名科学家和专家，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危机。既然赫鲁晓夫不能容忍波兰和匈牙利变革自己国家体制的行动，自然也不会容忍中国。突然撤走专家意味着大批在建的工厂停建，而许多在建的工厂也无法继续施工，因为工厂是按苏联的设计图纸建造。由于苏联同时中止了交付计划和设备的合同，新的计划项目也被放弃。这给中国的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在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60 年代初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尽管当时一些人相信，中国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储备粮的分配制度，再加上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购买的大批小麦，可以防止悲剧的扩大。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饥荒蔓延至全国。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大刮浮夸风，积极“反右倾”给河南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制造了臭名昭著的“信阳事件”。由于官方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遭到很多质疑，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有 80 万、104 万、370 万、500 万、800 万、1000 万、1400 万、1500 万、1700 万、2000 万、3000 万、3250 万、3300 万、3500 万、3750 万、4000 万、4500 万、5000 万、6000 万、7000 万、8000 万、1 亿、1.2 亿等多种说法。这里不想卷入饥荒具体死亡人数的争论，但是毫无疑问，它在中国艰苦卓绝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征途中书写了惨痛的一页。

本卷参考资料：

《毛泽东选集》第1——4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毛泽东思想万岁》（5卷本）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 编 1968年版

《毛泽东传 1949——1976》（上册） 逢先知 金冲及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美）莫里斯·迈斯纳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 1949——1965》（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改造》 李伟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

《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 王骏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电子版） 辛子陵 著

《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 许全兴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五百年来谁著史》 韩毓海 著 九州出版社 2009年版

《高岗传》 戴茂林 赵晓光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

《庐山会议实录》 李锐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1983年统计年鉴》（电子版）

《毛泽东与中国文化领导权》 网络文章 作者：韩毓海

《“高饶事件”起因再解读》 网络文章 作者：王海光

《揭露胡风万言书真相》 网络文章 作者：吴永平

《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是如何开始的》 网络文章 作者：沈志华

《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网络文章 作者：高默波

《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 网络文章 作者：王绍光

《毛泽东的独特视角：“农业就是工业”》 网络文章 作者：马泉山

《重新认识毛泽东与大跃进》 网络文章 作者：Danny

《透视毛泽东》 网络文章 作者：Jack Gray

《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与农村工业化》 网络文章 作者：王玉玲

《解读彭德怀之冤》 网络文章 作者：宋公明

《杨尚昆谈庐山会议》 网络文章 作者：陈郢客

《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的原因分析》 网络文章 作者：郭建波

第二卷 交锋

第一章 痛定思痛

第一节 退却

到了1960年，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农村发生了大饥荒，而城市建设也已经极度膨胀。首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1958年至1960年三年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9%、39.6%，大大超过了“一五”计划期间平均积累率24.2%的水平。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重工业畸形发展。1958年至1960年，重工业增长2.3倍，而农业却下降了22.8%。第三是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失调。重工业挤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第四是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调。由于基建规模盲目扩大，增加了几千万职工生活保障的开支，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最后是商品粮的供应能力和城镇人口急剧增加严重失调。这一切都与毛泽东的蓝图相反。

在8月国家计委讨论编制1961年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应以调整、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8月底，李富春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增加了“充实”二字，变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其适用范围则由计划部门的工作方针变成党和政府调整整个国民经济的方针，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的报告时肯定了八字方针，这标志着大跃进的终结。

这时，毛泽东已经对“大跃进”的问题作了深入思考，他在党内公开提出了“人祸”论。这是一个被一些人有意忽视的重要事实：

“没有料到，一九六〇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

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

某些人完全无视毛泽东在 1960 年的讲话，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是一个手指头和九个手指头的关系”是刘少奇违逆毛泽东，说成是毛刘分歧的开端，说成是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理由。实际上这些话刘少奇不过是重复了一遍毛泽东的话而已。毛泽东后来所说的“1962 年的右倾”最根本的还是指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包产到户的分歧。

后来，毛泽东还对庐山会议进行了反思。这再一次证明了彭德怀事件与大跃进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而是党内军队和文官之间的矛盾爆发影响了整个工作的开展：“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很快毛泽东实际退居二线，刘少奇已经站在一线开始主持改革工作，主要工作是逐步恢复苏联模式，并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修补。改革的标志是 1962 年 1 月 11 日开幕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由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主要负责人参加，后又决定吸收军队的部分领导干部参加。因有 7000 多人参加，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权力集中，反对分散主义。

首先当然是收回基层干部的权力。基层干部的作用和功能的降低，很自然的伴随着中高层党的领导的权威的提高。1961——1962 年，工作的重点是恢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尽管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也强调“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但其重心显然还是集中。在大跃进中被下放到地方的各项权力被重新收回中央，高度集权使得中央官僚机构急剧膨胀，60 年代中期国务院部委已经达到了 90 多个。党的指示比过去更加强调严密组织的思想，强调服从党的纪律的程序，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当然党的日益集中和

官僚化的性质即意味着国家机构的日益官僚化。

这些官僚主义集权化和职业化的趋势集中反映在大跃进后吸收新党员的模式和用人政策中。那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激进的干部受到了批评，在1957年“反保守”和1959年“反右倾”中被打击的领导干部得到平反，同时毛泽东下令为20多万右派知识分子“摘帽”。而吸收党员的标准开始侧重于那些具有技术和管理专长的人，像阶级成分和思想信仰这些一度是决定性的因素在入党和提干时已成为次要因素。实际上，在60年代初，党和国家的官僚化基本上是50年初那种趋势的继续（也许步骤更快），官僚化表现为把党和国家干部分成几十层等级并使这种等级制制度化的形式，相应于干部的级别而建立了一套等级制的工资制度和福利保障体系，政府和党的机关中的干部的职业特殊化现象不断发展。革命干部转变为官僚职员和管理人员，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的迅速发展，官僚机构的普遍生成及其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所有这些现象都是植根于50年代并在大跃进结束后的几年里繁荣兴旺起来的。

不论官僚机构有哪些弊端，在使中国摆脱困境、重建一个有活力的国民经济方面，党的官僚机构却显示了它的长处和效率。通过恢复中央对生产资料的控制，重新对生产者提供物质刺激，依靠又获得生气的党在组织上的效率，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里成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到1961年底，城乡经济已基本稳定，经过连续3年的下降以后，农业生产开始回升。濒临崩溃的经济状况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效率和官僚机构行使职能时的精确性。

而这一时期最大的政策就是“减人”。所谓减人，是为了解决商品粮危机，下决心减少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1961年底全国职工总数为4170万人，比1957年的2450万人多1720万人。实际上1961年比1957年粮食产量减少23%，而职工人数却增加了70%，更不用说一些为了逃脱饥荒来到城市的人。农村提供的农副产品供养不起这么多城市人口。在1962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它把裁减1000万职工和缩减2000万城镇人口的方案，作了详细周密的说明。从1961年到1964年，随着刘少奇逐步恢复党的权威和权力，通过极其严密的城乡户籍制度和强大的行政效率，约有2600万人被从城市遣返回农村，几乎相当于搬迁了一个中等国家。虽然这为缓解城市危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就像后来被毛泽东的上山下乡赶去农村的1600万知青一样，如今这2600万人对党的高度集权和刘少奇的驱赶政策当然极其不满甚至怨恨。一些人在1965、66年随着经济建设而返回城市，很快，这些有相同遭遇的“返城青年”成为文革造反派的中坚力量。

1961年1月，中央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和工业的基础”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国家将优先发展农业，降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大跃进时所设想的工业发展速度。中国并不打算走苏联的老路，即把农业的发展隶属于重工业的发展。国家在事实上也严格地实行毛泽东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政策。建设资金大量地从工业发展转移到农业就是这种政策的具体体现。现代工业中的一些重要部门被重新改造，以增加化肥和现代农业机械的生产。为了发展和应用改良了的农业种子还建立了相应的科研机构，全国农村实行电气化的方案也在规划之中。它们在七八十年代开花结果。在1964年的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公布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它最早产生于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并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将“农业现代化”放在首位。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最终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这当然不是1958年的那个激进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人民公社了，不仅是规模大大缩小，全国2.4万个人民公社分解成大约7.4万个，每个公社约有1600个农户，而且以生产队（即当年的农业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而且60年代初党所发布的指示鼓励使用物质刺激的手段来促进生产，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包产到户。”（简称“三自一包”）农民们不仅重新获得了自留地，还被鼓励从事副业生产并在重新开张的自由市场进行买卖。虽然官方规定自留地的面积不得超过可耕地的6%，但实际的自留地面积比官方规定的多了1倍。此外，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是通过复杂的工分制度，根据个人的劳动生产率而不是付出的劳动时间进行分配。不过，为了使农民去购买城市工厂生产出来的商品，人民公社的小工厂的经营受到了限制，后来干脆被禁止。由于取消了公社对商业和财政事务的控制，以及从生产队收税的职能，公社的独立性被进一步削弱了。上述职能改由县政府，即中央政府下属的行政机构来行使。大跃进期间分配到公社的拖拉机和其他大型农具又被收了上来，统一归国营拖拉机站管理经营。总之，公社现在不过是苏式集体农庄的一个比较精致的版本。而一度出现的包产到户现象，在1962年则受到了毛泽东的激烈批评，毛泽东不仅是考虑到农村的贫富分化问题，同时也上升到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高度。因为中国几乎没有海外市场，农村的单干可能会导致工业市场萎缩，从而影响赶超型工业化建设的进程。正如他后来所说：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

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在这一时期，农村升起了一颗明星。山西昔阳县的大寨大队“战天斗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的事迹逐渐引起关注。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并配发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不久毛泽东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利用集体化带来的组织性，农村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

对于振兴和发展现代工业经济这一长期问题，国家重新采取了由中央制定经济计划的方针。大跃进期间实际上消失了的工厂企业的厂长的权威又重新恢复。与地区、省一级的党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厂长和技术人员又掌握了工厂企业的经营权。厂长与工人间的传统的差别又重新出现。虽然工人们又一次隶属于厂长的权威之下，但他们却由于为提高生产率而实行的物质刺激而得到补偿，并有可能过上较好的物质生活。除此之外，工人阶级内部利益的分化还是因为大量地采用了计件工作制，按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发奖金，并对技术革新和发明予以奖励。但是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缺乏监管的物质刺激很容易成为“自己刺激自己”的手段。很快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就利用“物质刺激”制造了大量“灰色收入”。不仅干部与平民之间，技术工人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为了追求效益，对没有任何保障的非正式工人（外包工、临时工、合同工，类似于今天的农民工）的压榨更加残酷，几乎已经可以用“剥削”来形容。

到1962年年底，现代工业部门已经稳定，从1963——1965年，工业生产以每年平均11%的速度增长，工业就业人数以年7%的速度增长，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提高5.5%。此外，还有一些领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如教育，公共卫生医疗事业，科学研究，新产品的发展，以及新的更复杂的技术的采用等。

虽然刘少奇的政策使国民经济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其产生的社会结果和思想结果却并不尽人意。经济进步使社会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出现了新形式的不平等。除了“三自一包”和物质刺激导致的干部与平民，工人农民内部的分化外，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大跃进期间实行的农村工业化的政策已经放弃，这样，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尖锐差别又重新出现。城市卖给农民的工业产品（尤其是日常消费品）的价格

十分昂贵。这种价格为城市经济带来利益，却与毛泽东提倡的缩小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差距以鼓励农民消费的政策相矛盾。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情况一样，国家日益为城市的利益而剥削农村。在 1958 年为了限制农民过量进城（大跃进期间至少 2000 万农民涌入城市）而施行的城乡户籍制度不仅未放松反而由于“减人”政策的实施而更加严格。60 年代成为城乡差距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

教育方面，虽然 50、60 年代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民群众比在旧政权下有了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但受教育的机会依然是有限的和不均等的。尽管国家的新教育制度的宣称是为工人和农民服务，但是进入中学和大学的正规教育标准却有利于中国社会的新老特权集团——城市资产阶级、党政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许多农村儿童甚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或只能接受起码的教育。大跃进运动时期实行的教育政策试图通过采用群众教育的方法来纠正教育的不均等状况。根据大跃进时提出的“使群众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的目标，当时便草率建立了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半工半读学校”、“红专大学”、以及工农速成夜校。六年制的小学和三年制的中学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发展。为了使教育能够服务于当地的特殊需要，学校的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人民公社。60 年代初取消了这些平均主义的教育政策，恢复 50 年代所实行的政策和措施。城市和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因此在受教育的机会上受到了限制，许多半工半读的学校和计划不是被放弃便是受到挫折。对农村中小学的管理权又从公社回到县教育部门。国家又重新强调标准化中学和大学的入学准则，强调正规考试和教育质量。但这显然有利于那些享有特权的阶层如党政官僚、知识分子、资本家等社会集团的子女，有利于城市青年而不利于农村青年。更不用说那些越来越多的专门为高干子弟开办的特殊学校了。

正如教育制度中的不平等反映了社会和经济差别一样，在其他社会部门中情况也是如此，最典型的是医疗卫生部门。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建国以后医疗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尤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是惊人的。但是医疗事业的受益者的分布是不均衡的。现代医疗事业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医疗卫生领域中的城乡差别非常醒目而且还在不断发展。而且正规化和标准化使得传统医学受到了忽视。正是这种状况使毛泽东在 1965 年 6 月的警告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 15% 的人工作，而且这 15% 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医院那套检查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办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第二节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虽然还不能说农村就已经出现了“新富农”，但在较富裕的农民和贫穷的农民之间确实存在着准阶级差别，农村中的党的干部普遍腐化这一严重问题更加剧了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在6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干部贪污钱款和对公共财产赤裸裸的盗窃行为。比较普遍的现象是生产队干部贪污私分集体的粮食，以及基层干部和一些农民（通常是从前村里的头面人物）相互勾结，利用复杂的工分制度作弊，双方从中获利。

在清除干部的贪污腐化、制止农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这一点上，刘少奇与毛泽东一样坚决，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不在于目标，而在于使用的方法。刘少奇和大多数党的领导人主张运用党和国家官僚机构的直接力量来整顿农村的情况，而毛泽东则坚持要运用体制外的力量，以此为基础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后来他认为整个官僚体系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时就更是如此。

1962年下半年，随着经济形势的稳定，毛泽东发动了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闻名的运动。这场新运动的目的旨在反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官僚化趋势，纠正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重新在党内和社会上全面振兴集体主义精神和思想觉悟。事实说明，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试图通过**现在的党和国家机构**来实现自己激进的社会改造理想。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激烈批评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激烈批判包产到户的现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必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强调阶级斗争在中国还会长期进行下去，并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随后，毛泽东建议开展以延安整风模式的教育运动。

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根据湖南的试点，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正式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1963年5月中央制订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具体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这场运动。毛泽东警告如果忘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

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文件阐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围绕进行的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集体农业的受到忽视，以及农村中传统观念及活动的复活。第二个问题是党内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和方法，以及地方上农村党的机构和干部中十分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相应地，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强化农村的集体经济，清除党内的腐败习气，遏制官僚特权阶层的发展。因此，尽管更强调思想教育，但这次政治运动与其说是与延安整风，倒不如说与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类似。

《前十条》所提出的问题最引人注目的和具体的措施是开展“四清”运动，即“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的运动。运动的方法是通过“贫下中农组织”来“发动群众”。要让社会底层形成自发组织以克服党的包办替代。同时为了克服群众和干部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现象，决定号召进行一场新的思想再教育运动，重点是进行“自我教育”。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新号召被党政官僚视为对他们的地位和权力的威胁。很快党的两个补充文件加强了官僚集团对《前十条》的反抗。第一个文件是1963年9月，即毛泽东正式确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之时，由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起草的《后十条》。第二个文件是由刘少奇在1964年9月发布的《修正草案》。两个文件都对《前十条》中提出的政策作了具体的指示，并大量引用毛泽东的话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但是这两个文件的实际目的是减弱这场运动的冲击力，而最重要的是将运动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是高层向农村和公社派“工作组”以监督地方干部和群众。在《前十条》中，毛泽东强调运动的第一步是“发动群众”，刘少奇则坚持认为：各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动需要由上级机关派工作组，整个运动应该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前十条》占有突出地位的“贫下中农组织”在《后十条》中根本没有提到，相反，《后十条》规定“应先在党内召开会议”。通过党的内部组织处理，事先确定好“左、中、右”后再开始“发动群众”进行批判。刘少奇和毛泽东关于体制外解决和体制内解决的分歧逐渐开始明朗化。

大多数党的领导人，最主要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相信群众运动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思想上的成熟及其成员和干部的质量和纪律性。这种坚定信念的具体体现就是工作组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央集权的党的机关用以约束基层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并从上面领导群众的机构。但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包办替代”的体现。因为党政官僚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他坚定地认为，革命的真正源泉在体制之外。社教运动要以由绝大

多数农民自发组成的组织为基础，而不能由为上级党组织控制的“工作组”来掌握运动。后来这一分歧在 1966 年达到了高潮。

无论如何，党的官僚们对于“发动群众”似乎没有什么兴趣。而由身处一线主持运动的刘少奇所走的路线实际上的结果是完全与毛泽东希望运动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的，尽管当时毛泽东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制订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它是王光美在 1963 年 11 月至 1964 年 4 月间带领工作队在河北省桃园大队蹲点开展四清运动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它的内容有些类似于“微服私访”：先搞秘密扎根串联（土改中的方式），访贫问苦，保守秘密，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完“四清”后，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1964 年 9 月 1 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文件正式转发了“桃园经验”。

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转发到全国之后，在工作组进驻的农村地区，其通常的结果是大批农村干部被清洗，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比如：

山东省曲阜县东郭大队是名副其实的红旗单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组按照“桃园经验”，将所有大队干部隔离反省，劳动模范、支部书记郭守明全家被斗，给当地工作造成很大损失。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北京郊区通县，去了 2 万人的工作队，有 110 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 70 多起，死了 50 多人。

这是一种典型的“运动群众”的方式。工作组把运动完全神秘化，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后来文革中最著名的酷刑“喷气式”（亦称“坐飞机”），即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中产生。党政文官系统为了转移矛盾而对基层干部进行残酷清洗，这是自庐山会议以来一脉相承的，而《桃园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把总结出的整人经验标准化和精致化。总而言之，整个运动的结果说明了党政官僚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立利益的集团，他们作为政治决策的执行人，可以把中央的决定，尤其是不利于他们利益的决定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拉。这种操作方式是拒绝“发动群众”的包办替代主义。四清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利用政工干部与工农干部的矛盾，把整肃党的运动变为一场对工农干部的清洗。这是“三反”“五反”以来这种官办政治运动的弊端最显著的一次体现。

1964 年底，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各地代表多少将这种严重情况反馈给党中央。随

着工作组对基层干部进行的近乎疯狂的整肃，毛泽东表现出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这种包办替代的方法的强烈不满，并发展成为和刘少奇的公开分歧。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对“秘密扎根串连”、“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提出批评。1964年12月26日在他的生日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1965年1月，毛泽东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发表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分歧公开化了。《二十三条》把运动的重点由原来的农村基层干部转为“**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件号召重新建立农民组织，要求“**由群众来判断和决定**”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而不是由上面定调子。迄今一直限于解决农村中具体的经济和政治上的问题的“四清”，现在则被更广泛地规定为城乡都适用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当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观点发生分歧。毛泽东认为社教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要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刘少奇则主张“社教”运动“**党内外矛盾交叉**”，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重点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虽然表面上刘少奇最终被“说服”，但事实上由于两人对政治运动的方法以及相关理论和理念都有极大差距，因此二人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当1966年这种差异暴露出来时问题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由于越来越对党感到失望，尤其是党政文官系统利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工农干部进行打击，而且短时间内群众也不是说发动就能发动的，毛泽东决定利用与工农干部利益基本一致，在建国以后就屡受打击的军队来与党政文官进行抗衡。60年代初毛泽东开始对人民解放军寄予越来越大的期望。国防部长林彪在此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1964年底提出“三八作风”、“突出政治”和1965年对罗瑞卿的打击中。由于毛泽东的少数派地

位，林彪在军队中掀起一次次政治教育运动，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的同时，开始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宣传。1960年，林彪掀起了一场把人民解放军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运动。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于1964年5月首先公开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在其《再版前言》中，林彪宣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军队的支持，至少是对打击党政文官这一目标的支持，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还激烈批判教育制度。在1964年6月举行的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毛泽东公开提出培养“真正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首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制定的关于革命接班人的5项标准。后来毛泽东的教育理念越来越向社会底层倾斜，也越来越偏激。强调“实践中自学”，这也反映出他的尽快从无产阶级中直接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愿望。1964年，他提出要缩减正规的教育学制，提出：“真正的知识是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实践经验，而不是来自正规教育，……孔夫子从来没有上过中学或大学。……高尔基只读过两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的。美国的富兰克林是报童出身，但他发明了电。瓦特是一个工人，发明了蒸汽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还是外国，许多科学家都是在实践过程中自学。”

比教育制度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转向，也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60年代开始，文艺批判运动开始逐步升级。这时在学术界的讨论中出现了调和和矛盾的思想，如周谷城提出了“时代精神汇合”的观点，其大意是，在一个既定的历史时期中，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必然要融合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从这一观点出发，当代中国社会的革命的与非革命的成分将大致联合形成一种普遍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它们之间的矛盾也自然得到调和。邵荃麟认为，现实主义要求按照实际面目、而不是按意识形态所希望的形象来描绘群众。绝大多数人都是被称为“中间人物”的人，他们被卷入革命的洪流中，处于革命力量与旧势力之间摇摆不定。比如有人认为《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是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而不是主人公梁生宝。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每一个封建政权在上台后都会向被剥削者做出一定的让步以缓和阶级矛盾，即“让步政策”论。而中央党校的杨献珍提出哲学上在“一分为二”后还要“合二为一”，这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显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1963年12月12日，他做出了一个关于文艺的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在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做出了一个更加严厉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两个批示”很快推动了文化激进思潮的出现。上述的理论都受到严厉批判。创作方面，《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电影，《李慧娘》、《谢瑶环》等戏剧都被批判，文艺理论上，周扬在1962年提出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被作为“全民论”批判，被批判的还有孟超的《有鬼无害论》，夏衍的《电影论文集》等。在这之中，江青逐渐取代周扬夺取了文艺界的主导权。而对邓拓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就直接与文化大革命相连了。而到1966年4月江青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台，文化激进思潮达到了顶峰。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文艺批判运动采取了相当粗暴和专制的方式，但是其指向还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对矛盾的斗争性的强调。不仅如此，这其中的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自己解放自己”，反对包办替代主义的思想都非常明显。毛泽东当然不是一直反对调和，反对矛盾的同性的，而是毛泽东始终认为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尤其是与政治密不可分，即“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很难把“思想”与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区别开来。因此毛泽东认为，在官僚权力全面增强，包办替代主义几乎要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地位的时候，既然工农干部已经在四清运动中遭受打击，那么必须进一步地调动体制外的力量。现

实是需要让工农群众在运动中实现自我组织和自我教育，通过群众组织来抗衡党政官僚的包办替代主义。显然在这时必须进行意识形态的整体转向，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就是进行所谓“文化革命”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因此谈论“调和”显然被认为是不适当的。

同时，文化激进派也开始了重新塑造“经典”的活动。1964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在北京举行，由江青指导改编移植的《红灯记》和《芦荡火种》（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名《沙家浜》）参加了观摩。这场大会后来被称作“京剧革命”的开端。之后，江青参与到更多“现代戏”的创作、修改、排练中。江青在7月在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67年被冠以《谈京剧革命》的题目发表。随着文化激进派的艺术作品逐渐成型，意识形态的转向也就更加明显，而意识形态的整体转向直接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起点。

第二章 继续革命

第一节 几个理论问题

在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之前，我们还要进行理论上的工作，尤其是搞清楚几个重要的理论概念，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含义。

首先第一个概念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社会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以及一系列的运行制度，还是要为资本的增殖和扩张服务的。无产阶级即使夺取了政权，如果仅仅是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如“党”）上升为统治阶级，由于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机器未发生质的改变，那么掌握了生产资料的这一部分无产阶级就可能会逐步地把生产资料据为己有，变为进行压迫和剥削的新的资产阶级。即使生产资料真的实现公有，也必须有人来进行管理和操作。如果不改变原有的进行统治的国家机器，如果缺乏无产阶级的真正的监督和民主制度，这些管理操作者完全有能力通过原有的国家机器的统治手段将生产资料再次私有化。资产阶级打碎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与国家机器，建立起了崭新的，现代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真正胜利，就必须打碎原有的国家机器，沉重削弱国家的剥削和镇压的职能，直至原本用于剥削和镇压的国家的最终消亡。因此，列宁总结说：“**无产阶级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已经**

能立即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当然，国家消亡并不意味着否定管理，否定权威。问题的关键是彻底改变社会的组织结构，社会制度，尤其是要大大削弱国家的剥削和镇压的职能，也就是削弱官吏和常备军的权力。而巴黎公社，在这方面做出了第一次尝试。列宁将其总结为：“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变成了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这就是打碎国家机器的实质。

但是列宁的论述是否有问题？当然是有的。列宁是要在落后国家进行革命，是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列宁也说了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是为文明创造前提。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被迫要先“客串”中心国家中资本主义所要扮演的角色，之后才能走向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现代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列宁的理论，实际上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但是，由于列宁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大大延长了社会主义存在的时间，使其横跨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因此，在革命之初，由于经济发展尚不充分，国家机器并不能被完全打碎，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相反，社会主义为了演好资本主义在中心国家扮演的角色，还不得不借助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的部分特征。因此，就有了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逐步战胜资本主义”的论断，在政治上也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打碎旧有的国家机器，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直至国家权力的逐步削弱。因为这个国家要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又保留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因此，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必须是社会主义领导着资本主义走，而不是资本主义领导着社会主义走。如果资本主义的因素越来越强，国家机器的权力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持续扩大，那么，社会主义因素就会变成一件华丽的外衣，成为少数掌握了资本的统治者用来控制人民的工具。那么，列宁希望什么可以保证国家机器的不断削弱使这个国家能够真正走向社会主义呢？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中总结了研究成果：“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但是，如果剥夺了资本家的资产转化为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存在了，全体人民都成了无产阶级，那么还存在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吗？按照一般的对“专政”的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仅仅指的是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以及镇压他们的反抗，那么，它终究将是一种短期的，乃至瞬间的行为。如果是这样，只要公有制建立，生产力持续发展就能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的理论也就是如此。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

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这样理解无产阶级专政或许说得通，但是，在列宁的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剥夺和镇压，是不是大部分时间里，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呢？还是说，彻底粉碎了原来的资本家的反抗，就可以宣布建成共产主义？有人会说还有国外的资产阶级的渗透和颠覆活动，但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独有的举措，相反，是伴随着整个国家的历史的，根本不能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在革命胜利之后剥夺资本家并镇压他们的反抗，仅仅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形式。在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由于旧的国家机器不可能被完全破除，因此几乎是一定会形成新的剥削者和新的剥削阶级。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最有可能变为“新阶级”的自然是现有的生产资料的管理者和操作者，在列宁主义的条件下**也就是党自身**。而这种剥削者在产生时可能是促进社会进步，但是随着其资本的扩张，很可能会把使国家偏离社会主义的既定目标，从而阻碍社会进步，阻碍国家机器的革新和国家权力的制约和削弱，相反，为维护自身统治它们可能更需要经过扭曲改造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不断强化的国家机器，将国家引向最坏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方向。因此，必须要通过无产阶级的专政不断的纠正国家的方向使国家的权力尤其是统治和镇压的权力不断削弱。也就是列宁说的“使技术人员、监工、会计以及所有公职人员所领的薪金不超过工人的工资，使他们受武装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在国家机器进行不能完全打碎的情况下赋予十分有可能重新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无产阶级反抗和斗争的权利。也就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只要有武装群众的组织。”而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偷换成党或领袖的专政（列宁已经过驳斥了这一点），之后再偷换成官僚与新资产阶级专政。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同义词。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在讲到社会主义时，无论其定义如何，他们都始终没有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看作某一部分具体的人，因为这关系到的是国家机器和经济生产关系的运作方式。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所做的主要尝试就是“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有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阶级属性和阶级立场归根结底是由在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其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在这个基础上研究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们才能理解无产阶级本质上的民主性。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它的管理者和操作者如果缺乏监督为什么会能够逐渐把权利和资本据为己有从而是公有制蜕化为官有制直至私有制？要进一步解释这

种蜕变，必须联系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思索。我们将要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

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由于按劳分配，因此还存在着表面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现象。而这种因素可能会成为资本复活的萌芽。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但它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一般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它就是在按劳分配的制度下存在着导致分配中名义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权利，它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另外一种理解就复杂一些，它更强调的是“资产阶级”这个范畴。也就是说有人可以将自己的这种导致实际上的不平等的权利转化为资本，从而导致两极分化和私有制的复辟。所以，资产阶级法权不仅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即“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或“走向社会主义”的时期）也有可能产生，而且产生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因素还要比马克思说的两条多得多。如果缺乏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缺乏普遍的撤换制和监督权，缺乏强大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那么有人就完全可以把这种权利转化为资本，再通过这种“权力资本”来扩充这种权利，形成循环，那么资产阶级法权是完全可以不断扩展的。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人民本身的素质和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偏低，人民不仅没有“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的意识，甚至没有进行工业劳动的经验和当家做主的意识。因此实际情况就是不得不将公有的生产资料委托给一部分社会精英进行管理。但必须要保证生产资料的公有性质而不能使他们通过扩充资产阶级法权将使用经营权变为所有和支配权。

如卢森堡所说：“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否则社会主义就将是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下实行的，钦定的。绝对公开的监督势必不可少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府的官员的排他的圈子之内，腐化不可避免。”但人民素质的普遍低下和生产力水平的整体偏低使全体参加公共生活缺乏可操作性。带来的后果有两点：第一点是人民缺乏对国家机器进行监督（更不用说管理）的经验和能力，更缺乏必要的组织力量。因此，为了经济的发展，不得不赋予那些极少数高素质精英人才以极大的权力和极好的待遇，这里，已经承认了人的“后天特权”。第二点就是刚刚脱离封建制度，愚昧迷信仍然盛行，人民没

有当家作主的意识和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觉悟，因此自然导致对指令性计划的习惯性服从，以及组织起来共同监督的意识十分淡薄。这就给了这些技术官僚利用这些资本形成利益集团提供了空间，**这里，资产阶级法权已经由不可抗的自然因素，天然特权层面上升到经济层面。**但是，毕竟短时间内人民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不能有很大提高，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党的内部随着经济发展凭着资产阶级法权自然会产生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再加上他们比真正的无产阶级具有组织和信息的优势，尤其是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的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使他们非常容易联合起来要求扩大他们这个利益集团利益——要求制度变革，要求符合他们最大利益的私有化，同时将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专政。如果受到限制，他们中的个体就会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首先来获得这个利益集团中个体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把无产阶级赋予的权力看作是自己的资本，且由于他们不断强化国家机器并掌控了暴力机关，人民已经不可能再行使撤换权和监督权，人民仅有的一些组织形式也可能被打碎，**在这里，资产阶级法权就由经济层面上升到了政治层面。**随之当然就是这些利益集团逐步进入高层，最终实现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在落后国家进行革命，人民不得不把一些权力交由一些掌握知识技术的社会精英来行使，用以“为人民服务”。因此他们就可能以自身的地位，知识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作为资本，又利用这些资本来扩充自己的权利，导致资产阶级法权并不断扩张。并且在这些国家的保留较强力量的国家机器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不断增长和扩张提供了机会。如果缺乏对国家机器的制约和控制，缺乏人民的监督，缺乏赋予和收回官僚的权力的能力（也就是选举权和罢免权），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无产阶级的被专政，官僚统治地位的确立，直至完全形成一个完全凌驾于人民头上的特权阶层。

卢森堡曾经警告说：“**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在官僚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如果缺乏对生产关系的及时变革，缺乏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和限制，抛弃或故意扭曲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最终将导致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资产阶级法权不断扩张，吞噬人民创造的大部分社会财富的恶果。

其实，列宁晚年在在通过新经济政策恢复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将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毕竟，走向社会主义的历程，实际上就是生产力不断发展，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尤其是官僚权力不断被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民主不断发展的过程。

斯大林在阐释列宁主义时逐步认为只要建立起公有制，并利用计划经济推动生产力发展，就可以自然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因此，斯大林主义要求以不惜代价推动经济增长极大

化为目标。同时，斯大林彻底扭曲了“专政”的概念，提出“阶级斗争尖锐论”。即“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要采取更尖锐的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在这里，“被击溃了的”这个词就将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阶级斗争集中于具体的人身上，认为阶级斗争完全来源于旧的反对派和资本主义的包围而产生的“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恐怖分子”。因此，阶级斗争尖锐论实质上成为已经逐渐蜕化为作为国家机器官僚机构的“先锋队”的党对人民的全面专政和镇压。国家机器的权力无限扩张，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专政，资产阶级法权的不断扩展。最终，对生产关系变革的忽视带来了斯大林主义的失败和苏式社会主义的灭亡。

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那么党在这其中从革命者到压迫者的具体转变过程又是怎样的呢？因此我们进入第三个问题：包办替代主义。

我在前面已经很多次用到了“包办替代”这个词，但是它的具体含义还需要解释，尤其是大跃进是包办替代主义恶性发展的极端表现，因此要总结大跃进的教训，要理解大跃进与文革的关系，我们就必须了解包办替代主义。

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列宁的组织学说和革命理论。前面我已经介绍过了列宁的落后国家革命的理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在革命中组织和发动群众。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对于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需要一个组织来灌输，来培育，或者说无产阶级需要启蒙。那么就需要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把阶级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之中，组织引导无产阶级使他们去争取自己的权益。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观点。但是列宁没有论述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组织产生的问题。因为革命需要最广泛的发动群众，一两个人不可能成事，所以党不会傻到代替群众去革命。但是夺取政权以后就不一样了。党掌握了专政机器，还掌握了知识和技术。那么，在引导无产阶级继续前进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包办替代主义的倾向。

包办替代主义是比利时著名的左翼理论家厄内斯特·曼德尔在《权力与货币》中提出的概念。所谓包办替代主义，就是指一个阶级或阶层在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后，由于这个阶级或阶层的组织能力和阶级意识的不成熟，因此这个阶级在革命中的“先锋队”在革命胜利上台之后与这个阶级本身发生疏离和异化的现象。因此，这个“先锋队”不再试图继续去组织和启蒙本阶级使得它成为更有力的政治力量，相反，“先锋队”开始自作主张为它所自认为代表的那个阶级包办一切。而它所运用于包办替代的就是党组织对专政机器和暴力的掌握权，以及对技术知识的垄断权。与之对应的是，在革命时期可能相对比较

有组织有纪律的阶级队伍在革命之后由于没有能够把这种组织模式制度化和常态化，结果导致丧失了组织性和参与性的民众对于公共生活的干预能力的丧失与“先锋队”蜕化成官僚集团利用包办替代主义为自身谋取私利。

因此，尽管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是最大限度的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的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阶级专政。”但是“党不仅没有像列宁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无产阶级群众（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反对官僚集团的武器，而且党自身反而成了官僚集团专政的工具。不仅没有使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上升为直接的统治阶级，而且党越来越蜕变为一个远离工人阶级的特殊的官僚机构。”包办替代主义的力量在革命成功后却利用手中的权力摧毁这种群众的组织形式，也就是在摧毁民主的可能。

在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的历史话语中，社会历史的方向往往不直接取决于阶级的经济实力的对比而是组织力量以及意识形态所能达到的动员能力是否强大。一般来说，左翼所代表的阶级力量都趋向于社会的偏底层，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活动中，由于底层阶级的经济实力、组织能力和斗争能力远远不如统治阶级，因此革命的成功，往往来自于一个规模较小，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先锋队”性质的左翼政治团体。作为“先锋队”他们发动群众，在革命时代由于斗争激烈底层阶级可以暂时地团结起来，在代表他们利益的左翼团体的指引下取得斗争的胜利。但是在胜利以后，由于这个左翼团体立场的变化，在社会结构尚未完全改变的情况下（这需要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作为基础）坐上了他们曾经所反对的人所坐的位子。如果在一个注定会导致不平等社会结构中追求平等，那么必然倚赖的就是一个超出经济力量之上的权威，即政治权威。由于革命成功以后底层阶级不再像革命时那样团结，从而出现分散的倾向，而左翼“先锋队”也不再趋向于组织发动和启蒙群众，让他们自己去消除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平等，而是自己运用政治权威去强行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平等，那么包办替代主义就会因此崛起。由于包办替代主义导致的政治权威的加强而不是减弱，国家机器的强化而不是缩小，离左翼所最终期望的“社会收回国家”的愿望越来越远，阶级代表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微弱，那么革命异化为新的剥削与压迫，甚至是新的恐怖，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以苏联为例，“不是激化的内在本质导致了苏联官僚制度的极大膨胀，而是官僚集团的权力决定了苏联及其类似社会的计划的特殊形式。”

中国的两次包办替代主义出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中。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是群众

的自发组织和党政官僚的包办替代主义的合力推动了3年之中的高速集体化和国有化。因此它也就遗留下来了很多问题。在这个时候，由于两种因素并存，因此就存在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由于这时候群众不具备直接在舆论上反击官僚的条件，因此毛泽东希望知识分子担起这个任务。但在当时的体制下一些知识分子对官僚提出了严厉批评，但也有一些已经成为了官僚集团的一员，以社会精英的角度将矛头对准了工农干部甚至是党本身。这使得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

反右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谁战胜谁”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被解决了，但结果是官僚的包办替代主义取得了胜利，取得了社会经济的绝对控制权。这就是后来所谓的“57体制”或者是“第一书记专政体制”。也就是说，党的包办替代扼杀了民主的因素。

因此，鸣放运动最大的教训就是，知识分子作为特权阶层也不能保障能够代表工农群众的利益了。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自己去掌握现实中的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必须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利益，才能够真正增强实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热烈肯定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原因。毛泽东坚信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最好方式，后来还写入了宪法。当然伴随而至的就是必须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让无产阶级具备足够的能力和意识。在大跃进中毛泽东推行的那种特殊的农村教育就是由此而来。但是毛泽东一度产生过让无产阶级直接掌握科学技术的设想。但是大跃进证明了在短时期内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了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不产生新的特权阶层，那么除了进一步扩展基层教育以外，还必须要有劳动者对技术精英进行强大的监督，以避免以知识为资本运用公共资源谋取私利。而劳动者要有这样的意识，光靠党已经不行了，因为党的干部已经和技术精英合流，形成了自己的独立利益。那么要进行的，就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要培育的不仅是具备“国家的主人”的姿态的劳动者，同时还有一套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机制。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后来的《五·七指示》中，并进一步产生了小范围地方自治的设想。

在反右导致的官僚权力极度膨胀的时候，毛泽东急躁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造成的结果是，党政官僚为了追求政绩而进行的包办替代在很大程度上压倒了工农群众自发的运动和组织。一开始形势还能在毛泽东希望的轨道内，但是随着大跃进颠覆了苏联的严密经济计划的模式，经济计划的制订极其无序和随意，一些官僚为了追求政绩更是随意加码，随意打包票。结果毛泽东错误地做出了用“第一条腿”（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工业）去压“第二条腿”（劳动密集型的农村小工业），发动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一切毛泽东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也必须看到官僚体制的问题，否则，工业化问题解决不了，错误还可能再犯。如果说“高指标”的责任在中央，那么为什么之前没有出现大跃进这样严重的“瞎指挥”、“共产风”和浮夸风的问题呢？因为之前的计划经济是高度集中式的，

而大跃进为了调动“地方积极性”进行了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进行了大规模的“责任承包制”。但是地方上的包办替代主义和官僚主义造成了严重的问题。而强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又强化了这一包办替代。因为大跃进是旨在削弱官僚权力的，但是官僚现在的地位使得他们注定不可能去乖乖地执行，必定要把它引向符合自己利益的轨道。结果，所谓“地方的积极性”非但没有增加活力，反而导致了它异化为“官僚的积极性”，也就是“政绩的积极性”，造成了严重的浮夸风。而且事实也证明，这些官僚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已经达到了不顾人民死活的程度。

这使得大跃进的一个深刻教训是，要想实现“两条腿走路”的目标，就必须实现基层民主，使得农村或基层的小工业不会因为权力下放导致干部盲目追求政绩。而大企业中也必须通过真正的民主的公有制，也就是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来防止官僚特权和包办替代主义的泛滥。从而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产阶级法权的扩散。

第二节 艰辛开拓

在对几个理论问题进行详细的论述后，我们可以回到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上来，从而理解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在60年代初，原本并未消除的不平等在持续扩大。这体现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也体现在阶级内部之间。比如说城市中，党政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工资与普通平民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他们还有更好的福利保障甚至是特供商店。而工厂中的物质刺激和奖金制度也更加有利于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而不利于普通工人。由于体制和人的因素，这些制度与其说是在提高人民的积极性，不如说是在为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生提供温床。这是因为，在集中的管理体制下，生产资料的管理者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尤其是在“一长制”的模式下），很容易把国家给予的福利和奖金政策变成为自己牟利的工具。党的干部利用“物质刺激”制度“自己刺激自己”，从而导致资产阶级法权不断扩展直至形成政治集团。在中苏论战期间毛泽东就发现苏联的特权阶层正是来源于其高工资高奖金高福利的制度，针对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的论述一针见血：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中国也是如此。到 1956 年，最终在城市和农村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旧社会的剥削阶级都已被消灭。代替他们的是一支庞大的不断发展的国家和党的官僚队伍，正如在苏联一样，取代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旧阶级而出现的，是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新官僚阶级。到 60 年代随着一系列的措施，这个与工农有着相对立的利益关系的“新阶级”已经逐步成型。因此毛泽东提出了更为严重和不祥的警告：“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于是他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他看来，阶级斗争是具备可持续性的，是与经济建设并行不悖的。如果把阶级斗争理解为社会的不断变革，那么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也会赞同这一点。

60 年代初，毛泽东对整个组织系统的不平等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这种不平等表现在并且主要植根于党和国家机关中日益增长的复杂的官僚等级制度和身份差别制度，它有蔓延到整个社会的危险。他痛惜中国共产党蜕变成一个保守的官僚机构。他指责党的干部正在走向享乐和腐化的道路，他们追求的是权力、地位和享受。毛泽东还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观点。在苏联历史上，这一口号被等同于推进和承认社会地位的差别，特别是承认技术知识分子的地位，等同于将不平等普遍制度化。毛泽东后来说：“斯大林的书从头至尾都不谈上层建筑，没有考虑人民。见物不见人。……他们（苏联人）相信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只谈专，不谈红，只谈干部，不谈群众。”

毛泽东晚年对于高薪阶层的“资产阶级性”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有人问到“我们还

不清楚，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工人贵族，现代修正主义的基础到哪里去找？”

他的回答是，“我已经说过，**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农村中的富裕中农，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现代修正主义是战后和平环境滋长起来的思潮。”

让毛泽东担心的还有一件事：干部子弟问题。60年代的教育制度给予了专门的干部子弟学校以极其优越的教育资源。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完全靠自己。”毛泽东后来更认为干部子弟作为“大灾难”很可能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阻力甚至是官僚特权集团的主要潜在力量，甚至是“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

毛泽东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会产生一个新的剥削阶级或阶层的人。在毛泽东之前已有很多人看到或预感到了这一点，其中有马克斯·韦伯、罗莎·卢森堡、列昂·托洛茨基、密洛凡·德热拉斯等人。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和德热拉斯的《新阶级》都在60年代译成中文“内部发行”。毛泽东在理论上还是不成熟不系统的，他关于新的官僚统治阶级的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个思想是由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提出来的。过去不曾有过这样的事，将来估计也不可能再发生这样的事。在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中，这个思想无疑是一个异端，在政治上也富有爆炸性。它使人们对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极力论证的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了疑问。然而，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中国的官僚主义者确实是以新的剥削阶级的形式出现。他们使用政治权力侵占了一部分工农群众生产出的剩余产品。他们不是在私有财产中而是在他们掌管的国家“公有制”中享有既得利益，他们利用公有制为他们本人及家庭谋取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他们不是通过财产所有制，而是通过（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实际上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的身份来获得地位和特权的。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人已经成为或至少在变成一个虽然没有财产但却是功能齐全的资产阶级。而他们的凭借正是资产阶级法权。

有人批评毛泽东竟然要在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破除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灭的资产阶级法权，不是空想是什么？实际上，由于现实中官僚权力的不受制约的增长，毛泽东口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指的是能够把马克思所论述的那种原初的，导致实际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作为资本谋取私利，再利用这种资本将特权不断扩展至经济政治各领域的权利。是一种使得“新阶级”的产生得以可能的特权。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要限制这种毛泽东所

论述的“资产阶级法权”，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资本积累的阶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任务就是要使不可避免的，必需的资产阶级法权无法转化为现实中的资本，而这种资本也无法转化为现实中的新的特权。从而使其无法形成官僚特权阶层。毛泽东希望破除的就是这种把法权转化为资本，把资本转化为特权的权利。而要做到这些，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只有人民的政治实力上升了，才有可能迫使经济计划的制定者统筹兼顾，才能做到“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的局面，才能避免大跃进中部门比例严重失衡的状况。总之，调动全社会的经济计划必须要做到全社会的直接或间接参与。

在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后，毛泽东又提出了“首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才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也是一般规律”的观点。毛泽东所做的归结起来就是支持或扩大各个领域中的相对弱势的一方的力量，从而做到互相的制衡乃至社会力量的再分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扩大广大群众（而非精英集团）对于经济政治生活的参与性，普遍地最大限度地开放管理领域。“发动群众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只有允许容许大家参与管理，参与公共生活，而不是把革命看成是某些政治精英或职业革命家的专利，才能充分地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及无产阶级民主，才有可能做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展，防止官僚特权集团的出现，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是自己的，而看成是干部的。”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带来的后果就是群众对政治经济生活的热情普遍受到抑制，争取自身权利的阶级意识减弱甚至被泯灭。无产阶级普遍的专政就变成了少数官僚新阶级的专政，就变成了“十几个知识分子在桌子底下商议出来的”专政。而这一思想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对鞍钢宪法的称赞。毛泽东在1960年3月给《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做的批示称：

“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〇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

毛泽东在这里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了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六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形式。

毛泽东在实践中逐步强化了对于人民群众普遍参与的重要性的认识。如“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这是最根本的权利，……总之人民必须有权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是由部分人管理，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可以说是毛泽东在经历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后所得出的宝贵教训。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必须是整体的不受限制的参与权利，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指令性的行政命令和无所不包的精密计划导致下层群众受到压抑。缺乏了社会的普遍参与，人民无法自觉地起来监督被他们赋予生产资料管理操作权力的少数官僚群体和技术精英，一旦他们成为一个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将公共权力变成为自己谋私利的工具的，将资产阶级法权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占据左翼的意识形态却又“自己不革命还不许别人革命”的，享有各种高薪、奖金和特权和福利待遇的集团，腐化和官僚主义将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必然走向僵化，封闭和专制。

毛泽东晚年，尤其是大跃进后他对于官僚体制的容忍程度逐渐降低。毛泽东在一系列批

示与讲话中表现了他的思想的逐步完善。如“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尽管毛泽东此时并未形成理论上的总结，但说明毛泽东对于激发阶级意识，增强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推动群众广泛参与，实现真正的一个阶级的专政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

随着问题的加重，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容忍程度越来越小。在1965年12月，毛泽东再次说：“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单靠首长不行，你能管这么多吗？许多事你们看不到的，你只能看到一部分。所以要发动人人负责、人人开口；人人鼓动、人人批评。每个人都长着眼睛和嘴，就应该让他们去看，让他们去说。群众的事情由群众来办理就是民主，这里两条路线：一条是单靠个人来办，一条是发动群众来办。我们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要靠大家来治，而不是靠少数人来治，一定要发动人人开口。每个人既然长了嘴巴，就要担负两个责任，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在坏事情坏作风面前，就要说话，就要负起斗争的责任来。”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论证他的理论的合法性，毛泽东这时把巴黎公社看作他的社会理想的一个重要标杆。在1966年3月26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纪念巴黎公社95周年的文章，尤其是限制“特权阶层”和“高薪阶层”的思想，这对广大人民确实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怎样防止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发生蜕化变质？巴黎公社在这个问题上做过一些探索，采取了一些虽然是初步的但意义极其深远的措施，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

恩格斯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

人民群众是巴黎公社的真正主人。公社存在的期间，**群众广泛地组织起来，他们在自己的组织里讨论国家大事**，每天都有两万名左右的积极分子出席俱乐部会议，对社会政治生

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提出倡议或批评。他们还通过向革命报刊投稿写信等方式，提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人民群众这种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公社力量的源泉。……公社许多著名的法令，诸如废除公职人员的高薪制、取消欠缴的房租、实行非宗教教育、禁止面包工人夜间劳动等等，都是以人民群众的建议为基础的。……

巴黎公社坚决废除国家机关干部的任何特权，特别是在工资方面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改革。我们知道，剥削阶级国家为了培养一批高高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总是给官吏以优厚的待遇和种种特权。高官厚禄，横行霸道，这就是剥削阶级官吏的写照。……法国无产阶级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在巴黎公社成立以前，就多次提出废除官员高薪制的要求。巴黎公社成立后，实现了劳动人民的这个宿愿。四月一日，颁布了规定公职人员最高年薪为六千法郎的著名法令。……年薪六千法郎，这相当于当时法国熟练工人的工资。……巴黎公社在取消高薪、禁止兼薪的同时，还提高低薪，缩小工资差距。以邮局为例，低薪每年从八百法郎提高到一千二百法郎，增加百分之五十；高薪从每年一万二千法郎降为六千法郎，降低一半。……

国家领导人只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他们有多干工作的义务，没有多拿报酬的权利，更没有任何特权。这是破天荒的创举，其伟大意义不仅在于真正实现了“廉价政府”的口号；不仅在于扫除了剥削阶级用以愚弄人民的所谓国务活动的“神秘性”、“特殊性”，把国务活动变成工人职务的一种，把国家机关干部变成使用“特种工具”的工人；而且在于从物质待遇方面提供防止国家机关干部发生蜕化变质的条件。……

确实如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正是把巴黎公社的这一条重要经验忘得干干净净。他们追求特权，利用特权地位，化公为私，侵吞人民的劳动果实，占有高过一般工农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这些人从政治立场到生活方式，都是背向劳动人民，面向资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官僚看齐。他们还用高工资、高奖励、高稿酬、高津贴以及花样繁多的捞钱办法，大力培植高薪特权阶层，力图加强自己统治的社会基础。……把赫鲁晓夫修正主

义者的所作所为，和他们心目中的巴黎公社的“幼稚行为”比较一下，人们就可以清楚看出，什么是人民的公仆，什么是人民的老爷，什么是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恩格斯曾说过：“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你们想知道蜕化变质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下的苏联的“全民国家”。

但也毋庸讳言，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过度依赖，尽管毛泽东也强调工人参与管理，但是这个概念毕竟强调的是收入分配上的差别，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对更根本的问题——“党内资产阶级”或官僚集团对生产过程和生产资料的控制有所忽视。实践证明，它严重妨碍了文革在经济制度上的建设性创新。

第三节 重上井冈山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这一有象征意义的举动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恢复过去的革命传统，认为如今的社会现实可能会背叛当年革命时的许诺，会让当年烈士的流血牺牲变得缺乏意义。他说：“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你提意见他们不听。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忽‘左’忽右、形‘左’实右的事有没有？……做官的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现在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并说自己将领导一场“新的长征”，后来毛泽东总结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坚信他现在找到了这种形式，并即将付诸实践。

既然有破，就必须有立，虽说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基本上是以“延安模式”为雏形，从大

跃进的思路发展而来，但文革无疑是对其设想的最终完善和修正。这集中体现在 1966 年 5 月 7 日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之后给林彪写的一封信中。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这封信系统阐释总结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式的思考，后来公开发表后实际上成为文革的最高纲领：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这就是毛泽东对于文革的最高纲领，即对于建立小范围地方自治的构想，即中央计划（资金密集产业）加地方自治（劳动密集产业），“两条腿走路”的蓝图。这与毛泽东当年阐述的关于大跃进的蓝图并没有根本区别，但加上了那很关键的词：“批判资产阶级”。

按毛泽东对斯诺的说法，“应该像你们美国一样，把权力分到五十个州去。”如果按照苏联那样的包办替代主义计划来做的话，也就是中央制定一个包罗万象的计划，交由地方去

死板的执行。它不仅彻底遏制了地方的积极性，也遏制了群众的积极性，同样也遏制了社会主义的创造力。群众的“积极”只能表现在物质刺激上，表现在“多劳多得”上，仅此而已了。因此，毛泽东所希望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小范围内的独立性很强的自治体系，他们接受中央计划的指导，同时这个集体能够通过公共财产的增加来满足这个集体每一个成员的物质文化需求。通过自上而下的整风，批评和自我批评保证集体的纯洁性，调动每一位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性。通过中央计划执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第一条腿”和地方自治执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第二条腿”，形成“两条腿走路”的格局。

但是毛泽东这样构思的大跃进却失败了。事实上，权力下放没有带来毛泽东所预期的积极性的真正调动，而是浮夸风的蔓延，官僚权力的膨胀。也就是当中央打破了斯大林体制的同时地方上却产生出无数“小斯大林体制”。其问题就在于，现实中的集体已经不再是毛泽东所预期的那个集体了。如果把中央的权力下放给集体，但是在包办替代主义盛行的形势下，集体真正的控制权已经不再属于这个集体本身。由于包办替代主义将无产阶级专政由一个阶级的专政变为了党委的专政，甚至是第一书记的专政。而随着资产阶级法权的不断扩展，集体的领导者，理论上说原本是人民赋予权力的生产资料的操控者能够利用这种“法权”复活资本，也就是将运用生产资料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变为将生产资料垄断为己有，作为自身的资本控制人民的权力。这就是集体的“异化”。因此，所谓的权力下放，实际上也就是赋予了集体中的官僚以更大的权力，因此，它不可能鼓动起人民的积极性，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它只是包办替代主义的一个变种。因此权力下放鼓动起的是官僚的积极性，实际上也就是政绩的积极性。这就是大跃进时期浮夸风横行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够让一个集体真正成为一个集体。也就是说，普遍地开放管理，只有一个集体实现了普遍参与，普遍管理的能力，也就是实现集体中的充分民主，才能够保证权力真正掌握在集体手中而不是领导手中，才能调动每一个和自身利益相关的人的积极性。为了培养起管理意识，就必须进行“文化革命”，培育起真正的集体意识和参与意识。

整风模式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党政官僚既然已经能够从现有体制中集体谋取利益，那么各个阶层的党政官僚本身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诉求，也就是有了形成一个阶级的趋势。而整风模式是自上而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已经有了明显的利益诉求之后，自我批评的方式已经行不通，必须要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阴暗面”。而且，由于党政官僚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已经有了阶级化的趋势，那么自然它也就有了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转移矛盾，达到官官相护的能力。“官僚主义者”形成了一个阶级，基层干部只是听命于上级而已，但官官相护使得斗争矛

头根本无法往上走，因此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在上一章里已经讲过了新阶级理论。有人把此理解为仅仅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就是因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理论上不了解之故。尽管毛泽东还没有完全摆脱大跃进的乌托邦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阴影，尤其是在消除“三大差别”和知识特权阶层的问题上，以及变革生产关系上还有急躁甚至不切实际的心理，但总体上与大跃进相比还是要相对务实一些的。

还有一点，那就是毛泽东认为文革究竟该如何展开，应采取怎样的斗争策略，以及对于文革的定位。1966年7月8日，在韶山滴水洞中的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引者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峢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

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 20 世纪 60 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自从 1911 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 20 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 90% 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一些人怀疑这封信是伪作，认为是“9·13”事件后毛泽东用来推卸“个人崇拜”的责任的。但这个观点忽略了毛泽东许多耐人寻味的话。因此一般认为这封信是真实的，但在公开前经过一定的加工。这封信是难得一见的毛泽东的自我解剖，尤其是关于“虎气”和“猴气”的说法，被许多毛泽东研究者和传记作者接受。这里只针对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斗争策略和定位，分析信中体现出的两个问题。

首先，毛泽东要发动文革就必须要有支持的力量。但是体制外的力量要想完全发动还需

要一定的过程，因此毛泽东在体制内还需要有盟友。因此，毛泽东利用了 17 年来工农军事干部与党政文官的激烈矛盾，以当年的“高饶余孽”林彪作为自己的暂时盟友。于是，社会整体矛盾，即工农与包办替代的党的矛盾和体制内最激烈的矛盾，即文官与军队的矛盾实现了合流。文革成为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矛盾的交汇点。这也使得文革呈现十分复杂，光怪陆离的特征。但是，毛泽东对军队这个盟友是完全不抱信心的，因为毛泽东与军队之间是一种很明显的相互利用的关系。毛泽东想利用军队打倒党政文官，为文化革命开辟道路，而军队则想利用这场运动渔翁得利。在每一次革命之后都有可能发生革命者异化为新的统治者的事情，既然文革是要跳出这一“周期律”，那么谁是最有可能成为文革中异化产生的新统治者呢？自然就是试图渔翁得利的军队了。因此当文革深入后军队势必会成为最大的阻力。尽管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的地位和一系列失误导致了他并没有处理好这一问题。后面我们会详细讲到军队在文革深入后的作用。

第二点，就是最耐人寻味的“演习论”。似乎毛泽东对文革，甚至对他身后的形势都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自己都准备要“跌得粉碎”。而文革的目标仅仅就是为未来左派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一次演习吗？

我们必须意识到，绝大部分党政官僚都是希望“做官当老爷”的，而毛泽东认为这一异化是对当年共产党许诺的革命理想，对当年牺牲的革命烈士的一种背叛。但是困难在于，毛泽东的观点在党内是绝对少数，在体制内只有少数激进知识分子支持毛泽东，但是他们热情有余而政治经验不足。至于毛泽东所期望的能在工农群众中产生新的成熟的左翼力量，还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最重要的一点是，尽管毛泽东和底层民众在利益诉求上有一致的地方，但是文革前的社会矛盾远远没有激化到有必要进行一场传统意义上的“革命”的程度。许多人在革命胜利后对现有政权虽有不满但总体上认可，希望过上平稳安定的日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人民对共产党的“感恩”心理成为“走资派复辟”的温床。既然“继续革命”要做到“过七八年又来一次”。那么就必须考虑到社会成本和动员的问题。一场高强度的“革命”是不可能七八年来一次的。毛泽东心中尽管有一个最高的纲领（《五·七指示》），但是毛泽东也很清楚这只是一个最高纲领，是需要极长的历史时间去实现的。因此，第一次文化革命能前进到什么程度，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这种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也给其具体操作带来极大的危险。一方面是由于即将被革命的对象们的顽固立场和对专政机器的控制，另一方面是革命的主力军的能力和素质的堪忧，社会矛盾并不是没有完全激化的可能。而且毛泽东对“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片面强调，有

将人完全符号化和理想化的危险。激进派在文艺领域本身就是包办替代主义的粗暴和专制的做法，忽视启蒙，加剧了这种带有民粹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色彩的想法所带来的危险。这也是毛泽东一开始低调地将其定义为“演习”的原因。结果，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决策的失误，使文革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取得一定进展和成功后却逐步跌入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深渊。其强度和烈度就已经超出了“演习”，变成了对人民生活的极大破坏，最后成了彻底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批私字一闪念”，从而丧失了“继续革命”的可能性。这造成了许多人对革命的从实践到意识形态的完全失望和对公共生活的冷漠，导致了最坏的结果。

简而言之，有能力组织和实践的阶层不愿意再继续前进，或只想前进一小步；而有实践意愿的阶层却没有能力保障实践的成功。因此革命能否“继续”就是毛泽东的困境所在。更不用说毛泽东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思想上的冲突，导致的自己在理论上的不明确和不坚定。这大概是毛泽东对文革持悲观态度，将文革看作一次“演习”的原因。

《大动乱的年代》的作者王年一认为《五·七指示》和《给江青的一封信》是解读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两把钥匙，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这里还必须讲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构成了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基本缺陷。那就是虽然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的基本现实，并且有时也谈到了这种现实，但他本人的地位决定了他一定会从“党内新阶级”的观点上退却。因为这个理论如果被完全认可，那么要求进行的应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简单的文化革命，这在实际上就是要求用暴力推翻共产党国家而不仅仅是进行一场精神改造。尽管毛泽东称文化在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最为“深刻”的革命，但他清楚地知道，一场精神复兴的运动与一场真正的革命之间的差别。无论如何，全盘否定党政官僚也就是否定了毛泽东自己领导的革命，否定了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创立的新社会。他宁可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可以改造好的，在思想上是可以重新塑造的，并且能够重新成为革命者。因此，在毛泽东心目中，文革与其说是一场革命运动，不如说它是一场改良运动。我们看到，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改良主义的实质使得毛泽东一次次在革命力量持续激进化时，在激进力量在社会上取得优势时退缩不前。这一方面避免了激进派的产生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想法从而使其在斗争中更加务实，但另一方面，毛泽东的退缩或犹豫都导致激进派一次次遭到保守力量的凶猛反击造成严重的损失，最终连革命的最初目的——限制官僚特权都没有完成。这是文革失败最重要的教训之一。

在从“新阶级”的立场退却之后，毛泽东最终得出以个人的政治态度为标准来划分阶级的结论。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是由下述更为主观的因素，既“政治觉悟”的程度，以及政治

活动来决定的。也就是文革在划定阶级时所谓“**要看成分，但更要看行动**”。这在运动初期关于“血统论”的争论中尤其明显。这种规定的长处是，它在废弃了旧的阶级成分划分的同时，又坚持了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包括“**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观点，而且还没有把党的官僚机构都当成敌对阶级。但是，勿庸讳言，以主观标准来划分阶级很容易导致任意地把政治上的对手划分成“**阶级敌人**”，并且使人们更加关注个人的政治行为而不是社会集团的政治行为，使人民对于党政官僚的监督是人格化的而不是社会化的。其结果是过分重视个人思想而不是有效的制度建设，如果说最初的“党内资产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理论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次向务实方向的修正，那么毛泽东向强调个人的思想政治觉悟的观点上的靠拢实际上是再次把乌托邦种子播种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实践中去。事实证明的是，过分指望人“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批私字一闪念”无助于包办替代主义的解决，是弊大于利的。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给中国人民提供了关于阶级的三种不同的理论。第一种理论反映了1956年以前的初会阶级结构，它是革命时期的遗留物并依然存在于官方的“阶级成分”的制度中；第二种理论是关于新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官僚统治阶级的理论，这是毛泽东尝试性地提出来的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其后为毛泽东的一些比他更加激进的追随者，尤其是异端思潮所奉行。第三种理论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行为决定他的阶级地位的理论。第一种理论在政治上是稳健的，它肯定了1956年后的社会政治秩序，很自然地为大多数党的官员和干部，即所谓“当权派”所接受。第二种理论暗示着必然要进行一场反对现行政治秩序的革命，进行整体的社会变革。其标杆就是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它在文革初期为支持文革的各方所认同，但是当运动退潮时坚持这一观点的人却被视为“异端”。而第三种在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理论，它最终想要做的，是一场“有文化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以“四大”的形式，向知识分子和文化官僚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文化革命。强化劳动者的文化领导权和文化合法性，从而为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创造条件，为人民监督和管理国家事务探索道路。它在文化大革命运动退潮时（1968——1973年）最明显地表现出来，它支持了毛泽东的这种信念：95%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作为整体的党是能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得到改造并能清除掉资产阶级影响的，但这只有通过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激烈方式才能做到。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理论混乱，使得无数政治团体都能发现并运用最符合自己的利益的阶级观点。这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毛泽东由于种种原因（政权和革命的合法性问题、本人地位问题、历史时代的局限等等）还是未能充分摆脱苏联马

列主义话语的约束，未能创造出一个新的适合“大民主”制度的话语结构。由于毛泽东的观点在苏联马列主义的话语结构中不可能有合法地位，于是，他不得不借用一些传统话语来表达自己的“异端”观点。比如“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这就很容易会被理解为“外部的落后力量腐蚀党这个先锋队”的观点。而文化革命真正的对象——党政官僚集团，常常可以以此为由通过打击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边缘人群的办法，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最终的结果是，在文革中进行斗争的各方都能在“忠于毛主席”的旗帜下，以各种各样的理论根据和政治理由轻易地给某些团体和个人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进行残酷迫害。

本卷参考资料:

《毛泽东思想万岁》(5卷本)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 编 1968年版

《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册) 逢先知 金冲及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 (美)莫里斯·迈斯纳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 1949——1965》 (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美)费正清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改造》 李伟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

《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 王骏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电子版) 辛子陵 著

《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 许全兴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列宁选集》第1——4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论俄国革命》 (德)罗莎·卢森堡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权力与货币》 (比)厄内斯特·曼德尔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版

《新阶级》 (南斯拉夫)密洛凡·德热拉斯 著 世界知识出版 1963年版

《毛泽东的思想》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美)约翰·斯塔尔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美)莫里斯·迈斯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编 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

《大动乱的年代》 王年一 著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1983年统计年鉴》(电子版)

《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 网络文章 作者:萧喜东

《“文革”狂飚成因探讨》 网络文章 作者:钱昌明

《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 网络文章 作者:崔之元

《毛泽东与中国文化领导权》 网络文章 作者:韩毓海

第三卷 红色风暴

第一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一节 酝酿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评价姚文元这篇文章所起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毛泽东的指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的影响，认为姚文元的文章是在批评《海瑞罢官》是在给彭德怀翻案，一些不严谨的文章甚至直接说姚文元这篇文章就是在批评吴晗影射彭德怀被罢官。对于《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关系还存在争议，如《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就认为此文与彭德怀无关，说“批判吴晗的运动又**必须用彭德怀做垫背**，毛泽东……决定把他安排到大西南的三线工作，以避免在繁闹的人群中可能遭受的不测。”不管怎样，我们直接从姚文元的文本出发：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做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我们看到，姚文元虽然立论非常偏颇极端，很绝对地说地主阶级的官僚绝不可能为民做主，和以往文艺批判运动一样，《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存在着混淆个人思想与阶级意识的问题。就像上一章说的，它使人们更加关注个人的政治行为而不是社会集团的政治行为。“文化革命”使得这一问题更为严重。但如果非要说有现实影射的话，这里强调的正是反对包办替代主义，要求用“让民做主”取代“为民做主”，也就是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不要幻想有什么“青天大老爷”来拯救人们，也就是“造反有理”。此文是文化激进派的宣言书，官方意识形态将要发生大的转向，一场文化革命即将开始。

随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艺批判运动逐步在全国展开。这一类文艺批判运动大家都习以为常了。1966年2月4日，北京市市长彭真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制订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经刘少奇批准后，成为这次文艺批判运动的纲领。彭真等人希望把运动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很快各地领导都加入了这场批判运动中。

但是很快人们发现情况没那么简单，官方似乎要进行意识形态的整体转向了，因为批判的对象不再是某个知识分子的某个具体观点，而是彻底否定了整个17年的意识形态工作及其方向。它是60年代以来的文化激进思潮的一次大升级。其代表之作就是1966年4月10日，江青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的出台。它以江青2月间在上海进行的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为基础，经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修改，经毛泽东3次审阅之后发表，于5月29日向外界公布。其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了之前毛泽东的“两个批示”。这份《纪要》在文革结束后被冠以“黑纪要”，“法西斯纪要”等种种称号，至今一些老知识分子对它的愤恨并不亚于样板戏。《纪要》最核心的观点就是：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

这就是著名的“黑线专政论”，并正式提出了**“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崭新的新文艺题材上**“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艺术方法则**“要采取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

法”。同时，还要重新教育那些没有抵制住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干部，提出进行“工农兵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运动。”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30年代文艺”的迷信，甚至对斯大林的文艺思想进行了点名批评。对文化部和“反动权威”的批判随之开始。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倒台。他在60年代初提出的“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作为“全民论”受到激烈批判。在1967年初的《评反革命的两面派周扬》（姚文元署名，毛泽东审阅）中，对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人物”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进行了点名批判，开始了贯穿于整个文革10年过程的文艺“经典”颠覆、重评的运动。

在当时看来这只是一场比较大规模的文艺批判运动，但是量变促成的是质变，因为这场文艺批判运动进行的是文化革命，进行的是意识形态上的整体变革，而意识形态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变化最终导致的是现实社会中的风暴。

在1966年初，斗争主要在中央展开，即围绕要不要持续扩大运动的态势，把文艺批判运动变为政治运动。文化激进派（如戚本禹）以极其上纲上线的笔调攻击吴晗，而毛泽东激烈指责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5月4日至5月2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推出“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彭真等人想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文艺批判领域，要求运动必须要有党委领导，因此与江青、陈伯达等人发生严重分歧；由于担心当权派在地位和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后会寻求军队支持，因此打倒了与当权派关系密切的罗瑞卿，使林彪完全掌握了军队实权，但是因为与军队派系斗争搅在一起因此十分残酷；陆定一的中宣部早就被毛泽东批判为“阎王殿”、“死人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要想进行意识形态的变革，掌握宣传机器的中宣部当然要进行换血。而杨尚昆则是卷入了当权派“窃听”毛泽东的案件而受到审查。总之是双方互揭老底，谣言满天飞，林彪后来专门在政治局会议上声明叶群与他结婚前确实是处女。

到了5月份，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也受到批判，其中最具分量的是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各地领导干部也同样积极地投入了批判运动中，火药味越来越浓。很快彭真倒台，原北京市委宣告解体。在中央内部文化革命的激进支持者已经占据了优势。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它宣布撤消了原先的《二月提纲》，并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重新设立崭新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即中央文革。陈伯达任组

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后来陶铸也担任顾问），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通知》宣称：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之后，它严厉批判了文艺学术的独立性观点，提出文艺和意识形态相对于社会，尤其是相对于政治的依附性和非独立性，也就是用政治上的阶级话语，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取代所谓“平等”的“学术”话语。当然最著名的是毛泽东在它的结尾加上的一段话：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一些人认为《通知》中的赫鲁晓夫和“走资派”就是指刘少奇，这就太肤浅了。可以把《五一六通知》和文革结束后中央清理“三种人”（即造反派）的文件比较一下，1983年的

《通知》说“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继续受到重用，有的还被作为接班人已经提拔或准备提拔……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两者说得几乎一摸一样。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通知》是要打倒刘少奇，那么后来邓小平的“清理三种人”的《通知》是要打倒哪一位呢？

《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不过我们前面说过毛泽东未能完全摆脱苏联的话语体系，这使得他的新观点与苏联式马列主义话语体系互相交叉。《通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毕竟这是一场反对整个的官僚独立利益的运动，而官僚传统上是中央命令的执行人，这些人即使不是别有用心地把运动引向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也会因为自己的地位和立场对中央的决定做出有利于自己的理解。因此它注定了一开始会遇到极大的阻力。文革想要真正开展，还必须要有来自民间的响应。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点名批评北大党委领导限制运动的发展的做法。可想而知，如此“大胆放肆”的言论遭到了北大党委的“官办运动”的激烈批判，聂元梓被打为“邓拓帮凶”、“叛徒”、“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大坏蛋”。但是，聂元梓的大字报迅速得到了高层的支持，毛泽东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来又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它的意义超过了巴黎公社。”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邓拓等人被打倒，《人民日报》被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控制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系统阐述了关于文化革命的理论 and 政策，提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资产阶级启蒙人物总是鄙视群众，把群众当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当然支配者。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同他们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在唤起人民群众的自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登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对聂元梓大字报全文登载并且给予极高

评价。一场文艺批判运动迅速上升为对党委的批判，在学校中掀起了巨大的风暴。

第二节 工作组

在中央对聂元梓大字报予以重视和肯定的鼓动下，一些学校学生开始积极批判学校党委，批判政治运动的官办形式。一些学生还自发成立了组织。比如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等人成立的一个名叫“红卫兵”的激进组织。

不过当然党委的人也不会傻到心安理得地接受学生们的批评。他们使用了一种被称为“抛”的战术，抛出无数个“小三家村”“小燕山夜话”、“小吴晗”，说白了也就是寻找替罪羊，意思就是说不是党委把问题搞坏了，学校里的那些老师们才是罪魁祸首，党委现在打倒这些人“以谢天下”。也就是让学生们把对校党委的不满发泄到老师头上去。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一语道破天机：“我们已抛出一个‘三家村’，再抛出几个人就主动了，省委就没问题了”。在中央一级，被刘少奇、邓小平“抛”出的就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文化界的主要领导。仅在中南地区，被负责中南工作的陶铸、王任重以中央的名义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这个插曲却意味深长，它表现了这么几点：首先，党政官僚系统已经强大到可以驾轻就熟地转移社会矛盾，比如像这样把学生平日里积聚的对于学校行政系统的不满发泄到老师的身上。这样强大的矛盾转移能力导致支持革命的力量想要前进就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而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那套本来就十分模糊的话语结构更是使官僚会按照对自己有利的理解去执行，从而扭转斗争的方向。另外，它进一步加剧了对于文革认识的混乱。由于人们习惯以“亲身经历”解释文革中的一切，而文革中一方面由于党政官僚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而转移矛盾，另一方面底层力量的相对组织性的缺乏，导致了文革中斗争形势的复杂化。这进一步加剧了对文革认识的混乱，在后面的“红”八月中体现的尤其明显。

按惯例，搞运动需要派工作组。6月3日学校开始停课，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的工作组率先进驻北京大学。同日，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工作组的“八条指示”即“内外有别”、

“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鉴于四清的教训，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态度暧昧：“也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后来又说：“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6月4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专程前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在3人一再的坚持和保证下，6月1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派工作组在全国铺开。但是工作组进校后发生了一系列学生反抗工作组和工作组镇压学生的事件，急剧激化了社会矛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文革史的走向。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50天专政”。

对于学生与党委、工作组的冲突，一个经常被提到的例子是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秘密指使聂元梓写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不过当事人聂元梓和曹轶欧都不承认这一点），强调学生都是被操纵的。然而这实际上是掩盖了文革初期存在于全国的一个普遍的趋势，那就是：反对党委、反对工作组的自发性群众运动在全国高校普遍存在，而且这些自发性群众运动后来在意识形态上与高层文革派结成联盟。

我们首先看一下各方对50天专政的评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只字未提，这是官方“宜粗不宜细”的典范。《文化大革命简史》依照“简史”的风格，对此事记载道：“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各单位群众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不同。所以，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数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数派），必然会同一部分群众和某些基层组织发生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以致发生越来越多的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为了坚持工作，一部分工作组曾经**不适当**地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某些措施。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当时，对于这一类措施，党内党外都有赞成和不赞成的不同看法。江青、康生一伙确对此大加渲染，诬之为‘镇压群众’、‘白色恐怖’、‘反对革命’，力图给工作组加上弥天的罪名。”这里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从“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结论去先入为主。对于学校里和社会上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析完全无视其社会基础和立场，缘由，全部归结为所谓“思想问题”，“理解问题”。可

是一个群体的立场和对问题的理解不是从这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出发的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和《大动乱的年代》较为详细讲了工作组的错误尤其是对学生的打击迫害，但立场与《简史》一致。持权力斗争观点的海外学者宋永毅则讽刺说工作组残酷迫害学生的行动是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只有《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对此没有任何客观讲述，仅以“亲身经历”否认工作组有任何错误。因为如果要和官方结论保持一致，理解“50天专政”的意义也就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对“50天专政”内的矛盾冲突深入追究、分析下去，就可能破坏官方文革史的自圆其说。因此我们必须从事实出发。

当时派工作组是党的一种传统的、惯常实用的工作方式，其前提就是：一个基层单位的工农群众处于受压制、不敢反抗、没有领导的落后状态，工作组下去了解情况，搞清敌、我、友，以便发动群众。在四清中，这个观点被修改为：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烂掉了，实际上已经没有党的领导，因此上级党委就要派驻一个工作组，去重新确立党的领导，也就是由上级领导来确定谁是左、中、右。当时，派到基层单位的工作组被认为代表着党，代表着中央。这个有关“党的化身”和“党的体现”论，得到当时大多数各级干部的认同，比如，薄一波在1966年6月19日视察清华大学时，就“工作组能否代表党”这一问题“精彩”地训斥了蒯大富：“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但毛主席不是孤立的，他有头发，有手，有腿，他做事情是通过这些作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是通过基层执行贯彻的，我们认为工作组是可信赖的，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人都不相信？”

工作组进入学校后，在支持并扩大了学校领导的“抛”战术的同时，很快把在农村所做的那一套搬到了学校中。主要参考的即王光美的所谓“桃园经验”，也就是派工作组下基层秘密扎根串连、严密信息控制、“大兵团作战”、“给群众排队”、“洗手洗澡”、“下楼放包袱”，使政治运动的操作程序进一步标准化，精致化。工作组还组织了一批干部子弟来协助运动的开展，高层领导也通过他们上学的子女了解基层运动形势。很快，被揪出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工作组和官办学生组织的残酷打击。文革中知识分子是最容易受到进攻的阶层，各派都对“资产阶级权威”犯下过不可饶恕的暴行，但最先把意识形态批判上升为暴力行动的正是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和学校里的干部子女。如一位学者称：“在没有特权的**社会集团成为党组织选择的牺牲品的同时，最有特权的阶层即干部子弟成了党组织的主要同盟军。**”显然，工作组的这种方式一开始就与要求批判党委的学生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最早的悲剧发生在6月6日，即西安

交大“6·6”事件，学生李世英等人因反对工作组被打成“反革命”，被戴上高帽子游校3天。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更典型的，我们首先看北师大第一附中的例子（刘少奇次女刘平平在此校上学）：

6月9日，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6月17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通过刘平平等人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10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是‘四类分子’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危言耸听的言论搞得人人自危，互相揭发。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90%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77%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甚至故意制造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6月20日，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出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根据她对父亲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和文革委员会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学生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对“闹事”的厌恶和防范：“**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

从6月24日到30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等学生的3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8小时。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当场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默许下的武斗。三次斗争会后，全校1000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150名之多。还有整整一个班被打成了“右派班”。

第二个例子是北师大女附中。邓小平曾指示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搞成“典型”。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6月4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在人人自危的形势下，工作组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黑材料。6月17日，高三（4）班李黎黎等13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质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学生中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学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对少数学生的围攻持续到深夜12点。会后邓榕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小平说：“反工作组不对，这与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相符。”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在50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6个校级领导干部5个被斗，6个教研组长也有5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当时高二（2）班一个班就斗争了12个被定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X X、朱X X被定为“反革命”。张X X被斗了两天一夜，朱X X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

北大“6·18”事件后，工作组的镇压升级。6月20日邓小平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19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6月27日，梁二同等18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在10天内连下的3道指示，从7月7日到7月9日连续开了3次斗争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7月初，刘少奇、邓小平还制定了一个对中学干部、教师进行“集训”和“斗黑帮”的方案。7月25日，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说：“‘洗澡下楼’不要就事论事，要猛

上纲。”有的教师被打击已经写好了遗嘱、绝命书。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清华大学（由刘少奇夫人、“桃园经验”的炮制者王光美蹲点），工作组进校后声称：“蒋南翔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庞大的保皇党”，“清华干部8年也改造不过来”。工作组不准干部看大字报，不准参加运动和任何会议，仅数力学系一个系内，党支委以上、教研组主任以上干部55人中，被工作组打成“黑帮”、“黑线”的有39人，占干部总数的71%，该系党总支委员12人全部被打成“黑帮”。6月19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率先“炮轰”工作组，要求夺权。许多人响应支持。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后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刘少奇对他在清华的女儿刘涛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在关押中，蒯大富写下37份大字报，“炮轰”工作组组长叶林，声称：“要我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这永远也办不到！就是上了绞刑架，我也将宣布，我是革命者，我是坚决革命到底的！”

随着工作组对于学生的残酷镇压，学生们对于工作组的反抗也愈演愈烈。不过首先它是通过逾越了工作组所“钦定”的批判范围开始的。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校园发生了著名的“6·18”事件。那一天，一些学生未报告工作组，就在全校范围内把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单位的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拉来用暴力方式进行“斗争”。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60多人被以大规模集体暴力的形式“斗争”。

“6·18”事件成为50天专政的一个关键点。由于工作组与学生之间的矛盾急剧激化，遭到残酷镇压的学生发生过激行为已是在所难免。此时，“造反派”的学生（往往是平民子女或基层干部子女）由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因此在运动中诉求更激进，因此就更容易和工作组发生分歧。他们并没有什么组织纪律，因此在反抗工作组的行动中使用了极不恰当的无组织性的暴力方式，反而给工作组进一步镇压学生提供了理由。实际上，北大的“6·18”事件标志着文革的一个循环的开始。这个循环就是：首先，群众对于官僚确实有不满，但只是提出意见。但党政官僚为了掌控运动的主导权，操纵运动，不允许群众的批判超出工作组规定的范围之内。这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如高级干部子女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女，这类人在北京高校占了相当大一部分）并无所谓，但是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来说，这是他们所不满意的，他们反对工作组的包办替代。然后工作组镇压学生，然后这些学生观点进一步激进，比如要撤掉工作组，于是工作组更激烈地镇压。在撤掉工作组

后，党政官僚和干部子女还会利用血统论继续镇压可能的反抗。正是在这种“反抗——镇压”模式的不断循环中，文革中的社会矛盾一步步升级。

官方历史对 50 天专政中唯一给力的记载就是：北大“6·18”事件后，刘少奇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并加了按语，从而使全国各地的乱批乱斗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这里有意不去触及两个问题：第一，当时并不是以法治或者劝说的方式去制止武斗的，而恰恰是上纲上线到敌我矛盾的性质去严肃处理；第二，针对学生中自发的“乱斗”现象，实际上是用四清以来的政治运动的惯例作法，也就是运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斗争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刘少奇、邓小平并不反对对他们心目中的“右派”和“捣乱分子”实行暴力，工作组在整人过程中的暴力和酷刑都得到默许。关键在于“6·18”事件中的暴力超出了工作组的控制范围，这是刘、邓所无法容忍之处。只允许我使用暴力，决不允许你使用暴力。在后来的群众运动中，对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工作的 50 天的最大指控，恰恰就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和“残酷镇压群众”。

“6·18”事件使工作组的镇压急剧升级。北京高校内工作组和学生的冲突事件大部分集中在 6 月 20 日。其中较著名的是北京地质学院“6·20”事件。6 月 20 日，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学生的支持，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邹家尤工作组。当时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笏、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断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并指示工作队抓李贵。薄一波后来在地院工作组整李贵的黑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第二天地质部的领导人还调来一批机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组呐喊助威，并组织家属、小孩搞游行，作为反击。

北京师范大学的“6·20”事件是这样的：谭厚兰等 17 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上午 10 点，工作组组长孙友渔急忙作广播讲话，认为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于是，以“横扫外围”、“反干扰”、“抓游鱼”名义的围攻开始了。大字报的作者没有屈服，中午又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当晚，围攻和批斗的现象愈演愈烈，谭厚兰等写大字报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被限制人身自由。

北京林学院的事件围绕一份《谈话纪要》展开。6 月 20 日清晨，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等 5 人根据采访北京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的干部许克敏后所得的记录，整理成大学

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声称：“对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欢迎他们揭发问题”，“有人盲目地拥护党委，以为通过运动可以入党，或当个好党员，那就倒霉了。”提出“把运动的政策向群众公开，和群众直接见面。”这些意见深受欢迎，广为传抄，到6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34座大中城市。结果，它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5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7月9日，工作组召集12个院校4000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书铭等人达8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谈话纪要》的3个人打成“小三家村”，教师史X X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服毒含冤而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4000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4人自杀身亡，2人被斗得吐血，2人被迫害致死。

在6月20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39所大学发生学生轰赶工作组的事件。全国各地也都发生了学生轰赶工作组和工作组残酷镇压学生的事件。如西安交大“6·6”事件、青海“6·10”事件、南京“6·13”事件、广州《北京来信》事件、武汉墨水湖中学事件、东北人大“红旗事件”、重庆大学“6·18”事件、广西西大“龙乾运事件”等等。既然学生反抗活动不断，那么党政官僚就要准备进行系统的镇压了。当时一些人认为，学生反对工作组的事件就是1957年右派向党进攻的重演，陶铸、王任重《给湖北省委的信》中说：“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大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6月23日，北京市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作了著名的“6·23”报告，认为“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对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二次反右”的总工作被称作“反干扰”。

李雪峰的“6·23”报告传达后，“反干扰”被推向顶峰，这几乎是1957年反右的重演，仅清华的“反蒯（大富）”运动中就有700多人被斗，多人自杀。在“反干扰”时期，仅在6月份，首都24所高等院校30万师生中，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在“反干扰”运动中，一些中学的自发学生组织（如“红卫兵”）被视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在这之后，工作组利用“靠边站”的干部要求解放的心理，诱导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来换取早日“洗澡下楼”，让他们“将功补过、立功赎罪”。最典型的就是清华工作组让“下楼”的干部参加“反蒯”运动。

第三节 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在一线领导主持运动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毛泽东仍在外地视察，这是发动大规模政治运动或做出重大决策之前的惯例，目的在于进行进一步思考以及在体制内部争取和团结可以争取的力量。6月底，毛泽东在南巡之中赋诗一首：

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在7月8日写完了给江青的那封耐人寻味的信后，毛泽东离开韶山滴水洞，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得到了媒体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耐人寻味的社论：《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记录了毛泽东畅游长江时所说的话：“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此时毛泽东的未表态确实是给了许多学生以一丝希望。通过对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大力宣传，至少可以说明

运动还远远没有结束，而不是像反右那样匆匆了结完事。接下来还有“大风大浪”要考验他们。因此，可以理解学生们对于毛泽东的殷切希望。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指责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7月21日，毛泽东又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有些人不想想，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要闹事，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出来后，有些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的部长就那么可靠？有些部、报馆是谁掌握呀！**许多工作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文件要马上写上，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骂人、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斗嘛！不准打人，叫他们放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毛泽东表态后，立即派出中央文革小组与被镇压的学生进行联系。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由此从意识形态领域扩展到行政领域。7月21日，王力、关锋去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7月22日、23日，陈伯达、江青两次到北大进行调查。

7月2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广播学院（该校有100多人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被限制自由）出席群众大会，江青在会上说：“有些同学有意见，说你们之间不谅解，但你们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冲突，不能进行迫害，只能怪背后领导他们的人，你们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封条，XX不准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如果这算是所谓“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的话，那么，这是在工作组已经推行了50天的恐怖政策之后才发生的，而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月前学生轰赶工作组的原因。7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4次前往北大，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在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31名高干子弟联合发言，“给工作组唱赞歌”，认为工作组的错误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遭到另一些人的批驳。江青在大会上声称：“昨天同志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一张一张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革命行动！”顿时北大学生们情绪激动，口号四起。社会上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此开始。50天惊心动魄的经历，使一大批青年坚持认定了毛泽东代表着反压迫、反迫害，代表着翻身解放，代表着“造反有理”。至此高层文革派与基层造反派的政治联盟开始基本成型。

7月26日，毛泽东再次强调：“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此时围绕着撤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争论在学校中白热化了。这时候学生已经明确分裂成了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表面上看造反派有着更好的群众基础，但是在这个时候，且不说社会上的人对于批判党政官僚有所疑虑，即使在学校中，造反派往往也是那些在50天专政中带头反对了工作组的人物，如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等人。许多平民子女并没有对于批判工作组乃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系统认识。而即使是在已经参与了斗争的造反派之中，也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组织结构。因此尽管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但是面对整个一个官僚控制的国家机器，他们仍然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因此，他们之后的任务，一是发动更多的平民学生，乃至发动普通群众，二是加强自身的组织架构。至于保守派则是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阶层，最典型的即各个学校里的高级干部子女。前面说过，工作组扶植了一批干部子女领导的组织来协助运动的开展。高层领导也通过他们的子女来掌控运动形势。如邓小平之女邓榕后来检讨：“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的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在50天专政中他们已经依附于工作组，显然，他们自身特殊的身份以及工作组赋予他们的组织性使他们成为了一支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到了8月份工作组虽然撤走，但是干部子女仍然可以利用其影响力操纵新成立的“文革会”、“筹委会”、“红卫兵”等组织机构控制运动的方向。比如清华大学高干子弟掌权的概况：

刘涛——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三临”（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临时主席团、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主要负责人之一，自控系“文革”主任。

贺鹏飞——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之子，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校临时主席团主任委员，机械系“文革”主任。

李黎凤——人大副委员长李井泉之子，校“文革”筹委会、临时主席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工物系“文革”主任。

刘菊芬——人大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之女，清华大学红卫兵总头目。

乔宗淮——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三临”主要负责人之一，数力系“文革”主任。

胡劲波——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之子，机械系“文革”负责人。

王新民——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王维舟之子，“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

王苏民——第四机械部部长王铮之子，“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之一。

到了7月末，由于干部子女的实力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凸显其作用，高校中的争论的话题开始转向“出身”问题。如果说工作组对学生的镇压与1957年反右类似的话，那么对“出身”的争论与反右运动之后对“成分”的强调是一致的，都是在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严重质疑后的一种强烈的反弹。7月29日，在工作组撤出学校的同一天，北航附中贴出了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副对联成为了几个月内运动的焦点。而真正的工农子女（尤其是工人子女）立场并不很明确，一些人坚持造反立场，而另一些人鉴于反右的教训“随大流”跟了保守派。这使得保守派在组织性强大的同时也在现成的人数上具有优势，形成了多数。

之后，我们还必须了解一下50天专政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它的影响。首先，50天专政有它的偶然性成分，因为毕竟谁也不会想到学生们会对工作组的行为做出那样激烈的反抗。学生们毕竟不同于反右中的知识分子和四清中的农村干部。学生的这一阶层最大的特点在于，尽管他的立场选择与其家庭出身和地位会非常有关，但他毕竟是与社会利益没有直接的联系，总之也就是最“纯洁”的体制外力量，因此在对这个体制进行冲击时可以毫无顾忌，但也会带来过于激进化 and 缺乏组织性的弊病。而对于工作组来说，他们是党政官僚固定的进行包办替代的政治运动的手段，与之前的“抛”战术和之后的血统论相比，工作组这种形式无疑更加制度化，控制运动的效果也更加有效。因此他们也就成为反包办替代的群众所最激烈地要反对的对象。在我之前所说的“反抗——镇压”的循环中，形成了工作

组镇压的持续残酷化和造反派的持续激进化。这一循环很快超出了工作组的范围而蔓延到全体学生，进而蔓延到整个社会，整个文革的进程中。

我们来梳理一下 50 天专政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尽管一度提出过质疑，但是刘少奇并没有完全反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提法的。但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对其理解具有严重分歧，当时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刘少奇认为党内走资派**来自于外部力量对党这个“先锋队”的侵蚀**，因此如果对党的批评过头就要对社会力量进行打击，这是刘少奇“打击一大片”的理论基础。而毛泽东认为党内走资派来自现实的政治经济体制，党在执政后已经不能确保其先锋队的地位了，问题出在党内，要进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简而言之，刘少奇是“要整领导，更要整学生”，毛泽东却是“要整领导，不要整学生。”正是由于这个分歧被隐藏了起来，毛泽东以为刘少奇接受了他的观点，刘少奇也以为自己理解了毛泽东的意思，于是于一线刘少奇主持运动，酿成了 50 天专政的悲剧。从具体过程上看，刘少奇一开始也是去大规模地整学校领导和教师，并不是像官方历史所说“想把运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当学生有过激行为时，刘少奇就更加倾向于整学生。结果工作组“运动群众”的行为扭转了运动的大方向。这使得愤怒不已的毛泽东决定将刘少奇打倒，亲临一线主持运动。这也许不是刘少奇故意而为，而是他的立场和理论体系决定了他会对政治运动做这样的理解。50 天专政暴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对党内走资派的理解上的分歧，这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历史上观点分歧的根源，这也是毛泽东会在《炮打司令部》中把 50 天专政和刘少奇以前与他的分歧联系起来的原因。50 天专政同时也暴露了 60 年代以来一线二线体制的严重弊端，这是在 10 月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毛泽东会激烈批评中央的一线二线体制的原因。

最后，我们可以把造反派和 1957 年的右派做一下比较。在流行的文革评论话语中，被视为在文革中助纣为虐的造反派，与 1957 年因帮助党开门整风而遭迫害的右派，似乎具有根本对立的性质。1957 年反右运动中受到打击的右派分子，都被认为“是社会的精英，他们除了有知识，也往往是社会良知与公正的代表，他们之中的先知先觉者为知识群体中的佼佼者，是社会进步的先声。这些人的基本权利横遭剥夺，身家难保，那么，这个民族的不幸是可以想见的了。”可是，通过对造反派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 1957 年参加“鸣放”的右派分子与 1966 年投入造反的人士中，显然都存在着对现存制度的某种不满或反抗心理。前者可解释为“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的自然延伸，后者可理解为“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

有真正解决”。而促使他们反抗行为的共同因素，显然同样的是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

但是造反派和右派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是因为，1957年划的右派往往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有不少是左翼知识分子，只有一部分真正的右翼是要求工农干部下台而受到打击，而大部分知识分子则是由于和党政官僚在体制问题上的冲突。也就是说，他们批判所占的立场确是不同的。前者主要针对的是缺乏技术知识的工农干部，后者针对的是自命高人一等的党政精英。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会和党政官僚力量发生激烈的冲突，从胡风事件到反右一直如此，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又决定了他们和工农群众在某种程度上的脱离。因此，当来自社会体制之外的学生和来自社会偏底层的工人起来造反时，党政官僚和知识分子成为他们共同的批判目标。更重要的是，由于党政官僚先有工作组，后有保守派的保护，因此不排除一些造反派会把遭到镇压的怨气发泄到在他们看来和官僚同属一个阶层，又相对比较“容易”被批判的知识分子头上，如北大的“6·18”事件。由于知识分子夹在两头受气（他们自认为是中间阶层），因此知识分子所写的文革史就变成了普遍镇压的历史。这是因为一些人无法认清知识分子与官僚、知识分子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是两种不同层次上的矛盾，无法认清来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批判表面上类似但却终究不是一回事。

第二章 “红”八月

第一节 红卫兵运动

在进入八月份之前，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形势。学校内部围绕着倒工作组和挺工作组已经分裂成了两派。“造反派”人数偏少，主要是一些“造反”愿望比较强烈的平民子女。他们提出了一些非常激进的要求，反对工作组和学校里的干部子女操纵运动，希望把政治运动变成他们自身利益诉求的表达。许多批评教育领域的特权现象的观点就是由他们提出。人数少的原因一方面是相当一部分平民子女对于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还有疑虑，另一方面则是高校里（尤其是北京的高校）平民子女并不占优势。有资料显示1966年北京那些优秀的大学中干部子女和知识分子子女所占的人数竟超过半数。当然干部子女能上好大学并不完全是凭借特权，而是经济政治体制决定的优越地位为他们提供了比一般学生更好的学习环境和资源。而他们特殊的身份就更加助长了他们的优越感，可能还有一些理想主义（如“革命后代要接班”之类）。作为基层运动的掌控者他们很清楚他们绝对不允许这场政

治运动发展到冲击他们父母的地位的程度。因此一些人支持工作组是希望把运动控制在传统上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进行斗争（这是 17 年来党政官僚与传统精英斗争的延续）。有一些干脆利用工作组镇压一切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造反派。

在 1966 年 8 月来临之际，社会上潜藏的矛盾通过他们的子女在学校里表达出来。这一矛盾原本是不尖锐的，因为之前没有人对官僚权力提出过足够强的挑战；一方面，学校内的 50 天专政严重激化了矛盾，并形成了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学生由于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并不紧密，容易将本阶层的政治诉求激进化，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学校乃至全社会的潜藏的矛盾在 50 天专政后浮出水面，直至全面爆发。那种认为学生运动完全是毛泽东“忽悠”出来的观点是很可笑的。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坚决支持了工作组对于造反学生的镇压，证据确凿，尽管在口头上刘少奇坚持声称工作组的目的在于不要让运动失控（即使 7 月 29 日撤掉工作组后他还是这样认为）。在这里阴谋论宣称这是毛泽东的“圈套”，也就是他在运动之前故意离开北京，让刘邓放手镇压学生，然后自己再摆出一副为学生主持公道的姿态。如果刘邓不镇压，毛泽东就会说他们支持“暴乱”，同样有理由将他们干掉。

我们且不说毛泽东如果仅仅只是想打倒刘少奇有没有必要用文化大革命这样兴师动众的方式，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观点本身，因为它是在文革阴谋论的起点。之前我们已经将 50 天专政同 1957 年的反右做过了一番比较，指出过他们的相似之处。我们看到，在进行重大的群众运动或进行大的政治变革之前，毛泽东都要外出巡视。这主要是因为政治运动往往涉及到官僚体制内部的变化，如果目标是针对社会的（比如肃反），那么下个命令依靠官僚机构去执行就行了；但政治运动不同，因为它是运用体制外力量去改变体制内的利益分配，甚至是像文革这样要改变整个体制，因此所以经常会出现执行不力甚至是转移斗争矛头的现象，比如“挑动群众斗群众”或“整小官保大官”。四清中的“形左实右”和 50 天专政最为典型。因此毛泽东外出巡视也就很自然。1957 年开门整风遭到各级领导的普遍反对，毛泽东不得不对各省领导做工作。1958 年大跃进前夕毛泽东也同样在全国搞长篇大论的讲话。凭什么就说这次巡视外地是在给刘邓下套呢？按这个逻辑，那 1989 年 4 月赵紫阳访问朝鲜是不是在给李鹏下套呢？

第二点，在被体制内力量压制的学生出现的激烈的反抗事件，如西安交大“6·6”事件、北大“6·18”事件、北京地院“6·20”事件、北师大“6·20”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和党委镇压学生的事件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全国各地反抗工作组的事件都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不可能是他故意安排的。而官方历史则喜欢纠缠在康生和聂元梓的关系上，无视学生们自发的行动。那么，毛泽东怎么保证学生一定会把事情闹得那么大？而且，如果像 1957 年没起多大风波就将 50 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那

样，将学生运动干净利落地消灭在摇篮中，毛泽东又能奈何？最重要的是，学生的反抗事件，包括1957年鸣放中的“右派”言论在内，都是“反抗——镇压”这个循环进行多次的结果。是工作组的“打击一大片”在前，学生的激进行动在后。怎么保证刘邓不会识破毛泽东的“阴谋诡计”，缩小打击面，对学生客气一点？那么学生就可能不会有那么激烈的反抗，那样也就无所谓“暴乱”了，难道毛泽东在这之前就已经算准了工作组一定会干出那种事，学生们一定会如此激烈地反抗工作组，刘邓一定会如此激烈地镇压吗？

第三，有人认为毛泽东只给文革派“交底”，瞒着刘、邓，所以是阴谋。可是文革派也有不少观点与毛泽东不符，比如在毛泽东表态前，康生、江青都曾指责过北大“6·18”事件，毛泽东并没有给他们“交底”。而在文革前，毛泽东关于“三自一包”的批判，“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中央出修正主义”、“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言论都是公开讲出来的，更不用说《五一六通知》刘、邓都投了赞成票，起码心里应该有数。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态度暧昧，最后是刘少奇、陶铸向毛泽东打了包票才使得工作组得以进驻学校。毛、刘关于工作组的分歧实际上是两人立场、理论体系、对运动理解不同所致，也就是“方向路线”问题。

阴谋论实质上是对毛泽东的另一种神化。在阴谋论的文革史叙述里，毛泽东就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能知过去未来，能将一切都纳入他的掌握中，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在他的预料之中的神（当然是恶神），林彪江青当然都是丧心病狂的爪牙，周恩来是个懦弱的“忠臣”，而刘少奇邓小平都是上当受骗的纯洁的小白兔。虽然叫做“权力斗争”，可是我根本就没有看到有什么你来我往的斗争，只看到毛泽东拐了那么一个无聊的大弯子去迫害“天真无邪”的刘少奇的童话故事。最搞笑的是说刘邓不反抗毛泽东（包括以前不敢向毛泽东提意见）是因为大家把毛泽东当作神，以为他永远正确。都是共事了几十年的同事了，你当年的那点事我还不清楚，毛泽东在革命年代犯的错误也是不少的。突出毛泽东个人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宣传需要罢了。倒推因果，自己拆穿一个自己编织好的神话，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轻松的事情了。我们还是消停一下，回到事实中来吧。

就在社会矛盾通过学生运动而激烈化的局面下，中国进入了1966年8月。

1966年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显然这场会议将要决定文革的走向。会后，毛泽东向清华附中那个叫“红卫兵”的造反派学生组织写了一封信。“红卫兵”的代表作是三篇“万岁”：6月24日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7月4日的《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7月27日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力宣扬“造

反有理”。它被工作组认为是“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在“反干扰”中许多类似的学生组织被解散，但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最终坚持了下来。信的全文如下：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引者注），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毛泽东的信除了表示支持“红卫兵”以外，还表达了干部子弟（即信中的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因为这时许多干部子女在口头上还是“很革命”的）能够与平民子女实现团结与联合，“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的愿望，并重申“给出路”的政策以防学生们走向极端化（无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尤其是“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最为耐人寻味。

这是毛泽东的终极表态，由此完全亮明了毛泽东的支持态度。这封信公开后起到了两面的效果，一方面当然是造反派得到了领袖的支持，底气更足；另一方面却是由于领袖支持了这个叫做“红卫兵”的学生组织，那些掌握学校文革领导权的干部子弟们便把他们操纵下成立的学生组织都叫做“红卫兵”，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主流。正式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风暴。由于原本势不两立的两派为了争夺道义制高点都管自己叫做红卫兵，使得一些人自然就得出这样的逻辑：“红卫兵干了许多暴行，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所以……。”明明毛泽东支持的是造反派，而文革的激烈化却是始于保守派的暴行（无论是50天专政还是“红”八月），造反派以牙还牙引发的恶性循环，如果让毛泽东为造反派红卫兵的行为负责，那么保守派红卫兵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呢？

当然红卫兵运动还带来了文革研究上的混乱。特别是支持工作组的，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保守派红卫兵，由于在官方历史中他们被一笔带过而在阴谋论中他们被完全抹去（即“所有人都被毛泽东洗脑了，所以分析派别根本没意义”），所以他们没有独一的称呼，而有一个模糊的称呼：“老红卫兵”。其实“老红卫兵”是由于保守派较早掌权（而不是较早成立），并把造反派视为“狗崽子”而自称的，是干部子弟掌握了运动初期的话语权的结果。但造反派学生的历史并不比保守派短。所以在一些不严谨的文革史中，又把毛泽东在8月1日的信中支持的，一直受到工作组打击的造反派组织“红卫兵”与那些在工作组的扶植下在学校里掌权，在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后闻风而动，把自己也叫做“红卫兵”的干部子弟相混淆，结果得出了毛泽东支持“老红卫兵”这一结论，进一步加剧了认识上的混乱。而另一些研究者从资料中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出文革中的红卫兵分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派，但是囿于传统观念把一派叫“红卫兵”而另一派叫“造反派”。可是难道造反派的学生不会管自己叫红卫兵吗？这里我们姑且用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称之。

现在的情况对于保守派来说不是很妙，因为工作组被撤销，毛泽东也公开表态了。不过由于造反派在人数上占少数，因此保守派目前要做的就是不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运动中来或形成组织，毕竟平民学生在数量上是有绝对优势的。这种需求外加自身“自命高贵”的优越感，催生了血统论的传播。于是，7月29日北航附中贴出的那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迅速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就在毛泽东表示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8月1日，当天晚上，创作“血统论”对联的北航附中的学生把对联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到北京主要高校。迅速激起两派学生的大规模辩论。

这副被称为“鬼见愁”的对联的诞生，是文革初期爆发的一个意义重大、影响剧烈的文

字事件。它极其当代的政治内容浓缩于极其简练中国传统的语言和文字形式——对联之中，而且对联所提出的命题，来自真实的社会土壤，来自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冲突，它是对主流革命意识形态的公然篡位和取代，而不再是简单地模仿或重复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和官僚标准操作程式——而这后两者经常是凌驾于社会现实之上的。

我们分析一下这副对联。文革的目标是“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键词是“党内”和“当权”。而血统论宣称“老子英雄儿好汉”。“英雄”是谁？自然是昔日的革命英雄，今日的当权派，或者说是“禁不住资产阶级裹着糖衣的炮弹的打击”的人。而“老子反动儿混蛋”，自然限制了一大批人参加运动，即使要参加也要先接受“自来红”们的“教育”。这样，保守派就可以在运动中始终占据领导地位，从而把运动引向他们希望的轨道了。起码在1966年，血统论是党政官僚利用学生运动抵制文革的最核心的手段。

显然中央文革估计到了对联转移矛盾的效果。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他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但是陈伯达也无法说服支持血统论的学生。

从8月2日下午开始，北航附中学生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高呼“血统论”对联，为对联造势，从而引起更大骚乱。他们还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简称“贫协”，而清华、北大等校的学生立即响应，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这就是所谓“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中工人、农民子女实际上是被边缘化的，以革命干部子女，革命军人子女，革命烈士子女为核心；而“黑五类”即传统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由于其实官方并不反对对这类人的斗争批判，因此容易产生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对象混淆的“一次革命论”的错误。当权派正是利用这一点集中地往这个漏洞里钻。而运动的重点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腐蚀党这个“先锋队”的因素并不来自于党外“落后”力量，而来自于这个党本身。**黑五类既不在党内也不当权，这里实际上与四清运动中把矛头指向基层干部相同，是通过集中火力攻击传统阶级敌人来转移目标，将矛头指向社会。后来，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造反派，保守派攻击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广，从黑五类延伸到黑七类，黑八类，即加上了叛徒、特务、资本家。注意此处的资本家指的是公私合营后拿定息的资本家，可是我们看到，打击对象都扩展到八类了（梁漱溟曾讽刺说要不要把知识分子算成第九类，即“臭老九”），还是没有“运动重点”的“走资派”。保守派的立场可见一斑。

但是这一划分也不绝对。在学校内部，不少学生（尤其是工人子女）对运动并不完全理解，或是鉴于反右的教训不敢出头（当保守派散布“秋后算账”的言论时就更是如此），或是出于盲目崇拜，或是“赶时髦”“随大流”，或为了自保，加入了保守派组织。而少数出身“黑五类”的学生在遭到迫害和歧视后，反而仗着心狠手辣，讨得“红五类”的欢心，夹在保守派红卫兵中间充当打手。这也使得文革初期保守派红卫兵占了多数。北京第二医学院曾有人贴出过一张题为《飞出了一只白乌鸦》的大字报，对这类不伦不类的红卫兵进行了绝妙的讽刺。这些人都在高干子弟的指挥下参与了“红”八月中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文革中一派组织，尤其是保守派的立场和观点更多地取决于其领导层而不是执行者，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文革中的派系复杂性的问题。

随着运动从学校扩展到社会，当权派的镇压行动也开始扩散。这种保守派把打击矛头指向社会，一方面转移矛盾，另一方面镇压任何胆敢造反的势力的行动，就是所谓“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在社会上的延续。

第二节 炮打司令部

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反对成立“贫协”。她认为这是搞分裂，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尽快在学校里成立学生文革组织，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工作组和当权派。

同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讲话，对50天专政的批评更加激烈坦率：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

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当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讽刺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插话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泽东决定公开党内的分歧了。他在一张报纸的空白处写下了那段著名的话：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毛泽东公开了党内分歧，并把50天专政与刘少奇之前与毛泽东的分歧联系起来。这标志着1961年以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结束，也标志着1956年以来一线二线体制的终结。但这里不仅仅指的是刘少奇一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曾经的新民主主义左派，现在的已经“做官当老爷”，阶级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写出这份大字报后，到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刘少奇就由党内第2位降至第8位了，实际上等于倒台。而这时群众运动还没有完全发起。由于军队（这是处理政敌的最后手段）掌握在毛泽东手中，因此如果他仅仅想打倒刘少奇，根本没有必要用文化大革命这样既费时又费力，还十分冒险的方式。从过程上来看，是刘少奇的下台使运动逐渐地回到了毛泽东希望的轨道，而不是运动回到毛泽东的轨道导致了刘少奇的下台。这个顺序是不能搞混的。而且，一些忠实于“宜粗不宜细”的历史书更说毛泽东写了这个大字报后刘少奇就被“残

酷批斗”，实际上，毛泽东 8 次接见红卫兵刘少奇都参加了，还参加了 11 月份纪念孙中山诞辰 100 周年的大会。至于刘少奇受打击那是 1967 年“革命大批判”和“揪刘火线”的事情了，刘少奇下台之后他的地位至少保持了半年多。

这篇大字报 8 月 7 日被印发全会，并被登到了《人民日报》上，被称为“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在全国引起了爆炸性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象在 50 天专政中被批判被整的造反派学生们被“解放”了的激动心情。许多造反派读了《炮打司令部》后热泪盈眶，向毛主席像宣誓效忠。他们坚信毛主席代表着反压迫反迫害，代表翻身解放，代表“造反有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社会上急剧升温。因此我们看到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大家狂热不已，热泪盈眶的场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在这时，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两个毛泽东”的形象，我们这里引用钱理群老师的一段话：

所以后来有人分析是对的，**实际上文革中有两个毛泽东，或者不同群体对毛泽东有两个理解，一个群体，造反派的群体，认为毛泽东是解放者，革命者。另外称为保守派的这一批，认为毛泽东是既定秩序的维护者，是 17 年既定秩序的维护者。所以我们开始起来造反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深层次的原因是 17 年所形成的体制矛盾，具体原因就是因为在文革初期被刘少奇打成反革命，而毛泽东解放我们，所以就起来造反。**

造反者实际上有两类，一类就是老红卫兵一批人，还有一批是造反派的红卫兵。那个时候造反派红卫兵跟老红卫兵之间的区别，老红卫兵是要维护既成体制的，他觉得老干部、革命干部，你去反对他们就是反革命。而在我们认为，我们接受毛泽东思想，认为他们（干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派。所以其实文革那段时间，大家的感受不一样。在我们的感受，文革在批判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当中，刚才所说的单位所有制打破了，57 年体制打破了，第一书记专政，所有第一书记都被斗争了。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斗他们也并不合理。刚才我说了，我和支部书记虽然矛盾很尖锐，但是没有到你死我活，但是文革以后，就你死我活了，**因为你先把我打成反革命，我要是不把你打成反革命，我就永远不得翻身，这个对立是毛泽东制造的。毛泽东有一个理论，制造对立面，他把矛盾激化变成你死我活的**

斗争，这是文革很大的问题，当时我们是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

我们当时认为，**第一书记的专政打破了，等级制度也打破了，而且可以出版，自己办报纸，可以自己成立组织，可以自己游行等等。**现在很多人因此来肯定大民主，实际上这个大民主在我看来是为毛泽东所利用的。因为所谓大民主有限制，绝不允许反对毛泽东，谁反对毛泽东写就是反革命，不仅是毛泽东，连毛泽东亲密战友，江青，林彪都不能反对，这叫什么民主呢？这叫御用民主，恩赐民主。**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确实获得了出版、言论自由，比原来有一定的自由。首先我强调每个人对文革的理解，每个人参与文革都跟自己的利益是有关系的。**对于我来说利益是极其尖锐的，没有文革我是反革命，只有文革我才能得以解放。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提出了一些理想，这些理想对我们是有吸引力的，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就是三条，今天讲起来大家觉得还会有吸引力的。**第一条，官吏由群众选举；第二，官吏拿和工人一样的工资；第三，随时可以罢免。**（可以参见《红旗》杂志1966年3月26日和8月21日的社论——引者注）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所以他也想对国家体制做一个改革，这对我们当时有很强大的吸引力。

这里引用这一大段主要是因为钱老师很好地总结了当时的形势，尤其是划分两派，“两个毛泽东”的现象，和巴黎公社民主这个目标。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大程度上产生于此，因为这是各派为了争夺自己的利益所能够打出的最好也是最有效的旗帜。在造反派心目中，甚至在当时全世界左派学生心目中，毛泽东是造反者，革命者；在保守派心目中毛泽东是官僚系统的最高领袖，是既定秩序的维护者。如埃德加·斯诺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斗争是争夺对崇拜的控制，是‘由谁’以及首先是‘为了谁’来利用这种崇拜。”甚至连西方发达国家的左派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可以把毛泽东奉为“三M”（马克思、毛泽东、“新左派之父”马尔库塞）之一的精神领袖。如果要评价“个人崇拜”在文革初期的地位和作用的话，卡尔·马克思的话可能是最准确的了：“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

来给他们以帮助，……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只不过文革中请出的不是亡灵，而是现实中被高度政治符号化的活人罢了（当然在思想解放的同时，也存在着受这个活人的政治钳制的风险）。

另一方面钱老师提出了“两个文革说”（高层权力斗争的文革和底层人民“造反”的文革）的很具代表性的两个观点。一，我们和官僚确实有矛盾，但是弄到你死我活是毛泽东“忽悠”的结果。二，文革中的民主是毛泽东“恩赐”的民主，是很不“给力”的民主，因为你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自由。这两个观点非常具有普遍性。我们必须把这两个问题解释清楚。文革把斗争搞得过分激烈确实是严重的错误，我们后面还会分析造反派持续激进的现象。这里我想说的是，造反派的激进倾向是发生在50天专政以后的，也就是在发生在“反抗——镇压”模式恶性循环了无数次，双方都严重“反应过度”了以后。举例来说，一开始我只是向你提意见，没想推翻你；这是5月份的形势。可是你不让我说话。于是我的要求激进化，甚至联合起来干了过激的事情，于是你就要把我打成反革命了。6月份工作组对学生的镇压就是如此。于是残酷镇压，无情打击，最后我忍无可忍，终于想要把你个人推翻。于是1966年下半年造反派的大字报里集中批判50天专政，批判干部子弟骇人听闻的暴行。由于威胁到自身利益，官僚就要拿出更激烈的手段来反对。把你推翻了之后，我又想到这是体制的问题，于是想要搞真正的革命，也就是把整个一个阶层全部掀翻。因此到1967年初造反派的大字报里控诉整个官僚集团的腐化堕落就成为了主要内容。比如一些大字报不再是批判某个干部或干部子弟，而是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教育制度导致干部和他们的子女有可能“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而官僚更是会以停产、停工等“经济主义”进行更强烈的反击，结果引发造反派的夺权风暴。这与其说是毛泽东的“忽悠”，不如说是造反派政治上的不成熟和中国保守僵化的官僚体制互相作用的结果。

我们当然希望斗争中能都达成一定的妥协，否则就真的是追求乌托邦了，毕竟现实不具备群众直接掌权的能力。但是文革时只具备了妥协的首要条件，就是双方实力均衡。而还有两个条件却不具备：双方已然的矛盾冲突并不十分激烈，冲突只是个别的，偶然的；还有社会资源相对充裕，即使妥协一些也没什么大不了。而这时候由于50天专政，冲突是普遍的，已经发生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残酷镇压；而1966年生产力水平不足，社会资源也不怎么充裕（无论是相对还是绝对）。更何况这时候还处于工业化积累的阶段，任何人都想要成为积累的掌控者而不是积累要牺牲的对象。所以在这样的革命中双方真的很难达到妥协，至少在1966年底“经济主义妖风”以前，官僚集团不肯做出任何的妥协让步。

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文革中不允许批评毛泽东。这大概是论证文革不民主的最好证据。

文革当然有其局限，但我所要强调的是，与我们局外人不同，我们想的是什么符合“民主”就怎样，而作为文革的参与者，则是出于利益的诉求，利益的指向。至少在1966年，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但是保守派，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任何派别都可以利用的旗帜和口号，就像当今的普世价值一样。既然可以利用而且相当有效，因此至少运动初期并没有反对的必要。50天专政的恐怖结果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实际上已经使高层的文革派和基层的造反派形成了政治联盟的关系。局外人想的是原则，是意识形态，局内人想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的，想的是胜利。事实上运动进行到一定阶段，当意识到毛泽东已经不可能满足他们的政治诉求时各派就开始摆脱毛泽东这个偶像，甚至与其决裂，我们后面会提到。

因此，那种一开始就幻想着获得一劳永逸的完全“民主”的观点是很可笑的。历史从来不是发生在无菌箱里，民主从来没有标准范本。俄国叶卡德琳娜的启蒙，是有专制前提的启蒙；法国拿破仑的改革，是有专制前提的改革。人们并没有因此对他们的启蒙或改革视而不见。古希腊的民主制与奴隶制两位一体，从来都不乏劣迹和伤痛，但后人并没有说那不是民主。我们是说“这是不完全的民主，所以我不要”呢，还是利用这有限的民主进行不懈的持续的斗争，迫使统治者妥协，使民主的限度越来越小呢？

第三节 血统论的狂飙

在8月4日江青就“贫协”问题表态之后，干部子弟闹分裂的事很可能已经为高层所知晓。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亲自宣布为蒯大富平反，并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也就是别上当了，这引起保守派学生的强烈不满。江青和周恩来在文革中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如今“双脸”俱下，可见官方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8月6日，林彪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云则致信毛泽东，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针。”同日，受对联影响的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江青、康生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学生一再坚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江青则发表讲话，这是江青对血统论问题的明确表态：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其次是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做法上就叫一斗二批，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改，教育改革。……我们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法前进了。我们要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你们现在若是还顶在这儿，就不能斗那些家伙了，内部老紧张。我们现在有好多成语是过去的，你们不改我们也不勉强。你们请我们来了，我们出点主意行不行？既然革命就不怕有什么错误缺点嘛！你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也可以，或另外改也可以，我觉得这样比较妥当：**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

……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们**，这样才能孤立打击少数。换言之，**就是团结中间的，把打击孤立面缩小**。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队伍要树立起来，要团结大多数，才能斗倒、批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看一个人第一要看其阶级立场。第二不要唯成分论，这是指某个阶级的个别分子背叛原来的阶级说的。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现，不要看表面。

可见江青的语气相当温和，和我们印象中的江青的形象有很大不同。大概是因为这时当权派都还在台上，江青还不敢和这些干部子女完全撕破脸皮，因此强调学生要以团结为重。内容上江青重复了官方的观点，即有成分论，反对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尤其是她指出了这个对联有明确的转移斗争矛头的目的，因此劝说大家“把握大局”，不要局限在“细枝末节”上。但这个“中庸”的观点这有些吃力不讨好。保守派学生坚持血统论以阻止更多人参加运动，而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则要求取消任何成分划分。江青建议修改对联，然而改过的对联无一例外都是坚持原来的观点的，我们来看这幅：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造反——很难 横批：理应如此

显然，这幅是和江青的观点对着干的。我们再看几幅：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儿子造反为江山 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横批：谁敢翻天？

此时在社会上，造反派和保守派尖锐对立。不过保守派由于反对批评干部，得到了官僚集团的支持，在总体上占据了优势。尽管已经失去了工作组这个护身符，但是他们还是能够利用 17 年积攒起来的地位和实力来左右运动的发展。这使得文革要想突破几千年的官僚政治传统还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在高层，毛泽东的坚定立场及其背后的军队力量使得支持造反派的力量占了优势。而官僚如果在高层取得不到支持就只好把目标转向下层，即利用他们的子女在学生中的影响。于是在 8 月 5 日以后，**文革的形势就是，中央发布一个支持造反派学生的政策或公告，造反派红卫兵当然无条件地支持，但是保守派的红卫兵会利用权力和影响上的优势把中央的指示竭力扭向自己理解的，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因此就会形成“逆反应”。**

一些人头脑中的文革总是有这样一个预设前提，那就是毛泽东的命令可以令行禁止，他说什么大家都会拼死去执行，所以社会上发生的一切现象都是毛泽东支持的结果。这在一些条件下当然不错，但是有时候就未必。因为，民主国家领导人也好，独裁者也罢，政令能不能得到执行关键在于它是不是符合了社会上占据优势的利益阶层的支持。像毛泽东的一些比较符合官僚利益的决策，如肃反，反右就执行的相当好，甚至“好”得过了头。但是对于有损于官僚利益的决策，如大跃进，文革，执行起来能否保证原意就未必了。这是因为对于民主比较欠缺的国家来说，官僚集团作为利益比较独立的集团，其拥有的遏制民主的力量甚至比最高统治者拥有的还要强。也就是说，毛泽东要号召人民反对官僚特权，但是这时官僚还没有倒台，他们还是传统上中央命令的执行者，那么他们利用他们的社会影响和权力做出自己的理解，去转移矛盾就非常容易。更何况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很难听命于一个人的意志，党的基层官员们都是“宁犯路线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宁可得罪“伟大领袖”也绝对不得罪上级领导，以至于文革初期出现“95%的工作组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奇观”。而且，刘少奇关于党的理论，即认为党这个“先锋队”的阴暗面来自外部“不进步”的力量对党的侵蚀，这代表了大多数干部的利益。因此多数干部倾向于把斗争矛头指向社会，这也是“红”八月中学校中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会扩大到社会上的原因。文革初期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使得中央的指示的逆反应始终强于正反应。同时，当然响应中央指示的力量也在增长，最终使得正反应会压倒逆反应，但这要经历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在这之中，矛盾自然也就急剧激化了。

8月8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起草，毛泽东审阅，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十六条》系统阐释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和政策，有人称其为“文革宪法”。耐人寻味的是这么几条：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简称“斗、批、改”——引者注)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

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十六条》播发后，造反派和保守派红卫兵围绕着血统论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地方上各级领导对于保守派的支持自不必说，至于北京，尽管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在北京，但是北京毕竟是政治中心，高官多，干部子女自然也多，因此保守派的力量未必比外地小。

8月10日晚，毛泽东亲自到中南海群众接待站接见群众，发出了那句著名的“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自然大家热血沸腾，激情满怀。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通过，宣称：

全会认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反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反对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

要热烈支持革命的左派，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

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

全会后，林彪成为党的唯一副主席；撤掉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中央书记处的职务；刘少奇虽然仍留在中央领导机构，但已经降到了第 8 位；陶铸上升为仅次于毛、林、周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尽管也是政工干部出身，但这种从地方上提拔上来的领导人似乎要比中央老干部立场更加激进一些（即开明保守派，后来的华国锋也是如此）。

《公报》发布当天，北京工业大学贴出的《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把血统论推向了新高潮，该大字报由该校学生谭力夫、刘京创作。它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辩护道：“‘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明我们是有成份论者，‘基本如此’说明我们不是唯成份论者——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要把对联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把他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条条本本。”文中有意曲解江青的阶级观点，为血统论辩护。当日，北京各高校纷纷出现了只字不差的大字报，仅到北京大学观看这份大字报的就达 17.9 万人。对此，中央文革组织力量到各高校张贴《江青同志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以证明江青说的和《8·12 大字报》说的不是一回事。但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江青大字报的事件。

前面说过，50 天专政后血统论的崛起是与 1957 年反右之后对“成分”的强调是一致的。特权制度导致干部子弟产生先天优越感，但他们的地位与能力并不对应，尤其使他们在面对知识资源和环境优厚的知识分子子女时产生“压抑”之感（而他们两者又都是缺乏教育资源和环境的工农子女所反对的对象）。因此工作组的“运动群众”的形式给了干部子弟“造反”的机会，使他们掌握了学校的文革大权，从而推动了文革初期血统论的狂飙和对知识分子及其子女的残酷迫害。可以说 1966 年夏季的社会暴力行动是 17 年来党政官僚与知识分子的矛盾的又一次集中爆发，而且这次采取的是暴力恐怖的形式。

8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继续给予造反派大力支持和理论指导。尽管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到了对工作组的批判之中，但是保守派占据主动和多数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同日，北京中学数十万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举

行批判团中央的大会，以北大附中为代表的保守派要求斗争“小流氓”与以清华附中为代表的造反派要求斗争工作组的分歧公开化。结果在王任重、李富春等人的支持下，斗争“小流氓”的观点占了上风，斗争工作组和团中央的要求被党政官僚包办替代。它标志着造反派与保守派红卫兵齐头并进的局面结束，“团结”的结果是保守派控制了红卫兵运动的主导权，最终连最早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权也落入干部子弟手中。

于是，中央决定开展更大规模的支持造反派的活动。8月18日，北京举行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穿军装接见100万首都红卫兵。林彪和周恩来在大会上都发表了极富煽动性的讲话。林彪高呼：“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也就是从8月18日开始，红卫兵走上街头，大规模的“破四旧”运动开始。

第四节 破四旧

破四旧是对文革攻击的最集中之点，对它的关注程度可能要超过后面更血腥的武斗。在以人道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文革史叙述中，一个“精英”的损失似乎能赚取更多的眼泪和愤慨。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这样的惨剧和暴行是如何发生的。这里当然不是想为这些暴行辩护，但是我只是希望即使是批判和谴责也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事实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因此我们首先要梳理一下“破四旧”的语义涵盖范围的演变及其历史。

“四旧”的概念来源于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文献。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把破除“四旧”作为文化革命的重要政治任务。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

1966年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同样强调了破除“四旧”的政治意义：“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

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十六条》在文革中人人皆知，是红卫兵发起“破四旧”运动的直接思想来源和依据，但是这两个文件里所说的破除“四旧”的概念都是泛指与移风易俗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领域的批判和革命，并不等同于后来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

清华附中的造反派组织“红卫兵”7月4日写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7月27日写的《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都提到要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造反，但是都与《人民日报》社论的概念一样，是泛指意识形态和文化习俗的革命。直到北京二中红卫兵的文告和行动，“破四旧”才成了具有特定内容的运动。

真正意义上的破四旧运动是北京的红卫兵根据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而发起的。1966年8月17日晚，北京二中的红卫兵聚在一起议论，决定采取行动，破除北京市服务行业的“四旧”，主要是针对社会上的奢侈品消费以及服饰装束等。这是首次将“四旧”由意识形态领域上升为现实中的物质层面。为此，他们起草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8月18日凌晨3点起草完毕。8月18日中午，北京举行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林彪在这次大会上讲话，再次提到：“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周恩来也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林彪和周恩来讲化中的“破四旧”，仍然是泛指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也就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就能够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毛泽东的接见给了红卫兵极大的鼓励。8月18、19日，即毛泽东接见的当天和次日，北京二中的红卫兵印刷、散发了他们的传单，引起强烈的反响。破四旧开始后，22日新华社报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26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向旧世界宣战》，破四旧活动由此推向全国。

上述事实说明，通常所说林彪 8 月 18 日讲话煽动起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并不确切。红卫兵的倡议在先，林彪的讲话在后。红卫兵不可能事先知道林彪讲话的内容，林彪也不可能了解红卫兵正在“破四旧”的口号下酝酿新的活动。因此，红卫兵发起的破四旧活动，主要是在毛泽东接见、林彪讲话和传媒的鼓舞下，**根据自己的理解**而形成大规模运动。

运动最初是破除某些旧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称，禁止某些服装和头发式样，婚礼、教育“革命化”等等。但是短短两三天之内破四旧就发展为大规模的破坏文物古迹，砸烂教堂寺院，焚烧图书，打人，抄家，驱逐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回原籍等暴力行动，造成巨大的社会混乱和血腥的“红色恐怖”。

一类“破四旧”是社会文化领域的“破旧立新”，这一点为官方媒体所肯定，主要有：

1. 对市民生活方式，包括流行时尚的革命化、政治化要求；如“飞机头”等港式发型，“牛仔裤”和各种港式衣裙，“火箭鞋”（即尖头皮鞋），“下流低级的照片”，“黄色图书”以及香水、口红、项链等奢侈品均受到批判甚至被强制取消。甚至连抽烟都被禁止。最典型的是北京 26 中红卫兵总结的《破旧立新 100 例》。红卫兵对服装款式和头发式样的禁令起初还能获得一些群众的响应，但红卫兵为实行他们的禁令采取了强制的方式，上街督促、检查，强行剪掉“奇装异服”，要商店停止销售“四旧”商品，烧毁“坏”图书的举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们主张的积极意义，引起市民的不满和恐慌。官方媒体起初报道红卫兵对发式服装的要求，后来只笼统地称赞红卫兵破除旧习俗，而回避具体内容。

2. 要求商店、街道、学校改名，使之带有革命的含义。红卫兵更改地名、商店招牌的倡议多是一阵风似的形式主义主张，对社会没有太多实质性的破坏，而且也不涉及现实利益。因此官方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赞许性的报道，各地的领导和群众也多顺从青少年的要求。“扬威路”（苏联大使馆前的一条路）改名“反修路”的行动还拍成了纪录片。这也使得 8 月份的《人民日报》呈现一个滑稽的局面：一方面称赞红卫兵在进行仿佛是开天辟地的伟大行动，另一方面一涉及到具体内容，就只剩下商店街道改名这样的形式上的东西了。

3. 要求以各种形式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也许是几个月来官方宣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极端化、形式化的结果。最典型的是人人佩戴毛主席像章的“像章热”和把街道都刷上红颜料和宣传画的“红海洋运动”。当然还有无数的《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到处树立的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牌。中央不得不一再发出“勤俭节约闹革命”的号召，毛泽东也对这种行为进行了批评。因此中央对塑像和像章的规格都做了严格限制（所以今天看到的毛主席像基本都是一个姿势：“主席挥手我前进”）。

4. 在经济收入方面，红卫兵反对高薪制度和高利息，并且有平均主义的倾向。最典型的

即批判“三名三高”，即名教授，名演员，名作家，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如“各报纸今后一律不许给过多的稿费，堵住这个黑风口。”“建议国家考虑工人普遍长工资，资产阶级权威降工资。”红卫兵还要求在经济领域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或者个体经济的残余，反对物质刺激。这不仅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由于公私合营后资本家仍然享有很高的定息，知识分子有极高的稿费，干部不仅有高工资还有各种福利保障和特供商店，厂领导和技术人员则是“物质刺激”最大的受益者，他们的经济收入都远远高于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和普通市民，住房相对宽敞，生活比较富裕，因而招致一些市民的不满。对私有房产的剥夺，也反映了当时城市居民的住房紧张问题。政府采纳了取消奖金制和物质刺激，停发定息，没收私有房产等建议，但基本没有改变原有的工资制度。

5. 社会生活方面，红卫兵提出一些意在减轻工人体力劳动强度的要求，反映了当时崇尚体力劳动者的风气。如红卫兵建议：“有关部门要尽力想方设法在各胡同建立公厕，减少清洁工人的繁重劳动。”“邮递员今后一律不管往楼上、大院里送信，楼里自备信箱，大院找专人负责。减少邮递员同志的劳动。”红卫兵改革医院某些制度的建议反映了当时普通市民子女的视角，如：“医院住院、急诊一律不许先收费，烦琐制度要废除。具体的由医务工作者自己起来革命，打破旧框框，洋框框，一切为人民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在破四旧中，还有从青少年角度对成人的要求，用革命的词句，表达了对传统家长制的反抗，如“家长一律不许用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孩子，废除封建家长制，不许打骂孩子，不许虐待非亲生子，一律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孩子。”“破除家长制，孩子可以给大人提意见。”

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类的“破四旧”尽管很多内容偏激，放到今天来看并不可取，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红卫兵运动时期“红五类”子女中的边缘力量——工农子女的立场。尽管他们的建议未必都能够得到执行，但是毕竟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对于他们的偏激的要求，需要的是引导和组织，不能一棍子打死。

这里再讲两个问题。首先，能够拥有今天耳熟能详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只是少数高收入阶层，不少是与政治特权相关的。比如不少奢侈品是所谓“特供”，需要特殊的票证才可能获得，这是与特权阶层直接相连的。在“破四旧”中“一些原来只供应少数人需要的商品的商店，职工们也做出了革命性的决议：开始供应价廉物美的大众化商品，更好地

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其立场非常明确。但是这时工农出身的一些红卫兵缺乏组织纪律，认识还不深刻，带有强烈的平均主义倾向，因此采取了极其错误的破坏手段。到后来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官僚特权制度后，这类破坏也就自然平息。因此我们对于这些红卫兵提出的过激的要求要抱理解的态度，不要随意用今天的眼光看待前人。

第二点，就是红卫兵对于知识分子的过激行为虽然手段相似但动机未必相同。由于官僚和知识分子已经斗争了17年，结下的梁子太深，当权派想要“打击一大片”转移社会矛盾，知识分子是极好的对象。而把对知识分子的斗争从意识形态领域扩展到暴力行动正是工作组和保守派开的坏头。因此控制了基层运动的高干子弟把文革变成了官僚与传统精英矛盾的延续，而且把打击从意识形态领域扩展为暴力恐怖行动。50天专政中的“抛”战术如此，如今暴力攻击“反动权威”同样如此。不过后来翻过身来满怀怨气的造反派也同样对知识分子采取了过激行动。因为知识分子和官僚干部同为高收入阶层，甚至也是特权体制中的一部分。因此知识分子是造反派斗争名单中必有的对象。因为知识分子缺乏组织的保护而党政官僚很多都有干部子弟红卫兵的护卫，知识分子作为“三名三高”的主要被指控阶层，是比较“容易”被造反派批判乃至发泄的对象，这是造反派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由于知识分子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于是在知识分子所写的文革史中，文革就变成了普遍的镇压运动。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和文学上的渲染就更加如此。

在破四旧运动当中，有少数造反派红卫兵的通令或行动则直接接触及了在位的领导干部，例如8月24日沈阳31中的学生给辽宁省委贴出通牒：“你们各级高干宿舍太奢侈腐化，更不合理的是，有的还雇用保姆、佣人。……我们通牒你们，限令你们一天答复，三天之内采取行动。”这引起保守派红卫兵的强烈的不满和反击。

而破四旧的另一类活动是针对整个社会的破坏，主要有：

1. 对“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以及范围十分宽泛的政治边缘人群的住所实行搜查，没收私人财产，俗称“抄家”。在文革前的运动中只抄书籍日记等文字性东西，而且还要打借条。这是基于四清运动中从地主家抄出“子孙万代要报仇”之类的反动诗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检查措施。但是8月19日开始的大规模的抄家和砸毁文物图书字画的行为却被冠以“破四旧”的名义，被当成赤裸裸的抢劫和中饱私囊。北京市有11.4万户被抄家，上海有10万户被抄家。而且斗争的对象不断扩大，范围十分宽泛，除了早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外，通常还有资本家、部分小业主、被批判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如学校的校长、老师）、“学术权威”、共产党外的“民主人士”、有政

治历史问题的人（如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人员）等。

2. 砸毁文物、破坏古迹、捣毁寺院教堂等大型破坏性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活动是在前一类的破四旧活动出现几天之后才发生的（而不是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马上发生）。如最早的北京市的大规模文物破坏开始于 8 月 23 日。这种活动有明显的规模和组织性，如北京市 1958 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 6843 处文物古迹中，有 4922 处在文革期间被毁，大多数毁于 1966 年 8—9 月即破四旧期间。

3. 驱逐所谓“四类分子”等人员离开城市，遣返回乡。破四旧运动中，北京的红卫兵组织首先发布通令，驱逐被认定为“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市民离开北京市，后来逐步扩大到“五类分子”（即再加上右派），“六类分子”（再加上资本家）以及其他一些被认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8、9 月份北京有 7.7 万人被赶出首都，全国近 40 万人被迁出。后来北京大兴县还发生了屠杀“四类分子”的恶性事件。

4. 打人、关押、人身折磨等疯狂的暴力行动。破四旧运动期间打人成风，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对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们进行殴打、监禁、强迫劳动等非人的摧残，打击面严重扩大化，许多教师和学校领导遭到红卫兵残酷殴打，许多人仅仅因为出身不好被迫害。不少人不堪侮辱而自杀。人身侮辱、打人和酷刑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在“红”八月中北京就有 1722 人被打死。比如农大附中“红旗红卫兵纠察队”8 月 26 日一次殴打 131 名“非红五类”师生（占全校“非红五类”的 2/3），造成骇人听闻的“8·26”事件。

这些红卫兵的行为多数反映了“红五类”子女中的核心力量，即当时红卫兵运动的领导者——干部子女尤其是高干子女的利益和立场，他们也将破四旧赋予了自己的理解和主张。虽然工作组已经被撤走或受到批判，但是在 50 天专政中作为工作组整人的助手，高干子弟逐渐掌握了学校新成立的各种文革机构的领导权，他们操纵着“红五类”子女冲向了社会。比如前面引用的清华大学高干子弟的掌权情况，这里有必要再引用一下：

刘涛——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三临”（清华大学“文革”临时筹委会、临时主席团、红卫兵临时总部）主要负责人之一，自控系“文革”主任。

贺鹏飞——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之子，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校临时主席团主任委员，机械系“文革”主任。

李黎凤——人大副委员长李井泉之子，校“文革”筹委会、临时主席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工物系“文革”主任。

刘菊芬——人大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之女，清华大学红卫兵总头目。

乔宗淮——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三临”主要负责人之一，数力系“文革”主任。

胡劲波——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之子，机械系“文革”负责人。

王新民——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王维舟之子，“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

王苏民——第四机械部部长王铮之子，“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之一。

此外，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师大一附中的文革筹委会主任，刘婷婷是师大女附中的文革筹委会委员；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是师大女附中的文革筹委会委员（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个教育工作者即该校副校长卞仲耘），邓林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文革筹委会副主任，儿子邓朴方在北大被内定为校党委委员。贺龙的儿子贺捷生在北航、贺迎明在景山中学，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翻在北京六中，邹家尤的儿子邹建平在京工附中，孔原的儿子孔丹在男四中，张鼎承的女儿张梅妹在女一中，张文舟的女儿张兰兰在女三中，陈毅的儿子陈晓鲁在男八中，安子文的儿子安国在石油附中，此时都是红卫兵或文革筹委会的头头。而上述学校基本都是学生打老师，迫害、酷刑的重灾区。即使没有了工作组，他们仍然能利用他们的身份与高层的当权派保持联系。也就是“企图通过高干子弟继续左右运动方向，**执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压制群众，实行白色恐怖。**”而这些机构有时就成为红卫兵进行打人、抄家、砸文物等破坏活动的组织机构。他们的破四旧是向“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权威”“牛鬼蛇神”等出击。就清华大学来说，“三临”在8月份组织起“黑帮劳改队”（由刘涛、贺鹏飞领导的“8·9”红卫兵控制），全校500多名干部中被劳改的占70%，许多人遭到高干子弟们领导的组织的侮辱和殴打。而8月23日迫害老舍先生的红卫兵就是由北京女八中（后成为著名保守组织“西纠”的成员）的校文革领导小组组织的。这些学校领导小组成员作为“自来红”大多在50天专政中就是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在8月份通过成立“筹委会”“红卫兵”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直到9、10月份造反派红卫兵力量壮大后才被取代。连极力为保守派辩护的《大动乱的年代》也不得不承认：“多数派……侧重于造‘牛鬼蛇神’的反，与少数派侧重于造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反是有区别的”。保守派

决不允许冲击高级领导干部，绝不会触及“运动重点”的当权派，这是他们优越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依靠。而在50天专政中被打成“反革命”和“牛鬼蛇神”的造反派们要么作为“黑帮”继续受迫害，要么忙着冲击工作组的上级机关要求平反（多数人在10月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得到平反），哪有工夫上街搞破坏呢？

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逆反应”。在地方上，中央和基层都有人指责地方领导压制学生，动用专政机关和“革命群众”来打击学生都被禁止，军队更被禁止出手，因此他们倾向于利用自己上学的子女来影响和操控运动，按“西南王”李井泉的话说：“现在革命干部没有发言权，工农兵说话就说成是围攻学生。革命干部和工农兵只有通过他们的子女来说话。”他们还大力鼓励工农子女加入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一些人是想刻意转移斗争方向，另一些则是出于自己的立场对运动做出理解，即认为危害党这个“先锋队”的因素在党外，在社会，从而做出支持“破四旧”，打砸抢的决定。因为破四旧运动打击的对象主要是被以往的革命和政治运动打倒、改造、边缘化，以及被50天专政“抛”出来的人，这在许多干部看来是天经地义的“阶级斗争”，而这恰恰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斗争的不是工作组，不是领导干部，不是“当权派”。总之，领导干部将文革理解成党政官僚与传统精英斗争的继续，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支持。比如北京大兴县屠杀“四类分子”直接由公安部协助（公检法系统在文革中基本坚定地站在保守派一边，只有公安部长谢富治是“随风倒”），大队书记指挥；地方一些政府当权派（如山西省委）甚至直接参与指挥破坏文物古迹。这与文革“斗当权派”的宗旨本身背道而驰。此外，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如陶铸）没有准确把握“斗争大方向”，使得官方媒体对破四旧行动极其关注，大肆进行积极报道（但报道内容还是以“移风易俗”为主），将破四旧的星星之火煽成燎原之势。

除了党政官僚的支持和媒体的煽动外，血统论的传播也是保守派暴力的一个关键因素。8月20日，《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的主要创作者，北京工业大学大三学生，校文革筹委会委员，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口若悬河，一气呵成了长达半小时的闻名全国的讲话。这篇讲话坚持血统论：“有的人不爱讲老实话：‘老子反动儿混蛋’。……现在，**我们对你们的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还可以入团、入党，你们还要怎么样？一讲就是团结，怎么一种团结法呢？斗争中求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并认为批工作组是“右派翻天”“批斗各级干部是难

以容忍的事情。”他的名言是：“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高兴什么？他妈的！”“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显然，当权派和保守派由于造反派红卫兵的冲击，地位受到威胁，这反而使一些极端的掌权者产生了“权力（镇压之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更刺激了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主观能动性。

谭力夫的讲话一出笼，很快风靡北京。邓朴方在北大公开喊出“高干子弟就是要掌权”的口号。一些红卫兵受谭力夫“七斗八斗”的启发，疯狂迫害“黑七类”及其子女。同时谭力夫的讲话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仅在福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5人改名为“力夫”。个别省份在省委指使下，很快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以新华书店等渠道迅速发行到工厂村庄。有些单位甚至还规定每天学习讨论4个半小时“讲话”。同时，血统论的膨胀在全国掀起“报出身”风，即上汽车、火车、进商店、旅店、医院统统都要报一下出身。显然在这个历史关头，谭力夫这个“小人物”被当权派当作了救世主。

在这里，我们对关于血统论的三种观点进行一下总结。谭力夫是血统论最著名的支持者，他的观点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江青代表的是官方的“有成分论”的观点，重在表现，即“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著名的反血统论斗士遇罗克在《出身论》中反对有成分论，认为：“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传统文革叙述将遇罗克视为反对血统论的英雄，同时也是反对江青的。那么，按照二元的逻辑，江青就是支持血统论的，害死遇罗克的就是江青。做出这样的解释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以谭力夫为代表的持血统论的保守派红卫兵在文革史叙述中被几乎完全抹掉。遇罗克反对江青是因为他比江青更激进，可是难道他不会反对比江青更保守的人吗？！一些红卫兵组织与遇罗克进行过论战，但并不是支持血统论，而是指责遇罗克混淆“出身”与“成分”的差别。所以，遇罗克在1967年1月底写了《出身论》，在4月份（后面会说这是形势转向保守的时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批判北京中学生“4·3”派时说《出身论》是大毒草，但也是把《出身论》和血统论并列一起批判。文革中从未像批判血统论那样大张旗鼓地批判遇罗克的《出身论》。直到造反派受到普遍镇压的1968年遇罗克才因参与武斗被逮捕，在军队普遍清洗造反派的1970年才被处决。也就是说遇罗克之死与60年代末军队专政中的“血统论回潮”有关，我们放到后面再讲。遇罗克的战友回忆说：

“陈伯达的讲话(指10月份陈伯达批判血统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引者注)促使他写了这篇文章……他告诉我，也是暗示我，他说当时中央文革跟《红旗》杂志都找过他，跟他谈过，可能是给他了某些支持和鼓励。他说，像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这种机会根本是千载难逢。明明知道是有很大的危险，他说：‘即使为这个我要付出什么，我也值了。’这是当时他的原话。他当时是支持文革里边的平民主义的思想。因为当时提出来，消除一切官僚。他是觉得，这个是正好要把中国新出现的所谓新阶级、新等级，把它扫平。他说，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就好了。因为‘黑五类’子女就可以重新站起来了。他当时的基本思想是这样。”

保守派红卫兵在对学校领导干部和老师大打出手的同时，却又对造反派“炮轰”高级干部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怒。8月24日，清华红卫兵领袖，刘少奇之女刘涛、贺龙之子贺鹏飞同清华附中保守派红卫兵制订行动计划，组织北京12所学校保皇军企图武装占领清华园，镇压清华造反派。他们先在清华附中操场集结队伍，贺鹏飞作“战前动员”，指责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刘涛则大力宣传“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下午，12校联军手持皮带、棍棒冲进清华园，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殴打看大字报的学生，不但撕去揭发批判刘、邓、薄等人的大字报，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了大字报作者的名字，之后他们拆毁了“清华园”牌坊，殴打了写作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的“第一红岩战斗组”的成员，并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当晚北大、北航也发生了类似的行动。文革中第一次对刘少奇的批判，就这样被“自来红”们的一通拳脚棍棒和铜头皮带镇压。

此外，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红卫兵8月27日发布《告全市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十万火急!!——彻底粉碎反革命的复辟阴谋》，传单列举造反派冲击老干部，“进行疯狂阶级报复”的行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传单，可以与前面造反派提出的主张做一下对比：

他们闯进革命老干部家里将勤务人员赶出大门，扬言要老干部自己做饭，说这是“劳动化”。他们像一群疯狗，横在马路上，拦住革命老干部的小汽车，将他们赶下车，说这是“脱离群众”。他们像一批杀红了眼的屠夫，冲进医院，勒令取消高干生活待遇和看病优先权，让他们耗费宝贵的时间去排队挂号，企图让他们去等死！他们打着平等的招牌，干着强盗

的勾当，假借工人的名义，叫喊什么“房子应当平均分配”。**更恶毒的是，为实现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野心，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各级干部应民主产生”、“文件不许分等级看”等等，等等。**这完全是放屁！红卫兵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向全市狗崽子下最后通牒：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不许动我们的革命老干部一根毫毛！

尽管有些批判造反派无政府主义行为的言论还算中肯，但在当时两派激烈斗争的条件下，这一通告维护官僚特权的立场是确定无疑的。

与传统领导层对破四旧的态度不同，文革的决策核心恰恰不满意它的政治方向。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红卫兵破四旧活动态度低调，这与很多人的想象相反。关锋、戚本禹 8 月底给江青的报告中指出：“个别人利用某些学校的红卫兵对抗《十六条》，破坏文化大革命；**有些院校红卫兵的领导权落到了保皇派手里，他们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此报告被毛泽东转发至中央各机构讨论。而《人民日报》对破四旧虽笼统地赞扬歌颂但具体报道却很少。所以在官方历史叙述中，没有像讲述大跃进时说《人民日报》报道“亩产万斤”那样大讲特讲《人民日报》在运动中如何如何，而打砸抢等行为后来均被斥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挑动群众斗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阴谋”。而最早揭发出这些暴行和统计数字的，并不是改开后的所谓“真相”和“历史解密”，而是造反派的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之类的材料。比如造反派揭发的“8·26 事件”：

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农大附中召开大会，该校为“红旗红卫队纠察队”一小撮暴徒控制会场，把一百三十一一个出身“非红五类”的无辜同学（有许多同学是最早站出来的造反派）拉出会场，残施毒打，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雷管炸，剪阴阳头，侮辱女同学，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同学衣服被打成碎片，有的脊骨被打断，有的眼睛被炸失明，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烂血流如注……更加可鄙的是他们打过人之后，还不准带着血出去，全部得洗去。后来，盆盆的清水竟然都变成了发黑的血水！……

农大附中“八·二六”事件是刘邓路线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血债要用血来还！

当时除了破四旧运动之外，还有另一类学生的运动——继续批判工作组、冲击地方或部门党委，要求为在 50 天专政中所受的冤屈平反的活动。例如 8 月 19 日清华大学贴出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8 月 22 日又贴出《刘少奇同志七月二十九日的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公开批判王光美、刘少奇（后来都在 12 校保皇军冲击清华的事件中被撕去）。从 8 月 23 日起，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东方红公社”先后 4 次到地质部静坐绝食，要求工作组组长回地质学院接受批判（绝食期间遭到保守组织“西纠”的殴打）。又如从 8 月 25 日开始，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红旗战斗队”在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工作组组长回北航接受批判。造反派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王大宾和韩爱晶正是分别在这两次行动中一举成名。此外还有 9 月底地院、清华、北航等学校造反派对校广播站的“夺权”的行动。在 8、9 月间，地方上造反派冲击校文革和领导干部的行动也持续不断，相继发生了西安“8·16”事件、桂林“8·19”事件、青岛“8·25”事件、重庆“8·28”事件，福州“8·29”事件、杭州“8·31”事件、上海“9·2”事件、贵阳“9·5”事件等等。8 月至 9 月，破四旧运动轰轰烈烈，备受关注；而造反派冲击党内当权派的活动，则阻力重重。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真正关心、真正要支持的是后者。

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检阅行动终于换来了成果，那就是造反派力量的急剧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造反派的行列中。一些原本中立的人不满于党政官僚及其操纵的保守派红卫兵的针对社会的暴行开始支持或同情造反派。如一位造反派在回忆录中说，他原本是持中立态度的，并没有什么理想或蓝图，只是在血统论红卫兵的残酷打击下，“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许多原先加入保守派的工农子女也逐渐认清了形势，倒向了造反派阵营。“黑五类”子女更是不堪折磨也加入了主张“重在表现”的造反派队伍。显然他们把这当成了改变自己受歧视的地位的机会。比如在广州，73%的干部子女加入了主张斗争“牛鬼蛇神”的保守派红卫兵，而有 61%的知识分子子女和 40%的资产阶级子女加入了主张“矛头向上”的造反派红卫兵。更重要的是，一大批之前上山下乡或“下放”、“精简”到农村的青年此时返回城市，“返城青年”中的许多人都是在 60 年代初的“精简”浪潮中被赶到农村的，他们对主持这项工作的刘少奇自然十分不满；他们对免于“下放”，享有留在城市中的特权且能分配到好工作的干部子弟更是十分痛恨。很快他们成为造反派的中坚力量。

虽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在北京，但是更多的官员，尤其是高官也同样在北京。高官多，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血统论红卫兵自然也多。毛泽东显然不能容忍作为“革命中心”的北京被保守派控制。之前说了，保守派的活动得到了官僚的普遍支持，而官僚是政治决策的

执行者。因此一时间即使中央也对眼皮底下北京所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虽然毛泽东手中还握有军队（此时体制内仅有军队站在造反派一边），但是他总不能让军队把干部子弟都枪毙吧？！而如果要“管”，难保军队不会渔翁得利，把造反派一块镇压下去自己掌权，那文革也就别搞了。另外，虽然各地的造反派都起来了，但是也未必平衡。在一些偏远地区文革仍然是干部“运动群众”的手段。而地方上的干部子弟红卫兵依靠省市领导的支持，垄断了前往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的权利，使检阅行动反而客观上支持了地方上的保守派。

在这一形势下，中央决定让红卫兵进行自由流动。8月31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接见50万红卫兵，林彪正式提出“四个伟大”，即称毛泽东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林彪和周恩来在群众大会上都强调“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林彪还宣称：“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已经发展成社会的斗、批、改”，实际上肯定了造反派的进行全面社会变革的主张。针对保守派“打击一大片”的情况，林彪不再像8月18日那样发表煽动性的言论，而是强调：“**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红卫兵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9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正式组织红卫兵大串联，大批外地造反派红卫兵涌入北京，大大壮大了北京造反派的力量，为后来与保守派的决战奠定了基础。同时，造反派红卫兵开始走南闯北支持鼓动各地被保守派压制的学生们起来造反。一批到南方串联的红卫兵提出了“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的激进口号，矛头直指领导干部。南方各省市领导则以“揪南下一小撮”“抓黑鬼”的名义对串联的红卫兵进行严厉镇压，冲突不断。为进一步鼓励造反派，毛泽东又于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26日接见红卫兵，检阅大会共举行8次，接见1100万人次。

主流观点说是毛泽东8月份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导致了红八月的浩劫。中央文献出版社版《毛泽东传》相对严谨一些，没直接提，但也暗示了这之间的联系。但是，8月18日第一次接见后一直到9月，暴力活动达到了高潮，可是之后接见红卫兵的集会一直持续到了11月底，打砸抢活动尤其是迫害平民学生和破坏文物的活动9月就开始减弱，10月份就完全平息（砸毁孔庙的事件除外），能够说是毛泽东去支持红卫兵打砸抢的吗？

后来，对于1966年“抄家”的结果如何处理就成了一个问题，文化激进派对“旧文化”

漠不关心，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人中饱私囊。出身社会底层的造反派也没有什么文物保护意识。而且文化激进派其实并不反对对**有象征意义**的文物古迹的破坏，如1966年11月中央文革指使北师大造反派红卫兵砸毁曲阜孔庙的事件。因此，1967年2月，在戚本禹的建议下，中央发布了《关于保护古旧书刊、字画的倡议书》：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古旧书刊、字画的保管工作，我们向全国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以下的紧急倡议：

全国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彻底**批判**古旧书刊、字画所传播的流毒；

第二、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加强对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的保护工作；

第三、全国大、中城市原古旧书刊的收购部门，应该恢复收购，限制流通；全国各地图书馆、文化馆以及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所存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在未鉴别前，暂行封存，不得随意处理；各造纸厂收到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要暂行封存，妥善保管，与当地有关部门革命造反派共同鉴别处理；

第四、个人所藏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亦不得随意销毁。个人交售、捐献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各有关部门应该欢迎、收购。

第三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一节 自己解放自己

进入9月份，运动的主动权逐渐从保守派向造反派手中转移，到9月底造反派即使在之前保守派力量最强的北京都已经占据了相对优势。不过现在保守派要进行抵抗，他们手里还有最后一张牌，那就是他们的组织性。

我们注意到，各地的保守派比较早就已经形成了组织，并进行了广泛的社会镇压活动。

但是造反派的有一定实力和能力的组织却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来。这是因为，保守派作为一种受到国家机器支持的暴力力量，国家机器和党的机器的高度组织性就体现到了保守派之中。比如说集中的，享有极好待遇的干部子女学校，本身对于这些利益取向相一致的干部子女就是一种组织，为他们提供了组织的便利。再加上他们“上面有人”，对于高层的斗争进展如何非常清楚，这也使得他们可以集中做出反应。

必须说明一下，干部子女的行动有一些是有意的，但有一些则是无意识的，也就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和立场所自然决定的。因为他们的父母如果倒台，对于子女来说不仅经济利益受损，政治地位严重下降，所享受的各种待遇和特权也要消失，因此干部子弟绝对不允许有人冲击作为“运动重点”的领导干部，故有“保爹保妈派”的绰号。其行为的动机和性质与其说像法西斯，不如说与美国黑人运动中的三 K 党等极端白人组织类似。他们将文革理解成了 17 年来官僚与传统精英斗争的继续。因此这些“红色贵族”们极力扭转斗争方向，乃至冲上街头干出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暴行。

而对于造反派来说，作为不掌握国家机器的暴力力量，他们在一开始相对地要缺乏组织性和比较明确的斗争对象。暴力的施展也容易出现无序性。因为社会中下层的利益取向和观点五花八门，而他们也未必能够分清楚各种不同层次的矛盾，除非有一个很集中的批判对象，否则在这种胡乱的批判之中他们很难组织起来。但是血统论和保守派的组织就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对象。而官方在造反派数量上占优势后也开始进行积极的引导。因此，8 月底 9 月初造反派也开始成立组织，两派红卫兵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有了一较高下的可能。9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对“红”八月中保守派暴行的又一次否定，也标志着两派的决战正式开始。这里节选一部分：

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所谓人们的灵魂，就是说的思想，说的意识形态，说的社会风行的文化，说的同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种种风俗、种种习惯。**这些，都是人们头脑里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倡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充分利用大字报，进行大辩论，大鸣大放。这些都要动笔，动口。**动口，动笔，就必须动脑筋，让群众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天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会文斗，学会动脑筋，这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同志历来告诉革命的人们，要善于用脑筋。他指出：“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在造反派崛起时，保守派首先要明确自己的核心领导地位不会丢失，于是他们高呼：

还能再“老实”下去吗？眼看着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兴风作浪，赤膊上阵，屠杀我们的阶级弟兄却无动于衷？不能！再“沉默”下去，千百万人头落地，大好江山丧失干净！

还能再“畏首畏尾以小人自居”吗？让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当官作老爷，俨然以老子命令威胁我们？不能！不能！不能！再这样下去，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就会重新夺权，重新掌权，在精神上压倒我们，而我们仍然是敌人精神上的奴隶。……

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作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们要喝斥那些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不准翻天，如若乱说乱动，立即镇压！

凡出身非工农革干子弟者，我们可以随意找来谈话。他们在我们面前必须矮三寸！任何非工农革干子弟对我们必须尊重一些，不准恶意中伤！让我们工农革干子弟做主人！

保守派红卫兵在改革开放后扶摇直上，因此对他们如果提及的话，基本就是“自觉抵制文革的错误”，维护社会秩序之类。这话并没有错，但是他们更多时候是用更加惨无人道的暴行来镇压造反派力量，维护社会原有秩序的！其代表之作就是“西纠”。

1966年8月24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它以父母亲戚级别在行政13级（副市级或正县级）以上的学生为骨干。领导者是孔丹、秦晓、陈晓鲁等人。组织领导层的级别是以他们父母的级别来排序的。它的成立和活动，受到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干部的支持，就连周恩来都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许明指导他们的活动。在这之后“西纠”陆续发布了10道通令，要求制止武斗，维护秩序，反对打人、抄家等行为，反对对“黑五类”子女进行迫害。这一系列通使许多人认为“西纠”是维护秩序的“好组织”，按改开后官方的说法，叫“群众对文革的自觉抵制”。这里只说对了一点，那就是它确实是反对文革的。但是“西纠”里的人可不是普通群众，

而是父母级别在副市级或正县级以上的干部子女。事实上，也许“西纠”的领导层主观上也是想维护秩序，周恩来等人也安排了他们进行了保护民主人士，维护重大活动的秩序的工作，但其立场却使它在多数时候只能通过残酷镇压造反派来维护他们心目中的那个“秩序”。而“西纠”松散的组织使其通令大多数都只落实到了口头上。我们只要看一篇被“西纠”少见地落实的通令就清楚其立场了：

任何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级报复，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大致来说，“西纠”所发布的态度温和的通令，一方面是周恩来等人利用“西纠”在保守派中的巨大威望制止保守派暴行的结果，也是保守派在形势严峻后为自己做的辩护。“西纠”维护秩序的行动多是镇压冲击党委机关的造反派，而不是阻止破四旧的老红卫兵。为了对抗人们对红卫兵暴力的指责，“西纠”在发出制止武斗的通令之后不久，又在9月14日发布言辞激烈的警告通令：

我们要严厉警告那些妄图反攻倒算，变天复辟的混蛋们：以前，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们的家，打了你们的人，给你们戴了高帽子，牵你们去游街示众，赶你们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赶了就赶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想利用群众运动中的一些缺点，猖狂反扑，进行阶级报复。告诉你们，这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每一个纠察队员完全有权力、有义务协助革命群众，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

不知这是不是可以算作一个“红”八月的责任到底归谁的历史证据。

显然，他们的文告与行动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就是这个“西纠”的主要发起组织和主力之一，北京六中的红卫兵并没有因为“西纠”自己的通令而停止打人，他们创造了被称作

“现代渣滓洞”的北京六中劳改所（领导人是董必武之子董良翻），成为文革打人暴力的最高峰。造反派的揭发材料说：

六中劳改所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用来残酷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人间魔窟。劳改所设在六中后院东北角。由看守室、刑讯室、男牢、女牢几部分组成。上设值班岗楼，安有警铃、自动控制门、探照灯（由该校干部武继广、李雁书设计），夜间稍有风吹草动，便警铃四起，强光环射。墙上写着“红色恐怖万岁”六个血淋淋的大字（由红漆和被害者流出的鲜血写成）。所内常放长短刀、木枪、皮鞭、弹簧鞭等种种刑具。正门用砖砌死，一律由后边窗口跳进跳出。除“犯人”及看守人员外，其他人一律严禁入内。大批革命群众就在这里惨遭迫害。人们称六中劳改所是新式“白公馆”和“渣滓洞”。

9月27日至28日他们将本校学生王光华抓到劳改所毒打致死；10月初又残酷折磨本校职工徐霏田致死。两起命案的主要责任人都是“西纠”队员。直到11月19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等人直接到现场过问，北京六中的劳改所才得以解散。

随着造反派力量的增长，9月9日，北京造反派学生组织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三司”（因为保守派红卫兵在此之前已经成立过两个司令部。头头是地院的朱成昭，后来在中央文革的干预下改由蒯大富领导）。自此北京造反派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自己解放自己”，批判党委领导的行列中。

到10月份造反派已经具备了优势，全面总攻的时机成熟了。于是，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150万红卫兵。10月3日《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社论，要求“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正式揭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序幕。10月5日，中央军委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必须把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10月6日“红三司”举行10万人集会，呼吁全国各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张春桥在会上宣布全党对“紧急指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实际上肯定了“踢开党委闹革命”。

继造反派学生对谭力夫讲话进行激烈批判后，10月9日，张春桥在谈话中说谭力夫“他

代表一个阶级”，周恩来亦评价其“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认为血统论对联是“造成人为的阶级对立”。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大力批判谭力夫：“中央通过了《十六条》不过12天光景，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发表讲话，对抗《十六条》。这个讲话传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兴趣，但对那篇讲话却视若至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不做阶级分析，不把事情一分为二，只醉心‘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轨道，完全同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为什么因为是高干子女，就一定要掌权？难道因为他们的血统高贵吗？**”同时刘少奇、邓小平作检讨。10月24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激烈批判1956年以来的一线二线体制，矛头直指一线领导：“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并谈到了出身问题：“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算做终极表态。为打消群众的疑虑，保证不“秋后算账”，11月6日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宣布：“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宣布无效，全部清除，**一律当众焚毁**”。很快造反的浪潮席卷全国。

经历了50天专政和保守派红卫兵的残酷折磨，造反派终于开始全面反攻。人们极力表达对党委领导的官僚主义和50天专政的不满。自1957年鸣放以来，积郁多年不敢讲的话，不敢提的要求，对自己所受的各种不公正的对待的控诉，此时都如洪水般汹涌而出。从抢夺当权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黑材料”，冲击党政机关，查封党政报刊，一直发展到揪斗各级领导干部。11月8日，聂元梓等人贴出“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全国各地“革命小将”群起响应。一场狂暴的揪斗之风随即掀起。

11月12日，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等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判大会，揪斗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12月14日，北京文艺界“革命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揪斗陆定一、张闻天、林枫、杨献珍、李维汉、蒋南翔、陆平等人。21日又揪斗安子文、

周扬、林默涵、田汉、杨翰笙等。12月24日，军事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揪斗罗瑞卿、萧向荣、梁必业。12月27日，“政法公社”在工人体育场批斗周荣鑫、雍文涛。1967年1月4日，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在工人体育场揪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还在台上的谷牧、余秋里、王震、邱会作等人也遭到围攻。其中最轰动的事件是在1967年1月4日，江青、康生等人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派”时宣布中央文革顾问，“党内第四号人物”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作为开明保守派陶铸随即被打倒。地方各级党委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号召下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基本陷入瘫痪，许多干部受到怀着报复心理的造反派残酷打击。一些被保守派用来整人的酷刑，如“喷气式”，也被造反派拿来使用。似乎是认识到了造反派暴力升级这一现象，“两报一刊”开始集中发表文章批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认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打击一大片”的余毒，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阴谋”，反复劝说造反派们“走资派”只是一小撮。而毛泽东在12月27日给周恩来写信指示说：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毛泽东还说：“我们是无产阶级，斗争要文明一点，为什么把封建主义的东西搬出来。”但是这很难阻止在前几个月惨遭迫害甚至背负了家仇血债的群众。大批干部受到激烈批斗。1967年1月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成为文革中第一个死于造反派之手的高级干部。领导“西纠”血腥镇压造反派的孔丹，其父调查部部长孔原也在这一时期被激烈批斗，其母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大力协助了“西纠”活动的许明也被逼自杀。之后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也相继被迫害致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也险些丧命。这直接引发了军队高级将领反文革的“二月逆流”。镇压与反镇压的暴力之

间的恶性循环，导致暴力无法得到遏制，也无法达成可能的妥协，这是文革失败的重要教训之一。不过我们有些造反派的批判材料，还是挺有意义的：

《我们是怎样在斗争中平反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六月二十日，我院近两千人起来赶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绊脚石工作队。“六·二〇”革命行动是我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后，群众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发扬和集中表现。但是，地院史上这一伟大的光辉的一页，却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打成“反革命事件”，许多人被打成“反党”、“反革命”。臭名昭著的薄××（即薄一波，后来他被地院红卫兵激烈批斗——引者注）批示像万吨水压机一样，把革命派压入十八层地狱，造成了地院空前的白色恐怖局面！时隔两个月后（即“红”八月期间——引者注），有人还说“东方红”（其成员大部分是被工作队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学生）是“反革命”、“暴徒”组织，仍然因顶著“反革命”、“暴徒”的头衔而遭到围攻、殴打；……

实质问题是什么呢？**平反的实质问题**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尖锐、复杂、激烈的斗争，**就是“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光辉的十六条的指引下，我们于八月八日自发地组织了全国第一个“东方红”战斗队，打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我们同保工作队的势力强大的“斗批改”战斗兵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举行关于工作队问题的辩论会，多次炮轰地质部党委，我们在地质部举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威震北京的全国第一次绝食斗争（即8月23日静坐，要求地质部工作组成员回学校接受批判——引者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三天不给我们送饭，妄图把我们赶出地质部。但是，饥饿算得了什么？我们在第三天晚上还举行了联欢晚会，并豪迈地说：“我们要革命，不要馒头！”**他们多次调来臭名昭著的御林军西城纠察队骇人听闻地围攻、打骂我们**，但是我们对革命磐石般的忠心毫不动摇。打吧，骂吧，我们牢记着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了我们使不完、用不尽的力量源泉。

这算是对6月至9月的历史做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总结。而在10月16日，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说得更加系统：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

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赞成毛主席路线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职权，用其它形式来代替。例如，在一些学校、机关中，有那样的人，他们完全违背党中央指示的巴黎公社原则，预先指定，暗中操纵，成立所谓‘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文革会’，或者是别的什么组织。甚至当各地大量的革命师生来到首都见毛主席的情况下，也有的地方组织一小批人跟着前来，宣传自己反对中央十六条的决定，企图打击那些来京的革命师生。……”

我个人认为，在有些学校，有些单位，高干子女掌握领导地位，是没有好处的，对我们将来的革命事业不利，对他们自己也没有好处。……有的人就很快采取对付的措施了。他们说，‘中央已有指示（并没有这个指示），高干子女不担任红卫兵领导。趁群众不知道，要争取主动’。于是就用了金蝉脱壳的办法，辞去了职务，指定了他认为立场‘最坚定’的人去接替。”

第二节 最后的疯狂

到1966年底，造反派红卫兵在社会上已经基本占据了优势，形势对自称“老红卫兵”的保守派红卫兵们非常不利。1966年11月18日，北京市委发布《重要通告》禁止“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次日陈伯达在亲自视察后下令解散北京六中劳改所。12月16日，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宣布决定解散取缔各种“红卫兵纠察队”。随着“老红卫兵”的父母相继被打成“黑帮”或“走资派”（许多人正是受了他们的子女的牵连），他们的特权地位也逐渐失去了。

在强烈的失落感和报复欲的驱使下，干部子女逐渐走向联合与疯狂。

11月27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成立，并于12月5日发表《成立宣言》，声称“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不过有多少造反派就是被你们“逼上梁山”的？）这是一个由“西纠”“东纠”“海纠”的核心力量联合成的高干子弟组织。领导是牛皖平、宫小吉、卜大华、杨继平、邹建平、苏振生等人，连中共元老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翻都卷了进去。其成员根据等级地位不同，所佩袖章质地不同（呢、绒、缎、绸、布五级），尺寸不一（8寸、7寸、5寸三级）。“联动”成员以中学生为主，谭力夫、李洪山等大学生在里面更多地是起到理论指导作用。不过，青春期躁动的少年更可怕，我们叙述过的北京六中就是一例。青春期萌动是生理现象，但让青春萌动到犯罪状态却是社会现象。由于他们的父母此时多已被打成“黑帮”，因此他们对造反派的报复就更加暴烈和血腥。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毛泽东不可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不再抱幻想的他们与毛泽东这个曾经的偶像公开决裂，宣布“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而他们从“大民主”的角度批判中央文革的行动又给后来的“极左派”以不小的启发。

12月18日保守派的“理论权威”谭力夫被逮捕。情绪激动的造反派提出“把谭政文（谭力夫之父，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骨灰从八宝山扔出去”的极端口号，还准备召开全市批判血统论大会批斗谭力夫，但被周恩来制止。12月25日在中央文革的安排下，北京造反派召开“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和示威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口号。

针锋相对的，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在大会上他们高呼“打倒‘红三司’”“刘少奇万岁”“反对乱揪老前辈”等口号，还有人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从1966年12月26日到1967年1月11日，“联动”为解救被逮捕人员上演了“‘联动’六冲公安部”的闹剧。

12月26日，就是“联动”开大会的当天，两名“联动”的分子在抢摩托车时被北航造反派“红旗战斗队”逮个正着，被扭送公安部，这就是“联动”第一次冲击公安部所要解救的“落难兄弟”。当晚，“联动”发起营救行动，不但打伤了公安部的工作人员，连一位赶来调解的副部长都挨了打，但营救没有成功——第一冲。

12月28日到29日，“联动”调来几百名暴徒，强占公安部接待室，不断殴打工作人员，并高呼“打倒公安部！”“公安部权力下放”，不但成功地将两名“落难兄弟”抢走，而且将

3名公安人员绑到礼堂围攻谩骂，直到周围有群众赶来声援才撤退——第二冲；

12月31日到1月1日，调集百人再次冲击公安部，打伤2人——第三冲；

1967年1月6日到7日，纠集100多人公然从公安部大门冲入，撒传单、贴标语，砸烂礼堂，还跑进公安部食堂，将那里的四五十斤粉肠和熟猪肉一扫而光，还贴出标语“公安部的猪肉真他妈的好吃！”但公安部此次将他们的暴行广播了出去，大批造反派前来声援，“联动”一看形势不好，夺路而逃——第四冲；

1月8日，他们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高呼“打倒‘红三司’！”“打倒江青！”，再冲公安部，并用装上铁钉的“二踢脚”攻击负责守卫的解放军——第五冲；

1967年1月11日，“联动”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可是人心所向，由于这次自发前来保卫公安部的群众达10万之众，他们没有冲成，只好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谓权力下放的“最后通牒”，并高喊“油煎江青！”、“打倒陈伯达！”“打倒谢富治！”，最后甚至喊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

联动成员还极端发泄自己的不满，在干部子女学校，他们撕毁图书，破坏教学标本仪器，砸烂教室，拆卸桌椅板凳，肆意吃喝玩乐，对“狗崽子”、“流氓”进行不由分说的殴打，明目张胆地进行抢劫和袭击造反派甚至普通市民的恐怖活动。据统计，“联动”仅在3所高干子弟学校中打砸抢造成的损失就高达145万元。

“联动”的社会恐怖活动已经引起了各方的不满，造反派一方面把怒火进一步发泄在那些作为“黑后台”的领导干部身上，另一方面开始处理“联动”。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随后，先是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号召广大中学生同“联动”划清界线，从内部瓦解“联动”组织。在中学里，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相继成立，对“联动”发动了“中心开花”式的进攻；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对“联动”组织展开直接攻击。从1月17日开始，公安部在造反派的配合下，开始逮捕“联动”成员。造反派相继摧毁了北京一〇一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景山学校、育英学校的“联动”据点，共逮捕139人。

今天一些人主张成立“文革博物馆”，“不忘历史”。当然我相信某些人在说“文革博物馆”的时候心目中已经预先有了一个文革博物馆的蓝图了。可惜，这样的“文革博物馆”

在文革时期就已经办过了，这就是 1967 年 3 月 8 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在原先的“联动”据点举办的“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揭露“联动”以及“西纠”的种种暴行。后来展览会的批判材料和《北京六中劳改所内幕》等文件还印发全国。造反派批判“联动”的材料与改革开放后批判文革的材料，无论是内容还是思维方式都惊人地相似。拿着文革要反对的东西去反对文革，这似乎有些滑稽。我们来看一下：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

.....东、西、海纠及其变种“联动”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下，疯狂对抗党的阶级路线，**他们拼命鼓吹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以“血统高贵”、“自来红”、“当然的统治者”自居，自己不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挥舞“非红五类”“黑七类”“狗崽子”“混蛋”等大棒，对革命群众和造反派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和人身摧残，“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搅乱革命阵线。他们不准所谓“非红五类”的师生学《毛选》、佩戴毛主席像章，**不准参加毛主席接见革命师生大会和进行革命串连**；女二中几个革命小将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倡议改“扬威路”（苏联大使馆前的一条街道——引者注）为“反修路”的革命行动，竟被他们诬为“右派翻天”；“狗崽子制造国际影响”，农大附中“红旗红卫兵纠察队”一小撮暴徒一次就殴打 131 名所谓“非红五类”的师生，造成骇人听闻的“八·二六事件”，他们还设立“劳改队”、“劳改所”、“监狱”、“刑堂”，施用从封建帝王，“中美合作所”，西藏农奴主那里学来的各种酷刑，迫害出身不好的、或反对他们反动观点的革命群众。**一件件血迹斑斑的刑具，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惨案，记下了东西海纠和“联动”的滔天罪行，记下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笔笔血债！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王光华事件：王光华是六中高三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积极，六月三日他就和同学们贴出了全校第一张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但是推行刘邓反动路线的西纠一小撮却对他恨之入骨，竟然下毒手将他杀害了。

九月二十七日，他们乘王光华串联回校之机，非法将他劫持到“劳改所”。暴徒们兽性

大发，蜂拥而上，拳打脚踢，用木枪向王身上乱戳乱刺，并用枪托劈头盖脸地疯狂乱打，直使王光无法忍受，躺倒在地，暴徒们一面用脚猛踢王的头部，一面恶狠狠地说：“触及你的灵魂。”第二天早上王光华便尿了血并且昏到在地上。但是，那些刽子手（粟胜利、陈小伦等暴徒）还不罢休，又将王殴打。到中午王光华便支持不下去了，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十几分钟后便死去了。

徐沛田事件：徐沛田是六中的退休老工人，今年八十六岁，对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他常说：“要是在旧社会，我早就死了，我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就这一个无辜的老人也惨遭西纠一小撮人的杀害。

九月初，以朱支前为首的暴徒以“老吸血鬼”莫须有的罪名，对徐沛田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他们强迫徐跪在地上，嘴叨着破鞋爬行，把老人推进小便池，用水管喷射，用尿浇头，逼着让他吃屎、喝尿，真是恶毒之极，一伙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暴徒！他们将徐拉到淋浴室，用冷水浇身，然后又用滚开的水泼至徐的身上，把老人的皮都烫掉了，浑身通红。暴徒们并不就此罢手，他们把徐沛田带进厕所，活活地把老人用绳子吊死。事后还将他的尸体放在院内曝尸三日，并将面部全部打烂。

我们先不论这些材料真实性与否，但是只要把文中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换成“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或“专制暴君毛泽东”，这一篇文革批判材料不就变成了一篇控诉文革的“血泪史”了吗？

从种种揭发材料来看，高干子弟所以在文革初期带头“造反”，同他们父母的特殊身份是分不开的，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依靠近水楼台的优势，较早摸清了中央高层尤其是毛泽东的意图，他们利用特权地位和“先下手为强”，将运动赋予了自己的理解，一度控制了文革的走向。巨大的历史惯性迅速把他们推向风口浪尖，着实风光了一把。可是他们很快就原形毕露了。“跪煤渣”、“油漆涂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剃屁股”、“开水洗澡”、“打靶”、“突刺”、“扫膛腿”等各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血债累累的“劳改所”、“黑帮劳改队”，损失巨大的打砸抢活动，敲诈勒索、无所

不为的流氓行径，在群众之中引起巨大的震撼，许多人开始明白党内确实有剥削阶级存在，共和国最大的敌人就在党内。一些干部（如陈士渠）主动带着孩子向毛泽东道歉。

1967年4月22日，以各省市释放在“二月逆流”中被镇压被逮捕的造反派作为交换条件，毛泽东下令释放“联动”分子，但是实际上不准他们再参加运动。尽管中央文革亲自进行教育，但是他们还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了最后一次游行，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狂奔，并高呼“油煎江青！”“刘少奇万岁！”“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后再见！”“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你们尸体堆成山，黑血流成河！”之类的口号。而血统论骁将谭力夫直到5月29日才被释放。之后干部子女有几种倾向。大多数人由于父母被打成“走资派”或“靠边站”，没有学上又不能参加运动，与他们从小的理想形成巨大反差。失去信仰的，整日在大院里无所事事，打鸟，恶作剧，耍流氓之类的事情常干，人称“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难死法院”；坚持信仰的，埋头研究理论，思考人生，做了逍遥派；还有少数人则继续以“镇压流氓”的名义进行恐怖活动，成为极端组织（如“镇流纵队”、“红鹰纵队”等）。在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地下室里的“联动”一直坚持到1968年。

“联动”的活动对全国各地的干部子弟都产生过影响。一些人以“联动”为榜样进行打砸抢。如天津的“特动”、辽宁的“红后代”、福建的“东海兵”、广东的“主义兵”、新疆的“红造部”、武汉的“三字兵”、西安的“红色恐怖队”等。一些“联动”成员还流窜到全国进行打砸抢，有的还加入当地的保守派组织，对1967年的武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毛泽东针对全国普遍的干部子弟打砸抢的现象批示说：“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直至1968年上山下乡的大潮，此类行为才宣告平息。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官方以“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这些人的行为没有任何详细的裁定，因此各个流派对他们的解释五花八门。在80年代还是“维持原判”，以否定为主的。如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北京六中是西城区纠察队员比较集中的一所学校。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蒸蒸日上，恶性膨胀的“血统论”残害着无数幼稚纯洁的心灵。六中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对“血统论”提出了异议，于是被“西纠”抓进了六中的“劳改所”。西纠认定的“黑七类”、“狗崽子”、“混蛋”之类被押进“劳改所”后，不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要经受“跪煤渣”、“油漆涂脸”、

“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剁屁股”、“开水洗澡”、“打靶”、“突刺”、“扫膛腿”等惨绝人寰的刑法的逼供审讯。纠察队员还用被酷刑折磨而流出的人血，在“审讯室”外的墙壁上写了“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在这“红色恐怖”下，王光华被活活打死。在六中干了一辈子、八十多岁的退休老工人徐霁田，被诬为残渣余孽之类，毒打后施用“开水洗澡”刑，即把滚开的锅炉水往身上浇。徐霁田被烫得全身都是燎泡，最后被“红烧”、“勒死”。在这座“劳改所”中，被打骨折，残废，脑震荡的，不下二三十人。

在这里作者几乎照抄照搬了文革中造反派的揭发批判材料尤其是《北京六中劳改所内幕》，但是对中央文革对于此事的态度和造反派的斗争只字未提。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很容易使读者误以为这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杰作。实际上这种人道主义的解释范式只说谁是受害者，不提谁是施暴者（在他们看来结论是现成的），结果把把文革由两派激烈斗争的历史变成了普遍镇压的历史。

由于保守派红卫兵在改革开放中飞黄腾达的不少，仅其吹鼓手谭力夫后来就官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因此后来以种种手段为其辩护的就更不少。我们再举一例：

这里应该提到老红卫兵和西纠等群众组织在抑制混乱方面所起的作用。……8月25日，北京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纠察谁呢？纠察红卫兵。成立纠察队的目的，就是干预红卫兵运动，维护政策执行纪律，稳定秩序。……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西纠个别成员**后来表现极其反常，原因复杂**（该书中有不少这样的句子，似乎有难言之隐——引者注）。

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写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指出了这幅对联立论的偏颇，建议补充一副“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对联，……这位24岁的大学三年级的年轻共产党员，凭着对党的忠诚，讲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它是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抵制，今天无疑应当高度评价。……谭的讲话也有缺点，则不应苛求。（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

作为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参考书，“官修文革史”，《大动乱的年代》不仅只字未提“西纠”所犯下的暴行，还采取了公然歪曲事实的方式，将修改对联的“荣誉”由江青移到了血统论最积极的鼓吹者谭力夫的头上！《从对联谈起》全文是在肯定血统论，只字未提哪里有“偏颇”，只是将江青的观点进行曲解作为“补充”罢了。谭力夫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反文革的英雄。而直接导致无数人遭受迫害的血统论，竟被“谭的讲话也有缺点，则不应苛求”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了。一边热烈赞扬反对血统论的遇罗克，另一边却为血统论最著名的吹鼓手谭力夫辩护，这也真够滑稽的。

辛子陵说：“左派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毛泽东时代的真相告诉青年。”到底是谁在颠倒黑白，歪曲历史，不是很清楚了吗？必须明白不是每个反对文革的人都是纯洁的天使，必须警惕某些人利用“否定文革”对“西纠”、“联动”的历史进行掩盖甚至歪曲。

第三节 反思与持续激进化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认为，在“西方革命”中，旧体制先行崩溃，然后一批比一批激进的革命派别递次上台，将革命的纲领和思想推向越来越激进。在“东方革命”中，在旧体制崩溃前，出现“双重政权”，即现政府和一个挑战它的准政权组织。双方互相争夺领土与民意。文革作为以城市为中心的运动，呈现出很多“西方革命”的特点，最明显的就是其持续激进化。

到了1966年底，造反派红卫兵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中央的当权派，也都纷纷被打倒或“靠边站”。现在的形势似乎是一片大好。就像在改革开放中“伤痕文学”完了还要有“反思文学”一样，到了1966年底，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而是开始针对整个现实经济政治体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对于体制的批判和反思激发了一些人对于“继续革命”的愿望，导致了造反派的持续激进化。

对于造反派红卫兵来说，首先要思索并批判的就是，为什么这些干部子弟能够在文革初期掌握运动的主导权并且为了镇压群众而干出那样的暴行？那么结论必然是在于现有的这套干部子女享有特权的制度引发了他们的“优越感”和运动中保守的立场。如这个材料：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反动血统论，以及“三十而立”，“担当大任”的剥削阶级名利思想都潜移默化地腐蚀青少年的灵魂。例如，高干X X X的女儿看了《西厢记》后对其他高干子女说：**“如果在以前，咱们这些人都是皇姑小姐”。**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竭力在中国扶植特权阶层，疯狂抗拒毛主席关于缩小三大差别的一系列伟大指示，推行工资制，军衔制，扩大三大差别，维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有些干部他们本人就已经逐渐蜕变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了。这使得一些干部子女逐渐滋长了剥削阶级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在他们心目中，别人老子是“蚂蚁”，自己老子是“大象”。一将军之子，小学五年级时就给自己填了个兵役证：职务——坦克兵元帅，工资——700元。八一学校一学生X X X耻于父亲“官小”，要求父亲换上便衣，以免在将军面前“丢脸”。女十二中某班45人分成三层九等……

他们阻拦孩子与工农结合，走革命化道路；**千方百计地从政治、经济、生活作风等等方面向孩子灌输反动的血统论和资产阶级特权思想。**……他们让孩子享受种种特权：政治上可以“保送”入团、入党、入“名牌”学校，可以看内部资料，保密文件，可以随父母周游各地，经济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住单人宿舍，乘父母的小汽车上学、兜风，要保姆、服务员服侍……长此以往，养尊处优，**使得这些干部子弟完全脱离了劳动和劳动人民，头脑中深深埋下资产阶级特权思想的毒瘤，自命“血统高贵”，“政治优越”，是“当然的接班人”，成为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的儿子竟对服务员说：“如果没有我，还要你干什么！”这是多么赤裸裸的剥削阶级的人生观！

还有一些干部，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革命意志衰退，躺在过去的功劳上吃老本；阶级斗争观点模糊，不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他们不是把子女看作革命的后代、人民的财富，从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关心下一代的成长，而是把子女看作私有财产，娇生惯养，捧上天。其结果，不少干部子弟舒舒服服地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了，滋长了严重的资

产阶级特权思想，在“和平演变”的邪路上滑下去。……

运动初期，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给一些没有教育好的干部子女**提供小道消息，让他们“造反”，换得“左派”头衔**；后又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蛊惑他们以“好汉”自居，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撤销工作组后，又暗中操纵，扶植他们掌权。“八·一八”以后，又多次安排他们上天安门。此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从经济上支持他们。这样，使他们政治地位急剧上升，头脑中的特权思想，“自来红”观念大大膨胀，……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革命洪流冲击到他们的父母家庭和自身地位时，他们便走到群众的对立面，保爹、保妈、保自己，一句话：保特权！某“联动”分子说：“他妈的完蛋了，接班人成了‘三司’的了。我们革干、革军子弟就这样完了吗？不行，拉到山上打游击去！”还有人说：“我爸爸要成了三反分子，以后小汽车我坐不成了！”甚至狂叫：“我愿同老子把牢底坐穿！”就这样，他们被刘邓一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步步引入反革命的歧途。

最早的干部子弟学校“八一学校”的前身是“荣臻小学”，原本是抗日战争中收留烈士子弟的。进城以后，干部子弟学校不断增多，条件越来越好，造反派的材料说：

解放后，条件不同了，干部子女学校已无继续开办的必要。……刘、邓一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疯狂抗拒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极力庇护和扩展干部子女学校。在北京，八一学校、十一学校、景山学校、北京小学、芳草地小学、育英学校、育才学校等一系列干部子女寄宿制学校纷纷建立起来。这些学校，抛弃了解放前干部子女学校光荣的革命传统，一步步被刘、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引上了“和平演变”的邪路。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秉承刘、邓黑指示，在干部子女寄宿制学校大反所谓“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以“人多、物多、钱多”的特殊条件，大搞“正规化”、“特殊化”，追求校园的优美、设备的豪华、特殊的待遇。……不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

的劳动者”，而是培养“大干部”、“专家”，鼓吹“我们的孩子都是龙子龙孙”，“我们学校的学生是接班人的核心，是天生的接班人，长大以后要接爸爸妈妈的班”，“要出将军、部长、总理”，……这种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和教育路线，严重地腐蚀毒害着青年一代，使不少学生产生和滋长了严重的资产阶级的特权思想，沾染了浓厚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干部子女学校普遍特点是“三多”：一是“人多”。刘少奇曾亲自对育英学校教师说：于部子女学校人员编制“就是得多”。这类学校教职工与学生的比例一般是1：5——1：7。而一般的学校是1：28——1：35。二是钱多。干部子女学校每年开支达几十万元。如八一学校是30多万元，相当于北京郊区大兴县庞各庄小学每年经费1.2万元的25倍，而学校铁工厂和菜园每年几万元的纯利润还不包括在内。国家每年对每个学生的补贴是140——250元，而一般小学是30元。三是“物多”。干部子女学校普遍占地广大，校舍造价昂贵。八一学校占地面积达2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万5千平方米，有花园、果园、动物园，有卫生所、澡堂、游泳池，还有牛奶场、冰棍房、缝纫厂、洗衣房。校舍优美，建筑华丽、设备完善。十一学校平均每个学生占2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而一般小学只有2——5平方米。连苏联专家都惊叹地说：“在我们苏联，海军子弟学校是最优越的，但你们育英学校比我们海军子弟学校优越得多了。”学生在这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吃饭的时候，教师要在旁边照料；洗脸洗脚有人催；回家返校，有大小汽车接送。资产阶级思想的毒素就是这样无声地腐蚀着我们的年青的一代。

这些都发生在大多数人民生活并不充裕，大多数学校资源短缺的60年代。随着特权膨胀导致的社会分化，长大后的八旗子弟们便怀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理念冲向了社会，当他们优越感忽然被剥夺后，犯罪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养不教，父之过；徒不严，师之惰。”连私塾先生们都懂的道理却有人装做不懂。

因此，这些材料已经不再局限于批判干部子女究竟做了什么事情，而是追究到了日常生活层面，追究到了干部子女在教育领域享有优厚待遇的特权制度，正是这一制度导致了等

级观念的增长和“新阶级”的产生。这一飞跃标志着文革被进一步向前推进。也就是由批判工作组上升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上升为对于整个体制的批判。

随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进一步深入，不仅是对于干部子女教育制度，对于所谓“三名三高”的批判也在进一步升级，并由此成为了一个批判的焦点，即认为以权力作为保障的收入差距以及与级别相匹配的特权和福利制度才是导致文革初期 50 天专政和“红”八月的深层次原因。更重要的是，此时对“三高”的批判已经不再局限于知识分子，而是扩展到了整个上层利益集团。也不再局限于对工资数目的批判，而是已经涉及到了公务员工资制度中的营私舞弊，以权谋私，“灰色收入”等不合理现象。比如：

1964 年我们对上海、浙江、江苏常州市一部分企业 160 多万职工的调查，有保留工资的约十四万人。这十四万人中，**一般职工保留 10——20 元的工资，而旧技术人员、旧职员、资本家的爪牙，亲信，他们的工资保留的很多，有些人实领工资超过了他应得工资标准的几倍。**一个办事员，工资竟达 500 元——300 元以上，有的甚至高达 500 元以上。请看：

上海静安区房产公司 24 级的办事员杨格（原在外商单位工作）标准工资 49 元，可是他却拿 400 元，保留工资 351 元，**等于他应得标准工资的七倍多。**上海电业局一个会计，标准工资 94 元，实领工资 655 元，保留工资 561 元，等于他标准工资的六倍。

科研、教学、卫生、工程技术人员：在科研、教学、卫生、工程技术人员中，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他们的工资超过国家规定同类人员的最高工资，有的达一倍以上。如医务人员，就以北京地区为例，规定是高标准工资 333.5 元，但有些医师月工资实领 600 多元。

文艺人员：在文艺人员中，工资高得令人难以想象。一些大演“名”、“洋”、“古”，“封”、“修”、“资”的资产阶级“名演员”，他们极力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他们的月工资高得相当惊人，一般是 500——600 元，甚至高达 1000 元以上。请看：

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 2000 元，混入党内以后减为 1760 元，**高出国家规定的文艺人**

员一级工资标准四倍多。北京京剧演员马连良，月工资 1700 元，其中保留工资 1366 元。

资产阶级的老演员拿高工资，解放后新培养出来的青年演员也拿高工资。请看：

天津市京、评、越、豫四个剧团的十六名主要演员，参加工作最早是 1953 年，他们的工资最低 351 元，最高达 950 元。……曾经轰动一时的《千万不要忘记》，这出戏大家是熟悉的。现在我们就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到底千万不要忘什么？他本人有工资，书写成之后，得稿费 7000 元。由于把这本书改编成剧本，演出单位很多，于是他就每天忙于翻阅各地的报纸，统计演出单位，写信催要演出费。就是这位提醒青年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作者，他自己却因此得到几万元的高额收入。……

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生活：据我们 1964 年对几个地区的调查，拿著高工资的，不少人银行存款在万元以上，有的存款在 30 万元以上。他们有的是钱，放肆宣扬个人享乐，公开散布：“吃和穿最实惠，活着不吃好、穿好、玩好，还有什么意思。”

常州大成纺织三厂一个工程师（工资 402 元，其中保留工资 276 元）在困难时期，他却不惜花 100 元买两只鸡吃。1962 年他儿子结婚，儿媳妇叫他一声“爸爸”，给见面礼 1000 元。上海市第六医院一个高级医师，他妹妹结婚，他送礼竟花了一万元。

我们看出，最重要不是高薪与否，而是在现有体制下，也就是在苏联模式的经济政治体制之下，这些人能够以与其高薪相匹配的地位和权力去谋取更大的物质利益，这一权力即“资产阶级法权”，将手中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作为资本使用，不断进行“权”与“钱”转换的积累，从而逐渐形成“新阶级”，形成新的剥削者和特权阶层。这大概也是造反派如此反对“物质刺激”的原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搞“物质刺激”，而是在现有制度下，“物质刺激”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监管很容易变成技术官僚“自己刺激自己”的手段。因此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揭发出来的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对一个月 20、30 元（工厂工人多数是二级工，月工资 38.7 元，年轻工人和外包工、学徒工更低）且缺乏更多提高收入手段的普通人来说，其震撼力是十分巨大的。这使得造反派走向持续激进化，也就是由批判某个人上升到要变革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

但是，如果仅仅是红卫兵的造反活动还不足以推动整个阶层的激进化。**红卫兵作为学生，**

虽然其派别与主张与社会阶层有关，但是他们与社会现实利益并没有直接联系。这一方面使得红卫兵在对官僚和知识分子进行批判时会毫无顾忌甚至极度偏激，但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利益做驱动这样的激进行为只能管一时，不能管一世。要想彻底改革苏联式的包办替代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要让与社会利益有直接联系的工人自己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只有当造反派的活动直接与社会某一阶层的利益直接挂钩时，文革就演变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不再是一场简单的运动。

在运动初期，工人不允许参加运动，更不能形成跨行业的组织。在要不要把运动由学生扩展到与社会利益直接有关的工人的问题上，党内高层亦发生分歧。在后几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周恩来在讲话中反复提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性，要求红卫兵“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串联。”希望把运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其实周恩来的做法有一定道理。尽管造反派的持续激进化情有可原，对官僚特权的揭露也十分有意义，但是，在下面批判监督和自下而上“夺权”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一旦与社会物质利益直接挂钩的阶层参与进来，这场原本可控的运动就可能会变成一场不可控制的革命。更重要的是，在还没有对现有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很彻底的批判的时候，工人缺乏阶级组织和阶级意识启蒙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要夺权，很大程度上是使造反者坐上了原来当权派坐的位置，这不仅会让一些人有了投机革命的机会，对于现有体制的过分激进变革也会激起更多的人反对。总而言之，这将会导致难以想象的混乱，而且终结一场革命所要付出的代价要比终结一场运动大得多，影响也要恶劣得多。

1966年11月30日，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公社”发表了大字报《到工厂去，去学习、去宣传、去战斗》，红卫兵开始正式有组织地进入工厂鼓动工人，去斗争工矿企业中的领导人员和“当权派”。

我们这一革命的正当要求，却再三地遭到了以吕XX为首的厂筹委会和以陈XX为首的临时厂党委的无理拒绝。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以吕XX为首的一床厂筹委会一直执行着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违抗十六条，私设监狱、刑堂，私自抓人拷打，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把与他们意见不同的革命职工开除出厂，遣回原籍，对革命群众进行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使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长期受到压抑。……

在革命群众的支持下，经过多次的斗争，我们终于冲破了一床厂一小撮推行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及其幕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刁难和阻挠，获得进厂的权利。……入厂后，我们深入车间参加半天生产劳动，还深入到工厂宿舍同工人师傅谈心，了解一床厂革命职工坚持斗争的情况，向工人阶级学习。与此同时我们还帮助师傅抄写大字报，印发传单，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这一大字报成为红卫兵运动与工人运动合流的标志。正是这一合流使得意识形态的斗争上升为现实中的经济政治利益斗争，文化大革命规模急剧扩大。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即《工业十条》），宣布工人可以在8小时工作日之外参加运动，“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规定工人可以进行“革命串联”，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同时规定红卫兵可以到厂矿进行“革命串联”，12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还规定要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卫兵，要求“在农村中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的领导职务”，社队之间可以进行串联，还要“组织一批学生下乡串联”，开展“四大”。宣布“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向领导上提意见、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不许打击报复，不许扣工分。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的革命群众，应当平反。”至此文化革命完全扩展至工厂农村。

由于运动的批判对象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涉及到了现实利益层面，如对党政官僚高工资高奖金、特权待遇，政府工作中的阴暗面，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工人的经济政治权利，外包工和合同工的低下地位等问题的批判使得造反派持续激进化。这在1966年底产生了所谓“经济主义妖风”。这种“经济主义妖风”主要表现有：一是当权派、领导干部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动罢工旷工，导致停工停产、交通瘫痪。如吕正操鼓动铁道部罢工，火车停开，石油工业部鼓动油田停产，上海的保守派组织“赤卫队”还曾以停水、停电来威胁造反派（这再次证明了党政官僚垄断生产资料的权力对人民利益的威胁）。在这之后各级党组织基本主动陷入瘫痪；二是当权派以滥发补助、滥长工资的手段来收买保守工人、瓦解造反派，如上海一些工厂给工人提前发了3个月的工资。显然这种妥协只是一时性的，表面性的。不惜代价地抛出工厂财产、国家财产来拉拢工人当然不是常态化的，不可能收买全部工人，但确实给工人制造了分裂；三是一些市民为小团体利益

抢夺物资；四是人民经济政治上的诉求。如工资长期冻结问题，合同工长期不转正问题、劳保问题、福利补助问题、知青就业问题、宿舍分配问题、拖欠加班费问题、退伍复员军人待遇不落实的问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冤的问题等等，此时都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喷涌而出。因此对“经济主义妖风”不能一概而论。不过其中的前两种行为具有太明显的在工人中制造对立和分化的意图，它使一些激进的工人意识到，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变革，解决“领导权”的问题，使劳动者真正地能够获得掌管生产资料权力，自己的经济利益才能有所保障。使官僚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受到制约，才不至于在运动结束后反攻倒算，如果那样的话自己一时得到的经济利益将来也会失去。这又进一步推动了持续激进化，终于开启了“夺权”这个潘多拉魔盒。

在上海，造反派“工总司”与保守派“赤卫队”的矛盾逐渐激化，“赤卫队”甚至以停水停电来威胁造反派。12月30日，上海发生了“康平路事件”，“工总司”彻底击败了“赤卫队”，成为文革武斗的开端。“工总司”的一统天下为夺权行动奠定了基础。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到上海策划夺权。1月6日，王洪文率“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召开大会，强行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等揪到上海人民广场批斗，宣布打倒中共上海市委。会后，市委、市府的所有机构停止办公。当时称“一月革命”或“一月风暴”。毛泽东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表示支持。1967年1月9日，毛泽东谈到机关内部的文化大革命时，提出“我们这个政府（应该是指城市政府部门——引者注）过去是由上面派去的少数干部和下面的绝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了的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实际上是为夺权活动提供了依据。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由毛泽东审阅的《编者按》全面肯定了夺权行动。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它宣布：“组织原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主集中制……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1966年以来造反派的力量达到了最高峰。

本卷参考资料：

《毛泽东思想万岁》（5卷本）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 编 1968年版

《文革资料汇集》（约75万字） 网络文集 春秋中文社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约1600万字） 水陆洲 整理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约3000万字） 宋永毅 主编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

中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人民大学编辑小组 编 1969年版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高皋、严家其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文化大革命简史》 席宣、金春明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版

《大动乱的年代》 王年一 著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电子版） 辛子陵 著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美）莫里斯·迈斯纳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1966——1982》（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

《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册） 逢先知 金冲及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人民文革丛书》1——4卷（电子版） 刘国凯 著

《毛泽东思想万岁》（5卷本）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 编 1968年版

《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 吴焱金 著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09年版

《文革受难者》（电子版） 王友琴 著

《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 网络文章 作者：老田

《钱理群谈毛泽东的文革遗产》 网络文章 作者：钱理群

《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 网络文章 作者：李宪源

《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网络文章 作者：萧喜东

《“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 网络文章 作者：萧喜东

《文革中的领导与群众：话语、冲突和集体行动》 网络文章 作者：萧喜东

《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 网络文章 作者：宋永毅

《破四旧研究》 网络文章

《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网络文章 作者：王友琴

《联动覆灭记》 网络文章 作者：永远战士

第四卷 全面内战

第一章 革命委员会

第一节 三结合

当 1967 年来临的时候，造反派的持续激进化适时地推动了他们的夺权行动。2 月 5 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在造反派看来这是在实践《十六条》中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原则的开始。然而，意外却在几十天之后降临，毛泽东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提法，理由是这样一来可能要更改国体，还会脱离党的领导。因此肯定了黑龙江的做法，即“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式。他认为：“青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不少贡献，但是他们马上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班还不行；现在各省市都学习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那国号改不改呢？如果改为中华人民公社，那国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长了。国号一改，还有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我看苏联就不会承认，承认对他不利。**公社成立了，还要不要党呢？我看应当要，总要有个核心。**……总之，还要有一个党。我看名称还是不变得好，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还是叫国务院。上海人民公社就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吧！”这就是我在第二卷所说的毛泽东会从党内资产阶级的观点后退到改造干部思想的文化革命的立场上来的现象。这在避免了造反派陷入空想的同时却也使得保守力量增长，使革命陷入持久战，带来更大的损失。革委会人员采取“三结合”，即包括有部分没有被打倒的或“改造”好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代表（后来还包括了工宣队、农宣队等组织，主要是进驻机关、学校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人、贫下中农的代表）。于是，2 月 24 日，上海革命委员会成立。

当时认为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5 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转引了毛泽东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

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1968年3月30日“两报一刊”的社论再次引用了毛泽东的话：“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显然，毛泽东对革委会的设想是与延安模式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扁平化行政结构和反官僚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从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来说，革命委员会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构想。但是它马上遇到了重重的问题。首先，正在兴头上的造反派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贯穿整个文革，许多左派坚持认为革命委员会是一个倒退，因为它没有履行巴黎公社的重要原则，那就是行政长官由直接普选产生，而且可以罢免撤换。按杨曦光的话说，就是“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在文革后期，这个判断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革命委员会的原意是要调和社会上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这在表面上比以前的党政官僚一家独大的局面似乎要进步一些。但是，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无论是党政官僚，军队力量还是民间造反派，都不愿意达成妥协让步，至少是不愿意在革命委员会这个程度上进行妥协让步。它的根本问题就在于，革命委员会并不是来自社会上不同阶层的自发妥协，它始终具有来自上层的“被团结”的色彩。也就是说，造反派的持续激进化使得他们之前的行动已经超越了革命委员会这样的“三结合”阶段，达到了“夺权”的程度，这也就是杨曦光一再强调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因此，采取革委会这种形式，在造反派看来并不是一种进步，而是倒退，是把已经被他们打倒的官僚重新扶起来。因为他们是以夺权时的“公社”而不是文革前的“人民政府”作为衡量标准的。这是造反派对于革委会的不满，因此他们还要对领导干部进行批判，把运动往前推进。

对于党政官僚来说，文革中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显然他们又是以文革前的政治形式作为评价标准的，也就是说造反派和官僚集团对革委会都不满意，但是他们的衡量标准当然是不同的。而确实，尽管官僚反对革委会这种形式，但是与所谓的“公社”相比，革委会还但有一定的官僚制架构，革委会这一有包办替代色彩的组织形式客观上确实有利于党政官僚投机革命，到文革后期，当权派在革委会中又重新掌握了大权，群众组织基本

已经被边缘化，基本已经无法发挥维护社会下层的利益的作用了。因此，杨曦光所分析的革委会这种形式最终是有利于官僚篡权，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杨曦光还是没有把握住问题的关键：革委会这种形式与文革前相比确实是进步的，既然革委会能够被官僚控制和利用，那么为什么群众组织就不能利用革委会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呢？因为在革委会成立之初，至少在表面上群众组织是占据优势的。这里除了毛泽东本人的转向和官僚的投机外，还必须要看到造反派自身的问题。这必须要从造反派的持续激进化谈起。

从 1966 年的局势我们可以看出，群众走向激进化的程度由于 50 天专政和红八月而持续加快了。当然 50 天专政和红八月、血统论这样的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终究是跟现存的体制有关的。具体来说前 17 年在教育上给予干部子女的种种待遇和优惠条件是血统论出台的很关键的原因。但是体制的变革就绝对不像斗倒，打倒某个具体的人物那么简单，因为它会涉及到所有与此有关的人物的利益分配，因此注定这样的斗争难度更大，也更加激烈。而 1967 年初的造反派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呢？

必须明确的是造反派对于体制的变革要求乃至最后的夺权是**意识形态**上持续激进化的结果。而此时，造反派的实力虽然看上去很强大，但是实际上问题多多，其真正的政治斗争的实力与其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实力严重不相称。以毛泽东为首的文革决策层错误地估计了造反派的真实实力和反对派的力量，从而导致了贸然夺权，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

不仅是造反派意识形态上升的速度超过了其自身的组织能力，还有一点，尽管造反派领袖不乏理想与热情，也具有一定的斗争经验，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造反派组织仍然是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大杂烩。说到底来说，它是为了反抗 50 天专政和红八月中“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政策而奋起造反的那个“一大片”的人，他们的利益诉求千差万别。虽然相对于官僚来说他们都属于社会的中下层，但是他们自己的内部的分化也使得他们虽然有共同的反对目标但是观点不同。比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来说，他们中许多人有充分的理想和热情，也都被巴黎公社的民主蓝图所吸引，因此在行动中他们可能会有一定的组织性和充分的纲领甚至是阶级意识。但是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人来说，他们更多是借这个机会表达自己在 50 天专政和红八月中所受的冤屈。一些激进者要夺权，而一些温和者可能只停留在“经济主义妖风”阶段。他们并没有什么组织起来争取自己利益的愿望。由于缺乏必要的阶级组织和阶级意识，贸然的“夺权”也使得人们忽略了这两点，为后来的所谓“派性”埋下了祸根，导致造反派陷入窝里斗之中，无法组织成力量强大得既能够遏制当权派的官僚特权，又能够维持住社会秩序不致失控的强大社会阶层。当然也不排除混迹于其中投机革命的官僚和流氓无产者，更增加了造反派内部的混乱程度。

总而言之，尽管 1966 年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群众似乎是被充分发动起来了，但

是一些人是为了理想，一些人是纯粹为了发泄不满，更有不少投机分子，极其缺乏整合、组织和教育。而文革的核心决策层却被表面上“群众都被动员起来了”的表面现象冲昏了头脑，抛弃了之前“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态度，以为可以进行更加激进的社会变革，贸然夺权，结果导致了造反派的大分裂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

造反派组织发生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群众内部的利益分歧，尤其是在经济利益上的分化导致的分歧。对于体制的变革首先应该锁定在官僚特权上，而此时部分已持续激进化的造反派却已经迫不及待，开始进行各行各业经济和政治上的夺权活动，四面出击，此举不仅减少了对官僚特权的批判效果，还导致了本来组织性就不强的造反派的内讧，导致了原先由于当权派和保守派的恶劣行径而同情或支持造反派的群众转而反对造反派的激进主张，要么是从造反派队伍中分化出温和派，要么是保守派重新复活。清华大学周泉纓的《“4·14”思潮必胜》可以说是温和派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

1966年11月8日，王振海等人成立了首个全国性工人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激烈批判“三工”（外包工、临时工、合同工）制度，得到了中央文革尤其是江青的积极支持。1967年1月全国总工会发布《联合通告》，导致全国工人的经济诉求爆发，即所谓“闹转正，闹晋级，闹福利”。许多受到歧视和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得以转正，在60年代初被“精简”到农村的工人也补发了工资。“三工”揭露称：

（对于合同工）他们尽要挑选体力强壮的来为他们争取利润，一旦你有了什么病，不是从关心你身体出发，保障社会生产力，而是以病作为藉口，退你的工。这样逼得我们红色工人有病不敢说，有了医生的病假证明也不交出来，硬顶、硬拖，结果，形成了各种严重的病根，到最后，被发现了，还是一脚踢开。……三〇七分队有位冯朝玉同志，也是一九六四年来的，一九六六年生了肝肿病不敢响，医生的休息证明也不敢交，后来病情发展严重了，要求轻工作得不到照顾。病情暴露了，当权派又企图要她退工，工资到期不发，硬压了三天。可是就这三天，给冯朝玉同志带来了家庭困苦和思想影响。孩子们打好了背包等著妈妈发了工资回家，拿了钱好出发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可是孩子们那里知道他妈妈拿不到工资，饿著肚子，走回了家的呢！冯朝玉同志说：“我在当时遇到了这种情况，就对孩子们说，我过去在旧社会中受了多少苦，**今天共产党领导了，但是当权派老爷们还在迫害我！**

使我这个人穷人还没有翻身。劳动所得的钱还拿不到，你们还去参加什么劳动？”……

当权派们为榨取外包工的血汗，在基本工中间散布了歧视外包工的影响，……这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还在多劳多得的制度上，玩了二年，干尽剥削之能事。我们三〇二施工队在六六年十月份用了宜川一批外包工，给他们的任务是拉土方。开始，就拿多劳多得来刺激她们，按每八车算一个立方。（工资按立方算。）后来看她们拉得多了，要十车计算一个立方，再看看她们干劲十足，又拉得多了，就以十五车计算为一个立方。……这些当权派们，一手拿著如意，一手拿著算盘，**既以多劳多得的经济主义手段来刺激你；又以合同框框套住你，他们随心所欲，随意改变合同协定内容。既不得到劳动者本人的同意，又不接受人家的意见。**（上海市政工程公司《红色风暴》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这个材料写在上海“一月夺权”之后，这说明夺权活动并没有完全否定“经济主义妖风”中的积极因素。因为“三工”（外包工、合同工、临时工）是当时地位和待遇最低下的工人，也成为造反派中最活跃、最激进，有时也是最极端的一股力量。这份材料说明了上海在夺权之后确实开始关注工人的利益，也说明了夺权至少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涉及到了对工人内部待遇差别的批判。因为像外包工，临时工，合同工这样的群体的收入非常之微薄，福利得不到保障（今天同样如此），可以说处于社会最底层，因此他们这里激烈地批判经济体制。但是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那些同情造反派的普通工人，或者是技术工人，老工人，对于这篇文章又会是什么感受呢？如果你让这些拿着一两百块钱，有不错福利的老工人，技术工人去批判收入好几百甚至上千的党政官僚和他们的子女，那么他们是支持的。但是如果你让拿着二三十块钱的合同工或普通工人去批判八级工资制，去批判老工人、技术工人拿的上百的工资和对应的福利待遇，或者是物质刺激，那就会产生问题了。也就是说，造反派的持续激进化使得工人市民之中的收入较高者，也已经不能容忍造反派的行动了。当年，这些劳动者中的高收入者（他们还远远谈不上工人贵族）由于50天专政的恐怖和保守派红卫兵的暴行而支持了造反派，这是由于当权派的残酷打击而引起巨大反弹。但是造反派在1966年底被“全民动员”的表象冲昏了头脑，毛泽东乐观地认为1967年可以“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有了把持续激进化的思想付诸实践的底气，在没有对群众进行充分地组织和阶级意识的启蒙的情况下就在1967年初贸然夺权，结果运

动一深入到现实利益层面，立即遭到抵触，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裂局面。比如“三工”问题，尽管后来迫于“大联合”的需要，中央撤销了《联合通告》，取缔了“全红总”，宣布对“三工”制度进行稳妥改革，但是为时已晚，分裂的局面已不可避免了。

在夺权行动中，社会上经济政治地位相对较高的阶层，必然会反对造反派的激进主张，选择站在给予了他们相对的高工资和福利待遇地位的官僚一边。在工厂中，从厂党委办公室、政治处、保卫科到工、青、妇的干事，再到各车间主任，各工段长、班组长大多就是如此。在既有秩序的利益面前，缺乏阶级组织和阶级意识启蒙的工人立场可能就会转向温和或消极，这就形成了保守组织由少数骨干分子裹胁着大量普通工人而形成虚假的多数局面。而从造反派中分裂出温和派，以及复活的保守派，就成为1967年形势转向保守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但他们与保守派红卫兵不同，他们与他们要“保”的官僚没有直接的联系，纯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因此，造反派组织自1967年初开始持续分裂。有的人主张激进的要求，彻底变革经济政治体制，我们这里称之为造反派中的激进派；有的人反对激进化，只主张对现有经济政治体制做一些改革或调整，反对激进变革，我们这里称之为造反派中的温和派。当然还有人彻底反对进行任何变革，我们称之为保守派。

当然温和派或保守派中不只是工人。1967年农村也开展了文革。但农民要比工人消极得多，再加上农村经济基础的薄弱使得中央态度谨慎，农民中的保守派在保守派势力中最大最稳定，几乎所有组织都不是由农民自发成立，而是由各级农村干部去领导（只有少数城镇郊区农民中出现过造反派组织）。随着城市里形势的发展，公社书记、生产队长不宜直接出面，于是由人武部部长、民兵营营长、贫协主任之类就挑起了大梁。因此，除少数造反派会批判农村干部外，农村文革的斗争对象往往指向传统的“地富反坏”，其中以湖南、广西、广东尤甚。因此农村几乎是保守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武器库。1967年夏季，军区和人武部操纵的农村民兵往往是城市里最残酷武斗的制造者。一些地方的当权派甚至雇佣农民进城打人，为此1967年7月中央还发布过《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由于机关内部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体制内的公务员和在官场斗争中的失意者也加入了造反。因此，在一些地方夺权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么一种场面：首先，不是由群众组织造反夺权，而是党政官僚中的内部力量通过机关内部文革起来造反，甚至直接宣布夺权。在这之中既有人胸怀理想，也有人对造反派持包容态度，又有人投机革命想趁机捞一把。比如《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他因出身问题和历史问题一直受审查，结果在文革中成为重庆最早的造反派之一。当权派中“造反”的则有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黑龙江省委书记潘复生，山东的王效禹（1957年反右时被定为“右倾”，文革前是青岛市副市长）和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二人都曾是宜宾市领导，被李井泉排挤，1963年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文

革中被平反，官至革委会副主任)。不过这些或有政治理想或有投机心理的“体制内造反派”往往坚持温和派的立场。在革命的浪潮下，必然会有激进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对其提出质疑，然后进行斗争，引发新一轮的造反。而且由于某些高级领导“亮相”拥护造反派，因此可能还会出现“造反派要保皇，保守派要造反”的颠倒局面（河南就是如此），导致即使革委会成立各地仍然是混乱不断。这是革委会成立后却始终无法稳定局势的重要原因。

不过，公、检、法机关不同于一般的党政机关，它是专政机关，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支柱。它里面的工作人员可以说全部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党员比例、“红五类”出身的比例远较一般机关高。公、检、法工作人员有明显的优越感，他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人民的对立面，打击政治犯比打击刑事犯历来是更为重要的工作内容。而且由于他们是准军事单位，上下级的关系也远比一般机关严格。这些因素迭加起来，便使公检法系统成为党政机关内部最为保守的力量。总而言之，各个阶层力量的普遍参与，尤其是公务员阶层的参与，在 1966 年更好地推动了党政官僚的倒台，但在 1967 年夺权开始后却加剧了造反派队伍的分裂和混乱。我们引用一段文革异端派的分析进行总结：

相当一段时期，革命造反派的斗争还停留在自发阶段，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逼上梁山的。党内走资派的镇压，不啻是为渊驱鱼。……

有两个现象使革命造反派成员复杂化：一批民主革命时期仅仅是团结对象的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解放后政治经济地位，思想意识和政治态度逐渐与工人阶级一致，他们投入了革命造反派的行列在自发阶段上聚集，组织和发展起来的革命造反派，虽然按其实质来说，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一翼，**但它的组织与其说是单纯的阶级组织，毋宁说是以工人阶级左派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阶层、个人的联盟。**另一方面任何一个造反派都很难杜绝狡猾的阶级敌人、变色龙及小爬虫混进来。

革命造反派没有自觉地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铁的纪律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标准建立、发展自己的队伍，这给后来的整党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同时，旧的党组织瘫痪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导，政策，方针只能具体地由在组织的严密、步伐的整齐等方面都较革命政党相形见拙的群众组织来贯彻实施，这就大大延缓了革命群众提高党**

悟的过程，而且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出现的革命队伍的分化，落伍者的被抛弃，与机会主义派别的决裂等现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来得更加频繁和明显。

由于存在党政官僚这个共同敌人，因此大部分社会力量在 1966 年联合了起来。但是当党政官僚的利益收到了沉重打击之后，造反派的意识形态开始持续激进化并付诸实践。但此时造反派缺乏足够的组织性和阶级意识，结果队伍由于利益分歧而发生持续的分裂。社会地位较高者组成了温和派或保守派的群众组织，较低者则成为激进派。这是 1967 年各种事件得以发生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将永远不可能理解文化大革命。

第二节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既然造反派对于革委会不满，而党政官僚对于它的不满也可以想象，可是这一形式好歹也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不是仅仅一条“革命委员会好”的最高指示就能完成的。起码它在 1967 年初能被广泛接受就说明必然有社会利益阶层在支持它，而这股力量就是军队。

不说别的，仅凭文革初期林彪的活跃表现我们就可以判断军队力量在文革中确实是有很大的分量的，起码林彪所代表的这一派是这样。但是我们在 1966 年部分没有讲军队的作用，这是因为，军队的在这一时期最大的作用就是它的“不作用”。而到 1967 年，军队终于从幕后走上了前台。我们在这里将详细分析一下军队在文革初期的地位和立场。

对于一场原则上不使用枪杆子的“文化革命”来说，由于涉及到的了社会上不同阶层的利益分配，因此军队的介入与否对于任何一种形式的运动来说都非常关键。因为在涉及到利益的斗争之中，斗争的形式往往会非常复杂激烈。而此时，如果有一派的社会支持力量并不占优势，缺乏充分的社会动员能力，而此时却又得到了军队的支持的话，那么这一派可能会倾向于运用军队暴力强行压服社会上的反对力量。而文革时期社会各个阶层斗争激烈，军队的立场对于一场革命来说就更加重要。

正是由于军队在社会利益分配发生激烈变动的时候会产生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毛泽东要发动文革就不能不争取军队的支持。而此时军队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对于文革的主要目标，即党政文官系统（它包括白区党和政工干部，以及部分传统精英），军队和工农干部与其是存在深刻矛盾的。从高岗事件到“军事反教条主义”再到彭德怀事件，无不显示着军队与文官之间的激烈斗争，尤其是以“红区党”自居的军队以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工农

干部对于“白区党”与政工干部的总代表——刘少奇的不满也是相当强烈的。因此，如果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倒原有的党政文官力量，军队是持支持态度的。而其中最为支持的就是林彪，他当年就曾支持高岗，可以说代表的是“红区党”中较激进的一派。因此在文革前，为了防止军队在文革中出现支持当权派的可能，增强毛泽东在军中的影响力，林彪花了大力气进行政治工作，如“四个第一”等。文革初期又打倒了倾向于当权派的罗瑞卿、杨尚昆等人。军队中至少是主流派系的支持，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

但是军队毕竟不同于工农群众。这是因为，无论如何军队也都是党政官僚系统的一部分，他们的种种特权或“资产阶级法权”也都是造反派所要批判和反对的对象。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军队与文官矛盾的来由，虽然军队自己有所谓“红区党”，“白区党”的划分，但是我们之前说了，这是基于“打天下的却不能坐天下”的不满而发，是基于军队系统的出身干部和政工系统出身干部之间的资源和权力分配问题而发，党政文官的精英主义政策确实影响了军事系统干部与和军队有密切联系的“工农干部”参与政治的权力。60年代初尤其是四清运动中工农干部再次受到沉重打击，而工农干部的后台是整个军队系统，因此他们会支持1966年造反派与当权派的斗争。但是军队归根结底来说是要分享权力，他们只是反对当权派垄断权力，对于体制改革他们并不感兴趣。也就是说，军队干部与政工干部的矛盾是内部矛盾，当来自体制外，来自社会底层的造反派要求进行整个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考虑社会底层人民的利益的时候，军队很可能就会走向反面，反对激进的诉求，甚至帮助基层的保守派镇压造反的群众。简单来说，军队的利益和立场决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支持只管到1966年，不管到1967年。我们先来看一下文革初期军队的具体情况。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发布两天之后，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提出在打倒“彭、罗、陆、杨”之后，防止政变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治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化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

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之后林彪把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著名政变给数了一遍，最后是那句耳熟能详的话：

“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这就是著名的“政变经”。林彪用相当“直率”的政治语言表达了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支持。实际上，由林彪来表态也就说明了军队坚决站在毛泽东的这一边，以防止当权派因为在政治斗争中不利从而寻求军队的支持。而在接见红卫兵时林彪的一次次讲话，代表的不仅是高层激进派对于运动的支持态度，同样也是代表了军中掌权者对于文革的支持态度。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于8月21日向各军区、各野战军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公安部队文告经毛泽东圈阅也于22日发到各级公安局直至派出所，明确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胁也绝不允许。”“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可见，正是由于军队力量的支持，或者说由于它的故意“不行动”，使得造反派在1966年下半年可以充分地对当权派进行批判，而当权派也不得不利用他们的子女组成红卫兵，即“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样的方式进行反击。

但是情况到了1967年就有所不同。对于军队来说，它没有造反派那样的持续激进化，而军队中以林彪为代表的派别也只是认为对当权派的态度应该激进一些，而这是造反派和军队在1966年得以合作的基础。而在1967年，造反派不满于革委会的形式，至少是不满革委会中既成的权力分配，要求更彻底的变革。而军队力量可以作为“三支两军”的代表进入革委会，因此在军队看来革委会是一种极好的形式。首先，革委会保留了基本的官僚制，这符合了军队的不愿意对现有体制做太大变革的立场；第二，革委会打破了党政文官系统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军队及工农干部有了更大的拥有了参政权，这在他们看来这是

一种进步。第三，尽管革委会要求“三结合”，但是，具体如何结合，却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对于手握枪杆子的军队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很好的为自己扩展权力的平台（事实上党政官僚也是在1972年三支两军结束后才开始扩展权力的）。

因此我们看到，1967年的保守倾向除了毛泽东的转向，温和派或保守派群众组织外还有另一个形成来源，那就是军队。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反对对现有体制进行更激烈的变革。简单来说，军队是1967年初保守倾向的直接推动者，而保守派或温和派群众组织是其社会基础。在1966年军队与造反派可以保持合作关系，但是当1967年造反派持续激进化了以后，军队便不能容忍造反派对于现有体制的冲击而开始转向保守，有的调转枪口镇压造反派，有的则故意挑拨造反派的内部矛盾加剧其分裂。到1966年底，一些地方的军队已经开始私自介入文化大革命。而造反派、温和派、保守派的分野，派别的对立和斗争也使得夺权根本无法进行，相反当权派能够动用国家机器镇压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因此，与其禁止军队介入还不如制定标准让他们去支持造反派。更重要的是，一方面是当权派的“经济主义妖风”，主动罢工，各级党组织瘫痪使得工厂、交通等部门无人领导指挥，另一方面各地工人的夺权行动导致混乱局面蔓延到了经济建设领域，生产开始滑坡，因此军队还需要去保证工农业生产不会瘫痪；再加上毛泽东对于革委会这种相对务实的形式感到满意，因此在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在了解全国特别是安徽造反派在夺权中受挫的情况后，向林彪指示：“应该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是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时应该重新发布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

1月23日，中央宣布“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解放军正式介入文化大革命。1月28日，中央军委制定了规定军队支左工作的《军委八条》，经由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表。内容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这显然针对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造反派暴力升级的情况——引者注）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档、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作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这一条为毛泽东本人所加，显然针对的是“联动”暴力的教训——引者注）

如果与《十六条》中温和的“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进行比较的话，那么可以说高层认为群众已经充分动员起来，只要稳固革委会这块阵地，文革就可以结束了。因此《军委八条》措词激烈，对于群众运动也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如禁止武斗，禁止串联，赋予军队镇压之权等）。它的一些内容成为后来军队动用武力的借口。

起初，中央只是下令对广播电台、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等“要害”部门实行军管，随即扩大至民航系统。随着局势一天天的混乱起来，需要“管”的单位越来越多。由于各个群众组织之间无法达成有效共识，局面越来越混乱，军队乘机介入的领域就越来越多。于是，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做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

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这一文件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性任务向全国全军提出）。仅在1967年前5个月中，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就对全国7752个单位实行了“军管”，并对2145个单位实行了警卫保护，其中包括中央各部委、1219个银行（占全国银行的42%）、547个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台的24%）、111家报社（占全国报社的53%）、10个铁路局（全国共18个铁路局）。

当时三支两军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求区分“左派”组织和“右派”组织。在很多地方，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很混乱，但是总体上，要打倒谁，要团结谁，要保谁，群众组织分裂得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对于军队来说，毕竟他们将来一定会在革委会中占有席位，那么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能够取得日后地方行政的主导权，军队干部往往采取保守派的立场来判断“左中右”，比如说家庭出身好的，队伍成分“纯”的，组织性强，党员、团员、劳模多的（因为许多保守派的组织建立在党组织的基础上），“听话的”，就被军队认定为“左派”，而基层一些军队故意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使造反派内部分裂，再将激进的一方判定为“反革命分子”进行镇压，然后用“我分不清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来进行搪塞。毫无疑问军队对于“支”哪一派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的。

第二章 不进则退

第一节 二月逆流

到了1967年2月，随着夺权行动和军队支左的展开，造反派与军队的矛盾浮出水面。全国仅上海、山西、山东、黑龙江、贵州5个省市的驻军拥护造反派。大多数地方军区反对造反派激进的政治主张和要求，而造反派则对军队立场转向保守感到十分不满。这一矛盾从基层蔓延到了高层。军队将领们反对文革在军队内部完全开展，而造反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对当权派的过激行动导致大批干部被打倒，尤其是对军委文革组长刘志坚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打击迫害，更是直接引发了老干部们的强烈愤怒。

在2月1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同江青、康生、陈伯达进行了面对面的争论。叶剑英怒气冲冲地对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

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想干什么？”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了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你们凭空捏造刘志坚是‘叛徒’，我们是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不知道吗？”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即宣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引者注）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要保陈丕显，张春桥则称要同群众商量，当场拒绝。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随后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说：“我一生三不应该，第一我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二我不应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当年不应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

他们提出了三个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2月16日，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在与江青商量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让谭震林接电话，说：“谭震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上井冈山，井冈山是我请你去的吗？你不加入共产党你可以退出嘛！你不活这么大岁数不也活了吗？你现在也可以不活嘛！”3月1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干部，声称：“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林彪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谭

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从2月22日起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名义批评老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与此同时，江青等人在社会上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这时我们看到，军队中的一些领导人已经完全站到了党政官僚的一边了。值得注意的是有两点，第一，李先念直接为“联动”做辩护，这显然是在对抗《军委八条》中的要求干部严格教育子女的决定。“联动”组织由于打砸抢证据确凿，即使改革开放后都没有公开为其“平反”（也根本无反可平），这里李先念直接为其辩护，可见其立场。第二点，就是二月逆流中谭震林的激烈表现了。这位在大跃进中大搞浮夸风的老将这回表现更加抢眼。我们可以说谭震林的话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党内的保守力量与毛泽东的决裂。我们之前说过，在1966年，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需要利用毛泽东这个偶像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如今毛泽东所支持的造反派夺权行动已经超越了统治集团中的多数人所能容忍的底线。因此，谭震林的与毛泽东撕破脸的讲话可以说是保守派要与毛泽东决裂的威胁。他们意识到毛泽东可能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那也就不值得被他们树为偶像和领袖。

二月逆流是军队高层领导人和党政系统中有军队背景的人以“抗争”的形式向毛泽东做的一次公开表态，亮明态度，意思就是说，毛泽东你想做造反派的领袖你就去做吧，但是你不能同时是造反派和保守派共同的领袖，二选一！这一方面是造反派的持续激进化导致两派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难以妥协的程度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保守派向毛泽东所做的一次警告，不要忘了你还是这个党的主席和领袖，是党政官僚系统的最高领导人，你归根结底要代表我们的利益！这样直接的表态对于毛泽东来说显然是难以容忍，因此在进行批评时也毫不吝惜言辞。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对于“二月逆流”始终态度暧昧。因为毕竟毛泽东还是这个官僚系统的最高领袖，对于军队干部联合起来亮明底线的做法他是不会直接翻脸，去“另立山头”的。比如在1967年国庆节，这些“二月逆流”中的老师们都被请上了天安门（谭震林除外）。

后来，在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

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又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林彪倒台后，到了1971年11月，毛泽东把责任都推到了林彪头上，为“二月逆流”平反。

二月逆流就总体上来说，就是军队和造反派在基层的矛盾逐渐升级，最终反映到了高层的结果。结果党政文官和军队领导人联合了起来向中央文革和毛泽东亮明了底线。而毛泽东不敢有过激举动，这是由他的最高领袖的地位决定的。而中央这种僵持的态度返回到了基层，军队和造反派的矛盾就只好由他们自己去解决。而对于手握枪杆子的军队来说，“自己解决”似乎是最容易的事情了。在“二月逆流”发生的背景下，社会趋势重新转向保守，军队开始有意挑拨扩大造反派的内部分歧，进而镇压激进派。举例来说，在1967年初，武汉军区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二司”、和“工造”，逮捕近500人，牵连超过6000人；广州军区把“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等；成都军区把“工人造反军”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川大“8·26”，最后竟创下逮捕10万人的记录；湖南省军区把“湘江风雷”打成反革命组织，逮捕1万人；河南省军区把“郑大联委”、“8·24”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二七公社”，逮捕数千人；福州军区把“红革会”、“9·2”等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安徽省军区把合肥“红卫军”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8·2革联站”、“红革会”、“工人一司”；新疆压制“红二司”等等。一些军区则明目张胆地镇压造反派。其中最血腥，最残酷的就是青海的“2·23”事件。

“2·23”事件是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流血事件，开了军队有组织、有计划地镇压造反派的先河，是“二月逆流”在基层的典型表现。青海在1966年中的形势与各地基本相同，也都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之类。但是由于地处偏远，矛盾复杂等种种原因，在1966年底群众就已经明确分成了两派，即造反派组织“8·18红卫战斗队”和以党团干部为骨干的保守派组织“捍卫队”。1月23日，支左决定下达当天，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召集军区党委开会，决定支持“8·18”。这个决定虽然符合毛泽东的意图，却不符合军内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不为省军区内干部所接受，他们绝不认为成分复杂的造反派是左派，更何况不少干部的家属都已参加了保守派。军区党委会后不到3小时，军区机关干部便召集会议，成立了“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副司令员赵永夫当场“亮相”，说：“你们造反我当然支持。”于是，赵成了指挥部的顾问，在军区多数人的支持下发动了兵变。是夜，刘贤权司令员被软禁，电话切断，门口放双岗，警卫、秘书均不能接触。

军区风云突变以后，“8·18 红卫战斗队”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声言“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他的指挥，还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了巨幅标语：

“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青海省委也发生了分裂。省长王昭到外地治病，多数省委领导仍和他通气，策划支持“捍卫队”夺权。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则决定支持“8·18”夺权。1月29日，“8·18”一举夺了省委、省人大大权。但由于“捍卫队”和省委、军区的干部都以血统论指责“8·18”“队伍不纯”，夺权后的“8·18 红卫战斗队”迫于压力决定开门整风。他们将杨守礼等几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成员定为“反革命分子”，送交公安机关，要求严肃处理，以示革命。不料却中了圈套，分裂了自己的队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月4日，青海大学“8·18”红卫兵张贴大字报《炮轰青海省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言“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软禁中的刘贤权，深感问题严重，亲自起草了电报：“青海8·18是真正的造反派，总部、捍卫队是保守组织，界限非常明确，我们坚决支持8·18。”他要求发给中央，机要员却把电报稿退了回来，答复是：“赵副司令不同意发。”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把电报稿用纱布缠在腿上，穿上棉裤，请假到了兰州。兰州军区把电报发给了中央军委，没有回音。

《青海日报》社始终是青海文革的中心。报社里“8·18”占绝对优势，编辑部80%的人支持“8·18”。1967年1月12日，“8·18 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北京红卫兵“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报社的权。夺权后的报纸称作“新生的青海日报”，它旗帜鲜明地支持“8·18”。

2月8日，赵永夫、张晓川准备对报社实行军管，但军区党委两次开会都没通过。11日晚，军区副政委张文英向兰州军区请示，兰州军区也不同意军管。张文英让兰州军区请示中央军委，兰州军区请示了，答复是：“需要请示”。2月14日，赵永夫召开军区党委会议，通过了《军管青海日报社公告》，组成军管小组进驻报社。但军管遭到了“8·18”的抵制，进入报社的军管人员被“8·18”的人赶出来，有的人甚至被从墙上扔了出来。上午11时，部队包围了报社。2月15日，“捍卫队”上街游行，支持军管《青海日报》报社。但兰州军区来电作了3点指示，不同意军管，要部队撤出报社。赵永夫派副司令员刘斯起率6081、205、8122部队12名干部，连夜到兰州军区大楼前绝食静坐，要求收回成命。兰州军区一天之内开了8次常委会，研究《青海日报》问题。司令员张达志、政委洗恒汉态度坚决：批示不能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刘贤权派人给报社送条子，告知兰州军区的指示，

并写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8·18”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但是，一个意外让形势逆转。2月19日，“8·18”上街游行，反对军管。途经报社时，“捍卫队”前去阻截，“8·18”的车辆轧死了“捍卫队”成员张桂兰。以此为由，当天，赵永夫主持会议，决定将“8·18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2月20日、21日两天，“捍卫队”抬着张桂兰的尸体环城游行，沿途砸烂“8·18”的办事机构。赵永夫主持军区党委常委会，确定2月23日取缔执行“8·18红卫战斗队”的行动，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常委除刘贤权外，全部赞成。22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开进时，‘8·18’动刀，我们也动刀；‘8·18’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轧死人。”23日凌晨，赵永夫再次动员：“一定要占领报社，用刺刀挑也得挑进去。”有人说：“难道我们手中的枪是吃素的吗？”

23日上午8时，西宁全城戒严，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兵站部政委陈郁、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指挥调动了13个连围攻报社。11时10分，军队枪击“8·18”的广播站，所有喇叭顿时全哑。下午2时，西宁宾馆（赵永夫的指挥所）和报社后门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军队开始向手无寸铁的造反派群众开枪。在报社西北角的湟水大桥，负责守卫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手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枪声中第一排工人倒下了，20多人仅3人幸免。第二排岿然不动，继续朗诵。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动。一瞬间，64名工人死在枪口下。20多分钟战斗就结束了，部队轻松地占领了2000多人守卫的报社大院。

攻打报社的当天，军队在保守组织的配合下，又包围攻陷了“8·18”的重点组织：青大畜牧兽医学院“文革筹备处”、人民剧院“红宣兵团部”、党校“红色造反团”等。

最恐怖的是“群众专政”。在逮捕了第一批“反革命”后，剩下的“8·18”成员，就交给了“群众专政”，即把誓不两立的两派中的一派群众，交给另一派群众去专政，其后果可想而知。“捍卫队”大小单位都成立了类似“镇反指挥部”之类的专政机构，设立了“劳改队”、“临时拘留所”和“牢房”。他们的口号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决不施仁政”。于是捆绑、吊打、大头皮鞋踢（甚至出现了互借大头皮鞋的闹剧）、跪雪地、跪三角铁、烟头烧、火烤、烙铁烫、针扎、过电、穿针、手指夹筷子、活人打夯……种种无师自通的刑罚，都被花样翻新地施展出来。

最后，引述一下在为“2·23”事件平反后，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结案报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

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

1967年7月15日

“8·18”和军队在《青海日报》社对峙的9天中，赵永夫不断地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有记述称：“青海省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省会西宁，有个自称‘8·18’的造反组织，在北京来青海串联的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里边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们拥有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部队人员进行武装威胁。……因此，西宁驻军调集八个连队，对占据报社的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撤出报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2月23日下午攻打报社之后，赵永夫给军委、周恩来、中央文革都发了加急电报。晚上他还和军委通了电话，叶剑英接了电话。电话中叶剑英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当晚，西宁大街上贴出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对此，有记述称：“最后，青海的枪声终于打响了。青海方面的报告说，**占据报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围他们的部队开枪挑衅**。部队被迫进行武力还击，一部分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已被击毙，其余的人已被驱除报社，一场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下去了……林彪听讲这些情况之后，还是无所表示。就连那个误传的‘林副主席来电’，他听后也是一笑了事。”

青海问题的翻转，源于中央文革的一个报告，戚本禹这样回忆：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

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我觉着问题严重，就把中央文革小组《快报》组记者找来。记者按照军区报告说 8·18 先开枪，8·18 在报社杀人等等。我问他：‘你在不在现场？是亲眼看到的吗？’他不敢回答。我告诉他人命关天，责任重大，要实话实说，他吓得腿都打颤，这才承认不是亲眼看到的。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查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由我和关锋署名，后来文元、春桥回京，我们向他俩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署了名。报告打印后，经由陈伯达、江青转报主席。”

3月11日，毛泽东在戚本禹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经过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4次调查，青海事件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只有“8·18”的车辆轧死“捍卫队”成员是真的，其余什么“学生先开枪”，“在报社搞屠杀”都是子虚乌有。后来，中央文革还专门询问叶群那个“林副主席来电”是否属实，叶群当然否认。3月28日在“2·23”事件中被打击的造反派得到平反。于是才有了我们前面看到的青海省革委会的结案报告。后来背负了血海深仇的造反派进行报复也毫不手软，许多与“2·23”事件有关系的当权派被批斗致死，如支持保守派的省长王昭。倒是罪魁祸首赵永夫虽然被关进监狱惨遭批斗但活了下来（看来军人确实比一般干部要坚强），在改革开放后成为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得以善终。

首先说一下，关于青海事件的史实部分来自《炎黄春秋》，所以请不要乱扣“毛左颠倒黑白”之类的帽子。虽说该文作者比某些只看当权派提供的史料的人要强一些，但也是不管什么人什么派做了什么事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否定，结果就是什么事也解释不了，什

么形势也分析不出来，除了“全国人民都疯了”外也得不出什么结论。更有意思的是，作者以人道主义“怜悯”被镇压的造反派，但又不能改变既有的对文革的结论，结果发了一通感慨却根本看不出想表达什么。网上的评论也在争论这篇文章的主题到底是在控诉文革的罪恶还是在给造反派翻案，明明是一个很沉重的事件，却被这帮人搞得有些滑稽。

不过从“2·23”事件中可以看出，军队在基层首先还是倾向于保守派这一边，对造反派进行了残酷镇压。这在全国都非常具有普遍性。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人在镇压后还打出林彪的名号为自己壮胆，显然也表明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军队领导人反对文革，反对造反派的态度，甚至闹出流血事件，确实把军队中最支持造反派的林彪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作为军队的最高负责人，林彪此时肯定面临巨大的压力。

“2·23”事件发生在“二月逆流”时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的性质相同，都是军队反对造反派的激进诉求的事件。一个发生在高层一个发生在基层。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说两者之间有直接的互动关系（叶剑英虽然称赞了赵永夫的行动，但他可能也是被误导，不能说明整场事件都与他有关），但是在间接上，不能说没有二月逆流中军队领导人施加压力的因素影响。尤其是我们看到，在“2·23”事件发生之前，关于青海局势的真相就已经发了出去，甚至可能已经到了中央手中，但是中央态度的含混不清如“需要请示”之类，使得支持造反派的兰州军区也缺乏扭转青海事态的底气和力量，从而为赵永夫制造这场悲剧提供了可能。无论那个“林副主席来电”真实与否，中央军委模棱两可的态度也说明了，由于军队高级领导人强烈的反文革态度使中央的力量对比出现僵局，从而为地方上的军队领导痛下狠手镇压文革造反派提供了可能。事实证明文革的局势已经发展到了不以人们停止的愿望而转移的程度，现在的情况已经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了。如果我们认识到军队高层领导人所谓的“抗争”带来的是地方上军队对造反派群众的压制甚至是血腥镇压，我们对“二月逆流”的评价也需要重新考虑。一些人的逻辑就是，先假设了“文革是错误的”这个前提，然后把一切反抗文革的行为，无论是干部子女的暴行还是军队的血腥镇压都在实际上予以肯定，对于被害的造反派则再拿人道主义的态度“怜悯”一下，最后说这都是“毛泽东及其爪牙”“忽悠”全国人民的结果。它摆出一副普遍怜悯的姿态但却只怜悯自己的立场能让他怜悯的东西，最后什么也解释不清，只能期待“解密”了。

正是军队的保守立场作为直接因素，使得文革在经过1966年的狂飙后在1967年初出现保守的局面，2、3月份从基层到高层，全国各地军队都表现出强烈的反文革取向：或者是明目张胆地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或者是通过“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使得造反派内部的分歧扩大化导致分裂，从而复活保守派组织。总而言之军队与造反派，至少是与造反

派中的激进派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就是“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

第二节 持久战

到了三、四月份，地方上的造反派对现有体制的批判越来越激烈，在干部及高干子弟的特权和外包工、合同工制度上火力最为集中，对两者的批判一直持续到1967年底；伴随而至的夺权活动也如火如荼。由于担心出现分裂局面，中央事先规定如果造反派未实现联合，那么该省的夺权活动一律不予承认。但即使这样也无法遏制都急于夺权的造反派内部的分裂。总体来说，造反派中的激进派对革委会的权力分配不满意，寻求更激进的政治形式，甚至是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原则，造成造反派在夺权成功后发生分裂。军队支持革委会，因此挤压甚至镇压造反派和当权派，扩展自己的权力，因此对造反派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导致造反派内部矛盾严重激化，始终无法达成妥协，由于内讧而损耗实力；而党政官僚则可以利用革委会投机革命。结果革委会这种看似很好的形式就始终无法稳定局势，反而带来进一步的混乱。尤其是造反派与军队的矛盾愈演愈烈，激进派与保守派和温和派群众组织的矛盾也随之激化，最终引发了蔓延至全国的武斗。由于多数省份造反派都未实现联合，中央对夺权不予承认，在野的各派，包括军队也都有了反击的机会。最终文革运动无法速战速决，反而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在这场痛苦的持久战中，各派都要坚持到对方无法坚持下去为止。这种长时期的高强度和烈度的混乱无疑给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从而为文革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伴随着对二月逆流的反击，造反派开始激烈地批判军队的保守立场。在1967年上半年，造反派与军队进行斗争的事件主要有：

2月13日，广州中山大学“红旗”造反组织、珠江电影制片厂“东方红”造反组织、军体院等1000多人在省中级党校举行“声讨广州军区镇压革命学生誓师大会”。

2月14日，昆明军区军医学校、外语学校、步兵学校、文工团等军队单位造反派与其他群众冲击军区机关。

2月17日，四川大学“8·26”组织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以“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由于邓小平的嫡系“西南王”李井泉在四川的民愤太大，造反派的口号是“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名义，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了“砸烂以韦杰、甘渭汉为首的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誓师大会”。

3月8日，谭厚兰率北师大造反派冲击并占领北京农业展览馆，喊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两天后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等人到场表示支持。

3月14日，首都10万人示威游行，高呼“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和生命包围中央文革”的口号，要求打倒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

4月4日与4月12日，北航“红旗”两度发表“打倒徐向前，炮轰叶剑英、陈毅的严正声明”。成为反击二月逆流的佼佼者。

4月20日，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色工人造反纵队”主办的《红色造反报》第14期发表了“炮轰叶剑英，叫他靠边站”的文章。

5月23日，广西大学“革联”、医学院“闯”等造反派组织及一些中学红卫兵连续两晚冲入广西军区院内张贴“打倒韦国清”、“与拿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等标语。

6月7日至13日，“新北大公社”福州联络站参加了当地学生反对福州军区的绝食行动。

从3月底开始，针对当时形势，中央开始处理一些地方上军队立场的问题，如针对安徽问题，后来被发至全国的《安徽五条》：

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都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止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区军事机关一事，却都看得太严重了。

第三、一个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但是，要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在取缔证据确凿的反动组织时，也要把为首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一般受蒙蔽的群众严格的区别开来。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取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

第四、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取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作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第五、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显然，这里已经一再强调军队对于群众组织应持温和政策，设法调和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实现团结。中央不希望再把事情闹大，但是实际上这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一些地方的军队只对保守派组织温和，对造反派尤其是激进组织就冷酷无情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进行镇压，基层的局面逐渐被军队和保守派组织控制。总而言之，1967年以来中央希望用军队的实力实现团结，而是事实证明这种所谓的团结只能按照军队的枪口所指的方向来实现团结。也就是说，地方上的形势已经发展到了被军队的利益牵着鼻子走的地步。

在2、3月份军队支左干部的行动步调如此一致，当然不排除有他们参与二月逆流的“老上级”“打招呼”的影响，如“2·23”事件中赵永夫与叶剑英的关系，武汉“7·20”事件后炒得沸沸扬扬的陈再道与徐向前的关系。但是根本原因还是军队的一致的利益取向和立场所致。他们既有愿望也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该出手时就出手，想出手时就出手，毫不手软。很快军队控制了基层，**运动大有结束之势。**

鉴于《军委八条》发布后被利用而带来的消极影响，4月6日，中央军委发表了由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新的《军委十条》。它开头就说：“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作得好，有的作得不好。**目前出现了很多问题，应当及时引起严重注意。**”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作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过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这一条为毛泽东本人所加——引者注）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节录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本质，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是原青海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件作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

按以上各条办事。

它对于军队介入文革的程度做了极大的限制，而且，赵永夫这样的事件已经被树立为反面典型了。它对军队行动的严厉批判，可以说比《军委八条》要更前进了一步。很快各地造反派开始纷纷恢复力量，要求平反。但是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经过这么几轮“反抗——镇压”的循环下来，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已经急剧激化，进行妥协难度实在太大；而且这已经不是1966年红卫兵运动时那样，学生之间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社会利益没有直接联系，而是社会上的各个阶层为了争取自身的利益都已经深深地卷入了运动之中不能自拔。造反派趁《军委十条》下达要求平反，他们行动的正义性和舆论上的支持使得他们很快重整旗鼓，而军队对其行动受到限制自然是十分不满。而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各军区由于不能直接镇压取缔造反派，于是就动员支持人民武装部指挥武装民兵来复活保守派组织，对造反派进行镇压活动。《军委十条》下达的结果是军队支持下的武装民兵成为维护保守派和当权派利益的最主要力量，导致武斗在“反击二月逆流”后骤然升级。

1967年4月，中央以释放“联动”分子为条件，要求各省市释放在“二月逆流”中被捕被镇压的造反派。4月12日，为了做各军区的工作，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江青发表了她在文革中最著名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这篇讲话阐述了江青对于文革，对于当时形势的看法，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材料。如果我们“牢记十年浩劫，不忘历史教训，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之类的东西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可是江青本人在批判中根本不出场，又有什么意义呢？由于这篇讲话内容比较庞杂，首先节选她关于干部子女的一段话：

（先引用了一段《战国策·触蓉说赵太后》的故事——引者注）**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伯达同志经常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这个权就不能轻易用。**既然人民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禄也很厚，权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

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这个故事，主席讲了很多次。……

所以，解放军要立新功。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分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

这里再次对干部子女进行了批评，也算是对 1966 年保守派惨痛的暴力事件在原因上做了总结，深挖了干部子女再文革初期飞扬跋扈的深层次的体制因素。倒是非常有意义，这证明文革中并不是江青所有的话都是“胡说八道”“强词夺理”的。值得注意的是，江青引用的毛泽东的评论，尤其是“无产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可能会导致资产阶级复辟”这个论断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释为“特权阶层”，将“资本主义复辟”与“特权”画上了等号。这不仅对后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提出有直接影响，而且它为造反派提供了更强大的理论武器，也成为文革“异端”思潮最主要的理论依据。

其次，我们再节选她关于军队介入文革这个问题的讲话。

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轻易支错。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自己的思想明确，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

我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查研究，支持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我参加过两个小组。像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同志们，对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么自卑感。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就许多单位说，主席早就说过：“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也许我这人自信心太强，我总觉得不会是那样子的。你看，就是农业生产，夏收可能会不错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错。因为革命调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军队这样子大力地去带头，起模范作用，我看这是解放以来，十几年没有过的。进城以后，我们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些隔开了。这次不行了，要从兵营里出来，要从机关里出来，恢复咱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这样，有的地方就说，老八路又来啦。可见，我们当年还是和群众在一块多一点，进城以后就隔离开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最初开始，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这里江青所说的关于“支左”的问题前面已经说得够多，值得注意的一是“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由于军队自认为在“抓革命，促生产”上有功，因此对于中央要求其承认在支左中“犯错误”都持十分抵触的态度。二是最后那句“以林

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算是试图在弥补造反派与军队之间的摇摇欲坠的关系。而她举的“正面典型”又是黄永胜，他算是林彪的老部下了。

解放军虽说比国民党的军队要团结一些，但是也是山头林立，过了 17 年和平生活，跟现实体制，利益沾上关系以后就更是如此。1966 年以林彪为首的军队激进派支持了文革的发动和对党政官僚的批判，可是进入 1967 年地方上发生了那么多军队反对文革，镇压造反派，“拉一派打一派”的事件，而且镇压造反派的事件背后都或多或少地有军队高层中不同“山头”的影子，军队内部的分裂加剧，在地方上军队对于造反派的镇压和导致的武斗确实给了军队中曾经积极支持造反派的力量以很大的压力，对于军队的实际负责人林彪来说就更是如此。这更使得林彪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位上。因此 1967 年林彪对于造反派的态度晦暗未明。而在这里，江青还是表明了对处于动摇状态的军队激进派的拉拢。毕竟，国家基层的暴力机器至少相当一部分还掌握在保守派手里，而造反派作为不掌握国家机器的暴力力量往往手无寸铁，那么军队中可能支持造反派的力量，中央如林彪，地方如黄永胜，还是要与他们保持联盟的。但这已经是造反派和军队关系破裂的前兆了。

由于造反派基层的行动遭遇了如此多的挫折，文革派开始考虑从高层解决问题。于是当基层被“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笼罩时，高层的斗争又激烈了起来。这也就是所谓“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集中批判党政文官尤其是刘少奇来达到“大联合”的目的。1967 年 3 月 16 日，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即震惊全国的“61 人叛徒集团案”。它宣称：“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翻历史旧账的浪潮。“61 人叛徒集团案”将党政文官高层（尤其是华北局一派）几乎一网打尽，宣告了对“白区党”清洗的开始。这次清洗如果是为造反派的行动提供理由的话，那么它也同样是符合军队的利益的。这是以集中火力对“白区党”的大批判来换取军队对文革的支持，以此实现“大联合”的开始。

在把党政文官高层一网打尽后，矛头自然指向了刘少奇本人。1967 年 3 月，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批评，这是对刘少奇的“罪名”定性的蓝本。3 月 29 日，毛泽东批准印发王力、关锋对清华大学 50 天专政情况的调查即《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式公开了 50 天专政的一些细节，引起巨大轰动。打倒刘少奇的直接行动是从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开始的。3 月 30 日，《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著名的煽动打倒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

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以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名义对刘少奇的种种历史表现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革命大批判”的风暴正式开始。此后较著名的还有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宣称：“十七年来，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新闻学等各个领域，在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扶植和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毒素。在关键时刻，这些牛鬼蛇神总要在他们的后台老板鼓动下，纷纷出笼，跳出来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而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基干力量。”它将所有的当权派都说成是刘少奇的“代理人”，实际上也就是把刘少奇当作了现行体制的符号式人物，把造反派对现行体制的不满的怒火都吸引到刘少奇的身上。5月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公开否定了刘少奇的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与此同时，社会上针对刘少奇的行动也开始了，其中最活跃的无疑是清华的蒯大富。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而王光美留下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这就是所谓“智擒王光美”，对王光美在清华犯下的罪行进行批判当然可以理解，但是采取这种方式，只能说这些学生在政治斗争上还是太幼稚了一些。

不过随着中央“大批判”和“反击二月逆流”的展开，红卫兵可以进行名正言顺的行动了。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300人参加陪斗。清华大学连续几个月“三审王光美”，“盛况”空前。

这些针对中央高层的行动都建立在基层造反派的夺权行动遭遇到极大阻力和挫折的基础上。中央希望通过以对党政文官的“大批判”来换取军队对文革的支持，同时避免造反派的持续激进化进一步激化矛盾。但是当对“白区党”的“大批判”也无法改变军队拒绝“支左”甚至指挥民兵挑起武斗这一事实的时候，“揪军内走资派”这个口号就如同幽灵般回荡起来。许多文章详细辨析过“揪军内走资派”至少是在毛泽东的默许之下产生的，毛泽东一开始也没有否定这一主张。但是当然那篇文章根本不去分析当时的客观形势，孤立地只从资料的字面上去死抠什么含义，“深意”，这种事也只有书呆子干得出来。如果考察

到当时社会上军队镇压造反派的情况，至少是中央文革对于军队支左的表现很不满意这一事实，就会发现激进派们提出揪“军内走资派”就是顺理成章了。

虽说文革在一开始就声称“走资派”存在的范围包括军队，但中央是对于军队内部的文革态度十分谨慎，限制也最多。1967年1月22日当中央文革要求军队内部展开“四大”时就遭到了将领们的强烈抵制，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成为后来“二月逆流”的导火索。“反击二月逆流”开始后，军事院校、军事文艺团体和部队大军区以上是允许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单位，很快军委各总部和军兵种也迅速分成了造反、保守两派。4月16日江青接见军内造反派时就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其实真正“严重”的还是在中央。罗瑞卿垮台后成立的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为首的“三军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处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火网之中。李、邱二人尤其狼狈。1967年春夏，保守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艺演出活动，排斥军内造反派组织参加，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后者多次冲击前者的演出，遂被合称为“冲”派。邱会作等人向林彪求救。5月13日，林彪站到前台旗帜鲜明地支持演出，“三军”派声威大震，“冲”派受到压制，吴、李、邱顺利过关，“5·13”成为林彪集团的节日。“三军”派随即把持了掌握军委大权的军委办事组。中央在军队内部文革问题上的谨慎态度使得即使是二月逆流后军队至少在表面上还维持着团结。不过到1967年夏季各军区操纵的武斗升级后林彪也多次说“要把军队中一小撮不好的人揪出来烧掉。”实际上也赞同了造反派提出的“揪军内走资派”。

“揪军内走资派”是针对造反派持续激进化以后在运动中所遇到的空前阻力而出现的。但是问题在于，当时军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力量，而且军队在支工，支农方面表现还让人满意，保证生产领域的人都去闹革命但是经济不会出大问题。也就是说军队已经不仅仅是社会秩序的支持力量，同时也是国民经济运转的重要支柱力量。正是如此重要的地位，使得即使是毛泽东也不得不对军队的要求姑息迁就。如果“揪军内走资派”导致军队分裂的话，那么离真正的“全面内战”也就不远了。任何人都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掌握枪杆子的军队渔翁得利。因此，这个口号无论是对于造反派一派来说，还是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除非发生一场让造反派从基层到高层都无法容忍的事件，否则“揪军内走资派”永远不可能从幕后走向前台。

第三节 “7·20”事件

到了1967年夏天，武汉的局势进入了紧张的状态。

武汉的问题由来已久。武汉在1966年与其他地方一样，也是进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方针，在湖北的“6·11”和“6·20”事件中，省委对学生们进行残酷镇压和迫害。而以干部子女为骨干的武汉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三字兵”进行的打砸抢，乱揪人乱打人的活动使得许多工人、市民怀着“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心理加入了造反派组织。1966年11月，武汉的工人已经开始串联，共同进行运动。此时发生了造反派强抢工作组的整人的“黑材料”的事件。通过“抢黑材料运动”，许多人意识到了工作组以及当权派在50天专政和“揪南下一小撮”（即打击迫害来武汉鼓动造反的北京红卫兵）中所犯下的罪行。1966年11月10日成立的“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头头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1966年12月8日成立的“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总司”，头头吴焱金），1966年12月12日成立的“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简称“9·13”，头头李想玉）是武汉市三大工人造反派组织。此外，1966年10月26日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二司”，头头杨道远、方保林）是武汉学校中主要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此外还有一个规模较小的造反派学生组织“三新”（“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的合称，头头张立国、龙铭鑫）。

造反派首先干的一件大事是批斗中南局第一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967年1月1、2、4日，武汉数十万造反学生、工人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批判斗争王任重，揭发王任重在1966年在“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和“揪南下一小撮”中所犯下的罪行。1967年1月3日至5日，保守派组织“革命职工联合会”（简称“革联”）部分基层组织工人数千，停工赴京告状。他们围堵车站、机场，造反派红卫兵斥之为“保皇派、资反路线新反扑”，并与造反的工人、干部组织一起，激烈批判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三字兵”与保守派群众组织“革联”。5日，“工总”开始与“革联”发生激烈冲突，擅自拘留保守派3000余人，“革联”也密谋用暴力抗争。“工总”还曾派人跑到北京中南海门口请愿。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分歧和斗争，已经十分激烈和白热化了。

在取得对保守派的初步胜利之后，造反派在“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开始策划夺权。1967年1月9日，造反派接管《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权力。1967年1月26日晚，中共湖北省委被造反派宣布夺权。这次夺权虽然由于未实现联合而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但湖北省委的权力架构事实上已分崩离析。

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造反派内部人员地位复杂，很多是出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心理加入造反派的，出一口憋屈了好几年的恶气。这些造反派组织在没有充分地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意识没有深入人心，工人的阶级组织也不够强大和有纪律，而在这种情况下就贸然夺权，不仅会使平民中社会地位较高或组织性不强的一批人反对夺权这种过激方式和平均主义的经济诉求，还会使得由于根本利益受到侵害的党政官僚和军队力量以更加强烈的方式进行反击。而且缺乏组织性的工人在复杂的运动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无法分清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派性问题，甚至内部分裂的情况。

形势在武汉也是如此。“工人总部”以大产业工人为主，对当权派冲击更激烈；而“工造总司”中，小厂工人、小商贩、手工业者较多，立场温和。早在1月26日夺权前，“工人总部”头头胡厚民与“工造总司”头头吴焱金就发生争论。最终，1967年2月8日，武汉“工人总部”、“9·13”、“二司”等12个造反派组织在《长江日报》上联合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目前形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这个声明主要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掌权的重要性，以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勾结保守势力和社会上牛鬼蛇神进行反革命夺权”的危险情况；另一方面对在夺权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和做法的其它某些造反派组织，如“工造总司”，指责为“托派”、“半途出家的投机商”，正式标志武汉造反派的分裂，在造反派内部组织之间引起严重分歧和打内战。导致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又称“钢”派，即支持《二·八声明》的人）和“毒草派”（又称“新”派，即反对《二·八声明》的人）。这一次造反派的内部分裂给湖北文革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不久军队就利用造反派的分裂开始介入，两派之间的分歧愈演愈烈。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宣布“《二·八声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牛鬼蛇神炮制的反革命宣言书”，“拥护或反对《二·八声明》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并公开发出指示：“香花派靠边站！”在工矿、企业、学校剥夺“香花派”群众的听报告、被选举等政治权利。对“香花派”群众大搞人人请罪，个个过关。并以造反派的一些过激行为做把柄，在汉口井冈山大楼搞了所谓“工人总部罪行展览”，在武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搞了所谓“二司地下黑司令部展览”。2月23日，“工造总司”、“三新”等“毒草派”在自己掌握的《湖北日报》上发表声明，支持军区对《二·八声明》的批判，坚决站在军区一方。

当时，军事院校，军队文艺部门是允许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场所。但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却不能容忍军队内部批判意见，再加上他拒绝对当时武汉军区两名高级军官自杀的事件做出解释，2月27日开始，武汉军区对军事院校、文艺团体等军内造反派进

行了镇压。24个军内造反派组织一律解散，逮捕了175名组织成员，宣布行政管制43人，监督检查的2009人，提出警告的更是不计其数，逼迫自杀4人（2人被救未死）、开除军籍1人，上台示众的有1025人。局势开始日趋紧张。

2月28日，陆军第29师师部率4000余人，奉命进驻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2月29日，中央文革派人向“二司”的在京代表说，“《二·八声明》有缺点，有错误，要改正，要停止内战。”“工总”、“9·13”、“二司”等组织同意妥协，立即承认错误，公开检讨，主动停止了历时20天的全市大辩论。

原本造反派已经和解，但是军队却执意要实行“拉一派，打一派”把造反派之间的分歧扩大化。中央由于“二月逆流”而僵持不下的局面为武汉军区的擅自行动提供了可能。在“三月黑风”之中，3月17日，武汉军区及武汉公安机关擅自解散了武汉最早、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把“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并勒令48万工人总部战斗队员“不得改头换面成立其它组织”。十几天之内，逮捕“工人总部”头头朱鸿霞、夏邦银、胡厚民等人。“工总”区分部以上头头485人被捕。

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正式宣布“工总”及其所属组织解散，说“工人总部”有“十大罪状”。学生组织“二司”受到打击更为严重，军队称“‘二司’比‘工人总部’还坏。”并逼“二司”的头头交出《二·八声明》的炮制者。军队还布置各公安分局大肆调查“二司”学生的家庭历史、社会关系，大整黑材料，为镇压学生运动做准备。学生们先后发起了“新公校”（武汉支左火线指挥部）绝食和汉阳公安局绝食，要求释放“工人总部”的战友。还派出大量的学生去各个工厂，帮助工人成立战斗组织，重新组织起来造反。在“香花派”受到打击的时候，曾经被《二·八声明》打击过的“毒草派”表现出了一定的觉悟，“工造总司”和“三新”认为军区无权这样做，这干预了文革运动，违反了《十六条》，把支左变成了支派，要求军区放人，为“工总”平反。陈再道不愿意做工作进行争取，结果“工造总司”和“三新”与军区公开分裂。驳斥“工总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贴遍武汉。于是造反派中的“毒草派”在3月底同样也受到了军区的打压，军区甚至计划解散掉曾反对《二·八声明》的“三新”、“工造总司”等造反派组织。所幸的是，由于4月6日《军委十条》发布，规定军队无权解散群众组织，“工造总司”和“三新”得以保住。他们也以《军委十条》为依据，要求为“工人总部”平反。但是，军队认为“工人总部”是在《军委十条》发布前解散的，因此对“工总”的取缔有效，拒绝执行中央的要求释放在“二月逆流”中被镇压被逮捕的造反派的命令。

在4月份，造反派组织已经明确联合起来将矛头对准了军队，要求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捕的“工总”领导人。在运动中，北京大学学生，首都南下造反大队的李金春表现积极，在公开演说中声称“镇压造反派就是二月逆流的突出表现”，要求“揪出武老谭（武汉的谭震林式的人物——引者注），为‘工总’广大战斗队员平反。”“工造总司”在运动中迅速积累了人气，得到了工人的支持。

而这时，陈再道、军区政委钟汉华前往北京汇报工作。不久武汉军区公开发表军队支左办公室电话传达的所谓《4月19日陈司令与中央文革的谈话》，声称：

“最近，周总理和江青同志接见了我们。总理说，我们解散‘工人总部’做得对，坏人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以后还得注意‘工人总部’一些头头的活动。江青同志说，她受了新一中学生的骗了，绝食不是三万，而是三百人。江青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中央首长指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军委十条发布前解散的‘工总’不应恢复，武汉阶级斗争复杂，坏人很多，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江青同志说武汉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枪的刘邓路线，并向陈再道道歉，‘听信了假情况，闯了大祸。’江青同志又指出武汉的‘国民党渣滓’确实很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的人留在武汉，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

但是，当时参加19日汇报会议的陈再道秘书杨成荣后来证实，“江青同志根本没有讲话，总理的讲话也不是他们讲的那个意思。”

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解放军报》记者通过《情况反映》，连夜将《谈话》报到北京，说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19日会议的有关指示，询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谎言被揭穿。江青对如此“假传圣旨”自然极其恼怒。第二天下午，江青派人把这篇报道送给还在北京的陈再道。江青在这篇《情况反映》上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陈再道、钟汉华看了这个批示，感到震惊。他们忙打电话向武汉军区有关同志查询真相。陈、钟二人不久向江青写了书面报告，解释说是他们在向武汉军区电话传达中央文革指示时出现“工作失误”，一位武汉负责“支左”的同志随即向军队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风”，支左办公室对外公布的。他们还说他们没有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压制武汉造反派的意思。同时表示，这件事没有处理妥善，他们也有责任，接受批评，坚决

改正。由于担心再出现猫腻，4月21日，总政治部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前往陈再道、钟汉华住的京西宾馆，没收了他们4月19日参加汇报时作的记录；同时通知中央文革小组对群众组织的接见已被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自此以后，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中央文革小组一律不予答复。后来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回到武汉后也不得不再向群众组织讲话，否认了19日的谈话。钟汉华还为上司揽责任：“那两条不是江青讲的，是我讲的，电话不是陈司令打的，是我打的。武汉的同志可能听错了，也可能传错了，我们可以向江青同志道歉。”但是仍然坚持“工人总部不能翻案，我们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7·20”事件后，陈、钟承认电话事件是他们打电话说了假话。

但是，文革结束以后，在陈再道的回忆录里又重新讲了“与中央文革的谈话”，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已经是千夫所指的江青。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也听信了陈再道的一面之辞。如果这件事是江青出尔反尔，那么后来连周恩来都敢顶撞的“老粗”陈再道（陈再道是《亮剑》李云龙的原型之一）会那么顺从地向江青道歉吗？

5月1日，“工造总司”、“二司”、“新华工”、“新湖大”等组织联合进行了五一节大游行。这说明造反派在经历了分裂后，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又重新走向联合。

另一方面，军队几个月来对造反派的镇压，再加上造反派在不断的反抗过程中持续激进化，得罪了不少人的利益，使得保守派得以东山再起。武汉开始出现“红武兵”、“三字兵”打人，镇压造反派的暴力事件。而此时在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军队使用了他们最擅长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他们开始组织联合一切有保守倾向的社会群体。5月16日，在武汉军区的支持下，保守派联合体“百万雄师”宣告成立，号称有120万之众，实际约50万人，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它由市委组织部领导，市人民武装部直接指挥，成员有机关干部（尤其是公检法系统的干部，这也是“7·20”事件后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原因）、干部与军人家属、大企业中的复员退伍军人、工厂领导干部、老工人、技术工人、民兵等，由当权派控制的民兵组织“红武兵”是其中主要的行动力量。为保证人手，5月下旬，“百万雄师”还从各单位的组织中抽调近2万人（复员军人优先），组成完全脱产的机动武斗队。队员除工资照发外，每天还有伙食津贴8角，出动攻打造反派时每天发作战费2元。它在中央还未允许“文攻武卫”的时候却拥有民兵长矛、钢盔、烟幕弹、硫酸、消防车、军用卡车，甚至是毒气弹和防毒面具等武器。因此严格来说它不是群众组织，而是一支几乎从未“文斗”过（“7·20”事件前几乎未贴过大字报），当权派和军队支

持的，以镇压造反派为己任的特别行动队。

既然有了民兵组织支持，军队决定对造反派下手。当时对造反派的镇压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中央准备调查武汉文革的局势，要武汉群众组织派代表到北京去谈判。而“百万雄师”的目的则是要在中央谈判之前把造反派的力量扫平。造反派组织不存在了，自然就不可能参加谈判了（河南军区打“二七公社”也是同样的目的），于是6月份武汉地区的武斗急剧升级。6月4日，武汉军区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即《6·4公告》。尽管检讨了某些错误，但是提出“当前社会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工人总部不能恢复，……不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造反派认为军队是在“假检讨，真反扑。”但是“百万雄师”则认为军队还是太软弱，武汉的武斗正式拉开序幕。

6月初“百万雄师”开始以野蛮手段镇压造反派（全国各地保守派和军队对造反派的围剿5、6月份也基本开始），中央发布禁止武斗的《6·6通令》，但效果几乎为零。针对武汉武斗的情况，中央文革来电：“陈再道同志要设法制止武斗”，更毫无效果。很快，汉阳地区的造反派被“百万雄师”武力驱逐干净了，被造反派称为“敌占区”；汉口还有几个孤立的造反派据点，因此被称为“游击区”；武昌称为“解放区”。因为武昌区大学多，“百万雄师”搞武斗的时候还是区别对待的：把工人往死里打，大学生还被看作将来要掌握国家政权的，对于“接班人”打起来还是要温和一点。

6月15日，愤怒不已的武汉“钢二司”（6月时“香花派”的造反派组织都在自己名称前面加了“钢铁革命派”的头衔，即“钢”派）发表《千刀万剐陈再道》。

6月17日，汉口六渡桥发生武汉首次大规模武斗，之后民众乐园、汽车配件厂、汉阳轧钢厂、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均发生大规模武斗，最多只有木棍、石块的造反派远远不是手持长矛，以训练有素的民兵和复员军人为主体的“百万雄师”的对手，死伤惨重。

引起更大轰动的事件发生在6月24日。汉口友谊街的刘少奇纪念馆在文革初期被拨给“工造总司”做了司令部。6月24日6时开始，“百万雄师”叫战，数千人在军用卡车和消防车的支援下包围了“工造总司”司令部，向“工造总司”广播：“（1）放出窝藏的黑‘工总’头头和反革命罪犯”；“（2）将五类份子，牛鬼蛇神抢占的人民群众财产全部交出”；“（3）将抓进去进行酷刑的‘百万雄师’群众放出来”；“（4）将关在里面的卖淫妇女以及被‘工造铁军’抓进去强奸的少女放出来”。实际上，当时司令部内有220人，但“工造总司”成员仅80多人，其余都是被百万雄师迫害，不敢回家的人。“工造总司”广播员朱庆芳针锋

相对地在广播中控诉“百万雄师”，放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10点，“百万雄师”战斗人员缩小包围，向“工造”大楼内抛石头，“工造总司”内也准备了大量石块予以回击。11时，强攻不下，“百万雄师”开汽车撞击“工造”大楼的大门。12时，“工造”大楼后面无线电厂的军代表突然将大楼的后门打开，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战斗人员从后门攻入。造反派就这样被“亲人解放军”出卖了。“百万雄师”围攻的理由是要救人，实际上进去后就开始施展暴力。“工造铁军”队长魏东寡不敌众被逼到楼顶，见大势已去，举着红旗高喊“毛主席万岁！”跳楼自杀。广播员朱庆芳举手投降，也被杀死。在惨绝人寰的“6·24”事件中，“百万雄师”攻克“工造总司”的司令部，当场杀死28人，重伤60多人，杀人者多是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和铁道部江岸车辆厂的复员退伍军人。事后，军队利用军管封锁了全城通讯，但仅有的通讯畅通的武汉气象台里的造反派还是将武斗情况报告给了北京。6月26日，中央文革致电武汉军区，称：“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到了7月份，武汉仍然血案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在“7·20”事件前“百万雄师”在武汉军区和市人民武装部的操纵下挑起大规模武斗17次，杀死工人、学生137人、重伤1000多人。7月10日，武汉军区还召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统一口径，统一思想：“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一时期也成为文革诗歌创作的高峰期。武汉“新华农”的吴克强发表著名的文革诗歌《放开我，妈妈！》，控诉“百万雄师”和陈再道的滔天罪行，这里节选一部分：

放开我，妈妈！你可还记得哥哥和爸爸，

为了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二十年前，爸爸牺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下，

人民政权的奠基石呵，洒满了革命烈士晶莹的血花！

而今天，在两个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哥哥高举工人战斗队的大旗，却惨死在陈再道之流的长矛、匕首下，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的生命迸射出了光辉的火花！

想一想吧，妈妈，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

难道父兄的鲜血能够白流？难道能够让武老谭把革命造反派任意屠杀？

难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要捍卫？难道能让资产阶级重新统治我们的国家？

革命者从来不在困难面前低头；陈再道之流的长矛、匕首和水龙，又怎能使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惧怕！

我走了，妈妈！请您转告隔壁的苏蒙蔽和马大哈，

叫他们别再为陈再道卖命，五元钱的贿赂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叫他们转告“百万雄师”的操纵者，人类的罪犯绝然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刽子手的痉挛，显示出病入膏肓的虚弱；魔鬼的疯狂，只是死神到来前的最后挣扎，

光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革命造反派永远也杀不绝、压不垮！

后来的著名作家白桦（《苦恋》的作者，以一句“你爱你的国家，但你的国家爱你吗？”闻名）当时是右派分子，在武汉曾经写过一本诗集《迎着带血的铁矛散发的传单》，控诉“百万雄师”的暴行，传遍全国。

形势到了这个地步，中央决定直接介入武汉的局势。7月6日至9日，周恩来与毛泽东连续开会，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7月13日，在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毛泽东做出了南下视察的决定，并要去武汉“畅游长江”。由于武汉局势前景不明，大家决定对此次行程，尤其是毛泽东的行程保密。我认为毛泽东南巡的目的在于，武汉的两派尖锐对立，但主要是军队的问题，还没有像安徽、四川那样发展到造反派全面内讧武斗的程度，因此有短时期内解决的可能。如果解决了武汉这个“老大难”问题，那么就可以为解决全国问题提供一个表率。7月14日，周恩来、李作鹏抵达武汉，不久，毛泽东也秘密抵达武汉。当时毛泽东主张保陈再道、韩先楚、许世友等人。第一他们是有功战将，第二这些人本身是老粗，不跟他们计较，第三他们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因此要保他们。不料蒯大富

在得知张春桥告诉他的这一“内部消息”后擅自撤走了北京驻武汉的红卫兵联络站，又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

14日深夜，中央文革的王力、谢富治、余立金一行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接触到造反派学生。见了北京来人，在场群众热泪盈眶，消息迅速传开，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保守派学生组织“红三司”也只好刷出标语表示欢迎。谢、王也顺势公开打出中央代表团的旗号。

7月15日，毛泽东听取汇报，说他要坐镇武汉，解决武汉问题；并提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即要先从部队解决。同日，造反派举行了大游行，打出了“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王、余”的标语。各院校的喇叭播放了《毛主席派人来》等歌曲。中午，武胜路电车公司的“百万雄师”突然冲击游行队伍，双方发生武装冲突。专业武斗队“雷达兵”、“闪电兵”、“霸王鞭”、“翻江龙”、“铁臂摇”等几十车“百万雄师”向造反派发起轮番进攻，致伤工人学生多人，“新华工”的李长亮等伤重致死。双方冲突到下午终止。

7月16日，毛泽东明确“工人总部”要平反，先把几个被军区抓捕的“工总”头头释放，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7月16日到18日，谢富治、王力等人连续与造反派组织谈话。是日，没有发生两派的冲突，汉口“百万雄师”广播站甚至还对游行的学生发出“向革命小将学习”的友好呼声。随着中央文革的调停，武汉局势似乎出现了缓和的可能。

但是难点还是在军队上。7月18日，周恩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要求承认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上的错误，“工人总部”必须平反，释放“工人总部”的领导人，承认“工造总司”、“9·13”、“二司”都是造反派组织。可是陈再道并不知周恩来的讲话正是毛泽东指示的精神，而且毛泽东正在东湖亲自指导处理武汉问题。他十分抵触，不满周的讲话，对其要承认错误表示不服气。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黑材料”送给周，扬言让周自己去调查。最后，陈再道直接冲撞周恩来，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甚至指着周恩来在18日讲话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既然如此，周恩来只好带陈再道、钟汉华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说：“做军队的工作，做‘百万雄师’的工作，责任在上面，在军区。”对陈、钟提出“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打不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毛泽东还讲了文革的特点：“这回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还没有得到利益，士兵就抢。”周恩来也说：“武汉军区在‘支左’

工作中有错误，甚至错误是很严重的。**但是责任在军区领导**，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经过毛泽东的亲自劝说和调停，陈、钟同意释放被拘禁的“工人总部”造反派头头朱鸿霞和胡厚民；并按中央指示精神修改、印刷公告。似乎问题已经解决，随后周恩来返回北京。

但是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18日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在向独立师机关干部传达周总理对武汉运动的指示时，蔡炳臣却还造谣说王力和武汉造反派有亲戚关系，是王力“忽悠”了中央领导。原本就持保守立场，且自认为在“抓革命，促生产”中有功的军队干部们立即群情激奋。在把军队煽动起来以后，蔡、牛要求“你们对外不要提周总理”。本来，由于考虑到毕竟陈再道几个月来已经在群众和军队之间制造了足够多的对立，对支左军官和“百万雄师”的人的还需要做工作，因此周恩来的讲话只传达到团一级，但是经过军队领导的煽动，到7月19日上午，讲话精神已经被传达到基层战士，再由战士、军代表散布给“百万雄师”的群众。原本中央是以调停为目标，对“百万雄师”的态度还算温和，虽然认为“百万雄师”立场保守，但认为责任主要在军区和“百万雄师”的领导层（即人民武装部）。但是在武汉的军官和“百万雄师”的工作还没有做通的情况下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就被泄露，一时确实会让人产生“要把‘百万雄师’的人都打倒”误解。

7月19日凌晨，谢富治、王力在武汉水电学院向造反派发表热情的讲话，造反派又大力宣传讲话，备受关注。7月19日上午，武汉军区召开党委常委会，通过陈再道和钟汉华的检讨，宣布释放朱鸿霞、胡厚民等人。下午3点，武汉军区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请谢富治和王力出面做工作。王力说：“‘工人总部’要彻底翻案，朱鸿霞没有什么错，为什么要打他反革命，把他以前的作品的一些错误搬到现在来。《二·八声明》抓的人要放。‘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你们起了很大作用，才发展到现在这么多。**你们现在要做工作。红卫兵在初期还是积极的。但是他利用了刘少奇的血统论，没有跟上毛主席，成为保守组织。‘红三司’是偏右的。”结果，一些军官怒气冲冲离开会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回到师作战部，大发脾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很快，所谓“王力的四点指示”由军队传达向“百万雄师”，即“军队的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工造总司’

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因为“百万雄师”牵连群体太多，有民兵也有工人，有暴徒也有普通市民，许多工人和军人还担负着“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所以“四点指示”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的强烈愤慨。

总之，王力与毛泽东、周恩来的说法别无二致，责任主要在于军队领导人在基层军官与百万雄师的人的工作还没有做通的情况下就擅自泄露了周恩来和王力的讲话，而且只有一个简单的所谓“四点指示”，既对周、王的讲话断章取义，不解释其具体含义，也不说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意思，把责任都推到了王力一人身上。在当时双方对立极为紧张，对妥协的预期太低的形势下，确实会让人产生王力向党中央、毛主席“进谗言”，要把“百万雄师”都打倒的误解。“百万雄师”作为保守派直接听命于军区，使得他们很容易被军队误导。而一些在武斗中犯下累累罪行的人担心造反派翻身后报复，就更加心虚，可能更倾向于铤而走险。很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29师的战士起来“造反”了。

19日下午4时左右，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报的消防车一起冲向军区大院。他们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凭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军区机关干部的家属子女纷纷支持他们的行动。19时，又有8201部队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富治接见，要求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机关人员：“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牛怀龙、蔡炳臣等人对于军队上街的情况都未予以制止。很快“百万雄师”也开始上街游行，并与造反派发生武斗。

7月20日0点30分，隶属“百万雄师”的公检法干部——武昌公安局14人率先冲击东湖客舍北门（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一号），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在大门内100米处，双方对峙下来。而“百万雄师”按“专揪”统一策划，受命控制宾馆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和北门。一批“百万雄师”成功地从北门冲进宾馆，包围了谢、王的住房，要见谢、王。这时陈再道与谢、王在一起，但却拒绝了去劝阻他“造反”的部下们的请求。尽管王力、谢富治同意接见，还一度说服了一批“百万雄师”的群众，但是很快一批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以武力强行突破阻拦，要“理论理论”，将王力拉上卡车带走。与他们在一起的陈再道也被误打。后来王力虽被救出，但已经挨了军队战士和军官的一顿顿暴打。

7月20日上午，独立师8201部队的战士、“百万雄师”、公检法等机关的干部组织声势

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出动各种车辆 396 辆，其中消防车 27 辆，陆军军车 83 辆，空军军车 15 辆，“百万雄师”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约 10 辆。游行队伍开到湖北大学门口，“百万雄师”冲进学校毒打学生，重伤 3 人，打死 1 人。车上的高音喇叭狂呼口号：“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王力！”、“王力滚出武汉！”“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红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是王力的后台；有人说“不管周 XX 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甚至有人传言：“抓那个来游泳的人。”（毛泽东要来武汉游长江的事只有军区知道）军区支左办公室的门卫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不是好使唤的。”道出了这次事件的实质。

周恩来闻讯后，立即乘飞机赶回武汉，但是汉口机场已经被“百万雄师”封锁。飞机无法着陆，只好改降条件较差的山坡机场。在与毛泽东会面后，决定还是先让毛泽东撤出这个是非之地。7 月 21 日，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武汉。而为了护送王力去机场，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化装成“百万雄师”的人穿过军队的封锁线。此时，北京 3 个步兵师和一支空降部队向武汉集结，停在长江面上的东海舰队的军舰发表《严正声明》，支持造反派，声称“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最终，7 月 23 日，在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下，武汉“7·20”事件终于平息。

7 月 25 日下午，中央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此时地位微妙的林彪一度不愿去，最终还是亲自出席了大会。随后，中共中央把武汉“7·20”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最终结果由周恩来宣布）。陈再道的老上级徐向前被认为是“7·20”事件的总后台，受到批判。全国随即掀起了声讨“7·20”事件的浪潮，陈再道得到了青海赵永夫一般的待遇。7 月 27 日，中央宣布武汉军区“犯有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随着武汉当权派由于“捅了天”而垮掉，“百万雄师”很快宣告解体。随后，武汉独立师被打成“叛军”，“百万雄师”被打成“反动组织”，遭到造反派和军队激进派的激烈报复，牵连 18 万人之多。徐向前、徐海东也作为“黑后台”被打倒。

8 月 1 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正式提出“要把军

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把他们批倒批臭。” 社会趋势急剧激进化。

由于认识到专政机关已经不可能站在造反派一边，8月7日，谢富治提出“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号召。这些曾经血腥镇压群众的专政机关干部遭到了造反派的残酷报复，3.4万人受到了打击迫害，1100多人被迫害致死。8月9日，林彪讲话批评军队领导人镇压群众运动的行径，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完全赞同了“揪军内走资派”和进行全面、激进的社会变革的主张。但是林彪毕竟是军队的实际负责人，因此他提出“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也不希望垮下去。”8月16日，周恩来也指责军队：“他们讲成分、讲党团员，听话的就觉得好。根据这一点，支左常支错了。”很快，王力等人在讲话中言辞激烈地提出要揪出军内“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揪军内走资派”正式从幕后被推向前台。

“7·20”事件至今疑点颇多，争论的焦点就是陈再道是否直接指使了7月20日“兵变”的发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名义上林彪还代表着军队，但是大家已经认识到军队中的多数已经不可能代表造反派的利益。林彪在中央支持军内保守派的“5·13亮相”断绝了造反派对军队激进派的期望，如今“7·20”事件证明了地方上军队多数干部“无可救药”的反文革的取向，在造反派激进的政治诉求下曾经“最革命”的军队成为了保守力量最坚强的后盾。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武装左派，允许造反派组织拥有自己的武装。否则，面对当权派和军队的暴力镇压，不要说夺权的目标完成不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甚至连1966年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会可能失去。现在造反派要求踢开军队武装自己，面对军队的暴力，造反派也需要枪杆子。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造反派的讲话中声称“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正式认可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但它的发明权并不归属于江青。在“7·20”事件前，为了应对“百万雄师”的围剿，一些高校的学生提出了“文攻武守”的口号，在校园里修筑了防备“百万雄师”的防御工事。“7·20”事件和“文攻武卫”标志着造反派与军队的彻底决裂，文革正式由军队压制分化造反派的阶段转向同样掌握了枪杆子的造反派力

量与保守派力量进行武装斗争的阶段，也就是造反派所谓的“国内革命战争”的阶段。

8月4日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了一封毛泽东的信。因为林彪之前给毛泽东写了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毛泽东却回信说，“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夺枪问题并不严重。”8月9日林彪在接见新任的武汉军区领导人曾思玉、刘丰时说：“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还提出：“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表面看来很乱，乱是把反动路线搞乱了，把反动阶级搞乱了，把他们都暴露出来，……**现在党、政府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不乱，反动东西就不能暴露。**”实际上肯定了“天下大乱”，肯定了造反派的“武装斗争”。

这里再说一下对“7·20”事件的评价问题。它是1967年以来由于造反派的持续激进化和中央的保守倾向导致的军队压制造反派的的一个趋势的顶点。当中央坚定地站在造反派一边时，军队不惜以如此极端的方式挽回一切。改开后的评价是“觉悟的群众对文革的抵制”，这有些逻辑混乱，如果按照官方的语境来说，文革就是打倒一切镇压一切，抵制文革肯定是站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外的立场进行反对。可“7·20”事件却是保守派对造反派的残酷镇压，不仅不反对打倒一切镇压一切，相反还以更加血腥残暴的手段镇压甚至屠杀造反派。就像我之前说的，人道主义的立场被滥用，表面上好像要怜悯文革中的一切死难者，实际上它只怜悯可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东西，至于预先被认定是“错误”的，那么对它进行的一切迫害、镇压、屠杀就都是具备合法性的。这又与自己标榜的人道主义相悖。我们以一段著名的对话作为“7·20”事件的结束吧：

原武汉某厂一工人当年是“百万雄师”某区联络站的小头头，曾经风光过几天。如今，工厂早已倒闭，本人下岗失业多年，为生活计，在汉口大街上开了个小卖部倒卖啤酒。一天，一个刑满释放的当年造反派头头杨某某来找他批发啤酒——当然也是为了糊口。二人聊了起来，结果“久仰大名，相见恨晚”。

一个说：“老弟辛苦了！在里面待了几年？”

“不多，整 10 年。”

“现在哪里发财？”

“出来就一身病了，老婆早嫁人了。没有工作，在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点烟和啤酒，凑合着活吧！老兄你们应当不错吧？”

“不错个屁！我们‘百万雄师’的许多老工人都下岗失业了。早知道如此，老子当年绝对不参加‘百万雄师’。现在看来，当年你们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了。如果再搞文革，老子一定跟着你们当造反派。”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文革结束后究竟经历了多大的不满，才会使这位被官方认定为“觉悟”的保守派工人又重新变得“不觉悟”，放弃了自己当年用汗水或鲜血捍卫过的信仰。

以“7·20”事件和“文攻武卫”为标志，全国武斗的序幕拉开了。

第三章 热月¹的降临

第一节 外交部

“揪军内一小撮”成为了“7·20”事件后运动的主要方向，“7·20”事件后，造反派的持续激进化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自然在全国又引发了造反派组织中温和派和激进派新一轮的大分裂，从而是更加激烈的冲突与武斗。激进派一般都在“二月逆流”中吃过苦头，因此积极“揪军内一小撮”，主张彻底变革现有的社会秩序；其中北京红卫兵“4·3”派充分利用江青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理论，矛头直指“特权阶层”；地方上一些异端组织甚至鼓吹发动农民革命武装夺取政权。而军队通过扶植保守派组织来进行镇压活动，如湖北“百万雄师”、河南“十大总部”、广西“联指”、湖南“高司”、四川“产业军”等等，这些“老保”的共同特点是无原则地保军队，而且一般不会文斗，只会武斗。温和派方面，清华大学的周泉缨在《“4·14”思潮必胜》中宣称“造反派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主张恢复文革前的旧秩序，也得到了大批人的响应支持。不仅是温和派，一些在1967年初经历了挫折的造反派也开始有些认同。很快周泉缨被急速捧红，甚至得到了“周老六”的称号

(马、恩、列、斯、毛、周)。尽管后来毛泽东亲自出面否定了这一观点，但是后来周泉纓领导的“4·14”派和“4·14思潮”就成为反对造反派持续激进化的温和派的代称。毛泽东后来把受“4·14”思潮影响的温和造反派称为“犯错误的老造反派”。

而另一方面，造反派持续激进的目标和几个月来的挫折汇合到一起，一些人又开始考虑直接从中央解决问题，因此造反派们对于中央的期望也上了一个台阶，中央文革基本上迎合了这种期望，而在群众的印象里不迎合这一激进要求的人自然也就成为要被革命的对象。

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大形势下，首先被批判的是军队领导人和有军队背景的党政官僚。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文革与军队派系斗争卷到一起而十分复杂。7月25日，总政治部遭到造反派大规模冲击，402人被关押、斗争，其中17人被迫害致死。此后，全国相继发生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揪军内一小撮”达到高潮。连已经基本退出政坛的朱德即一度被批判为“钻进党内的大军阀”，直到毛泽东表示愿意与朱德一起陪斗后，造反派对朱德的批判才逐渐平息。而已经倒台的“死老虎”彭德怀这时就成为了造反派们发泄对于军队的恼恨的主要对象。正是在“7·20”事件前后，即军队与造反派的矛盾急剧激化之时，之前受冲击不大的彭德怀作为“军内走资派”受到残酷批斗。

而对于体制的持续激烈的批判必然也要涉及到这个体制的代表人物，那就是刘少奇。1967年6月30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井冈山”、“前锋”等十几个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搭起帐篷，安营扎寨。宣告成立“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揪刘火线”行动拉开序幕。到7月初，中南海西门、北门，直至故宫北护城河沿岸，连营接寨几十里，搭起7000多个棚子，架起500多个高音喇叭，树起3000多面旗帜，代表700多个造反派组织，除北京的以外，还有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山东、安徽、新疆等省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常住人数在1.5万人以上。7月18日，中南海造反派率先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8月5日，《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开大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随后中南海造反派再次激烈批斗刘、邓、陶。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造反派对刘少奇的批判越来越缺乏理智，即使刘少奇手持《宪法》抗议也无济于事。如果说“揪刘火线”最初是造反派在表达对于50天专政的愤恨和责任追究的话，那么到1967年夏季对刘少奇的暴力行动可以说已经上升为造反派对于现实体制不满的一个集中的发泄。经历过文革前潜藏的不满，50天专政，老红卫兵，军队的残酷镇压，民众尤其是激进派对于现有体制的恼怒和不满已经达到了非常强烈的程度。而刘少奇几乎已被认为是这一体制的符号式人物，而且他对50天专政要负直接责任，因此他也就成了造反派极端地发泄不满和进行打击报复的集中对象。一些人不理解为什么群众会如此怨恨刘少奇，其实只要看一看如

今网上那些要把长住于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位“鞭尸”一类的激进言论，作为不同时期公众眼中一个让人不爽的体制的符号式人物，其得到的评价也不会差太多。既然文革中上山下乡的 1600 多万知青中的许多人会对毛泽东怨恨诅咒至今，那么在 60 年代初在 3 年间被刘少奇以“精简”的名义赶回农村去的 2600 万人中的“返城青年”又岂会无动于衷？

但是最激烈，也最具轰动性的造反活动发生在外交部。运动伊始外交部部长陈毅积极支持文革，周恩来也强调外交部是中央部门，反对把“夺权”行动照搬到外交部。一开始对于外交部的批判还比较务实，主要集中在外交部工作人员的腐化和特权问题上。如：

一、许多外交部副部长独占一幢楼房，各自配备秘书、专车司机、厨师、看守等工作人员，有的还雇佣人服侍，由公家供给地毯、沙发、衣柜、钢丝床、写字台及其他大批家具。

二、据揭露，×××大使从国外回来时带回四十多只箱子，大发横财；××副部长从香港购回一只电冰箱。××大使爱好字画，就以陈设美化使馆为名，不惜巨资购买大量高贵名画，供其欣赏。同时还利用困难时期大使不检查行李的机会，从香港买回面粉若干袋。×××副部长甚至不惜违反中央政策套用法郎外汇，购买洋货。

三、外交部的老爷们长期养尊处优，四体不勤，一出门就要坐小汽车，而且车子还要新式的、西方的才行。还有，国务院规定司局长下班不坐小轿车，而这些老爷们也拒不执行。例如，非洲司副司长××每次下班都要坐小轿车，而且还经常发牢骚，问司机为什么老是开这辆破车。**有一次他乘小汽车到育才小学接孩子，竟不惜耽误去机场迎接外宾这样重大的任务。**

四、这些老爷们的生活十分腐化，每个副部长、大使、司机一年的薪水好几千元，而且各自都有成千上万的存款。在国家困难的时期，人民生活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可他们却可以照样大肆挥霍，他们每月除按规定供给肉、蛋、油、糖、香烟之外，还经常多分机关的生产品，如打来的黄羊，捕来的鱼等等，有时还到钓鱼台、友谊宾馆、国际俱乐部去吃喝玩乐。此外，他们还收到许多外国回来人员赠送的礼品。

五、这些老爷们不仅自己官气十足，享受特权，而且破坏制度，让其家属子女也都跟着

享受特权。真是一人当官，全家享福。例如：有时举行招待外宾的晚会，很多工作同志都没有机会参加，可是我们的部长、司长们却能携带家眷坐在贵宾席上，甚至把保姆也带去。有时还违反规定，把他们的家眷带着参观保密的专案。这些老爷们还以私人关系代替组织关系，滥用职权。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薄一波的夫人曾“指示”干部司要把他的女儿分配到外交部，而干部司也就照办了。后来她又想要女儿到国外“锻炼锻炼”，结果又如愿以偿。×××大使的女儿不愿在公安学校随班下乡劳动锻炼，他就通过非法途径，把女儿硬塞进外交学校，并指使专人为她单独一人开课。外交部豫王坟幼稚园甚至专门安排高级干部子女坐飞机流览北京，让他们去开“眼界”。有的少爷小姐还经常充当代表团的成员随同他们的父母到国内外去游山玩水。又如：×××大使的儿子为了显示自己，竟带着他父亲的手枪到学校里炫耀。此类事情，不胜枚举。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让我们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外交部的这个“特权阶层”砸个稀巴烂！

但是，在经历了 1967 年初军队对造反派的残酷镇压后，重新反弹的造反派掀起了新一轮的持续激进化的浪潮，这一次，夺权成为了他们目标的核心。7 月 15 日，趁着周恩来离开北京去处理武汉事件的时候，北京“一外”（北京外国语学院）、“二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造反派数千人组成“揪陈”大军，举着陈毅的模拟像，一起涌到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他们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揪出，决不收兵。”

8 月 4 日，为了支持 1967 年 5 月香港左派为反抗香港当局的暴行而发动的大游行，首都新闻界举行“支持香港人民抗暴斗争”大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到会。开会期间，戚本禹特意找到在 4 月份雅加达大使馆遭到暴徒劫掠时挺身而出的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政务参赞兼临时代办，“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戚本禹表态说：“陈毅应该下到群众中去接受批判，在外交部对面‘安营扎寨’是革命行动。”应造反派的要求，姚登山第二天就向外交部激进的造反组织“革命造反联络站”传达了戚本禹的讲话，自然讲到“安营扎寨”是革命行动。这在外交部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温和派组织“革命造反总部”（该组织主张批判陈毅但反对打倒）听了姚登山传达后，感到与以往周恩来保护陈毅的指示大相径庭，便上告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等人，指责姚登山煽动群众，造谣生事，

由此而引出了王力著名的“8·7”讲话。

8月7日下午外交部礼堂举行了对陈毅的第一次小型批判会。当晚，“7·20”事件后有些飘飘然的王力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造反战士”以及姚登山等召至钓鱼台，信口开河发表了煽动外交部夺权的“王八七”讲话。

8月5日姚登山同志向全部同志传达了关锋、戚本禹同志和他的谈话。现在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竟有人告诉到我们这里，告到总理、伯达、康老、江青、中央文革小组。这件事证明文化革命搞了一年了，本来是正常的事情，而外交部还有人告状。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很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姚登山同志在印尼造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

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戚本禹同志对“造反总部”来信和传达记录都看了，他说姚登山传达的没有什么出入，是他讲的话，他负责任。

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好像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不要听某些人的话，把外交工作神秘化了！现在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反倒对了？干外交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二十几岁的为什么不能当外交部长？可以当！对那些不革命的，不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管他是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统统打倒！！外交部可以夺权！有人不赞成“打倒刘、邓、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夺权斗争也有半年多了，外交部竟出现这类怪现象，令人深思。……

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揪陈毅的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陈毅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接受检查，就是可以揪！……

团结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得那么严重！

我们看到，王力的讲话实际上已经反映了文革运动在持续激进化后走上的困难道路。让党政官僚接受群众组织的批判监督原本没有问题，但是如今遇到技术性极强的工作，就很难把“监督”和实际中复杂的事务操作区别开来。这里文革激进派在对待技术部门问题上的肤浅性可见一斑。它偏离了造反派对外交部的批判矛头主要是集中在对待工作人员的官僚作风和官员特权待遇这个方向，而是希望以最激进也最脱离实际的夺权行动来解决问题。如果说 1966 年到 1967 年初造反派的要求还比较务实的话，那么到了 1967 年中，也就是“7·20”事件后造反派新一轮的持续激进化浪潮之后，他们就已经走得太远了，可以说已经露出了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苗头，更不用说地方上极左派“异端”们的主张。

第一次批斗陈毅大会由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二外“首都红卫兵团”发起，于 8 月 11 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参加大会的造反派组织有一万余人。周恩来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指示。在批斗大会上，陈毅和陪斗的姬鹏飞坐在所谓“被告席”上。大会进行中，陈毅曾一度到后台休息，在与会者的要求下，又回到“被告席”上。大会主席团主席宋远利、对外文委 7 个组织、驻外使领馆“9·9 战斗兵团”、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联名代表发表了一篇极长的控诉陈毅的文章，讲述的同样是外交部官员的奢侈腐化的行为，对待工作人员的官僚作风、老爷态度，各种不正常的特权等等。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造反派对外交部的冲击变本加厉。8 月 19 日造反派直接冲击，“砸烂”外交部，“查封”外交部大印，然后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领导权。紧接着，造反派又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被造反派押至王府井沿街叫卖造反小报《批陈战报》。他们还被关进外交部地下室写“检讨”，晚上放出来向造反派“汇报”。造反派的行动激进地已经逐渐失控，随着事件进一步升级，终于引发了 8 月 23 日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闹剧。

8 月 20 日中国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声明：“**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必须在 48 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 19 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 34 名工作人员。**”原本中方的要求十分合理，而群众参与到声援香港左翼民主运动的活动中也无可指责，但是在此时激进的造反派却通过极端的方式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制造了一起国际事件。22 日上午，由北京外语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机床厂等 10 余所大专院校及其他单位造反派联合成立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口举行万人声讨大会。周恩来得到报告，紧急召见造反派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

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造反派负责人保证不进入英国代办处的允诺后才离去。在中国外交部“最后通牒”照会规定的时间过后，围攻英国代办处的近万人情绪激动，置国际关系准则于不顾，对警卫战士的再三劝阻置若罔闻，强行冲进代办处，放火烧毁办公楼和汽车，围攻殴打英国代办人员，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

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前，北京还发生了群众冲砸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三国驻华机构的破坏行动，以及午门反缅集会、围困苏联驻华使馆等涉外事件。这“三砸一烧”使中国的国际声誉受到从未有过的巨大损害，在世界各国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不久，周恩来在讲话中将这一系列恶性事件定性为“无政府主义”，“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要求总参谋长杨成武立即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

8月25日，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终于表态：“……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后来又说，“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但要狠狠批，要批透，不然的话，就争取不了，分化不了，怎么处理，也由总理决定。”毛泽东还在王力“8·7”讲话稿上批了5个字：“大、大、大毒草！”周恩来随即起草报告，对王力、关锋二人实行隔离审查，对戚本禹则探其表现再作处理。毛泽东很快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8月30日，王力和关锋在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旋被投入秦城监狱。

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造反派时正式否定了“揪军内走资派”。9月24日，王海容等人撰写了题为《王八七讲话是一株大毒草》的大字报，根据毛泽东的授意，公开点了王、关、戚的名，并引用了唐代诗人罗隐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张大字报于9月27日贴出，立即轰动了整个外交部。王力、关锋从此销声匿迹。而陈毅在9、10月间相继出现在各种重要场合。9月30日晚间，陈毅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庆18周年招待会。10月1日上午，陈毅以及其他挨整的“二月逆流”的老师们（谭震林除外）随同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原本希望保住戚本禹，但是各地军队干部不会原谅他“揪军内走资派”的行为，他们整了无穷多的“罪证和材料”，要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必须毫不手软地把戚本禹弄下去。最终毛泽东妥协，1968年初戚本禹被隔离审查。中央文革的“三把尖刀”王、关、戚至此全军覆没。

从“7·20”事件到9月份王力、关锋、戚本禹倒台，造反派一度又占据了优势，但是

其过度激进的要求已经出现了偏离大多数人民群众政治诉求的倾向，甚至一度达到了无政府主义。毕竟，在全国局面已经混乱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希望军队再出现分裂和混乱。否则，经济生产没有人维持，社会秩序也永远无法稳定了。结果，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中央文革的“三把尖刀”成了替罪羊。尤其是对王力的严厉处理和对陈再道的相对“宽大”，也反映了毛泽东在处理“7·20”事件中表现出和处理“二月逆流”事件中同样的谨慎甚至保守的态度。毛泽东不希望军队出事，这是他的底线，而军队正是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利用这个底线而肆无忌惮地行动，一次次将运动往保守的方向拉，向有利于军队利益的方向拉。无论是二月逆流，“7·20”事件还是后来1968年对造反派的镇压，都是如此。

虽然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已经越走越窄，但现在参与文革的各派社会力量都已经陷入持久战的泥潭里不能自拔，他们中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一个强大到足够支撑起整个社会秩序的利益集团。因此，要结束蔓延到全国的武斗，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二节 武斗

在江青发表“文攻武卫”后，迫于巨大压力的解放军开始允许造反派组织“搜集”旧武器，但这并不能阻止一些解放军将更新的武器发给保守派组织，在全国制造更大的流血事件，如四川、江西的军分区，人民武装部直接把枪支发给它支持的那一派组织。而由于有了枪杆子，各地的造反派内部的分裂也愈演愈烈。

1967年8月份开始各地的武斗达到了高潮。其中以重庆是造反派内讧式武斗的最高峰。到1967年，重庆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8·15”派和“反到底”派。前者为温和派，后者为激进派。1967年7月7日，重庆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9人，伤200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了枪弹，后来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军队也分裂参与到武斗中，其中54军对“8·15”派的支持最给力。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和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和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1967年7月31日——8月6日，荣昌县两派共700人左右参加武斗，死亡78人。同年8月8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用3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重创12艘。同日，武斗队又将坦克开出，经沙坪坝到市中心解放碑示威。8月13日，两派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临近建筑被焚毁。8月18日，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8月28日，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武斗，双方死

亡 40 人。杨家坪街道被焚毁近半，双方死亡 100 人。1967 年的 7 月、8 月、9 月间，山城重庆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从 1967 年夏——1968 年夏，分别属于两派的重庆造反派组织共发生武斗 31 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艇等军械兵器 24 次，各种原因死亡 645 人。死者中年龄最大的为 60 岁，年龄最小的为 14 岁。后来 54 军被中央强行调离重庆，武斗最终在政府和军方的压力下停止，两派头目随后都被判处无期徒刑。重庆武斗期间，有不下 20 处地方埋葬着死难者。正式的“红卫兵公墓”有 3 处。它们都是由造反派们建设的“烈士墓地”。重庆市沙坪公园内现保存有全国唯一的武斗公墓。

而广西则是造反派与保守派斗争的顶峰，武斗规模是全国之最。1967 年 3 月 30 日晚，为反击二月逆流，“广西一司”、“广西 8·31”、“井冈山”、“东方红”等共 16 个造反派组织共 400 多人，在南宁举行“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游行，两次到区党委大院示威，与机关一些群众组织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4 月 23 日，“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广西 8·31”等组织 400 多人，冲击南宁一中红代会成立大会会场，双方发生武斗。5 月 25 日，保守派“5·25 指挥部”数百人冲进《广西日报》社，与冲击报社的另一派“4·22”进行辩论，要求其撤离。双方最后以石块、木棒为武器，展开激烈的战斗。到晚上 8 点以后，双方前来支援者达五、六千人。直到第二天凌晨武斗才停息。在此期间，广西军区派出 7 辆宣传车，呼吁双方停止武斗，但无人理睬，最后双方只能派出救护车抢救伤员。5 月 26 日，这两派又发生大规模武斗。从上午 7 点一直打到下午 4 点，双方各有百余人受伤。5 月 30 日凌晨，因为支持“4·22”派的领导人给中央文革发电报，指责对立面是“党政军一小撮走资派”而导致武斗再起。直接起因是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的《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发表在《广西日报》上）。在 5 点 30 分左右，“5·25 指挥部”调集队伍，对《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大规模武斗再度爆发。

1967 年中，广西正式分裂为要求打倒韦国清（区委第一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的造反派“4·22”和死保韦国清的保守派“联指”。“4·22”在大城市占优势，“联指”在小县城和农村占优势。6 月 13 日在南宁一中，因广西大学“4·22”派的“革联”组织进驻一中，说是要指导“兵训”，遭到一中“联指”派的“红卫兵团”反对。过后，一中“4·22”派的“指点江山”被“红卫兵团”300 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结果，“4·22”派的支援部队“工总”和部分学生、群众 500 多人赶来，很快，“4·22”组织数百人推倒学校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组织人员也前来声援，双方互扔石头、砖块如雨。之后，又有双方后援者不断赶来参加武斗。这场武斗持续了 3 天，直接经济损失 5 万多元，双方伤 200 多人，其中重伤住院者 100 多人，这只是

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6月15日，“4·22”组织与永宁公安局干警发生武斗。打死2人，打伤14人，其中重伤8人。所有户口簿和档案文件被付之一炬。同一天，南宁郊区“联指”决定组织农民进城支持，围攻“4·22”派据点“航运工总”、文艺体校。在“联指”的指挥下，“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保守组织与郊区农民共600多人，围攻“工总”一码头，后围攻者达2000多人，造成重大伤亡。在此前后，“联指”组织1000多人连续数天攻打《广西日报》社，未克。6月24日，清晨。“联指”调动工人、农民攻打“4·22”、“火种”总部大楼。当晚攻克。现场上，用钢叉叉死1人，6名“4·22”骨干分子被关押，遭到毒打，许多物资被抢走，有一名进攻者被汽枪击瞎一只眼睛。6月25日，下午5时，“联指”组织人员，包围文化大院，用推土机推倒围墙，展开强攻，到7时左右攻进京剧团、桂剧团和木偶剧团。有20多名被围攻者负伤，第二天继续攻入文联大楼，“4·22”600多人全被活捉，其中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和毒打，许多财物被盗。

7月12日，北海市发生武斗。双方用石块、木棍对打，连打两天，共有100多人受伤，其中重伤30多人。8月4日，南宁“联指”调动近万名武装人员，攻击《广西日报》社文化大院、区展览馆等“4·22”据点，遭到猛烈反击。武斗中使用钢叉、高压水管、硫酸、推土机，双方伤亡惨重。8月21日，南宁“联指”攻打东方红医院等“4·22”派据点，结果，联指死1人，“4·22”死9人。8月23日，“4·22”武力封锁南宁邕江大桥，“联指”组织就出动三四百人，到晚上11点，密集的枪声仍然响彻夜空。11月29日，柳州市发生武斗。12月22日，区交通厅、水电厅发生武斗。12月24日，钦州市两派群众互相开火。

1968年1月下旬，出现广西全区性大规模武斗的局面，武斗双方破坏铁路交通，抢夺军队武器甚至抢夺抗美援朝的军火物资。2月15日，凤山县、柳江县发生武斗。4月1日，梧州市发生武斗。双方开枪开炮，部队前去制止，被打伤7人。4月30日，部队和民兵奉命围剿广西“农总”宁明上石分部。5月1日攻克，俘虏40人。由于广西武斗旷日持久，急于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中央终于改变了对“4·22”的支持态度，将支持“4·22”的55军调离广西。形势对造反派愈发不利。

5月3日，阻止抢夺武器的3936部队一营军车被“联指”所属组织开枪扫射，打死5人，打伤31人。5月20日，“4·22”与“联指”下属组织再次武装冲突，打死2人，炸死3人。5月25日，解放军被造反大军包围后，发生冲突，打死2人，伤20多人，夺走枪支700多条。这场武斗又演化成对立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另一场武斗，一直延续到5月30日。6月3日，桂林市武斗升级，连续夺枪。武宣县、上林县两派武斗也极其严重。6月19日，南宁再次发生武斗，死62人，全部沉尸开邕江。6月23日，“联指”在攻打“4·22”码头

时，请求炮火支持，结果，炮轰到第二天下午 3 点多钟，40 多艘船只被击中，起火燃烧。7 月 3 日中央发布禁止广西武斗的布告，将抢枪定性为反革命行为。于是韦国清指挥广西军区明目张胆地协助“联指”展开了对“4·22”的杀戮。现在形成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联指”调动几个县甚至是十几个县的农村民兵围攻“4·22”控制的城市，由于“联指”的民兵肆无忌惮的屠杀政策，城市市民也加入到帮助“4·22”守城的队伍中，形成一场场惨烈的攻城战和巷战。南宁武斗延续到 8 月 5 日结束。各座城市的“4·22”也相继被歼灭，仅桂林“老多”因有 141 师的支持而坚持下来。据不完全统计，仅南宁“4·22”就被打死 1340 人，被俘 6445 人，另有 2500 多名居民被抓捕，后来这批俘虏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 26 人。市中心 33 条街巷被炮火击中，成为一片废墟。再加上攻击者的伤亡，南宁武斗总共死亡人数达 1470 人，被俘者达 8445 人。烧毁房屋 2820 间，面积达 46 万平方米。致使 50000 多名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达 6000 万元以上。

在传统叙述中，由于原因早有定论，因此对文革中的武斗均采取不解释原因的态度。如今，要想真正分析和吸取文革的教训，我们必须对武斗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已经分析过了由于造反派的持续激进化导致社会上出现了激进派和温和派两大群众组织的分野，当然还有复活的保守派。但是这并非群众组织的分裂唯一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军队的因素。在 1967 年初军队对造反派的血腥镇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利用甚至直接武装保守派或温和派组织，这就使得他们和激进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持续激化。“7·20”事件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两派仇恨太深，大家对于调和的期望值太低，才会导致保守派在军队的操纵下之中反应过度。武斗的事实表明，文革的激进化目标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所能容纳的程度，也就是说，由于它的目标在 1967 年后已经超出了社会利益结构进行变革的可能性，当它的目标越激进，激进地超出了一定的范围之后，那么它所能代表利益的社会成员就越来越少，反对它的力量就越来越多。由于并不是极少的一批人，而是相当多的人现在是运动所批判目标的受益者，那么，文革就无法通过打倒“一小撮”走资派来完成，只能通过群众的大分裂来呈现。毛泽东后来说“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在 1966 年底却不是这样的状况，那个时候可是人心所向。可以说是 1967 年持续激进化的政治诉求导致其批判深度、动员强度大大超出了社会生产力所能容纳的范围，它越来越激进的诉求使得其越来越偏向社会的最底层，而社会发展的水平却不足以使这一底层形成足够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甚至不足以维持住社会秩序，结果导致局势失控，全国武斗的局面给国家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这场运动就由追求民主逐渐沾染上了民粹的色彩，支持的人越来越少，反对的人

越来越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最终导致了文革的失败。

文革中两派斗争之所以如此激烈，归纳起来，一是要保卫自己的利益，二是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从而造成愈来愈严重的派性斗争。前一个因素是事情的本质，它决定了矛盾难以调和。后一个因素是事情的量，它使矛盾斗争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运动中各派力量的博弈和互相利用使得力量对比此起彼伏，尤其是军队的保守立场，各派之间矛盾也就被挑动得越来越激烈。最终，当这种持续激进化的方案进入死胡同的时候，“7·20”这个偶然的事件又导致了造反派的自我武装，从和平反抗与镇压的循环变为双方之间的武装冲突，使得矛盾进一步升级。而当武装冲突也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文革也就进入了真正的死胡同。总而言之，由于造反派组织性不强以及军队故意挑动导致的派性问题，将不同层次的矛盾混淆，导致持续的内讧和内战。这种派性还与传统的社会矛盾相融合，如官场派系斗争，“四类分子”的政治歧视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偏远地区的农村的传统械斗等等，导致全国矛盾大爆发，进一步加剧了混乱的局面。

有人否认文革两派有社会基础，片面强调两派观点表面上的一致，如两派都造刘少奇、邓小平和各省市当权派的反(个别“联动”分子公开造中央文革的反除外)；两派又都宣称“誓死保卫毛主席”(个别“联动”分子公开拥刘反毛除外)。但是，保守派的利益诉求往往跟原有社会秩序一致，而“造反派”的利益诉求则有悖于原有社会秩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正是有了这个“一致”和“有悖”，我们才不能把文革中的两派之争，尤其是1967年7、8月前的斗争一概斥为“春秋无义战”。

但是随着8月份一些造反派的激进举动将中国险些拖到无政府的边缘，那么一场大家手里都有枪，付出了使造反派付出了惨重代价的武斗也不会有任何有益的效果，更不用说造反派内部严重的内讧和派性斗争给社会所带来的破坏。而此时军队也就成为了使社会趋势转向保守的最强大的动力。在1967年末的形势下，鉴于社会力量对比悬殊造反派已经不可能取得胜利，把已经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趋势往回拉一下似乎并没有错，但是军队的人只要手握枪杆坐在台上就可以按照他们的利益，把社会力量对比拉回到1967年初，拉回到1966年，甚至拉回到1966年前。造成社会力量对比的持续倒退。实际上，如果要追究社会主义力量内部的分裂和内讧的原因，造反派的持续激进化和文革领导层的决策失误可以说是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67年7月到9月，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表了一系列谈话。毛泽东认为：“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不过鉴于形势有失控的危险，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

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 “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对于干部问题，毛泽东认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 “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 “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在此之后，中央开始对运动加大限制。9月5日，江青讲话正式宣布否定“揪军内一小撮”，对“文攻武卫”加以限制。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军队受命恢复秩序。1967年10月1日，参加“二月逆流”的军队领导人被请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典礼，似乎是表明了军队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10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校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学校复课，对红卫兵运动进行了更加严格的限制。

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又重提1966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革命，又提出要大办“学习班”，使全国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意味着运动的目标退回了1966年8月以前的意识形态革命领域，显然官方已经对1967年以来冒进的局势有所反思。

10月7日，毛泽东在视察中指示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时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虽然这一指示很精辟地指出了文革所暴露的社会矛盾，但是现在的重点已经是“吸取教训”，解决干群关系，而不是建立新的体制了。这意味着文革的目标已经从“革命”下降为“整风”，即以改造党为目标。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提出“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所谓叛徒、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再过组织生活”。毛泽东在文件中加了一段话，“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即“五十字建党方针”。11月5日毛泽东又做了一个新批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正式确立了文革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建党方针。12月2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意见和问题》，实际上是确定将整党作为文革的主要目标。放到历史条件下来看，毛泽东所论述很好地发展了列宁主义关于党的组织的思想，尤其是在党掌握政权之后如何保证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确实成分复杂，他们究竟是不是都能够成为先锋队的成员还有待检验。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一批示标志着它对文革的定性与最初许诺的目标相比出现了偏差。最初文革是要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制度，至少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是一次对国家经济政治体制进行变革的“社会革命”，是要彻底超越苏联模式建立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但是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伴随而来的把造反派大量吸纳进党内的“突击入党”，实际上也就是把体制外的革命性因素全部吸入体制内，实际上无助于改变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关系问题，即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问题。而把“整党”当作了文革的目标，也就是用体制外因素去推动体制内因素的变革。这样对文革的定性就与文革前的政治运动并没有什么区别，降低了文革特殊的意义，可以说是对文革初期许诺的社会变革的一种放弃。

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

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说，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如果仅仅从理论上讲这个总结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问题在于，官方给文革进行理论上的总结，“总结经验”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暗示着文革可能会迎来自己的终点。总而言之，造反派的持续激进化已经超出了社会可能的承受程度，对此军队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烈的反文革取向。在 1967 年下半年否定了“揪军内走资派”，并视察了全国各地文革的局势后，毛泽东认识到，如果继续进行一场建立在群众首创精神基础上的文化大革命，势必要冒使全国陷于大规模的内战的风险。“7·20”事件的经历更强化了他的这一看法。而现实是 1967 年结束时全国 29 个省只有 9 个成立了革委会！而且这种全民动员式的政治风暴已经给人民的正常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并导致经济的大幅滑坡。多数人对已经缺乏意义的无休止的斗争感到厌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最终毛泽东选择了秩序，也就是选择了结束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热月”即将来临。

本卷参考资料：

《毛泽东思想万岁》（5卷本）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 编 1968年版

《文革资料汇集》（约75万字） 网络文集 春秋中文社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约1600万字） 水陆洲 整理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约3000万字） 宋永毅 主编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

中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人民大学编辑小组 编 1969年版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高皋、严家其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文化大革命简史》 席宣、金春明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版

《大动乱的年代》 王年一 著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电子版） 辛子陵 著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1966——1982》（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

《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册） 逢先知 金冲及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美）莫里斯·迈斯纳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人民文革丛书》1——4卷（电子版） 刘国凯 著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 吴焱金 著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09年版

《悲欣交集话文革》 曹承义 著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08年版

《不再沉默》 武彩霞 著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0年版

《陈再道回忆录》 陈再道 著 解放军出版社 2009年版

《毛泽东最后十年》 陈长江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9年版

《青海二·二三事件》 网络文章 作者：孙言诚

《趁机造反》 网络文章 作者：郑义

《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 网络文章 作者：老田

《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几个重要文献》 网络文章 作者：老田

《回顾文革的认识论价值》 网络文章 作者：老田

《文革“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 网络文章

《王力“八七”讲话与外交部“夺权”闹剧》 网络文章 作者：宗道一

第五卷 革命终结

第一章 异端思潮

第一节 文革初期的“异端”

如果用“异端”这个词来形容文革中与官方发生冲突的思想观点会引起严重的混乱。因为文革决策层总体来说处于一种“中间非常偏左”的位置上。他们与社会上的保守思潮会发生冲突，但是与更加激进的“极左”关系也不那么融洽。而且问题还不那么简单，比较难办的是那些直接向文革决策层本身提出质疑的观点了。现在当然可以把中央文革对它们的镇压轻率地否定掉，但是要判断这些观点是左派还是右派就比较困难一些。而更困难的是，文革在不同时间段还会有不同的斗争形势，时间背景又会对异端思潮和中央文革的决策产生巨大影响。总之文革中的“异端思潮”绝对不可一概而论，而应该具体分析。

一些学者认为文革中存在所谓“右派异端”，最典型的即血统论和“联动”思想，但这是值得怀疑的。事实证明血统论这样的思潮是保守派用来维护自己地位的武器，也就是维护前17年的体制。尽管官方已经进行了大力气的清算，但它深厚的既得利益联系和文化基础使得它像一个幽灵一样伴随文革的始终。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它永远是攻击对方，尤其是保守派攻击造反派的好武器。如之前所说的，在青海事件中夺权的造反派“8·18”迫于保守派压力清除了几个出身不好的成员，结果削弱了自己的力量，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可见血统论对造反派的危害。血统论本身就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是“文化革命”要批判，要打倒的对象，因此不能算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异端”。**严格意义上的异端思潮，应该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产生的激进思潮，它们或者是触犯了文革决策层自身的利益，或是危及到了政权的合法性，而受到中央的镇压。**最重要的一点是，文革本质上是统治者发动的一场革命，这决定了文革派最终会从激进的，甚至可能颠覆政权的政治革命的立场上退下来。这一“退却”是高层文革派与基层造反派分歧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到了1968年，中央日益满足于“三结合”“整党建党”和“斗私批修”，而比这更激进的主张，如反对特权阶层，武装斗争，或彻底的政治变革（如建立“公社”）——即使他们在1966、67年曾得到中央支持——自然会被视作“异端”。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异端派实际上就是文革中的（不是改开语境中的）“极左派”。

但是富有戏剧性的是，即使这样定义，开启文革异端思潮的正是保守派。尽管血统论并不能算作“异端”，但是“联动”的所有观点并不能一概而论。由于血统论被批倒批臭，“联动”抛弃了毛泽东这个偶像宣布“忠于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后对毛泽东思想的界定恰好与“联动”的观点一致）。更重要的是，他们采取了“形左实右”的方式，利用“怀疑一切”的思潮从“造反”或“大民主”的角度来攻击中央文革，质疑文革的合法性，结果客观上给了真正的极左派们以极大的启发。

在1966年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一些老红卫兵激烈攻击中央文革和林彪，如伊林·涤西等人对林彪的批判，甚至质疑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态度。在1966年11月27日，北京林学院学生李洪山贴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标语，在辩论中，他同意谭力夫的观点，认为谭力夫“基本上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批判谭力夫的讲话是群众斗群众。批判谭力夫更是群众斗群众。”并质疑中央文革的合法性，说“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文革的领导机构却没有经过群众选举”，认为学生组织分裂也是中央文革的责任。一些学生群起响应，接连出现了批判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的大字报，指责陈伯达批判血统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是“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极力支持谭力夫和“血统论”对联，甚至把标语贴到了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12月4日，支持中央文革的“红三司”贴出标语进行反。12月14日，康生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李洪山就是反革命小头目。”“攻击林总是否叫群众？凡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就是反革命，他们不是群众，是群众的敌人，是他们与群众做斗争，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17日，李洪山被公安机关逮捕，次日谭力夫被捕。它的最后结果就是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条》的发布。它声称：“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于是，文革中最著名，也是后来被控诉得最多的文革罪名——“现行反革命”的适用范围被扩大了。无数讲文革的段子或故事，说某人不小心做了什么事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来表达文革的恐怖与荒唐的，都是出自这个《公安六条》。

这一次镇压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尽管李洪山和谭力夫关系密切，但他提出的观点却是值得玩味的。他在保守派红卫兵即将倒台的时候用了非常致命的一招进行还击。因为他提出

的刚好是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文革最显著的标志本身就不符合文革的“大民主”，不符合《十六条》中“文化革命小组.....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文化革命小组.....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的要求。这确实是对造反派进行反击的极好的理由。他通过指出中央文革小组本身就不符合大民主，不符合《十六条》这一条点进行攻击，迫使中央文革亮明原本就不好意思亮明的底线，使其说出肯定会被抓住把柄加以利用的话，不能不说是极好的策略。因此不能因为李洪山代表保守派就否定他的观点的意义。事实上他指出了文革最大的软肋，那就是这场反对官僚包办替代主义的运动的中枢机构本身就是包办替代主义的。造反派的领导机构不是由造反派拥戴出来的，而是由上面指定的。因此，文革中高层与基层造反派的互动是脆弱的，不稳定的，一旦形势变化就会出现崩溃的危险。李洪山指出了这个软肋，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对此的反应也最敏感。我之前已经说过了造反派很大程度上是在借用毛泽东的旗帜，利用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来获得经济政治体制变革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合法性，一题多作的情况比比皆是。但是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文革决策层和文革造反派之间并不是一个阶级和其阶级代表的关系，而是类似于一种联盟关系。**双方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和规划，因此在政治变革中会形成基层和高层的互动。但是如果当毛泽东或中央文革认为造反派的激进程度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底线，或危及自己地位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把运动往后拉。但是往后拉是要借助社会力量的，这股力量就是保守势力。结果保守势力所占据的优势又会使得社会趋势保守得超出了毛泽东或中央文革的忍耐程度，又会去支持造反派力量去变革体制。也就是说，文革造反派作为体制外的社会利益阶层与其在体制内的政治盟友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是建立在非常脆弱的基础上的。毛泽东当然会希望造反派能够拥有自己真正的阶级代表，但是造反派的持续激进化又与他的“中间偏左”的立场相冲突，毛泽东不可能允许一场真正的政治革命，因此毛泽东一次次在造反派走向激进时转向保守，而毛泽东每次做出转变态度的决策都有社会利益阶层在执行，在拉动。毛泽东的每一次转向保守行动，在避免造反派陷入空想主义的同时都会给造反派带来内讧和损失，正是这种基层与高层之间薄弱的联系再加上保守派的主观能动性，使得毛泽东一次次“纠偏”都会使得造反派一次次被削弱，而离文革的目标也就又远了一步。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评论的：

“逆文化大革命的势头而去反对频频出现的‘极左’现象，却变成了一种长期的清洗，这一清洗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初领导人都被赶下政治舞台为止。因为每当毛泽东向右的方向，或至少往中间那一挪，他的大多数信徒就会发现自己太左了。在某种意义

上说，对极左分子不断清洗最终将清洗到毛泽东本人身上，尽管直到他去世几年之后才开始这样做。”

前面详细讲过公社和革委会之争。但是造反派基层与高层的分歧远远不止于此。尤其当基层造反派由于高层对他们的支持力度不足甚至是反对其激进主张，而将批评的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时，高层与基层关系的脆弱就体现了出来，导致的左派之间的内讧就会大大损耗支持文革的力量，把社会趋势拉向保守。从公社革委会之争到四人帮垮台都一直是如此。比如《公安六条》最初是用来对付“联动”由于特权丧失而走向极端化的保守派红卫兵的，但是李洪山抓住了造反派的软肋逼得中央文革发出更极端的表态，结果后来《公安六条》就给了地方镇压激进的、“极左的”造反派的最好理由，给了保守派和军队清洗造反派的最好武器，也给了后世控诉和嘲笑文革以最好的素材。

在造反派持续激进化的背景下，1967年5月间，北京高校出现了一个名为“5·16兵团”的组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张光武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贴出《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声称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6月2日，正式成立的“北京钢铁学院5·16兵团”再次发出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给周恩来的一封信》和《二十三个为什么？》。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6·16兵团”与钢院“5·16兵团”合并，“首都红卫兵5·16兵团”正式成立。在后来“反击二月逆流”，外交部夺权等一系列事件中，“5·16兵团”不断发表攻击周恩来的言论。7月11日《首都5·16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中声称：“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周恩来此时至少还与造反派保持着一定的合作关系，因此攻击周恩来的思潮是主流造反派所无法容忍的。半官方的首都学生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宣布“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6月3日，陈伯达、江青亲自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讲话，宣布“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但是“5·16兵团”的活动一

直持续到7月份，言辞越来越激烈，而中央的反击和定性也就不断升级。8月26日，北京造反派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5·16黑匪兵团’”大会，批斗了其领导人张建旗等人。9月份，江青、康生、陈伯达相继讲话批判“5·16兵团”。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时发表了著名的“9·5讲话”。首先她强调了对武斗的限制，并点名批判了“5·16兵团”：

同志们！我不是提倡武斗，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的。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是指那种情况。**现在不需要那样的武斗，**武斗总是要伤害人的嘛，总是要破坏国家财产的嘛。为什么要做败家子呢？**在这里我要说明，“文攻武卫”不要去掉它的阶级内容，不要去掉它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你们双方不要回去都搞起‘武卫’来，戴上柳条帽，拿起长矛来，那就不好了。……

几个月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们人数不多。在表面上也是青年人，这些青年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对我们是有刻骨仇恨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是青年，青年人的思想不稳定，被利用了。真正的幕后人都是很坏的人。“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你们切不可上当，你们现在都在北京，难免有人向你们进行活动。

此外，江青趁这个机会表达了中央的最新动向，否认了几个月前几乎所有文革决策层（毛、周、林、中央文革）都赞同的“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第二个问题就是军队。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抓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

能允许吗？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的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尽管我们军队有少数同志，甚至个别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也不允许这样抓。……

对军队同志的缺点错误应该给他们以机会，让他们自己作自我批评。你不要光看我们的老干部犯了错误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打起仗来他们可很勇敢，很可靠啊。有的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跟不上形势，说错些话，做错些事。只要他想改正作自我批评，就好嘛。应该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应该遵照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里江青对军队的态度来了一个 180 度大转弯。江青的这篇讲话把中央文革派和基层激进造反派的分歧全都暴露了出来，不仅是限制武斗，反击“5·16 兵团”，反对“揪军内一小撮”，江青还讲到了文革派高层与基层最初的分歧，革委会和派性问题：

第三个问题，要逐步地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新的领导机构。目前这股子歪风除了针对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针对著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以外，就是针对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的事物。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更难免混进一点坏人，但它毕竟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它是在斗争中产生的，是在群众的基础上产生的。现在有这么一股风，又要把中央已经批准的革命委员会全部弄掉，这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那里挑唆吗？同志们，你们知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这个事也要警惕。……

同志们，我们要创造良好条件，我们要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派，不要成为张家派、李家派。派性，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特性，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无政府主义，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我建议你们双方都作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好。双方都作自我批评，不是就不吵架了吗！比如你反对我，我就到你那里去作自我批评，然后你当然觉得惭愧，也找找自己的毛病，也作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冷静下来，互相谈谈，互相交换意见。**求大同，**

存小异嘛！大“同”是什么呢？“同”，就是共同性，就是一起闹革命，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还是站在“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如果你们都是要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大原则底下，有什么理由不联合起来，有什么理由不团结起来，而闹你们的派性呢？……不太一样的做法或者看法，那可以保留。我们小组也经常有不同的意见，并不是没有什么争论，但是我们能够在一致的大前提底下把“异”存起来。

之后江青的讲话被发布至全国，要求各级革委会学习。如果从当时的形势来说，起码江青在这里反对派性，反对无意义的武斗，反对无政府主义，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中央文革与造反派中的激进力量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一分歧在江青讲话的时候似乎是在江青一边，但是它却最终导致了保守派力量利用中央和基层文革力量的意见分歧而对基层造反派进行残酷的清洗。“5·16 兵团”事件如果不是因为后面的那场“清查 5·16”的大清洗很可能只是文革中的一个小插曲。小插曲演变为大清洗本身就表明，当造反派中的激进分子由于 1967 年初的二月逆流而对党政官僚和军队的矛盾进一步升级时，他们开始指向高层，批判文革决策层中相对温和的那一方，即周恩来。但是此时周恩来与主流造反派仍然保持着合作关系，毛泽东也需要周恩来去制止造反派的一些过激行为。这次冲突表明了民间造反派出现持续激进化时，即使是中央也无法容忍的。而激进派对于周恩来的批判恰好成为了军队和党政官僚后来清洗造反派的极好借口。一场造反派中的极少数批判周恩来的小插曲竟在军队和党政官僚的操纵下演变为一场造反派全体受到致命打击的浩劫，可以说中央文革是有理由怨恨周恩来的。除了周恩来外，中央文革与造反派在革委会上的分歧，在“文攻武卫”上的分歧，在派性上的分歧，在对待“军内一小撮”上的分歧，这都是后来保守派和军队利用中央的“纠偏”对造反派发起大规模清洗的切入点。

“5·16 兵团”毕竟产生于在全国局势失控以前，也就是发生在“7·20”事件导致的造反派极端激进化以前。在这之后，中央一度与造反派在“文攻武卫”和“揪军内走资派”上保持了一致，但是外交部的事件加上全国无休无止的武斗使得 9 月份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倒台成为中央再次转向保守的标志。而这一次，已经极端激进化的造反派手握枪杆子，独立性就更强，与中央的冲突就越来越激烈了。当中央试图再次“纠偏”时，却发现造反派与中央的关系陷入了与 50 天专政类似的恶性循环之中：造反派不同意中央文革温和的或保守的观点，提出极其激进的政治诉求，结果官方要对其进行打击。原本是造反派之间的

内讧，但是由于造反派掌握武装力量，因此不会轻易改变原来的激进观点，结果官方对其的定性也就一步步加重，甚至上升为敌我矛盾，最终同意或默许了保守力量对它的残酷镇压，使得保守力量重新抬头。文革高潮中的异端思潮，正是以这种循环给造反派带来了一轮轮的内讧与清洗，直到支持文革的力量消耗殆尽为止。

第二节 中国向何处去

湖北“7·20”事件后，我们可以想象在经历了几个月“百万雄师”的镇压后一些造反派的激进程度。显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于中央对武汉问题的处理，尤其是对军队领导人的责任追究上的温和态度是不满意的，进而在更多的问题上与中央文革的观点发生冲突。“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武汉造反派中的一批激进学生由同一松散群体演变的三个名称。其主要头领是鲁礼安和冯天艾（两人均为华中工学院学生）。当时的右派分子，后来的著名作家白桦也加入了这一组织。他们创办了他们自己的理论刊物《扬子江评论》，成为著名的文革异端思潮。

“北决扬”似乎是感到了造反派的极端激进的想法在城市已经得不到足够的响应，于是他们决定将目光对准比城市生活差得多的农村，关注农村在文革中的变化情况，要求将文革扩大到农村，进行农民运动甚至是农民革命战争，把文革变成一场真正的大革命。“决派”在《北斗星学会宣言》中声称：

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将严格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最彻底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洗中国农村几千年堆起

来的垃圾赃物，在我国农村大树特树起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伟大的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他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力量。……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此外，“北决扬”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即“国内革命战争”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以建立“公社”作为其目标。这与当时其它的异端组织观点一致。《扬子江评论》即发表文章说：

政治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毛主席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写到：“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要生存，就反抗。当革命者也拿起武器的时候，战争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爆发了。谁敢否认 67 年出现了国内战争的事实呢？谁敢断言一旦中派（即温和派——引者注）里的顽固分子与党最后分裂时，他们不会挑起战争呢？希望和和平取得全面胜利的思想，实在是有点靠不住的。不应当否认一切战争。要从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手上把权夺过来并巩固下去，没有武力和武力作后盾是不可能的。政治革命必然伴随以社会革命，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通过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过渡，会有这一天到来的。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向世界和历史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社会产物——北京人民公社。

显然，造反派激进的政治诉求已经不是官方所能容忍的了。无论是鼓动“农民革命”还是发动“国内革命战争”，这一理想化，近乎民粹主义的观点不仅脱离实际，而且已经危及政权本身。对于被武斗折腾得筋疲力尽的中国来说，大多数人也不会同意他们的观点。随着 1968 年底军队对造反派镇压的来临，“北决扬”毫无意外地遭遇了悲剧的命运：1969 年 9 月 7 日，中共中央根据湖北省上报的材料，发出对武汉问题的指示，把“北斗星学会”和“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定性为“反革命地下组

织”。湖北省又把参加这两个组织的一些学生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并判刑，并在全市开展了清查“北决扬”斗争。这一事件又和清查“5·16”搅合到一起，变成了一场针对整个湖北造反派的大清洗。湖北被定为“北决扬”和“5·16”分子的达60万之众，直到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向湖北省委呈送《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认为“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12月，湖北省委批复同意，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于起诉，先后释放。

“北决扬”提出的观点虽脱离实际，但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式和建立公社的目标得到了极端激进派的群起响应。随着造反派“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斗争中造反派的一些人已经逐渐认清了局势，为造反派在文革中提出自己的理论总结和真正的独立的纲领提供了可能。而且，文革中毛泽东在建国之后的大量讲话内容被泄密，《毛泽东思想万岁》这样的民间私印毛选为造反派进一步理解和发挥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提供了理论指导。随着中央文革、毛泽东与造反派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造反派也逐渐意识到中央的包办替代已经很难完全代表他们的利益。造反派打着毛泽东这个偶像的旗帜进行社会变革，但是当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激进要求时，他们也会与他们的偶像发生分裂。攻击周恩来就是一个开始，到1967年底批判中央文革甚至委婉地批评毛泽东的大字报也开始出现了。造反派中的极端激进的力量，或者说“极左派”，迫切需要一份表达造反派自己独立的诉求的，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纲领。

狭义上的异端思潮，即根据“继续革命”理论要求彻底的社会变革的思潮始于上海，其开山鼻祖是上海造反派组织“支联站”的领导人“全向东”。其人真名汤福坤，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助教，1957年的“右派边缘分子”，以积极组织反王洪文的行动而著称。尤其是他充分利用了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中引用的毛泽东关于“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的评论，认为社会主义中特权导致的分配不公是产生新兴资产阶级产生的关键。因此要求彻底批判特权阶层，主张彻底的政治变革，实现更平等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

正是在造反派急需独立的理论指导背景和全向东等人对官方意识形态进行解读利用的条件下，产生了异端思潮四大代表作即“四大毒草”：北京“4·3”派的《论新思潮》、广西大学的《今日哥达纲领》、湖南“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四川“8·26”派的《川大“8·26”必胜》。其中名列首位的是1967年6月11日，北京中学红卫兵中的激进造反

派“4·3”派发表的《论新思潮》，它最充分地运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理论阐述自己对文革的理解，将矛头对准特权阶层：

社会主义国家之前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是特权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之前的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相应地伴随着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即把社会上的财产和权力重新分配给某一些人，而每次分配的结果，都是使统治阶级，即代表少数人的阶级占了绝对优势，使他们掌握了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而这些人从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第一天起，就同广大劳动人民存在着矛盾，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再分配日益趋向统治阶级的继续进行，这种矛盾逐渐尖锐，两极分化突出，于是发生一次大的变革，再一次进行大规模“再分配”。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使自己在财产和权力方面占了优势，由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它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这次的再分配实际上体现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该保持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而社会上的主要矛盾则不能简单地按掌权的人与人民的矛盾来划分了。必须加以分析：

真正代表无产阶级也就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当权派，**分配在他手里的财产和权力是公有的，他只起一个暂时代替掌管的作用。并且他们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通过一次次“较和平”的再分配——这必须用一系列的革命化措施及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逐步缩小各种差别。最后达到财产和权力的真正公有。显然他们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将采取一个又一个的变革行动来促使财与权的公有化，这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革”的实质。**

逐渐蜕化的当权派。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有巨大能量，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无时无刻不在腐蚀人的灵魂的情况下，蜕化是很有可能。何况“挟重器”（指掌权力）的政治经济地位唤醒了许多人头脑中本来就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这个引人注目的当

权派地位是阶级敌人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这些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像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很显然，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

.....上述特权人物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反动作用，因而他.....竭力阻止历史的再分配——这个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革命进程。**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广大劳动人民是欢迎再分配的。是站在“革”一方面的。**但鉴于四旧的影响，也因其他地位的不同而表现出程度不同的要求。**

该文可以说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特权阶层”产生的极好的阐释，也是较早的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总结。它上承江青《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与全向东等人对它的解读，向下对杨曦光的“红色资本家阶级”的理论和1974年李一哲的《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也有不小的启发。与1975年毛泽东提出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有相通之处。

随着运动中造反派行动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他们在思想上也在逐步摆脱高层话语的局限，创立自己的一套纲领。其代表就是堪称文革异端思潮的巅峰之作的《中国向何处去》。

在1967年底，湖南从造反派“湘江风雷”中分裂出了一个激进组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简称“省无联”。他们发表了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成为文革中最激进的并有一套精致理论的组织之一。《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评价其为“这种思潮为当时中国的派性混乱增添了一种色彩。”“色彩”前面好像缺了一个形容词，使得这句评论跟没说一样，不知作者是否有难言之隐。那么我们还是先看一看《中国向何处去》吧。

第一部分是文革理论的总结，它重新发现了在文革初期被忽视的《五·七指示》。它特别强调《五·七指示》的指导作用以及它的理想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武装斗争才能够实现。

.....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在人们脑子里留下的是空想的印象，这时和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

到十分尖锐和高度阶段这一事实相符合的。现今的中国由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向代表阻碍历史前进的生产关系的腐朽阶级进行斗争，并必然导致社会大革命，新的社会必然在烈火中诞生。这种客观规律就是毛主席的科学而不是空想的预见的坚实基础，而人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规律，那当然就会出现科学预见给人们留下了对美好将来的纯粹空想的现象！人们认为中国将和平过渡到《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去。实际呢？“和平过渡”只不过是“和平演变”的别名，它只会使中国离《五·七指示》描绘的“公社”越来越远，离苏联现社会越来越近。毛主席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就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必须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否则，不谈夺权问题，不谈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去空喊实现《五·七指示》，那确实是“乌托邦”的空想。

第二部分是描述一月夺权的重大意义。最重要的是他将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式发展为党内“新阶级”的“红色资本家阶级”的理论。

.....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 90%的高干靠边站了，当时从湖南来看，张平化、章伯森、华国锋之流的权力小到零，从中央来看，财政部，广播局等部门纷纷夺权，李先念、陈毅、谭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们的周恩来的**权力也大大下降，当时的财产到谁手里去了呢？到组织起来自己掌管城市、工业、商业、交通等等的（党政财文大权）充满著无限热情的人民手里去了。社论所号召的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掌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自己管理城市、工业、交通、经济真正实现了，一月革命风暴在一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手中转到了热情澎湃的工人阶级手中。社会忽然发现，没有官僚自己不但不会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发展的更自由，更快。并不是像官僚们在革命前吓唬工人们的那样，“没有我们，生产会崩溃，社会会混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

一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

这就是一月革命中阶级变动的真实内容，这一个短暂时期内实际部分地区不很彻底的实现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社会处在一种类似巴黎公社的“群众专政”的状况。一月革命风暴告诉人们中国要向著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现在 90%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们绝大部分，在一月份靠边站了。90%的高干在一月革命风暴中靠边站。这决不是“群众”的过失，“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恶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惩罚，“罚不当罪的极少”，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用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罢官革命，揪人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化革命，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联系一月革命风暴的事实，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在这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

“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纲领都以不大具体的萌芽状态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后期被社论提了出来，应推翻的腐化阶级，应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甚至人们根本不敢异议的社会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一伟大发展是一月革命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出的勇敢和首创精神的必然结果。

第三部分谈到了造反派与中央文革的最初分歧——革委会。他提出了建立“公社”的主张，而对革委会的激烈批判最后引出的是对于军队的失望和愤慨。而第四部分也就自然谈到了二月逆流。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深入，还是处在何等的低级阶段，而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高级的革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一种很不成熟的阶段。

在这种不可能彻底胜利的时候，要想立即夺取真正的胜利，那是左倾冒险主义，遵照资本家阶级把革命果实夺取过去的必然性，使人民在更加高级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通过革命的来潮和退潮，准备夺取最后胜利的力量，这才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如今称之为战略部署）否则，在群众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要在中国实现“公社”的时候，建立“公社”就会变成徒有其名，而实际上是和现在革委会内容一样，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

三结合就是革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过渡形式是必须的，否认过渡形式是左倾空谈主义。

.....“红色”资本家阶级在二、三月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财产（生产资料）和权力从革命人们手中被夺回到官僚们手中，早春二月是龙书金、刘子云、章伯森、华国锋以及全国的官僚和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权力无限大，那时就是他们飞黄腾达的时机，而革命人民的权力下降到零，并大批被投入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公检法控制下的监狱。

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

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如果让资产阶级企图实现，无产阶级的退却就会退入坟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会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发出了反击的号令。从此伟大的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开始酝酿。

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革命进入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真正开始触及到军队问题。革命人民在一月革命风暴时对军队问题想得很幼稚，认为只要地方上走资派推翻了，部队就可以遵照毛主席自上而下的命令和革命人民相结合镇压走资派，二月逆流中的血的事实告诉人民，单纯自上而下的命令并不能把毛主席的意图贯彻到部队中去，**军队走资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资派的利益的一致决定了它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自下而上搞军内文化革命……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状况。**

二月以来的斗争把军队的严重问题摆到了广大群众面前（以前只讲在毛主席少数人面前）这就使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逐渐具备了条件，科学地预见了在“公社”这一新社会中的军事力量不同于现在的军队，二月以来的斗争使毛主席的这一思想逐渐掌握了群众。

第五部分讲述了“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对军队的保守倾向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再次阐述了建立“公社”的构想和号召国内革命战争：

看到了现在军队和解放前的人民军队有了变化，解放前的军队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的。军民关系像鱼水一般，**解放后由于革命物件从帝官封变成走资派，而这种走资派在军队内是当权者，因此一些部队在革命中不但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血肉一般的关系，甚至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使军队来一个根本的变动，“极左派”在毛主席一句语录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根据，毛主席在同年五月指出军队住进营房后，脱离群众了。

（二）看到了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

战争，八月份无产阶级和“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大规模武斗和局部国内革命战争证实了他们在八月份的预见，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经验更是史无前例和丰富伟大。出乎一般庸人的意料之外，历史竟是按着“异端邪说”所预见的方向发展。不可想象的大规模抢枪事件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合乎规律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军队直接参加（在江西杭州等地是军队直接打）的局部国内战争暴发了：人民在八月暴发出的创造精神和革命热情更是使人感动之至。抢枪成为“运动”所表现出的规模之大，革命战争的威力雄壮，在那一瞬间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金、刘子云之流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像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这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专走资派的政）的真实力量。他们与人民是一致的，是共同为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而斗争的，而军区这一官僚机构垮台，人民不但不悲叹，反而欢呼起来。不像以前那样以为没有他就不行，这一事实又使无产阶级能够比较实际地预见中国的军队向何处去？“中华人民公社”的武装力量的情景，可以断言，中国将是像一个军就是民，民就是军，军民打成一片，军队摆脱官僚控制的社会去。**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

之后的部分是对现实的分析，主要是批判9月份以来中央对于军队的袒护政策，分析认为仅仅靠“文斗”根本无法解决问题，革委会不可能保证无产者的利益，最终还是要靠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文章一次又一次委婉地批评毛泽东向军队妥协退却，声称：

这次退却的幅度之大是空前的，九月份以来干部政策的无限放宽实际上是向走资派的一

个大幅度的让步，让他们上台，具体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陈再道的处理，主席甚至说他学习的好，可以出来工作。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大大加强，这次退却没有遭到二月份那次退却所造成的“溃退”，资产阶级这次不能像三月那样几乎一口吞下革命等等。湖南炮轰周恩来的革命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还成立了省无联，在某些方面，向前有了发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成长壮大的证明。

最终，为了要消灭官僚制，建立公社和武装夺取政权，必须要对群众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和建立“毛泽东主义”的革命政党。之后文章又驳斥了满足于现状的“二次革命论”和急躁冒进的“一次革命论”，对革命形势进行了分析。最后，文章模拟《共产党宣言》发出自己的宣告：

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胜利和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革委会被推翻，“中华人民公社”诞生这一震撼世界历史的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必定到来。

“极左派”公社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才能达到。让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在震撼世界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试看明日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

毛泽东主义万岁！

不过，对于被武斗折腾得筋疲力尽的中国来说，杨曦光的激进观点显然既不符合这时候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更完全无视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悬殊的力量对比。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官方意识形态和话语的影响，根据巴黎公社的原则创造了一套造反派的独立而精致的思想和理论。而“省无联”最后的命运也可以想见。1968年1月24日，周恩来、康生、江青等接见湖南省造反派组织代表，宣布取缔和镇压“省无联”，特别提到杨曦光及其《中国向何处去？》一文。1968年2月，逃亡到武汉的杨曦光被公安部门

逮捕。在对造反派进行的大清洗浪潮中，1969年11月，杨曦光以反革命罪判刑10年。

文革“异端”思潮实际上是文革思想伴随着实践而发展出的“顶峰”。而极端激进化的“异端”思潮实际上也是造反派的分裂内讧局面的极端产物。造反派中的一些人不愿再向前走，趋向于和中央文革保持一致；一些人认为走过了头了，希望往后退一点；当然更别再说相当多的人要翻掉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案；还有一些人则坚持原来的激进观点，认为文革不仅仅是“斗私批修”的文化革命，而是一场政治革命；要进行国内革命战争，建立公社；要求批判军队领导人，武装造反派；要求批判周恩来，彻底打倒官僚制。实际上，文革越往上走，其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少，其中的少部分激进分子就越来越极端。他们的政治诉求，整个运动的政治动员的广度和强度已经超出了社会发展水平，超出了社会生产力所能承载的程度，脱离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异端派遭到镇压，乃至整个造反派失败的社会基础。而只要中央每后退一步都会要借助比现有的占优势的力量更加保守的力量，从而使革命出现下降趋势，也就是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别说1967年的成果可能保不住，连1966年的成果也要失去。

要压制1968年出现的异端思潮，即主张变革体制也主张武装斗争的造反派，姑且称之为异端派，要借助比它保守的社会阶层。这些阶层有主张变革体制但反对武装斗争的激进造反派；不主张变革体制，只要求批判官僚特权的温和造反派与部分军队势力；17年间社会地位较高，但还是主张对官僚权力进行一些限制的开明保守派；还有最保守的党政官僚。打倒异端派后，比其保守的力量都有所增长，结果革命呈现下降的局面而“刹不住车”。之后温和造反派和军队打倒激进造反派；开明保守派打倒温和造反派和中央的文革派；最终文革前的党政官僚打倒开明保守派，终结并彻底否定文革，这就是1968年到1978年这10年间中国社会力量不断下降走向保守的轨迹。对应历史事件的话，1968年对“5·16兵团”、“北决扬”、“省无联”的镇压是激进造反派打倒异端派，最终“7·27指示”发布，之后是“全国山河一片红”；1968——1970年“清查5·16”，“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是军队清洗造反派尤其是激进派；1971年“9·13”事件后造反派和保守派联合打倒军队势力；1972——1975年是造反派与保守派分化整合，分别团结在四人帮和周恩来、邓小平麾下。1976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是开明保守派联合党政官僚打倒造反派，造反派无论温和激进都遭到清洗；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政官僚打倒开明保守派，从而完成了下降的过程。

第二章 休止符

第一节 “全国山河一片红”

到了1968年初，蔓延全国的武斗又回到了文革的起源地——高校中。

要论派系之复杂，文革中可能哪里也不如北京。中学红卫兵中有“4·3”派和“4·4”派之争，大专院校红卫兵中有“天”派、“地”派之争，清华大学里的“井冈山”和“4·14”派之争，第七机械工业部中的“9·15”和“9·16”之争，中央军委中的“冲”派和“三军派”之争等等。尽管北京也发生过西单商场财贸系统的大武斗，但是总体来说，毕竟在中央眼皮底下，各造反派组织与中央关系紧密，因此曾经在“红”八月保守派掌权时暴力与流血充斥的北京轮到造反派掌权时，在全国武斗的局面下反而成了一方“文斗”的净土。当时北京的特点是，除了中央文革组织的针对高官的批判大会是造反派发泄和施展暴力的机会外，各团体之间主要利用自办的小报进行唇枪舌战，激烈批驳对方。这使得北京似乎成了文化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典范（当然仅限于红卫兵内部）。

但是，到了1968年初，清华大学中“井冈山”与“4·14”两派的斗争终于引发了大武斗。在高校的武斗中，清华大学利用理工科大学的条件，自己制造手枪、手榴弹、长矛、土坦克等等，甚至在校园内挖地道，修工事，损失十分严重。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68年5月30日凌晨，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攻击对立面的学生组织，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清华的武斗也引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7月初，中央为制止广西和陕西的武斗局面，分别发布《7·3布告》和《7·24布告》。7月27日，毛泽东发布“7·27指示”，北京60余家工厂组成“首都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一般由保守派工人组成）3万多人进驻学校宣传《7·3布告》和《7·24布告》，制止武斗。在清华却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731人受伤。被认为是最忠于中央文革的蒯大富竟然也与高层发生了激烈冲突。形势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毛泽东认为是必须表明中央文革派与造反派之间的分歧，结束这场已经走入了死胡同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了。

7月27日晚，毛泽东接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毛泽东说：“文化革命搞了两年，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现在是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人讲，广西布

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把武斗工事统统去掉，要刀枪入库。

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中南海、大会堂那么大，都可以住嘛！办个学校还不行？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都要住在北京。可以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一个叫新北大(公社)，一个叫新北大(井冈山)，就像苏联共产党(布)一样。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清理自己内部的问题。(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这个问题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会消灭，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现在正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青年人听不得批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听不得批评的。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只能批评别人。……”

这就是毛泽东 7 月 28 日凌晨的讲话，以此为标志，红卫兵运动宣告结束，毛泽东正式开始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步伐。文化大革命的热月终于来临了。但这一切并不是毛泽东的一句最高指示就能够完成的。毛泽东不可能凭空使社会秩序恢复起来。此时由于造反派越来越激进甚至陷入空想，派系分化越来越严重，给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反对造反派的力量自然也越来越强大。这正是毛泽东能够结束运动的社会基础。但要想打击社会上的激进力量就必须联合比它保守的各派。而此时，或许毛泽东该庆幸 1967 年底的及时刹车使得造反派没有将军队冲垮。现在，当毛泽东表示革命小将们“**要犯错误**”的时候，军队自然成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镇压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中坚力量，经过一轮折腾，军队终于回到了它最擅长的事情上。但这就意味着毛泽东想终结运动必须顺应军队的利益指向。在 1968 年，经过持续的斗争，几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都是矛盾极其激烈，你死我活

的状态，而要用一个已经充分参与了社会利益活动的利益集团去干预社会，恢复秩序，那么你不可能指望它在为社会“主持公道”的时候不会掺杂自己的私货。在这一时期，为了能使社会秩序恢复，尤其是经济建设恢复，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军队的作为和诉求，无论是残酷镇压造反派还是清洗“白区党”干部和军队内部派系都采取了姑息纵容甚至支持的态度。1968年初《人民日报》相继发表《论派性的反动性》、《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等文章，实质上是支持了军队主导的强制性的“大联合”。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军队掌控一切的军管时期，即“斗、批、改”的时期。

很快，随着以强硬姿态禁止武斗的《7·3布告》和《7·24布告》，以及“**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被推行至全国，由保守派工人组成的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各个学校、机关、单位，制止武斗。这似乎是1966年工作组的复活。8月5日毛泽东将巴基斯坦外长送给他的芒果转赠给清华工宣队，表达对工宣队的支持。1968年8月15日的国防会议和冶金会议之后，周恩来主持的各种会议，基本上都是以恢复秩序，恢复经济生产为主要目标，不再支持造反派群众的合理要求。这一回运动是真的要结束了。

正是摸清了中央的底线，军队才敢于以制止武斗的名义对各地的造反派进行放手镇压。一些造反派喊出了“**要群众运动，不要运动群众**”的口号。而《7·3布告》发布后韦国清在广西镇压造反派“4·22”时的手段之血腥，即使用文革武斗的标准来衡量都是骇人听闻的。江青曾经对重庆“反到底”派的头头黄廉讲过：“**军队的事情不好办，你们自己要把握好。**”不过在多数地方，在内讧之中已经耗尽了精力和实力的造反派或红卫兵组织在面对军队的介入时几乎没有抵抗能力。渔翁得利的军队开始急匆匆地进行“大联合”，在各地建立革委会。此时的革委会不要说离文革初期提出的巴黎公社民主原则差了很远，即使是“三结合”也徒有虚名。大多数地方匆匆忙忙建立起来的革委会实际上已经由军队控制，29个省的革委会中大多数直接由当地军区的司令员或政委担任主任。而此时革委会里面的群众组织，已经与1966年底1967年初冒出来的那些独立的，自发的群众组织有了很大的不同，在经历了镇压和武斗后，这些组织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了，更像是“**从群众组织的废墟中找出来的**”。总而言之，1968年9月5日全国的革委会成立完毕，“全国山河一片红”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最强音。到1968年底，随着清查“5·16”，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的展开，全国大规模的武斗基本停止。

我们在这里总述一下全国各地从一月夺权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历史。需要注意的是，

1966年的“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战线分明。而1967年后近半数的省份是造反派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的斗争，部分省份是温和派联合保守派斗争激进派，有些甚至是三派四派之间的混战。只有少数省份是前一阶段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的延续。而且，运动持续时间短，革委会成立早的省份（北京、上海除外），往往造反派保留的力量较强；而运动拖得长的，即1968年在中央的压力下强行“大联合”的，往往造反派力量弱，有的形同虚设，有的甚至被完全击垮。

我在这里先把这一时期不同时期的形势分析展出来，以便大家对于各地具体的斗争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 时间段 | 形势分析 | 历史事件 |
|-----------------|---|--|
| 1966年底——1967年1月 | 造反派逐渐崛起，与保守派组织斗争，批斗干部，冲击政府机关，提出政治经济诉求。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 |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济主义妖风”；“一月夺权”；三支两军，《军委八条》 |
| 1967年2月——1967年中 | 运动深入，造反派持续激进化，开始出现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分野。军队立场转向保守，中央对军队问题出现僵局，地方上军队采取了支持保守派或者是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导致造反派分裂扩大。 | 各地造反派分裂；青海“2·23”事件，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反击二月逆流”；《军委十条》 |
| 1967年中——1967年底 | 中央为二月逆流中遭镇压的造反派组织平反。造反派与军队发生激烈冲突。军队支持的保守派组织最终垮台，由于文攻武卫，各群众组织开始发生武装冲突。中央反对极端激进的异端派。 | 武汉“7·20”事件；文攻武卫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武斗，批判“5·16兵团”。 |

| | | |
|------------------|---|--|
| 1967 年底——1968 年底 | 造反派武装冲突继续，中央开始倾向于恢复社会秩序。一些地方军队开始残酷镇压激进派和异端派。最终在中央的调解下各地造反组织与军队勉强和解。军队通过清查“5·16”和清理阶级队伍来排挤造反派。红卫兵退出历史舞台。 | “揪军内走资派”和“武装斗争”被否定；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广西血案；各省革委会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上山下乡运动。 |
|------------------|---|--|

北京:北京的工人运动殊无足观。1967年4月20日以公安部长谢富治为主任的革委会成立后虽然也出过王景瑞、王老民等搅局者，冒出过“某某胡同工代会”之类小山头，但所争论均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无关大局。

与北京的工人运动默默无闻相比，北京的红卫兵可谓是风光无限。自从1967年1月战胜“联动”，继而进行《北京日报》、教育部夺权后，“红三司”中的北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一方与“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一方冲突不断。4月初民族宫夺权后，两方正式分裂，“新北大公社”（聂元梓）、北航“红旗”（韩爱晶）、清华“井冈山”（蒯大富）一方被称为“天”派；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地院“东方红”（王大宾）一方被称为“地”派。“地”派多为“红三司”旧部，“反击二月逆流”和“揪军内走资派”要比“天”派更积极更坚决，批斗领导人时下手也更狠。而且“地”派通过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造反派“红联”的潘梓年、吴传启与中央文革，尤其是与王、关、戚保持着比“天”派更为紧密的联系，并得到谢富治更大的庇护（聂元梓提起这两件事至今愤愤不平）。“天”派后来还被异端组织“北决扬”称为“中派（考茨基派）”。似乎“天”派较温和而“地”派较激进，但是在北京之外情况却刚好相反，外地的“地”派组织表现得更温和甚至保守。这大概与学生们意气用事，乱拉队伍有关。“天”派中的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在不少省市都是鼓动造反夺权的急先锋；而清华中的“地”派——周泉缨的“4·14”派则在河南支持听命于军区的温和派“河造总”，而其《“4·14”思潮必胜》更是主张“造反派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河归旧道十七年”，主张全面恢复文革前的旧秩序，成为文革温和派的纲领性文件。再如“地”派中的北师大“井冈山”曾派出一支队伍去武汉支持保守派“百万雄师”，弄得陈再道受宠若惊。可“7·20”事件后北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的大会时，其领导人谭厚兰又厚着脸皮要求代表红代会发言，结果被“天”派一顿痛损。“天”、“地”两派的斗争在“文斗”了一年后来1968年春开始动武，以清华“百日大武斗”造成

两败俱伤，毛泽东发布“7·27指示”命令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而终结。

与大学相比，中学红卫兵的思想碰撞更为激烈。他们在1967年4月份红代会成立后分裂成了“4·3”派（京工附中“红旗”派刘钢为首）和“4·4”派（原“首都兵团”负责人、中学红代会一把手，北京25中李冬民为首）。两派的分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联动”立场：前者强硬，激烈批判血统论和特权阶层，后者则较温和；二是对军训的态度：前者抵制，且一度将矛头对准主管军训且同情“联动”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而后者则支持军训。后来“4·3”派的《论新思潮》成为文革异端思想的代表作。

北京军内的两派斗争不可不提。由于军事院校、军事文艺团体和部队大军区以上是允许开展“四大”的单位，军委各总部和军兵种也迅速分成了两派。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为首的“三军委”屡受攻击，李、邱二人尤其狼狈。1967年春夏之交，保守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艺演出活动，排斥造反派组织参加，导致造反派多次冲击演出，遂被称为“冲”派。邱会作等人向林彪求救。5月13日，林彪亲自“亮相”观摩演出，“三军”派声威大震，“冲”派垮台，吴、李、邱三人由林彪的“老部下”上升为“死党”，“5·13”成为林彪集团的节日。而“三军派”后来也控制了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军委办事组。

天津:1967年1月4日中央宣布天津市由河北省辖改为中央直辖，解学恭任市委第一书记。天津文革与河北文革、刘少奇的华北局问题纠缠在一起，形势复杂。很快造反派在夺权等问题上出现分歧，并在《天津日报》、公安局等处发生冲突。受李雪峰（华北局第一书记）、解学恭和天津警备区支持的温和造反派“8·13”、“卫东”联合“河老八”“主义兵”等保守派组织压制激进造反派，激进造反派遂联合组成“大联筹”开展“反二月逆流”，矛头直指李、解和警备区，发生多起武斗，但保守派却始终打而不倒。1967年9月禁止抢夺军队武器的《9·5命令》发布后“大联筹”处境艰难，被揪出不少“一小撮坏头头”。12月6日以解学恭为首的革委会成立，他的江山坐到了1978年6月。

河北:河北省会不到两年间多次易址（天津——保定——石家庄）。“一月革命”后河北军区、63军与38军各支一派。省会保定的造反派于1967年2月分裂为38军支持的激进派“工总”和河北军区、63军及李雪峰、刘子厚（河北省省长）支持的温和派“工筹”，石家庄与其对应的派别是激进派“狂人公社”和温和派“大联指”。“二月逆流”时期“工总”、“狂人公社”受到压制，到1967年5月翻身后，两派开始武斗。后因河北军区迁至石家庄，“狂”派所受压力渐大，而由于陈伯达明确表态，致使“狂”派彻底失败。1968年2月3日李雪峰、刘子厚领导的革委会成立。保定“工总”则因有38军的支持，一直维持下来。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陈伯达、李雪峰垮台，“工总”颇为舒心，但“批林批孔”中两派争端又起，武斗延续至1976年11月，全国闻名。与其他大多数省份小有不同的是，河北省委机关内部的造反组织是他们所在派别的核心，省委领导和各级干部不少被卷了进去，派性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即使是1978年后省长刘子厚因搞派性太不像话而调国家计委，接替他的外地调入干部也有一到河北就被拉下水，弄得狼狈不堪的。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在文革初期即表示拥护造反派。1967年1月上旬，郑大“联委”（以批判吴芝圃，揭露“信阳事件”著称）与郑工“革命造反派”就对省委是先夺权还是先批判产生争论。随之，由于受清华红卫兵驻郑州联络站（保守的“4·14”派）的影响，双方又对刘建勋是支持还是打倒出现分歧，形成“造反派要保皇，保皇派要造反”的颠倒局面。后来河南的造反派分裂为激进的郑州“二七公社”（以郑大、郑工为核心）、开封“8·24”和温和的“河造总”两大派。河南军区支左介入文革后即支持温和派“河造总”和重新崛起的保守组织“十大总部”，在“二月逆流”中，为了在中央组织的两派谈判中取得优势，军队以武力解散郑大“联委”，取缔开封“8·24”，在河南全省抓捕“二七公社”成员，逮捕数千人。经过几个回合的反复后，7月份中央认定河南军区支左犯有“方向路线错误”，“二七公社”、“8·24”为革命左派，“十大总部”为保守组织，“河造总”则以“犯错误的老造反派”的身份参加“三结合”，于1968年1月27日成立以刘建勋为首的革委会。

山东：1967年1月31日，济南军区、山东省公安厅以冲击专政机关的罪名宣布山大“主义兵”“山工联”等一批激进造反派组织为“反革命”，并在山东全省展开大抓捕，仅山大学生就有2000余人被捕。2月3日，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在济南军区的支持下依靠几个大学和一部分温和造反派组织宣布夺权，成立革委会。但后来济南军区又打着支左的旗号复活保守组织，对王效禹政权造成威胁。王只得联合山大“主义兵”等组织“反二月逆流”，开始了对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没完没了的斗争。激进派的“主义兵”对王效禹的“反二月逆流”是支持并积极参与的，但其为战友“山工联”翻案的决心则始终不变（其每天晨练带操喊的口号都是“翻案、翻案，为‘山工联’翻案”），故与不给“山工联”翻案的王效禹矛盾颇大。但王效禹“姿态”很高，一直将山大“主义兵”视为“犯错误的老造反派”予以“正确对待”。而杨得志却坚持与王效禹完全不能合作，互相扯皮。1968年11月王效禹因“反复旧”遭到批评，至1969年终因得罪太多军队干部而被杨得志取代。

山西：参加山西造反夺权的是陈永贵、李顺达、解悦一批劳动模范和学毛著积极分子。但如此之多的先进分子进入造反派队伍却没有使山西避免如同其他地区一样的内部分裂。

1967年3月8日革委会成立，到4月份山西造反派就正式分裂为副省长刘格平支持的激进派“红总站”和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69军军长谢振华支持的温和派“红联站”。陈永贵属“红总”，李顺达属“红联”。结果最先造反的刘格平、张日清同归于尽，谢振华掌握了革委会大权。1969年8月，“红总站”的武斗司令杨承效无视中央的《7·23布告》继续武斗被谢振华镇压后，陈永贵就成了“红总站”的标杆人物。可谢振华杀得了杨承效却奈何不了陈永贵，于是便捧李顺达，想以此抵消陈永贵的影响。可如此却是将“学大寨还是反大寨”和派性斗争搅到了一起，一片混乱。

内蒙古：1967年1月下旬，造反派“呼三司”因其下属组织在《内蒙古日报》的夺权行动未获内蒙军区支持而与军区产生对抗。1月29日“呼三司”开始在军区门前举行静坐绝食。2月5日，“呼三司”成员韩桐遭军区干部故意枪杀。事件发生后军区处置失当，显得十分愚蠢。他们先是企图包庇凶手，毁灭罪证，甚至栽赃于造反派；继而又转移斗争目标，宣布支持造反派的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高锦明、权星垣（著名作家权延赤之父）是“三反分子”，致使保守派对权星垣等人严刑拷打、揪斗游街。由于军区部分干部战士参加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斗争，局面几近失控。在此形势下中央于4月13日宣布改组“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内蒙军区，宣布“呼三司”为革命造反派，其对立面为保守派。但“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等保守组织不服，组织大队人马赴京请愿，要求中央收回成命。军区亦有千余人随之前往，并当着军委首长的面痛殴刚复职的军区政委吴涛。留在呼和浩特的保守派则于5月10日冲击区党委机关并占据区总工会大楼。中央遂将内蒙军区降格为省级，其建制划归北京军区，并由北京军区派野战部队进入呼和浩特。5月30日，保守派退出总工会大楼，随即瓦解。11月1日革委会成立。但在随之而来的“清肃内人党（内蒙古人民党）”运动中，“呼三司”内部又因对运动的支持或反对产生分裂。

辽宁：1967年“一月革命”后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亮相”支持造反派，得到了当时辽宁最大的造反组织“辽联”的欢迎。但“辽联”主力之一，激进的辽大“8·31”坚持打倒宋任穷的立场，不承认宋的“亮相”，遂退出“辽联”自立山头。而被宋任穷在“亮相声明”中点名几个保守组织又组织起“辽革”开始造宋任穷的反，“咸与维新”，也要夺权。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于2月介入文革支左，支持保守派“辽革”，压制温和派“辽联”和激进派“8·31”。于是辽宁形成了保陈反宋（保守派“辽革”）、反陈保宋（温和派“辽联”）、反陈反宋（激进派“8·31”）的三大派，长期混战，武斗不断。其中“8·31”最为强悍，很令中央头疼。直到拿下了其最有影响的头头张祥久，1968年5月10日辽宁才得以成立以

陈锡联为首的革命委员会。

吉林：1967年1月28日，以“二总部”为主的造反派宣布夺权，并成立作为政权组织的“红革会”。随即“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8·15”、“人大红野”等造反派组织退出“二总部”，于2月8日成立“长春公社”，造反派分裂为温和的“红二”派（“红革会”与“二总部”的合称）和激进的“公社”派。2月3日“公社”派的“公安联总”进入人大找该校的“红二”派滋事被吉林军区镇压，“红二”士气大振，“拥军”口号喊得震天响；“公社”则一时失语，龟缩一隅苦等转机。进入4月“公社”终于找到突破口：“红二”控制的《长春日报》编校疏忽，错字连篇，这在当时是个颇便于上纲上线的问题。“公社”遂于4月17日封了《长春日报》。以此为起点“公社”开始全面反攻，长春武斗连连。但军区是支持“红二”的，“公社”在武斗中占不到多大便宜。当年7月底在中央民院开过一个庆祝湖南造反派“湘江风雷”平反的大会，“公社”有人到会发言，先祝贺兄弟组织翻身，然后声泪俱下地控诉贺吉祥（负责支左的省军区副司令）的迫害使他们有家难归。由于中央肯定“红二”和“公社”都是造反派，两派于1968年3月6日联合成立革委会。

黑龙江：哈尔滨造反派于1967年1月31日举行联合夺权誓师大会，宣布成立革委会，宋任穷、潘复生（省委第一书记）、汪家道（省军区司令）到会发言表示支持。“三结合”的形式获中央批准，被称为“东北的曙光”。当日，哈工大“造反团”即发生分裂，随之，黑大、哈军工等均出现分裂。分裂的焦点是省委常委赵去非能否进革命委员会。反对的一方为激进的“炮轰派”（又称“山下派”）；赞同的一方直接听命于潘复生，为温和的“捍联总”（又称“山上派”）。由于有潘及军区的支持，再加上由于靠近苏联，毛泽东不敢让其闹得太乱，“捍联总”始终占较大优势，直到1971年潘复生下台，“炮轰派”才重新抬头。

上海：上海自“一月革命”以来就是张春桥控制，王洪文直接指挥的“工总司”一统天下。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革委会。但从1月28日起“红革会”就开始“炮打”张春桥，虽遭镇压，几仆几起，直到1968年4月《文汇报》的朱锡琪“炮打”失败后才宣告结束。而王洪文在使“工总司”内部以耿金章为首的“二兵团”等反对派屈服后，又遇上“联司”的挑战。“联司”是老造反派，战斗力强，有号召力。社会上反对王洪文的散兵游勇“红革会”、“炮司”、“二兵团”等又围绕着“联司”成立了势力颇大的“支联站”，很令王洪文头疼。“支联站”的灵魂人物“全向东”是文革中最早的思想型造反者之一，能说会道，见解深刻。他别有洞见地解读毛泽东关于“财产权力再分配”的评论，这给北京“4·3”派的《论新思潮》和湖南的杨曦光以很大启发。眼见文攻数月无效，王洪文决定武力解决。1967年8月趁湖北“7·20”事件后“文攻武卫”之机，他调集3万大军，水陆并进，终于

将“联司”和“支联站”铲除。毛泽东此时正在上海，他通过电视目睹了这场现场直播的冷兵器战争。王洪文的指挥能力不知给这位大军事家留下了什么印象。

江苏：江苏的造反派分为激进的“红总”和温和的“8·27”，两派均以南京大学为核心，前者头头是文凤来、张建山，后者是曾邦元。1967年1月26日以“红总”为主的夺权引起“8·27”的不满，双方矛盾升级导致分裂。由于造反派未实现联合，中央不认可“1·26”夺权并于3月5日宣布对江苏由南京军区实行军管，军区政委杜平任军管会主任。从3月9日开始，军管会开始取缔“红总”的多个下属组织，“8·27”士气大振，“拥军”的口号也喊得更响。但随着《军委十条》的下达和“反击二月逆流”运动的兴起，“红总”转守为攻并配合军内的“倒许”活动，在杜方平（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吴大胜（军区第一政委）等军队干部的支持下将矛头指向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自此“红总”和“8·27”的大规模武斗日甚一日，连山东的王效禹也派人来凑热闹。但中央认为双方都是造反派，故最后还是实现“大联合”，1968年3月23日以许世友、吴大胜为首的革委会宣告成立。

安徽：安徽文革前期保守派力量十分强大，在1966年底，1967年初和造反派武斗时占据上风，这直接导致毛泽东下令军队介入运动，支持左派，此举使保守组织马上垮台。紧接着，温和造反派“8·27”等组织在省军区支持下于1967年1月26日夺了省委及合肥市委的权。他们排斥和镇压激进造反派力量，说：“1·26夺权好得很”，称为“好”派，被排挤的激进造反派说夺权“好个屁”，称为“屁”派。1967年3月底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安徽五条》批评了“二月逆流”中军队对“屁”派的镇压并改组安徽军区，“屁”派翻身后与“好”派的武斗不断。李德生率12军入皖支左，虽号称“一碗水端平”，其实是“按下葫芦浮起瓢”，疲于奔命。至1968年4月18日以李德生为首的革委会成立。两派都有头头参加“三结合”并任省市级实职，到万里主政时期都被清洗。

浙江：浙江的造反派在保守派垮台后的1967年2月分裂为坚持要求打倒江华（省委第一书记）的“省联总”和支持江华的“红暴”两派。浙江军区支左介入文革后支持的是温和派“红暴”和保守派“红一司”，激进的“省联总”在“二月逆流”中遭到打击。但空5军、20军宣布支持“省联总”后形势逆转，浙江军区“犯方向路线错误”，“红暴”一败涂地。后来“红暴”被认为是“犯错误的老造反派”，得以进入1968年3月24日成立的“三结合”的革委会。浙江武斗以温州为甚。20军进温州时遭到的是穿便装的温州军分区部队的抵抗，野战军之间发生武斗，从派系上看虽说是“八路军打新四军”，战斗依然异常惨烈。后来林彪亲自下令从外地调军队入温州才击溃了当地军队的抵抗。从“批林批孔”开始，温州又

成武斗重灾区。大规模武斗把温州各级干部几乎全部卷入，后果是基层形成权力真空，私营个体户势力抬头，商品经济起步，为温州今天的地位奠定了基础。故此批判“四人帮”时其罪状之一便是其在温州“复辟资本主义”。

福建：福建造反派两个组织“革造会”和“8·29”在1967年1月底准备联合而未成。激进的“革造会”因冲击军区而遭镇压，温和的“8·29”一派掌权并支持福州军区。5月中央开始解决福建问题，要求军区释放被抓捕的人。“革造会”派要求平反，将矛头指向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称其是“二月逆流”。“8·29”则继续保韩压“革”。由于两派斗争与福州军区内部韩先楚和刘培善（军区副政委）的矛盾纠缠在一起，双方都能抢到枪，武斗激烈，到1968年5月，各派均被承认为革命派而实施大联合，于8月14日成立以韩先楚为首的革委会。1973年韩先楚调离福州，“8·29”日子便不如以前舒心，所以他们74、76年都比“革造会”闹腾得厉害。特别是1976年，福建省委几乎被他们整瘫痪。因此，四人帮垮台后，“8·29”的头目是最早落网的。但韩先楚却怀疑1975年中央整顿福建造反派是四人帮所为，甚至不知深浅地找李先念想把刚抓起来的人放出来，可见其关系之深。

湖北：“7·20”事件后共同战胜了“百万雄师”的造反派又出现分裂，即以“钢工总”、“钢9·13”、“钢二司”为主的激进派“钢派”和以“工造总司”、“新华工”、“新湖大”为主的温和派“新派”。“钢新之争”虽然也有过武斗，最终两派还是于1968年2月3日联合成立革委会，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为主任。1969年“钢工总”头头胡厚民发起“反复旧”企图限制军队权力扩张，但被中央压制。此后造反派遂屡受军区打击，一蹶不振。

湖南：造反派内部不断分裂是湖南文革的一大特色。

1966年12月底，“湘江风雷”、“井冈山红卫兵”等激进组织认为立场温和的“高司”与省委签订“望江楼协议”是右倾行为，昔日战友很快反目成仇。“高司”的人一度被打得有家不敢回。次年1月，湖南军区明确支持“高司”，引来了“湘江风雷”的反军狂潮；2月4日军区镇压了“湘江风雷”，逮捕1万多人。继起的“长沙工联”又反“高司”并坚持与军区对抗。最终1967年8月中央《8·10布告》肯定了“长沙工联”，并为“湘江风雷”平反，指责湖南军区“犯方向路线错误”，“高司”就此垮台。但《布告》墨迹未干，“长沙工联”与“湘江风雷”冲突又起，双方在长沙市中心城区发生了解放路、湘绣大楼、北站等大型武斗，死伤多人。“工”“湘”之争尚未最后决出胜负，“湘”派中又分裂出一批人成立了“省无联”，其尖端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杨曦光。杨曦光以一纸《中国向何处去》为“省无联”招来灭顶之灾后，“湘江风雷”也因实力削弱而被击败。一家独大的“长沙工联”又分裂成了“汽电”派和与“湘江风雷”残部纠结在一起的“湘瓷”派（其灵魂组织是后来

被毛泽东斥为“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的以省委机关干部为骨干的组织“永向东”。

1968年7月禁止武斗的《7·3布告》和《7·24布告》发表后“湘瓷”派出局，湖南1968年4月8日成立的革委会遂形成“汽电政府”。

江西：“一月革命”后江西的保守派不但没垮台反而在江西军区的支持下组织起统一组织“联络总站”准备夺权。而造反派“大联筹”则受到军区的镇压，激起武斗。

1967年夏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支持“大联筹”，省会南昌遂为造反派控制。但各县人武部仍力挺保守派，个别军分区甚至以武力抗命，故造反派在多数地县并不占优势。

此后造反派内部又杀出一支“极左派”（南昌航校为首），毛泽东闻知后说“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从当时媒体报道看，江西对“极左”派的“教育”似乎颇为成功。但1968年1月5日革委会成立后，“大联筹”又分裂为分别以万里浪（洪都厂）和涂烈（江拖厂）为首的两派。当时较量的结果是后者占上风。“批林批孔”中造反派重新抬头，万、涂虽然均以矛头向上为大方向却多是各自为战。由于涂烈此时已是省委常委，距权力中心较近，万里浪一派有时被省委视作防波堤或牵制力量，以至在四人帮垮台后的“打招呼”时都曾经对万里浪特为关照。1978年初经人大选举的新一届省革委会副主任中仍有万里浪。万里浪还在当年五一节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诗作歌颂“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万里浪文革前就是业余诗人）。但不过半年，万里浪就被送进看守所，与涂烈“会师”。

广东：广东“地总”、“红总”（简称“总”派）的武斗尖兵是与“西纠”、“联动”齐名的血统论组织“主义兵”，按理说“保守派”的称号非其莫属。但周恩来在宣布了“总”派是保守派后又赶快收回，称其不过是有“保守倾向”。而广东公认的造反派是以中大、华工、广医三面“红旗”为首的“旗”派。他们于1967年1月22日发动夺权。虽然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十分顺从地交出了所有的公章，中央却因造反派未实现联合对夺权不予承认。而“旗”派的某些组织又参与了军内造反派对广州军区的冲击，并在公安系统的夺权问题上与军区发生了对抗，导致“旗”派与军队的关系十分紧张。而广东文革又与香港左翼民主运动互相呼应，互相影响。鉴于广东的特殊地位与当地形势，中央决定实行军管。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二月逆流”中乘机镇压了“旗”派的“八一兵团”并解散了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等近20个“旗”派组织。“总”派士气大震，高歌云：“三月东风浩荡，军管成果辉煌”，故其也被称作“东风”派。后来，周恩来为广交会顺利召开而宣布“旗”派为革命造反派，使其至少在广州短时间内过上了“迨可小康”的日子，也进入了革命委员会。1968年2月21日黄永胜领导的革委会成立。但随着武斗的升级，缺乏军方后盾的“旗”

派颓势渐显。倍受压制的“旗”派赴京寻求支持，武传斌主持了“全国受压老造反派会议”，妄图成立全国性造反组织。此举触怒了中央，周恩来和康生斥责“旗”派有“反共救国军”混入，“旗”派遂再无法抬头。

广西:广西是造反派遭遇彻底失败的省份之一。

广西于1967年中形成打倒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的造反派“4·22”和死保韦国清的保守派“联指”。保守派“联指”由于得到广西军区的公开支持在斗争中占得上风。但中央文革和周恩来还是在8月24日接见两派代表的讲话中肯定了“4·22”。“联指”对此非常不满，曾经在北京街头贴出大标语攻击周恩来。在武斗中，双方破坏铁路交通，动用重型武器，甚至抢夺抗美援朝的军火物资，损失十分惨重。进入1968年春季以后，急于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中央逐渐改变了对“4·22”的支持态度，一度支持“4·22”的55军被调离广西。“4·22”几乎在广西全境都处于“联指”的武力围剿之中，只有“老多”因有141师的支持在桂林城内勉强支撑。中央《7·3布告》将抢夺武器军火定性为反革命行为，于是韦国清指挥广西军区明目张胆地参加了对“4·22”的杀戮。其广度与强度骇人听闻。广西成为武斗最血腥，死亡人数最多的省（伤亡超过10万人）。大批“4·22”成员赴京告状，并参与组织了“全国受压老造反派会议”，妄图成立全国性造反组织。周恩来和康生因此斥责“4·22”与广东“旗”派一样有“反共救国军”混入，消灭了他们最后一线希望。8月26日，以韦国清为首的革委会在攻打“4·22”的枪炮声中成立，从“4·22”中分化出的温和派龙智铭（于1971年在清查“5·16”中自杀）、曾春生担任了革委会副主任。广西的派性斗争到1983年才宣告结束，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高居官位的“联指”头头颜景堂、邓文光、李家海、廖炜雄等人在80年代“清理三种人”运动中先后被判刑或开除党籍。原装正宗的铁杆保皇派落得和造反派一样的下场，全国只有广西一家。

四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自古如此。

1966年11月13日，“红卫兵成都部队”召开批判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大会，提出“**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群众对“西南王”李井泉的怨恨已非一日，造反派均踊跃参加。但更激进的川大“8·26”却认为大会是“**假批判、真包庇**”。遂退出“红成”，另立山头。成都的造反派于是分成两支，但共同的敌人都是保守派组织“产业军”。

随着文革进入夺权阶段，成都军区加大了支持“产业军”的力度并和“8·26”及“工人造反团”等发生激烈的正面对抗，在“二月逆流”中军队对造反派采取了专政措施，“产业军”也企图以武力荡平“8·26”等造反派，独享政权，因此大小武斗不断，最后军区创记录地逮捕了10万人。5月中央就解决四川问题发出《四川五条》，为“8·26”平反并改

组成成都军区，“产业军”随即垮台。于是激进派“8·26”与温和派“红成”的矛盾浮出水面，随着双方在对刘结挺、张西挺（二人都曾是宜宾市领导，因李井泉排挤，1963年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后参与造反，官至革委会副主任）是打倒还是支持等问题上的争论升级，文革发展成“武革”，由于军工企业多，四川武斗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武器之精，水平之高堪称全国一流。直至1968年5月31日革委会才宣告成立。

重庆文革的进程与成都大体同步，唯一的区别是重庆的保守派垮得早，温和派“8·15”（有54军支持）与激进派“反到底”之争在1967年初就开始了。由于军工企业太多，重庆的武斗比之于四川其他各地又更上层楼，在全国可能仅次于广西。重庆的54军长期坚持“拉一派打一派”，又加剧了两派之间的对立。“8·15”派后来几乎被武装成“百万雄师”一样的组织。最后中央不得不于1968年底让54军调防云南，才平息了重庆的武斗。

贵州：1967年2月14日革委会成立，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为主任。不久造反派即有分裂迹象，李再含曾经派人到北京抓捕找中央告状的异见分子。1967年4月11日，部分激进派因不满当天召开的省红代会被李再含一手包办而且有保守派参加而冲击会场。造反派正式分裂。反李再含的一派称为“4·11”，是激进派；支李的温和派以最先起来造反的地化所为首，被称为“支红”派。由于李再含企图以武力解决问题，两派武斗不断。占上风的“支红”派对“4·11”派的镇压十分残酷。直到1969年10月中央根据新华社记者的汇报材料逮捕了李再含，武斗方才停止。

云南：1967年1月上旬，云大“炮兵团”、昆工“8·23”等造反派组织围攻昆明军区大院欲揪省委第一书记、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得知阎自杀后仍无撤围之意。周恩来打来电话劝其退兵后，温和的“8·23”积极响应撤退了自己的人员，但激进的“炮兵团”却拒不退兵并扬言“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两派裂痕凸现。1月26日两派分别夺权后，正式分裂。中央对未实现“大联合”的夺权不予承认并决定由昆明军区对云南实行军管。也许是对“8·23”在围攻军区时的撤围表现有好感，昆明军区及13军、14军支持“8·23”派的立场逐渐显露，而昆明军区副司令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朱家璧则支持“炮兵团”。地方干部也随之表明立场：省长周兴支持“8·23”，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支持“炮兵团”。由于双方都有军队支持，便都掀开了对方身后的“军内一小撮”。6月底谢富治、王力来云南处理问题，打倒了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军区副政委李成芳，“炮兵团”一度占得上风，并乘势将矛头指向13军、14军。但13、14军依旧坚挺。“8·23”派随即反攻，双方武斗升级，闹得昆明几近断粮。进入1968年后，“炮兵团”迭遭重创。先是其旗下的“工八团”被冠以“国民党滇西挺进纵队”之名被中央下令围歼，一次死亡200余人；接

着是支持他们的赵健民被康生打为“叛徒”、“特务”；紧接着是新上任的昆明军区第一政委谭甫仁（林彪嫡系）一到职就明确表明支持“8·23”。“炮兵团”的苦日子开始了。8月13日以谭甫仁为首的革委会成立，与此同时，在谭甫仁支持、鲁瑞林（昆明军区副政委）主持下，一场以镇压“滇挺”之名，针对“炮兵团”的“划线站队”风暴席卷云南，这又和军队与地下党的传统矛盾搅合在一起，株连干部群众无数，搞出了“赵健民特务集团”、“云南地下党”、“朱家壁‘边纵’游击队”等多个冤案，致死1.4万余人。两派自此结下血海深仇，1970年谭甫仁遇刺恐怕也与此有关。两派以后又是多年恶斗（批林批孔后“8·23”派内部又分裂），至今余波未泯。

陕西：在战胜了著名的血统论组织“红色恐怖队”后，1967年1月中旬，西安的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发生争论。西军电、西工大、西北大学的造反组织指责西安交大的造反派“调和”、“折中”、“投降”是“右倾机会主义”、“叭儿狗”并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的极端口号。造反派遂分裂为温和的交大“工总司”派（东派）和激进的军电“工联”派（西派）。其实“工联”派对“工总司”的指责甚无道理，当时毛泽东就批评“工联”派“极‘左’是有嫌疑的”。即以对军队的态度而言，湖北“7·20”事件后，“西”派于7月27、28两天组织数千人到省军区静坐，高喊“揪军内一小撮”；“东”派则发动近10万人的“8·5”静坐，冲击省军管会和21军军部，武斗战车自此启动。最惨烈的汉中武斗还把北大和聂元梓一起写“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高云鹏扯进去。由于两派都自认为是“一贯正确”的老造反派，均得理不让人，陕西武斗后来居上，1968年5月1日革委会成立后仍未平息，最后恼羞成怒的中央发布《7·24布告》，不分路线是非，各打五十大板。保守派一度想借造反派内斗之机复活，但终因陕西军区、21军支左坚决，没能成功。

甘肃：甘肃省委在1966年8月初明目张胆地支持铁杆保皇派李贵子操纵部分红卫兵冲击率先造反的兰州铁路局等单位，造成数起恶性事件。中央不能容忍甘肃省委这种明显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恶劣行径，遂将负有直接责任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裴孟飞、马继孔撤职。在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受到批评，11月10日，汪被罢官，第一书记由胡继宗代理。所以，11月10日之后，甘肃所有的群众组织矛头都指向汪锋，连最保守的血统论组织“兰州市红卫兵总部”也不例外。随之，保守组织成立“革联”；而造反派于1967年1月22日联合成立“红联”。2月5日，“红联”在甘肃军区支持下夺权后发生分裂。中央于5月中旬发表关于甘肃问题意见，批评了省军区并决定甘肃的支左改由兰州军区主持。被“红联”开除或后来自己杀出去单干的激进派组织于5月成立“红三司”，

被中央认为是左派，受到兰州军区的支持，而“红联”被视为是犯了错误、但可以团结的革命群众组织。三派起先是纠缠混战，从8月起，“红联”开始联合保守派“革联”与“红三司”对抗。斗争的焦点是省委第一书记胡继宗、省委书记处书记裴孟飞。兰州军区和“红三司”认为胡是中央肯定的干部，理应进入革命委员会，“红联”、“革联”坚决反对。而“革联”认为被罢官的裴孟飞是汪锋为自保过关抛出的替罪羊，应当解放，又遭到兰州军区、“红三司”坚决反对。当得知将成立的省革命委员会有“胡”无“裴”时，“红联”“革联”拒绝入阁。但由于省委、省人大机关都被“革联”控制，1968年1月24日成立的以兰州军区政委洗恒汉为首的革委会竟一度无处立足，“红三司”只得将革委会的牌子挂到了兰州饭店。而“红联”“革联”挺“裴”倒“胡”的风潮也未止息，直到3月将裴孟飞打成“刘、邓司令部的二线班子”，甘肃的派性斗争才告一段落。到了文革后期，兰州铁路局两派斗争再起。原因是邓小平进行交通运输整顿，1975年九号文件下达后，一直生产工作正常的兰州铁路局不服整顿，派性爆发，顿时大乱。在野的“红联”奋起反派性，矛头直指掌权的“红三司”。铁道部工作组到兰州后撤换了大批“红三司”的干部，但此时“批邓”已经开始，发生了下台的干部涌往北京大闹铁道部，找万里讨说法的事件。

宁夏：1967年1月以后宁夏先后出现了四大派，分别是“总指挥部”、“宁三司”、“宁总司”、“筹备处”。其中对立的两极是激进造反派“总指挥部”（以宁大的安建国、冯贤、杨长春为首）和复活的保守派“筹备处”，另外两家是温和造反派。“总指挥部”联合一些造反组织于1967年1月27日夺自治区和银川市的大权（有其它造反派反对），宁夏军区一度表态支持，2月11日却又撤回支持，造成“总指挥部”一度解散，军区又大力支持在3月份复活的保守派“筹备处”。“总指挥部”4月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中恢复，从5月初起与“筹备处”武斗，同时也与“宁总司”、“宁三司”发生武斗。由于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坚决支持保守派，军区独立师、各级人武部都有人参加“筹备处”与“总指挥部”的武斗。在“8·5”永宁武斗和“8·8”吴忠武斗中，造反派都伤亡惨重，中央遂“调虎离山”召朱声达入京，并派62师等部队到宁夏支持激进派“总指挥部”。温和派“宁总司”、“宁三司”抱怨62师偏袒“总指挥部”，而保守派“筹备处”则以武力围攻62师，部队受命反击，造成“8·28”青铜峡流血事件，数百人被打死打伤。此举引起宁夏军区上下的愤怒，当62师进入银川时，500余名独立师干部战士上街武装游行以示抗议。由于中央文革特别是康生态度坚决，反复表态，而朱声达已被调离，“筹备处”终于在1967年底逐渐瓦解，其中的反戈一击者则另组“筹革造”于1968年初在中央的主持下与“总指挥部”、“宁总司”、“宁三司”下实现大联合，于4月10日成立革委会。

新疆：新疆文革自始至终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焦点是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第一政委、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的王恩茂。以“红二司”为首的造反派（以新大“胡乱闯”、“胡大炮”为首）坚持打倒王恩茂，而保守派则有以“三促会”为首的“死保”派和“红三司”、“红革联”等“一批二保”派。1967年夏天武斗时，新疆军区支持保守派，空9军支持造反派。尽管“红二司”有中央支持，但毕竟实力不济，在乌鲁木齐只能困守新大等几个孤立据点。在中央急于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压力下，“红二司”只好“三促会”、“红三司”、“红革联”实行“大联合”，于1968年9月5日成立革委会。

青海：青海“8·18红卫战斗队”在1967年3月28日获平反后，以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为后台的保守派“捍卫队”即土崩瓦解，但造反派也内乱不断。“8·18”认为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军区司令刘贤权都是在“2·23”事件前就支持“8·18”，是革命领导干部，应予“结合”；而“东方红”、“主义兵”等组织则咬定杨植霖在解放前被捕入狱时有叛变行为，必须打倒。在“8·18”内部也有持稀奇古怪观点的各种激进派别，受主流势力的打压。最后以刘贤权为首的革委会于1967年8月12日成立。

西藏：西藏“造总”头头是一位毕业后主动入藏支边的大学生。对立面是保守派“大联指”。“造总”查封《西藏日报》、冲军区、反张国华（区委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在“二月逆流”中遭军区镇压。中央于1967年4月为其平反后，“造总”与军区支持的“大联指”在雅鲁藏布江大桥等处发生武斗，由于有军区卷入，伤亡不小。后来中央又和稀泥，承认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进入“三结合”，于1968年9月5日成立革委会。

第二节 清理废墟

伴随着革委会成立有三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对党政官僚尤其是作为“白区党”的地下党进行的大清洗。随着政治形势的稳定和群众运动逐渐平息，中央得以腾出手来处理高层自己的问题。首先这是从军队内部的清洗开始的。继1968年初打倒了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后，1968年5月经过马拉松式的审查，社会上又掀起了全面批判贺龙的浪潮。6月份毛泽东批准了对贺龙的审查。当然军队对“白区党”打击的打击一直在进行，1967年初的“61人叛徒集团案”几乎将“白区党”高层一网打尽，为后来军队全面清洗地下党系统奠定了基础。其最高潮当然还是打倒刘少奇。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正式宣布撤销刘少奇的一切职务，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开除

出党。10月16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号召批判刘少奇的“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开始了对刘少奇的新一轮批判高潮。在1968年，随着“清理阶级队伍”的展开，林彪等人直接操纵的对于党政文官，尤其是中央要员的打击迫害达到了高潮，出现了“广东地下党案”、“赵建民特务集团案”、“冀东冤案”、“内蒙古人民党案”、“新疆叛徒集团案”等一系列大清洗。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占到了干部队伍的17%，而在中央这一比例达到了更加惊人的70%。当然无数的回忆录已经控诉过，因此这里不再详述了。

关于文革中的死亡人数，毕竟文革期间人口暴增，因此没有任何人口统计数据支持，所以没有60年代初的饥荒的死亡人数被炒作得那么火爆。但是论其“增长速度”来说还是很惊人的。最开始在两案审判的时候，是说林彪四人帮集团迫害人数73万，致死3.5万人。但这只有“迫害致死”，似乎不包括军队镇压造反派和武斗导致的死亡人数。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死亡人数在40——50万之间，莫里斯·迈斯纳的《人民共和国史》也采纳这一观点。“公共知识分子”丁抒搞了一个“翻两番”运动，把死亡人数扩大为200万，大概是认为中国人多，死得起。而辛子陵先生则放了卫星，发明了一个“叶剑英讲话”：“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透露了一个数字：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当然也无客观证据支持。死亡人数至今已经翻了588倍，始终处于“左派嫌太多，右派嫌太少”的状态。

但是这里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对高级干部的打倒和下放固然是毛泽东的“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本意，即所谓“学习”和“接受再教育”，这是符合毛泽东后退一步的目标——清党整党的。但是必须承认对高级干部和地下党干部的打击确实是很强烈，甚至是很残酷的，尤其是对刘少奇的打击。毛泽东原本是希望多数干部能够“站出来”支持文革，但是造反派的持续激进化和全面夺权使得多数干部“站”不出来，只得以打倒而告终。而在对这些打倒干部的处理上，就不能仅仅用毛泽东的目标来解释，还必须考虑到作为这一打击的执行人，即以林彪为代表的军队激进派自身的利益诉求。

实际上这个问题同上山下乡一样，是文革阴谋论逻辑完成的终点，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就非常必要。首先我们说一下阴谋论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阴谋论认为，毛泽东对以前的政敌宽容是为了显示他的“正确”，而对刘少奇不宽容是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也就是说刘少奇要追究60年代初的大饥荒的责任，毛泽东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杀人灭口”，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自然非要把刘少奇整死不可。这么解释好像也说得通，不

过我在前面已经反驳了对于毛泽东给刘少奇“下套”的观点，指出阴谋论最大的问题是他的“后设史观”，倒推因果，完全无视具体历史事件的偶然性。经过这么一轮文革的叙述下来，阴谋论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而且，河南饥荒的“信阳事件”和吴芝圃的罪行就是在文革中被造反派“郑大联委”揭发的，吴芝圃被判为“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揭发信阳事件的造反派头头还进入了革委会。这使得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掩盖大饥荒的说法不攻自破。关于刘少奇之死的具体历史细节又有一定争议。比如一些人认为刘少奇之死的一些细节是杜撰的等等，这里不多做考证。但是确定的是一些描述刘少奇的命运的书由于煽情性太重而损害了严谨性。总之除了1967年“揪刘火线”有造反派的过激行动外，中央对刘少奇只是“严密监视”或“软禁”，将刘少奇转移至开封的“一号命令”也是备战需要。刘少奇之死的细节争议就更大，中央文献版《刘少奇传》也没讲，这里就不考证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如果按照传统说法，毛泽东针对的是刘少奇一人，他在1968年彻底摧垮了刘少奇的支持者取得了胜利，那么我只能说刘少奇的魅力也太高了一点。刘少奇的“粉丝”居然占到了中央成员的70%，全体官僚的17%，还不用说那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但是最终被保护下来没有被审查的人。斯大林的大清洗虽然比例比这个高一些，但是针对的也是反对斯大林的形形色色的派系，而不是具体的一个人或一个派。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如此不可撼动，可是人们还是要区分一下“老左派”、“改革派”、“上海帮”之类，真正意义上的“邓派”反而少之又少。实际上，阴谋论者所持的是一种“全民论”的逻辑，天真烂漫地以为某一个人就真的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所以要打倒这个全民代表就要残酷镇压迫害全体人民，这就要用人道主义把文革中不同性质的悲剧统统混淆。且不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会对此嗤之以鼻，即使是最保守的政客也不会接受这一点，那些在60年代初被刘少奇“精简”到农村的后来又回城的外包工们就更不会赞同这一点。也就是说，文革阴谋论的背后正是全民论，而全民论往往是当权者“忽悠”人民的最好手段。

如果我们用军内派系斗争解释林彪对军队领导的残酷打击，那么对于1968年党政文官和中央官员的大规模审查和迫害的解释可能也不算太难。那就是军队系统对于党政文官的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党政文官和军队在前17年中斗争激烈，高岗事件和彭德怀事件是两次集中的爆发。也就是说前17年中军队和文官接下的梁子已经太深，而在历次斗争中刘少奇作为党政文官，“白区党”的总代表始终表现活跃。因此军队在文革初期支持了对党政文官的批判，这是毛泽东得以发动文革的必要条件。但是后来军队由于造反派的持续激进化而选择了保守立场，与党政文官的矛盾被放到了一边。随着1968年对造反派的镇压，清算“白区党”和“红区党”之间的矛盾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那么，

林彪继承高岗的遗志，在对党政文官进行报复时自然不会手下留情，借着文革的机会对党政官僚进行了一次致命的打击。而在高岗事件和彭德怀事件中表现抢眼的刘少奇就成为军队眼中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我们注意到，当权派在“打击一大片”时要打压军队，使用的是查“假党员”的方式，因为战争中入党都比较匆忙；而军队对当权派的清洗是按照所谓“抓叛徒”，揪历史问题来进行的。那么，在敌人统治区活动的“白区党”就很容易被冠上“被捕叛变”的“叛徒”的罪名遭到打击。一些无辜的地下党员也在军队进行的对文官的大规模报复中受到迫害。而且军队自己也明白，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自己的姑息迁就完全是因为军队承担着恢复社会秩序的大任，更不用说经济生产、工程建设还需要军队来维持（如南京长江大桥就是许世友带着军队在 1968 年完工的）。但是军队不会天真到以为毛泽东周恩来会真正代表自己的利益。那么，不断地清洗有可能取代自己的人就成为保证军队掌握利益持久化的一块很重要的砝码。

除了军队和文官的深刻矛盾以外，毛泽东对刘少奇处理的加重也不是百分之百出于满足军队的利益需要的目的。从另一角度来说，由于文革已经进入死胡同，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始终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随着文革遭遇热月，中央已经不可能再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或“**特权阶层**”去解释“走资派”，那么，抓出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此提法由毛泽东在 1967 年初为批判“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而提出，虽然大家心照不宣，但直到 1968 年底官方才承认是刘少奇，而“**二号走资派**”始终未点名）“以谢天下”就成为了首选的方案。就像毛泽东在 1957 年以“引蛇出洞”来为自己失败的鸣放运动进行辩解一样，此时已经成为了公认的前 17 年体制代表的刘少奇就成为了文革失败的替罪羊。按照莫里斯·迈斯纳所说：“**即刘少奇对革命的背叛不是党内自然的产物，而是外部力量对党的侵袭的结果，于是可以把‘两条路线’的斗争解释为革命和反革命、在整体上保持着革命纯洁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与外部渗入革命队伍的敌人之间的斗争。**”从而维护党的一贯正确的形象。就像我之前说的，文革运动的意义已经被下降为一场与文革前的政治运动毫无区别的对党的一次“整风”，而不再提已经失败了的政治经济体制变革了。因此在 1968 年的官方话语中，“抓坏人”、“揪出代理人”的倾向就非常明显。

第二个现象，那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 1968 年达到了顶峰。表面上看这似乎是 1966 年以来的延续：比如毛泽东的著作以大数量发行。文革十年间，《毛主席语录》的官方出版量达到了 10 亿册，《毛泽东选集》发行了 1 亿 5000 万册，《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发行了 9

亿张。但是，伴随而来的是《毛泽东思想万岁》（由红卫兵以查抄政府机关机密档案等手段编成的民间私印毛选，其中泄露大量机密，有的今天官方都未解密）被大量销毁，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造反小报”也随之消亡，而文革初期群众对毛泽东自发的崇拜和在此名义下的造反夺权活动已经被强制性的宗教仪式所取代。佩戴毛主席像章和挂毛主席像已经由自发行为变为强制；军队支左干部和工宣队、军宣队操控下的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等多种古怪的“献忠心”活动取代了以往的大鸣大放。姜昆的著名相声《如此照相》就是对这一时期情况的极端化夸张。有人这样描述：

“例如，人们可以看到，在北京各地，军宣队召开各种座谈会，在会上，对立组织的成员坐在一起绣毛主席的画像，在家庭里常常建有毛泽东思想的‘忠字台’，全家人围坐在台边献忠心。学校的孩子们不再以‘早上好’而是以齐声朗诵‘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来开始一天的活动。在全国各地都修建了用传统宗教象征装饰起来的纪念馆以记载和纪念毛主席的生活和业绩。人们有组织地来到这些被官方新闻机构称为‘圣地’的纪念馆朝圣以表现自己的忠诚。而检验对毛主席是否忠诚的标准，也不再是看其是否能按照毛泽东思想而采取革命行动，而是看其背诵的毛主席语录多不多，其挂在街上或家里的毛主席像大不大。1966年，对毛泽东的崇拜鼓励了人们去破除迷信，1968年，对毛泽东的崇拜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迷信。”

对于文革中“个人崇拜”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个人崇拜在不同的时期的表现形式和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在革命退潮的1968年，在“个人崇拜”领域，那个“一贯正确”的党的领袖的毛泽东，那个党政官僚系统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已经完全击垮了代表着翻身解放，代表着“造反有理”，向官僚主义和不平等开火的毛泽东。官方似乎认为毛泽东这个唯一的旗帜能够把几乎撕裂成两半的中国重新缝合起来。让曾经势不两立的组织在一起绣毛主席像的行动，看上去也是一场维护“安定团结”的努力。同时这也是军队（以及他们操控下的工宣队）从造反派手中夺取话语权的一种方式。对此，莫里斯·迈斯纳这样分析：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文革运动几乎被埋葬之时却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由于群众宣布他们永远忠于包罗万象的‘毛泽东思想’，因而他们也就放弃了他们一度掌握的权力，现在他们就得使自己隶属于产生这种智慧的人的权威，这一切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不过，

在群众运动的废墟上盛行起来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也受到了军队领导人的欢迎，因为他们长期以来就热衷于用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的‘思想改造’来取代反对现存机构和当权派的真正的政治运动。而军队现在是人民共和国支配一切的机构。”

第三个现象就是 1968 年 12 月毛泽东发出的那条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并从以前的倡议变为强制。1968 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 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 1600 多万人，约占城市人口的 10%。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1969 年珍宝岛之战后，“全民备战”展开，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从 1969 年初到 1970 年，全国共拥有 12 个“生产建设兵团”及 3 个农垦师。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的目的是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使城市避免出现无业游民。这一结论也与官方所说的“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生产停滞”相吻合。不过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尽管城市中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确实已经过剩，但文革期间全国职工数量从 1966 年的 5198 万人增长到 1976 年的 8673 万人。尽管文革初期的混乱导致职工人数增长缓慢，但是在社会稳定后，随着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的进行，从 1969 年开始职工人数就开始大幅增长。毛泽东 70 年代的批示中甚至有陕西咸阳附近的工厂已无知青可招的情况。可见如果说是缓解经济混乱带来的就业岗位匮乏的话，那么也是指很短的一段时期之内，根本不能作为上山下乡制度化的理由。总归来说上山下乡得以持续肯定是与文革初期所提出的教育革命的目标有关，教育革命的后果我们放到后面再讲。但是起码在 1968 年，上山下乡的短期目的还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排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解散红卫兵组织。由于文革的失败，这些胸怀理想却对社会缺乏真正了解的红卫兵如何处理就成为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且不说异端思想，他们在城市中蔓延的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煽动已经缺少意义的武斗，对于社会已经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了。将他们赶到农村去或许是最糟糕，但却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最终原本势不两立的几派红卫兵都卷入了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他们之中有还在思考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异端派，有曾经在各地支持鼓动造反，大鸣大放的普通造反派，当然还有自视“血统高贵”，已经成为逍遥派的高干子弟“老红卫兵”。几年后，当这些曾经势不两立的不同派别的红卫兵归来的时候，他们都可以以“知青”

这同一个名号去控诉文革对他们青春的浪费和耽误。

对于红卫兵本身来说前往条件艰苦的农村可能是锻炼，但总体上并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多数人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最严重的还不在于此。尽管文革遭遇惨败，但是多数人还是不能完全理解文革对于社会主义的教训和意义。之前已经说过，造反派贸然夺权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忽视了阶级组织的培养和阶级意识的启蒙。很多人是出于对“50天专政”或“红”八月的报复心理加入了运动，发泄一下几年来，或者是在运动初期对党委领导的不满，有人是出一口恶气，有人是怀着“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心理，更不用说少数投机分子了。因此，红卫兵在斗争中似乎并未完全学会斗争，更多表现出的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所描绘的所谓“青春的躁动”。这种心理使得他们离真正的阶级斗争越来越远，无政府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横行。这使得他们无法很好地总结运动的经验教训，为左派的长远行动确立目标和信仰。因此，在“7·27”指示和上山下乡的大潮来临之时，他们中的多数人自然产生的是一种理想破灭的绝望情绪，一种“被利用”的感觉。这种幻灭感带来了中国人对于政治的失望，这种虚无感使得人们越来越觉得自己当年不自觉的，无意识的利益诉求是在“说假话”。在实践上对改开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政治虚无主义情绪具有极大的影响。人民对政治的冷漠带来的自然是官僚和精英们对政治经济的自由操纵和控制。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最消极的后果。

但是并不是说在这些人中就没有思想者。在经历了文革失败的挫折和上山下乡的实践后，“文革后期民间思想”就成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主题。在抛弃了城市造反过程中的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后，就如一些人所说，“一个是懂得了中国的老百姓多苦，又懂得了中国的老百姓多好。”在知青中间，举例来说，围绕着当时农村的现状，1968年秋天，20岁的高干子弟张木生（其父曾经给周恩来、董必武当秘书）写出了5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在这篇文章里，张木生批判了学大寨的偏颇，并对当时中国的体制问题提出了质疑，并得出一个结论——“包产到户”确实可以增产。文章很快被油印传播，北京知青中刮起一阵“张木生旋风”。反对者也不少。在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铅印了一本书——《老贫农怒斥张木生》。1969、1970年间，知青“扎根派”和“不相信派”之间的论争愈演愈烈。“不相信派”是以张木生为代表，“扎根派”则以任公伟为代表。在北京，两人在沙龙中就曾对各方面的问题面对面地激烈论争。任公伟等人又在他们的油印刊物《广阔天地》、《任重而道远》上对“那些打着‘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张木生之流”进行了连续的激烈的批判，驳斥张木生等人的言论。有人写内参，把张木生告到周恩来、

陈伯达处。周恩来批示说“有一些插了队的年轻人，他们去探讨一些过去不认识的世界，不要轻易的就去给扣上什么反革命的帽子。”但在1972年，张木生在呼和浩特被捕入狱，坐了8个月的牢，1973年被推荐进入内蒙古大学读书。钱理群老师总结说：

第一派认为中国关键问题还是特权阶层，要解决特权阶层的问题，他们主张一次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有很深刻的分析，他们探讨了特权阶层是怎么形成的，那时候思想已经达到很高的深度，形成权力资本的概念，权力向资本的转化，才形成特权阶层，认识已经到这个水平了。因此认为中国需要再进行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就要解决权力转化为资本特权阶层的问题，因此要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工人农民、劳动者有管理权的，没有官僚的，相对平等的，劳动者管理权力的新的民主制度。那个时候也提出来了，西方的一些民主经验是不是可以借鉴。总体来说，主要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优先，这是一派。

第二派，就是认为中国要解决民主、法制和启蒙这样一个思路，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新的法西斯专政，要解决新的法西斯专政，关键一个是法制，一个是民主，再就是启蒙，这就是法制、民主、启蒙是他们的三大口号。这种法制、民主、启蒙基本上是主张要通过街头政治来解决，用民间的民主争取法制、民主、启蒙。同时他们提出来修订宪法，但他们对宪法的修订就提出来要把巴黎公社三原则定下来，要有选举权，要求把人民民主权利写进宪法。而当时的启蒙理解很有意思，他们强调启蒙的关键是要使劳动者有自己的觉悟，劳动者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看出这些他们理解的民主、法制的启蒙，其实有相当多社会主义理想在里面，左派的、左翼的民主法制和启蒙的思想。

第三派，张木生他们，我曾经总结了张木生的思想，有几个要点，他觉得中国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回到一些常识上来，首先要使老百姓过好生活，第一个观点，首先使老百姓过好生活，有点像今天讲的民生问题。第二，怎么使老百姓过好生活，就要发展生产力，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三，怎么发展生产力，怎么改善老百姓生活呢，主要要靠体制，他

主张体制内部的改革。改革必须要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内部体制的改革。第四个要点，体制改革从哪里入手呢？从农村入手。第五个要点，农村怎么改革，从改革人民公社制度入手，是这么一条思路。

这样就可以看出，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由改革开放实现的主要是第三条路线，按照这样的设想，80年代中国农村体制改革基本是沿着张木生他们的思路，是他们这一派的思路，一直到今天，改善民生、发展生产、经济为中心，这样的思路，是按这条思路进行改革的。

另外，80年代也强调民主、法制和启蒙，但你可以发现，80年代的法制和启蒙跟我们当年想象的民主、法制有一点区别，（第二派）**那个民主法制和启蒙是带有左翼思潮的，强调劳动者的权利为核心，劳动者权利和劳动者觉悟为核心的，跟后来八九十年代所主张的民主、法制和启蒙是不太一样的。相反劳动者权利是被忽略的，我们讲法制，讲这些都是跟劳动者无关的了。**

第一派基本是被拒绝的，完全拒绝的，而且被人遗忘的，有些人都不知道有第一种，基本上不知道，就被遗忘了。

实际上，这三派思想经过酝酿，在文革后期都有所表现。第三种后来张闻天等人也都做过类似思考，并成为邓小平和党政官僚集团的实践，这里不多说。前两种实际上是文革后期的异端思想，也就是主张用民主和法治这样的温和手段来达到激进的政治目的，并明确将目标锁定为“特权阶层”，强调法制对于“反迫害”的意义。1974年李一哲的《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就是这方面的代表。第一种思潮在文革后期还反映到了高层，1975年毛泽东和文革派提出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就与这一思潮有相当的关联性。

这三种社会思潮都延续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不是所有的思想都能够付诸实践。改革开放后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关系和斗争结果最终决定了只有那一种思想可以占据主流，最终断绝了继续完善升华其它两派思想的可能。

第三章 中共九大

第一节 清理阶级队伍

前面已经讲过了社会异端思潮的过程，同时也论述了在文革走向失败的情况下军队对社会的普遍镇压活动及其成因。下面我们来看具体的历史事件。

随着 1967 年底中央开始关注恢复秩序，针对造反派无休无止的派性斗争，他们希望对造反派进行一次系统的整顿工作，使造反派能建立有力的阶级组织。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1967 年 11 月 27 日，江青在讲话中说：“在整党建党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由此开始。

在一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的目的在于平息造反派武斗，恢复社会秩序。但是很快，随着“全国山河一片红”，革委会在全国成立后，军队在社会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结果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由对造反派的整顿变成清洗。它成为了军队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倒台的党政官僚和造反派进行的疯狂迫害的手段。显然，由于军队是此时社会的唯一支柱力量，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于军队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由于自身利益取向而产生的偏差都采取了姑息迁就的态度。清理党政官僚尤其是“白区党”的活动前面已经讲过。而在对造反派的清洗过程中进行工作指导的，除周恩来、康生外，其他参与者几乎构成整个后来的“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利于造反派的调整过程，几乎没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的过多参与。

1968 年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有步骤有领导地吧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这里节选一部分：

.....据统计，在这个厂的二十六个加入过国民党的工段长一级干部中，有二十二个已经混入了共产党。因此，建国十八年来，这个厂的阶级斗争一直是极其复杂，尖锐，激烈的。针对这种情况，军管人员今年二月二十一日进厂后，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狠抓阶级斗争。不论是搞革命大联合还是促进革命三结合，不论是开展革命大批判还是进行本厂的斗批改，他们都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

在这个大会上，军管人员历数本厂建国以来出现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发动群众进行揭发和检举，进一步揭开厂内阶级斗争的盖子。根据群众的揭发，检举和军管会的调查核实，接着又在四月十六日全厂的对敌斗争大会上，斗批了六个公然诬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

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这两次大会，把群众充份发动起来了，正像有些工人形容的那样，“大好形势，大快人心，大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阶级敌人的威风”，使这个厂的对敌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从北京新华印刷厂的情况来看，所谓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主要是指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原来占全厂总人数三分之二的“大联总”一派的一些骨干成员**，跟着坏头头艾善泉，冯学志（已被专政机关逮捕）干过许多坏事，但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一种是有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但还不是叛徒，特务。按群众的说法，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在全厂少说也有百人以上，数量相当大。特别是第一种人，他们的问题同原来本组织中的一般群众大都有联系，处理好坏对全厂的运动影响极大。军管人员认为，对敌斗争，能不能掌握好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的也就是看能不能正确地处理好这些问题。……

凹印车间有五个青年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不少坏事。群众很气愤，要求揪斗。军管人员经过认真研究，注意到这几个工人是因为觉悟不高和缺乏经验受了坏人的蒙蔽和利用，真正的阶级敌人不是他们，而是蒙蔽，利用他们的人。因此他们说服群众不要揪斗这五个人，同时反复向这五个人宣传党的政策，鼓励他们检查交待自己的错误和对阶级敌人进行大胆的揭发。经过了这样一番工作之后，有一次在召开全厂对敌斗争大会的时候，五个工人中的三个主动地跑到台上检查了自己的严重错误，沉痛地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与此同时，他们又当场向广大革命群众揭发了指使他们干坏事的黑后台，现行反革命分子于冬海。这时，五个工人中的另外两个，已经守候在这个反革命分子身后，等台上的三个工人一声招呼，他俩就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坏家伙揪到台上，交给群众批斗。

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是很坚决的，不论是对特务，叛徒，还是对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都带领群众，狠揭狠批。特别是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地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

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他们还准备进一步挖掘埋藏得更深的特务分子。

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强调“发动群众”，“揪一小撮”，但这样的政治运动总体上是在远离文革式的“四大”运动方式，向文革前的四清运动和50天专政类似的官办政治运动靠拢，或者说是刘少奇版“运动群众”的“群众运动”的复活。分析这篇文章，实际上军管会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么几条：首先是讲讲这个工厂“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就是以出身和“政治历史问题”将人们划定好队伍；之后是充分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人人过关，然后通过官方运动揪出暗藏的敌人。我们注意到，这场运动与文革运动相同的是揪出“走资派”，但是也利用了造反派的一些错误对造反派进行残酷斗争。在这里，家庭出身和历史问题再次取代了之前的“现实行动”、“表现”成为评判革命和反革命的主要标准，这无疑是文革的倒退，是对血统论的风气助长，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中的“血统论回潮”现象。而在文革运动中则是以“表现”来评定是否“革命”的，知识分子可以给群众组织当“秀才”（如白桦写的控诉百万雄师的诗集），一些右派甚至参与了武斗并写了歌颂武斗的诗歌，资本家的子女可以以红卫兵的身份接受毛泽东的检阅，《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因历史问题一直受审查，却是重庆最早的造反派之一，而四川省的造反派头头竟是国民党军官的儿子。而这一时期严格的血统论色彩的审查就将许多人拒之门外甚至遭到迫害。这种包办替代主义的运动显然是对要求“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造反派的极大打击。血统论对造反派始终有害无利，当党政官僚挥舞它时是如此，军队挥舞它时也同样如此。

清队的主要内容是对激进造反派的镇压。在文革中，造反派由于极端激进化而产生了大量极端的行为，而造反派激进化越极端，得到的支持就越少，反对声音，尤其是对煽动武斗和平均主义的主张的反对声音就越强。但首先要明确的是造反派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激进和极端的。正是党政官僚拒绝妥协的态度导致“反抗——镇压”模式持续升级。保守派的镇压越来越残酷，而造反派的反弹也就越强，从而导致了造反派的持续激进化 and 极端激进化。工作组、干部子弟、军队这么三轮对造反派的压制下来，你是不可能指望造反派能够做到“温良恭俭让”的。另外，由于造反派的一些失误，比如说贸然夺权，缺乏及时必要的阶级组织和阶级意识，导致队伍成分复杂，因此在进行反弹的时候常有一些过激的举动。而且由于造反派越来越激进，它所代表的利益阶层也就越来越窄，它的一些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的主张确实使得不少群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这是造反派惨遭镇压的社会基础。而且现在的状况是，军队掌握了国家的大权。新上台的军队干部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利用了人民对于造反派的不满，将这种对立扩大化，更不用说势不两立的保守

派组织趁机进行的大规模报复。结果造反派组织受到沉重打击和迫害，在革委会中能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小。1969年5月中央批判湖北“反复旧”运动的《5·27指示》实际上承认了军队在革委会中的绝对支配地位。就如有人所说，“当权派的一切作为都免于追究，实现‘团结’的唯一的调整方式是压制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抗。”显然这对支持文革力量的发展和保留文革仅存的成果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另外我之前说过，由于军队很清楚自己能够上台是因为很特殊的原因，那就是毛泽东希望借助军队的力量恢复秩序。至少是恢复到政府部门平稳有效运行的状态上。因此毛泽东对于军队在恢复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掺杂进符合自己利益的“私货”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而军队也很明白自己的这种地位是暂时的，等时机到了毛泽东一定还会把他们请下去，让造反派和党政官僚再来战一回合。那么，赶快削弱其它两股力量，使得自己的地位永久化，就是军队优先考虑的目标。所以军队无论是对于“白区党”干部的清理还是清洗造反派都毫不手软。当然军队自身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以林彪为首的激进派对于其它温和派（如对罗瑞卿、贺龙、杨成武）的攻击和清理也都一直在进行之中。但是我们必须分清楚不同性质的矛盾。

由于是打击一切与军队利益相悖的人，清理阶级队伍的罪名便五花八门。直接针对造反派的有“一小撮坏头头”、“武斗干将”、“破坏文化革命的坏人”、“大黑手”等，此外还有“国民党残渣余孽”、“伪军警”、“漏划右派”、“逃亡地主”、“反动资本家”、“反动权威”、“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动阶级遗老遗少”等等。当然还少不了“地、富、反、坏、右”。而这场运动也证明了文革的领导者与参与者的那种脆弱的联系。当军队和保守派群众组织对造反派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行动时，当造反派再次遭到包办替代式的政治运动打击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再也没有出来为他们进行辩护和鼓动。造反派对中央高层的失望和冷漠使得高层文革派逐渐丧失社会基础，为1976年文革派的彻底失败埋下了伏笔。

在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提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1969年2月开始的“内人党（内蒙古人民党）案”又把清理阶级队伍推向了高潮。这次对“白区党”的打击由于牵扯到民族矛盾和派性斗争，结果导致34万人受到牵连，1.6万人被迫害致死，成为清理阶级队伍中最大的案件。革委会主任滕海清因搞扩大化而被撤职。

但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还不完全等同于文革结束后的那种以是否“起家”来划线的“揭批查”和“清理三种人”运动。不仅仅是造反派中被清洗的也有不少是那些确实有打砸抢

行为，过火的武斗或者是提出过异端主张的人(但这个人数也已经相当庞大)，而且一些同意妥协的激进造反派被保留了下来，一些温和组织以“犯错误的老造反派”的名义加入“三结合”。造反派的头头被“突击入党”吸纳进了体制之中。还有就是大批倒台的当权派（尤其是地下党背景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也在这一时期遭到了清洗和处理。对以刘少奇为首的当权派的清洗前面已经说过，在“红”八月结束后暂时松了一口气的知识分子此时又像 50 天专政一样被关进“牛棚”、“学习班”或下放到干校。这段时期是 1966 年后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的又一个高峰期。翦伯赞、吴晗、田汉、范文澜、杨朔、李广田、赵树理、萧也牧、孙维世、闻捷、郑君里、海默、邵荃麟、严凤英、以及“乒坛三杰”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等人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军队专政时期遭迫害逝世。

而清理阶级队伍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打击已倒台的干部的子女，这是军队挥舞着血统论的大棒扫向造反派时的一个副产品。干部子女在 50 天专政和“红”八月之中的暴行已经有目共睹。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随着他们的父母倒台他们也受到残酷打击。打击干部子女的最出名的例子是刘少奇之女刘涛和邓小平之子邓朴方。邓朴方受迫害致残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不再赘述。刘涛在运动初期是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自控系“文革”主任。并指挥了 12 校联军冲击清华的事件。后来她又领导了清华的“黑帮劳改队”，在“红”八月中残酷迫害校领导干部和教师。在清队运动中刘涛被工宣队几十次谈话，还被迫写了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针对军队利用血统论镇压造反派和肆意报复干部子女的情况，1968 年 12 月毛泽东批示说：“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

对于清理阶级队伍，莫里斯·迈斯纳评价道：

“它的表面目的是审查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党的干部和其他领导人以及在动乱期间上升到领导职位的人在政治上的可靠性。清理中使用的标准标志着毛泽东主义在确定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问题上的进一步退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规定按照政治行为来确定阶级，而现在他却对站在旧路线上的官僚主义者做出了妥协，后者认为，强调社会阶级出身在政治上十分有利。**这样，调查组受命不但要审查被审查对象的政治历史，还要审查他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可能有的社会关系。**为了适合当时的政治潮流，对**

于知识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激进组织的领导人的审查清洗十分严格。据观察，保守派组织的政治领导人对‘清理’运动的反应十分热烈。一般地说，整顿运动是从干部扩大到群众，许多人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受到了各种形势的迫害和歧视。过去的社会出身如今再次成为机型政治判断的标准，家庭历史不那么纯洁的人成为与其在政治上或个人关系上有宿怨（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的大量的新的仇恨）的其他人的嘲弄对象。”

第二节 九大与清洗的继续

早在 1967 年秋，毛泽东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就党的九大准备工作和召开时间等问题在上海做调查。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了主持九大筹备工作的领导机构。1968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毛泽东在全会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认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已被打倒，夺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召开党的九大便成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的一项迫切任务。1969 年 3 月 9 日——27 日，九大预备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预备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它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认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承认文革造成的军队专权的既成事实，有“唯生产力论”的嫌疑，让张春桥重新起草（这可以说是毛、林矛盾的前奏）。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69 年 4 月 1 日——24 日在北京举行。研究者一般认为九大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开始走向衰亡的标志。出席大会的代表 1512 人，代表全国 2200 万党员。多数代表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军队上级指定，有的人是在确定为九大代表之后，才赶办入党手续，甚至是在赴京列车上才“突击入党”的。相当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处在被审查或监禁中，未能作为代表出席九大。

4 月 1 日，中共九大正式召开。这个日期颇具讽刺性。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

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把党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即所谓“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并提出了“斗、批、改”的新任务。但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对于文革的评价虽然很高，但是仍然没有超出“五十字建党方针”的范围，也就是把文革定义为一场“巩固党”的超级整风运动，与文革前的政治运动几乎没有差别。显然，由于文革的草草收场，领导人已经完全不提原来的激进的体制改革方案了，仅仅是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斗、批、改”而已。

九大是一次超级精兵简政：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和固定的入党誓词（“入党誓词由党员本人填写”），取消了一线二线的划分，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复了活动，政治局常委 5 人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文革的指挥机构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的权力格局是全国权力极度分散到地方而中央权力却高度集中于毛泽东手中。红卫兵也被纳入中学体制之内，成为取代了原来的共青团的普通组织。而少先队则被“红小兵”取代，都只是换个名字而已。

这次大会是军队的胜利，大会选举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70 人，候补中央委员 109 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 53 人，军队干部达到了 136 人，占 49%，群众组织代表和老干部平分了另一半。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如果脱离了“军队干部最终主导了文革走向”这个宏观背景，那么关于林彪与文革的关系的探讨就不会有多少有意义的结果。4 月 24 日会议闭幕后，中央才向外界宣布九大召开，在九大《公报》中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声称九大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从录像中可以看出，似乎是为了突出“团结”和“胜利”，其气氛之活泼亢奋真的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次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而更像是一场全党联欢会。在有录像可查的中共代表大会上，九大可以说是最不严肃的一次大会了。

1969 年 3 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激烈交火，国际局势一度达到了非常紧张的地步。

关于外交方面的问题不是本文的范围，但是对于当时几乎被派性斗争撕裂成两半的中国来说，找一个共同的对外目标转移社会矛盾似乎也是一个好方法。于是，在阶级斗争遭遇了严重挫折之后，民族主义又成为了团结中国人的一道良方。

8 月 28 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

怕。”并接连提出了“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中央领导（包括已被打倒的）被疏散到全国各地，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至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1969年10月1日，建国20周年国庆节上，“全民皆兵”的标语非常引人注目，同时出现了一条历史上最长的国庆口号：“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这一口号为毛泽东亲自草拟。到了这个时候，尽管还有对“苏修”的批判，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团结”的色彩却开始冲淡了原有的阶级斗争。为了缓解社会上各阶层之间激烈的矛盾和恢复社会秩序，更是掌握主导权的军队要把整个社会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牵引，那么通过全民备战运动“一致对外”就成为了转移矛盾的好方法。尽管全民备战运动只此一次，但却给了后来的执政者利用民族主义来转移国内矛盾的启发。

1970年，新一轮的政治运动开始，这就是“一打三反”。它来自于1970年初的3个通知：即1月31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实际上当时进行的主要是第一个。它声称：

.....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乘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连，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作，为害很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不多了，但还有反革命，而且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当前国内外阶级搏斗激烈，反革命分子必然要跳出来，或者由国外派进来，进行破坏和捣乱，对此必须提高警惕。

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

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

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报复，特别要严防用资产阶级派性来混淆敌我，在那些思想上、组织上还没有真正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地方和单位，应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把钻在本派里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出来。

在紧张的国际局势下，原本对武斗和派性的平息工作骤然上升军队掌控下的针对造反派的镇压和清洗。遇罗克即在这一时期遇害。一些在文革中进行打砸抢，煽动武斗，对敌对派系进行残酷打击的造反派头头也在这一时期被处死。为了在短期内达到规模，将死刑的最高核准权被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只需要把杀人人数报到中央备案即可。而省一级将权力进一步下放，最终县一级都有权力宣布执行死刑。大清洗自然也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以至于毛泽东在公安会议上不得不警告“**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10个月内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人，逮捕28.5万人，9000人被判处死刑。这一次镇压与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和1983年的“严打”并称为三大镇压运动（1955年的“肃反”广度强度都有限）。不过来得快去得也快，下放的死刑核准权在运动结束后很快收归中央（1975年张志新被处死时是由最高法院批准的），并未出现1983年“严打”后死刑核准权竟然24年收不回中央的情况。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打三反”中的后面两个通知，在通知中列举了地方上大量的贪污腐化浪费的行为。如《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即要求：

……有些单位大兴土木，讲排场，摆阔气，请客送礼，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这种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作风。严重地影响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当前的战备工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中央重申：

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要一律暂停下来，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根据当地情况，分别移作他用，然后重定节约施工计划，付之实施。

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不许随意拆迁房屋。目前正在施工的，责成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重新审查，酌情处理。……

四、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必要时由内部调剂解决。确需购置的，地方经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军队经军以上党委批准。严禁用公款购买沙发、地毯、钢丝床、电冰箱等各种高级消费品。

五、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看戏、看电影。不要搞不必要的庆祝活动，更不许借庆祝活动搞铺张浪费。……

由于革委会保留了基本的官僚制，很大程度上只是军队工农干部坐上了当权派原来所坐的位子，可能会起到监督制约作用的造反派则被排挤和边缘化。因此对于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自然缺乏足够的遏止力量。这一结果自然也使得许多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产生了巨大的疑问。这一时期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很大程度上使得异端派的对特权阶层的论述得到了某种“印证”，这为后来文革派与党政官僚的持续斗争埋下了伏笔。

但最大、最恐怖的清洗是清查“5·16”运动。在江青批判“5·16兵团”的“9·5讲话”发布之后，1967年9月8日姚文元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声称：“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取了陶铸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正式拉开了清查“5·16集团”的序幕。到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5·16”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之后清查“5·16”运动几乎伴随着每一场政治运动，随着“罪行”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它已经变成了一场持久战。1967年底倒台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被认为是“5·16”的后台，1968年初倒台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被认为是“5·16”的后台。显然，既然“5·16兵团”产生于造反派中的激进思潮，那么清查运动就是军队用以清洗造反派的最好形式。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

一六’。……**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到1971年，林彪又说：

“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五·一六，一个也不能漏掉。”

清查“5·16”规模越来越大。其打击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整人手段之卑劣，在文革中都属少见，堪称文革第一大冤案。地方上清查“5·16”往往是由军队干部主持，专案的具体经办人员（当时称为“动力”）往往是进入“三结合”的“革命干部”和保守派组织。数百万人（主要是造反派）受到牵连，仅湖北造反派就被“清查”60万之众，出现了所谓“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局面。各种“批斗会”“攻心会”开始展开，逼供信盛行。连各种“学习班”都成了清查“5·16”的战场。运动动用了曾经被激烈批判过的包办替代主义的政治运动方式，即四清运动中的一系列整人措施，如“坦白运动”、“一般号召”、“个别突破”等等。如果说清理阶级队伍还有“群众路线”的话，那么清查“5·16”则大幅借鉴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原本一小撮异端派“炮轰”周恩来的行动竟招致了横扫造反派的一场浩劫。连当年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王大宾也被卷入其中。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揪军内走资派”中受到造反派强烈冲击，因此在清查“5·16”中报复起来当然不手软，以至于江苏产生了一首民谣：“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造反派在他们曾经在50天专政中遇到的这种“运动群众”的专政面前毫无反抗之力。即使后来军队退出政治舞台，清查“5·16”始终是不同的利益集团打击对方的有效武器。1970年任“5·16”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倒台，1971年林彪倒台，他们都相继被认为是“5·16”的“黑后台”。后来连四人帮都被看作“5·16”的幕后主使。直到文革结束后更加彻底和恐怖的“揭批查”运动和“清理三种人”运动出现，清查“5·16”的行动才不了了之。

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这三大针对造反派的清洗运动证明了，在经历了文革中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坐上了当权派曾经的位置的军队和工农干部整起人来并不比当权派要温和多少。由于造反派的冒进导致的文革的失败，政治体制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曾经被大家用刘少奇做符号的那个体制或路线即使在刘少奇倒台后仍然能由不同的利益集团来使用。尽管文革的失败给中国社会和经济带来了极大地破坏，给一代中国人带来了绝望、不满和冷漠的情绪，但是情况并不完全是像表面上那样糟糕。在那两年的时间里，大多数中国人得到了有限的，但却是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会不平等，向权力机构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公众讲坛、大字报和报纸上表达自己的主张等等。很难想象这种失败的，有限的却又空前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罢工自由没有对人产生深远的影响。既然文革中除了毛泽东什么都可能成为批判的对象，那么很

难说他们会忠实地听从毛泽东的继任者——无论是谁——的指挥。在大批判把党的大量阴暗面揭发出来以后，党已经很难保持原有的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而军队和工农干部渔翁得利的结果也说明不要寄希望于别的利益集团会代表自己阶级的利益，因此这就又回到了《十六条》中的那句话：“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包办替代的方法。”

经过了中共九大和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三场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已经结束了。但是“天下大乱”并没有带来“天下大治”，中国的前景似乎是无法捉摸的。

本卷参考资料:

《毛泽东思想万岁》(5卷本)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 编 1968年版

《文革资料汇集》(约75万字) 网络文章 春秋中文社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约1600万字) 水陆洲 整理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约3000万字) 宋永毅 主编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

中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人民大学编辑小组 编 1969年版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高皋、严家其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文化大革命简史》 席宣、金春明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版

《大动乱的年代》 王年一 著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电子版) 辛子陵 著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1966——1982》(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美)费正清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美)莫里斯·迈斯纳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册) 逄先知 金冲及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人民文革丛书》1——4卷(电子版) 刘国凯 著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电子版) 宋永毅 著

《文革受难者》(电子版) 王友琴 著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 吴焱金 著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09年版

《不再沉默》 武彩霞 著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0年版

《文革异端的判别标准》 网络文章 作者: 云林

《四十年的友谊》 网络文章 作者: 鲁礼安

《牛鬼蛇神录》 网络文章 作者: 杨曦光

《文革夺权阶段各地两派斗争概况》 网络文章 作者: 杨大庆

《钱理群谈毛泽东的文革遗产》 网络文章 作者: 钱理群

《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 网络文章 作者: 老田

《文革中的“政治迫害”和四人帮的历史责任问题》 网络文章 作者: 老田

第六卷 余音绕梁

第一章 “斗、批、改”

第一节 农业改革

失败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像它最初许诺的那样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甚至没能保存下独立的、常设的群众组织。虽然对官僚主义模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在中共九大后在“斗、批、改”运动中的种种加强社会平等的改革措施归根结底是改良主义的，因为这一努力的最大阻力——传统计划经济的官僚制没有太多的变化。因此官僚，无论是文职干部还是军队干部对政局仍然具有很强的操控能力。因此，官僚体制的继续发展与运动结束后的混乱和派性斗争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毛泽东所做的一些积极的努力。

除了掌权的阶级之外，被统治者在革命失败后的绝望与悲伤情绪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深入和军队严厉的政治镇压和思想钳制开始弥漫。一些人开始后悔，一些人则坚持自己被“利用”。文革的狂飙严重透支了中国人的政治热情，这一股激进的政治热情是自五四时代开始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这种参与积极性的丧失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一直持续至今日。社会底层的消极使得毛泽东的一些有利于他们的改良主义的政策难以得到来自基层的响应，这更扩大了官僚利用改革扩展权力的空间。

文化大革命毫无疑问地是一场城市中的斗争。农民们对文革的响应非常有限，国家对于发动农民就更不积极。但是，局势稳定之后的改革的目标，至少是在初衷上，是在农村。

文革最激烈的时候各派都曾经鼓动农民进城斗争，这方面以保守派为甚。除了调动农村民兵外，一些地方领导干脆出钱雇农民进城打人甚至施用酷刑，一天2元或打一次1元。虽然有极少数进城的农民提出过扩大自留地等要求，但是十分有限。在“天下大乱”后，中央当然不会再容忍农村发生城市中那样的混乱，而一些激进的红卫兵到农村鼓动造反，大多数也没有得到农民的响应。到了城市运动收尾的时候，文革才开始真正影响农村。在一些地方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如一位外国学者的研究称：

文革前的中国农村，没有很好的渠道让农民发表他们的意见，诉说他们的苦衷。农民的

怨气便只能一点点地积累起来，能量越积越大，等待时机爆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批斗村干部时的一些激烈作法或许不像看上去那样过分。这些行动帮助农民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也让当权者得到一个教训，了解村民的能量。……大辩论、大批判为农村的新权力机构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贫下中农协会，有的地方叫贫民会，在村党支部瘫痪后，开始行施领导权。……根据社员的要求，村子里的贫下中农协会定期要求生产队和大队向社员公开账目，国家给村子里的救济粮，都由村民讨论决定如何分配。文革中农村的其他群众组织也很活跃。民兵连把村子里的年轻人联系了起来，妇女联合会则把妇女发动了起来。这些组织虽然都有官方的色彩，但他们无形中为普通农民，特别是家庭妇女们，提供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机构和场所。通过这些机构和组织，他们可以更好地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使村子里的当政者更好地了解他们的要求，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和愿望。……下乡回乡的知识青年，有农村人口原先没有的知识、技能和勇气。他们不安于现状，敢于改造现状。他们认真地开始改造农村的面貌。许多回乡和下乡知识青年自己动手给村子里拉上了电，装上电灯，接上了有线广播。有了电后，许多地方开始了电力灌溉和建立社队企业，使当地的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这里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

这样的好效果一般局限在极个别地区。就全国来说，分裂的派系似乎更多地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的基础上，文化大革命成为清算个人和家族宿怨的借口。在这其中当然有堕落腐化的农村干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恶劣行径（如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农村的屠杀案，其操纵者都是大队一级的农村干部），也有军队利用惩治“四类分子”来震慑造反派的意图（如广西）。多数成立的“贫下中农协会”由农村干部控制，也是以批判曾经的地主富农和“忆苦思甜”为主，这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没有什么区别。而解放军在农村推行的也与他们在城市中干得差不多，即集中学习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和各种花样的“向毛主席献忠心”等活动。在文革平均主义的影响下，在一些地方又开始了“并社”“并队”甚至是“共产风”，富队穷队强行拉平的情况，很快遭到中央的制止。在文革中，原本7万个人民公社被合并为5万个，但是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规模没有太大变化。

总而言之，农村中真正有实质影响力的变化都是来自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是农民自发

的行动。一种“冷静版大跃进”的政策开始推行，也就是复活大跃进之中的政策和改革措施，但是十分谨慎，循序渐进，确保不再出现大同社会式的乌托邦幻想和狂热。它的第一步往往是由军宣队、工宣队或“贫下中农协会”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处于上级党委的严密控制下，但是“三结合”还是使得农民（主要是贫农）更多地参与了村里和公社的社会经济生活。之后所做的即制止所谓“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由于大规模工业建设尤其是三线建设的需要，对于农村的资本提取再次加剧。农村的自由市场受到了严格限制，自留地被严格限制在了耕地总面积的5%。尽管1969年进行了将基本核算单位提升至大队甚至公社的试点，“农业学大寨”的学习内容也逐渐由“战天斗地”、“农田基本建设”转向“自报工分，群众讨论”和大队核算，甚至出现了废除自留地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样的激进举措，但是在1972年后的整风中很多都被斥为“极左”遭到否定，直到去世毛泽东也不再抱把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提高到大队的幻想。但由于文革导致原本就不怎么样的计划生育工作（主要是技术原因）中断，暴增的人口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粮食产量不温不火的增长。人民吃穿用上的困难无疑在继续给文化大革命减分。不过70年代农业机械化的努力，农田基本建设如平整土地，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外国引进的化肥厂和化纤厂的投产以及杂交水稻等高产作物的发明，都成为70年代末的农业飞跃的因素之一。

而文革中的农村政策最大的成功应该是恢复了大跃进时期对于农村工厂的建设。农村“就地工业化”是毛泽东“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战略中的至关重要的“第二条腿”，也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目标。在《五·七指示》中即有“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大跃进中办起来的农村小工厂由于随后的农业危机，大量劳动力又重新投入农业而荒废，最终由于刘少奇的一纸禁令而走入低谷。在60年代，人民公社不过是苏式集体农庄的一个精致版本。但从70年代初开始，随着“两条腿走路”的恢复，农村小工厂又开始起步，并在1972年批判“极左”后迅速发展，获得了“社队企业”这一官方称号。人民公社制度在对集体资金的筹集和对劳动力的动员中发挥了作用。针对当时社队企业受地方干预过多，被强行拉平的状况，1975年9月华国锋（他在湖南就积极支持社队企业）向毛泽东提出社队企业“对于巩固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消灭三大差别，都有重大意义。它代表了人民公社的伟大希望和前途。”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建议，废除了60年代制定的禁止农村办小工厂的禁令。随后华国锋在第一届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公开宣布了社队企业的伟大意义，对其给予充分肯定。社队企业迎来发展高峰。从文革追求

平等的目标来看，这些小工厂可以缩小城乡差别，也可以有计划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农村的半失业问题。它成为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上的一个主要创新。

这些小工厂最初是以修理农具，生产化肥为主。在70年代末13套外国引进的化肥设备投产之前，农村生产的化肥占到了全国的一半。而农业机械有相当一部分也是由农村自己制造。农业机械和化肥生产的连续飞跃显然为70年代末的农业飞跃提供了可能。此外，一些小工厂的生产遍及行水泥、钢铁、化工、医药各个领域。到70年代末，这种“社队企业”达到130万个，产值超过200亿元，吸收劳动力达300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10%，镇江附近的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竟吸收了50%的农村劳动力。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考察，后来改革开放中乡镇企业来源之一的“苏南模式”（另一种是“温州模式”，即由于武斗不断导致基层权力真空，私营个体户发展而来），就是由当年的社队企业转化而来。

尽管鼓励自力更生，国家还是为社队企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城市也为社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这似乎是文革运动的直接结果。城市把过时的小工厂和技术转移到农村，技术人员，科学家，管理人员到农村去；通过提供书籍和教师来培训农民。一些下乡的知青成为社队企业中的骨干。而交通、水电、医疗等基础建设也都是中国社队企业大规模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同时，根据毛泽东“生产资料在公有制范围内可以交换”的理论（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既然公有，不是商品，因此不能交换），国营拖拉机站被取消，拖拉机被交给公社或大队。大中型拖拉机从1965年的7万台增至1978年的55万台，中小型拖拉机由1965年的4000台增至1978年的137万台，许多地方开始使用机械耕作和灌溉。

尽管社队企业在短时间内并未扭转城乡差距，但它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始。它是毛泽东1961年的那句论断的实践：“人不要都挤在城市里。积极地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这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标准一定不要低于城市，……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地区人口过多的问题。”

“两条腿走路”战略为中国创造了大量的“计划外经济”，即高度分散化的计划经济模式。而改革发源于中央计划之外而不是之内，这是中国后来的改革能够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对于农村有争议的变化是在医疗和教育上。1969年秩序恢复后，开始执行毛泽东在1965年的指示中的“把医疗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观点。当然为了短时间内培养大批的农村医疗队伍，采用的是“速成”的方式。医学院学制由6年减为3年，课程也减少了。整个医疗体系的管理权被下放到了地方，所有城市医疗人员都开始向农村轮换流动。到70年代初“赤脚医生”这样的辅助队伍比1965年增加了4倍。他们往往只接受6个月的培训就投入

实践，除了常见病治疗外还负责卫生保健教育和计划生育工作。尽管措施草率而激进，但是相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 70 年代联合国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医疗卫生问题的典范。1975 年的电影《春苗》（李秀明主演）讲述的故事就是农村医疗改革和文革运动的混合物。它在文革结束后作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文艺”受到批判。由于这些形式的采用，再加上技术的突破（避孕药和避孕套），70 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也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66 年至 1978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由千分之 26.22 下降到千分之 12，后来 80 年代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而且当时主要是以二胎制的宣传鼓动为主。

在文革前夕，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逐渐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城市的教学数量和质量都要比农村高得多。入学考试和正规的城市学习资格，以学习成绩为唯一标准的升学制度，必须缴纳的学费，这都成为拉大城乡教育水平的因素。1957 年就发生了因抗议城乡招生名额差距太大而引发的“汉阳事件”。大跃进曾经为改善这一状况做过激进而草率的努力。到 60 年代初，农村不符合“标准”的学校和半工半读学校减少，而为城市干部子女办的特殊预备学校却增多了。这使得文革初期付出了血的代价。而且，大学为已经非常臃肿的政府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培育大量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却很少有适合农村迫切需要的技术和技能的学生。于是，在“精简”和下放的浪潮中，这些过剩的城市精英被赶到农村（多是工农子女和出身不好的子女），但他们过于专业化的知识在农村也没有什么用处。

显然教育制度是 1966 年红卫兵中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分野的社会基础。文革初期一些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红卫兵就提出了一些激进的教育改革要求。而毛泽东对西方的学校制度也始终不满意，坚持认为知识来自实践过程中的自学，主张缩短学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甚至激烈地声称“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注意前面那个条件千万别掉了）。在局势稳定后，教育改革正式开始。1971 年 8 月 13 日发表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激烈批判 17 年教育是“天才教学”、“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无用”，在基层要“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大力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把学校办到家门口，让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城市要进一步搞好厂矿、企业和街道办学。民办公助的学校和民办教师，国家补助应是主要的。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经费要相应增加。今后，国家专拨一定数量的经费，以保证普及农村小学教育。**”

和社队企业一样，尽管号称“自力更生”，但是国家还是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在 10

年间，成绩主要在中学方面。小学在校学生人数由 1 亿人增加到 1.5 亿人，中学在校学生人数由 1300 万人增加到 5900 万人；小学教师由 385 万人增至 522 万人，中学教师由 71 万人增至 328 万人。绝大部分都是在农村。但是教育资源不是马上就能跟上，教育上的冒进带来的是教育质量上的急剧下降。改革初期在恢复以质量为纲传统教育路线的时候裁撤了大量农村学校和学生。但事实是尽管恢复高考后的头 3 年“释放”了积压 10 年的考生，但之后高考参加人数却始终有增无减，50、60 年代大学招生始终不足的窘境变成了 80 年代的“万人过独木桥”。而且 80 年代农村出身的大学生的所占比例是一个至今无法企及的高峰。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文革中农村基础教育的成就。

伴随而至的激进教育改革是将中学管理权下放给了公社，小学下放给了生产大队，不再由县政府统一管理。学费、入学考试和入学年龄限制被取消或大幅压缩。大跃进期间的业余教育和半工半读教育也都重新恢复。1975 年的电影《决裂》（郭振清主演）即是反映“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它在文革结束后也被斥为“阴谋文艺”，它的续集，四人帮垮台前夕完成的《反击》由于直接点了邓小平的名根本就没有上映。众所周知的是上大学的标准是推荐，由生产单位按照政治标准和文化程度挑选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制度。这被认为有助于消除城市特权阶层子女长期以来的资源优势。

70 年代活力和混乱并存的农村教育成为了后来争议不断的话题，这里无意参与。但是，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没有根本上的变化，使得一些积极因素被抵消。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推荐制度中干部子弟的“走后门”现象（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受到激烈批判）。而农村作为国家工业化资金来源这个极其不利的地位，三线建设，高额税收，所谓的“献忠心”粮（实际是强制性的征粮），价格剪刀差，使得原本可能用来改善农民生活的资金和可能促进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农业剩余产品都被投入到了工业建设中。总而言之，前 30 年农业集体化给农民带来的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远远大于经济利益，最终城乡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节 工业改革

1969 年后的工业改革到底给工人带来了多大的好处始终存在争议。左翼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极大。在这里我们只讲一些简单的事实。

文革中工人提出了一系列的激进要求，这些主张主要有：增加工资和福利保险，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直接控制（即工人参与管理），废除给无产阶级制造内部分裂的工资差别和奖金

制度、物质刺激，废除严酷的外包工、临时工和合同工制度，工人自主选择工厂工作，废除党控制的工会等等。没有人承认城市中一点变化都没有。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劳动部和工会组织都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文革中建立的工人代表大会。伴随取消了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但工资数目没有任何增加。“工业学大庆”当然就和农业学大寨一样，精神政治鼓励能起多大作用是值得怀疑的。不过鞍钢宪法的要义是要“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因此，这个方面值得考察。

号召城市改革的是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掌握了全厂的领导权，包括技术大权。过去控制工厂技术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革命的青年技术人员和革命干部，成了科学研究和技术设计的主人。.....

第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技术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受到了深刻的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技术“权威”，政治上臭了，技术上的纸老虎的原形，也暴露无遗。磨床研究所的不少研究人员，过去把技术资料记在本本上，作为个人的“小仓库”；现在都自觉拿出来，汇集成册，分给大家参考。全厂技术人员纷纷主动下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研究和改进设计。老年技术人员下车间，也注意放下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

第三，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变了。过去，这个厂的几个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曾提出所谓“一对一”（即一个工人为一个技术人员服务），他们的所谓“结合”是“工程师动嘴，工人动手”，“工程师出主意，工人照着干”，他们还建立了管、卡、压工人的一套规章制度。一本《生产工人手册》，就拟定了一百七十多条，要工人背熟牢记，条条照办。凡此种种，进一步加深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鸿沟。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实行了工人、革命技术人员、革命干部的“三结合”，普通的工人参加了设计，技术人员也在第一线参加了实际操作，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双方的关系有很大改善。.....

还有就是红旗杂志 1969 年的一篇文章《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

.....这个厂过去的规章制度贯串了“专家治厂”的路线，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扣、罚。在一本近十万字的《北郊木材厂企业管理制度》中，规定了这个权是这个长的，那个权是那个主任的，就是没有什么权是工人的，工人有的只是被管的权。

.....他们彻底批判了“专家治厂”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新建立的规章制度中，充分发挥工人的主人翁作用。比如技术管理，过去技术大权掌握在少数人

手里，技术管理制度越来越繁杂，严重地压制工人群众的创新精神。工人搞革新，要经过“五定”（定项目、方案、图纸、金额、效果）“四道关”（技术科审定，财务科算账，厂长批准，供销科备料），周转很长时间，才能开始试验。其中一道关过不去，就吹台了。工人阶级掌握技术大权后，建立了新的技术管理制度，新产品试制、设备维修、新工艺的制定，都是工人与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进行。

精兵简政：他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认为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必须精兵简政。这个厂，过去管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厂部有一处二室七大科，脱产人员达一百三十多人。科室多，人员多，为了互相制约，把人与人、科与科的关系，用一大堆烦琐的规章制度规定下来。繁杂的规章制度，造成各自为政，互相扯皮。有的同志概括了这样几句话：机构层次多，解决问题少；表报手续多，实际有用的少；官僚主义多，深入群众少；烦琐哲学多，工作成效少。革委会成立后，精简了机构，许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就失去了作用。没有闲人就没有那么多烦琐的规章制度，同时，只有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才能巩固精兵简政的成绩。现在，只有政工、生产两个组，共二十一人，建立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人服务、为生产服务的革命化的新制度。人少，事多，但解决问题快。

一分为二：.....对于社会主义企业和现代化大生产所必需的计画管理制度、成本核算制度、质量检验制度、工艺规程、安全操作规程以及必要的劳动纪律等，是不能“砸烂”的。

正确的作法是：改革不合理的，保留合理的，创立新的。

质量检验制度也是一定要有的，认为可以不要质量检查制度的观点，是片面的，错误的。改革质量检验制度，一定要保证产品质量精益求精。过去的产品质量检查制度，对工人群众不信任。一本《品质管制制度》五章二十六条近一百款，强调依靠少数检验人员“监督工人”，造成生产工与检验工之间的矛盾。工人同志说：不依靠群众，就是一个工人后面跟上一个检查员，也提高不了质量。现在，他们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人人负责，互相帮助，班长检查，小组讲评和成品入库、出库专人验收”的新的检查制度。在全厂生产大发展、新产品不断出现的情况下，新制度保证了质量稳步提高。

1968年9月毛泽东提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成为“全国山河一片红”后的“中心任务”。作为“斗、批、改”的措施，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下车间劳动，而工人管理小组可以监督基层单位的计划与决策。而管理企业的职责则是“三结合”的工厂革委会，取代了过去的一长制。

但是，也许城市中政策的变化与政局的变化关系更密切。随着党政官僚逐渐重新取得优势，原本就混乱、不成熟的新体制很快就变得不伦不类甚至面目全非。一些更具根本性的主张则被斥为“极左”加以批判。对劳动力流动的严格控制和刻板的城乡户籍制度自不必说，文革中批判火力最集中的外包工、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也都得以保留，工资没有任何变化，尽管在福利和保险上有一定的加强。到了70年代中期，精神鼓励的内容越来越空洞，对“无私劳动”、“热爱集体”和“爱厂如家”的赞扬逐渐盖过了“工人参加管理”的诉求。工人的八级工资制（30—108元，平均40多元，临时工和合同工比最低工资还要低），技术人员15级工资制（平均150元），管理干部的24级工资制（45—404元）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工人的工资没有任何提高。70年代以来，被废除的规章制度也逐渐恢复。由于工厂中的自由散漫导致产品质量的下降，国家越来越强调专家管理和技术标准，劳动纪律也越来越严格。1973年恢复了省工会，取消了文革中成立的“工人代表大会”。后来全国总工会也恢复了。尽管工厂革委会已经被党政官僚占优势的党委严格控制，但是有时候它还是可以成为工人表达自己的不满，憧憬一下文革初期的那些理想的场所。由于取消了奖金

制和物质刺激，工人的积极性也受到压抑。1974 年李一哲的《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就提出**在工人组织监督和参与管理的前提下**恢复一定的物质刺激和奖励发明。尽管文革中对干部的打击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独断专行和官僚主义风气，遇事与群众组织多商量商量，但是领导始终还是领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民主协商”和“下基层”越来越具有象征意义。**最重要的是，厂长最终要向党和国家负责，而不是向群众组织负责。**就如一位厂长所说的，“**我们厂所取得的成绩应当归功于集体的工作，但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我的责任。**”在这样的“苦日子”下，毫不怀疑工厂容易出现死气沉沉、循规蹈矩的局面。而厂长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努力把体制往有利于自己的一方面拉，而“苦日子”熬出头后反攻倒算进行起来也更加变本加厉。

也许城市改革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分权化行动。严格来说中国从未建立起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是少数没有照搬中央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中国的经济计划制订始终无法像苏联那样娴熟。到了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干脆放弃了制定严密计划的努力。毛泽东对斯诺说“**应该像你们美国一样，把权力分到五十个州去。**”“**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作为“斗、批、改”的措施，原本由中央控制的企业被大量下放到省市一级。对应的是中央委员会的里面省地干部占了最大比例，达 43%，总体来说这一次大规模权力下放并没有出现大跃进那样的狂热和灾难。这可以作为文革取得一定作用的证据之一。1970 年毛泽东将经济上全面放权比作“**虚君共和**”。当年的经济计划提出了加快内地战略后方建设、积极发展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进行企业下放、加快农业机械化等要求，为此继续进行大规模放权和缩小企业规模，至少 70%的中央企业的管理权被下放给地方。同时将全国分为 10 个协作区，要求各自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进一步促使了财权、物权、投资权的进一步下放。同时这也使得经济计划出现变化，毛泽东主张经济计划不要定的太死，后来又提出“**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举例来说，对于农业生产的指标从来只到县一级，下面由每个生产队自己想办法增产。而苏联则是把产量指标和具体的增产措施都发到集体农庄的，只要照做就行了。而且中国的经济计划只有最基本的产量指标和人员指标，比苏联简洁得多。当时苏联设计了一套极其精密的，复杂程度不亚于西方经济学的计划计算方式，但是中国从来就没有学会，后来干脆放弃了。中国最终了采取的是大跃进中开创的“**两条腿走路**”的战略，即大小并举，土洋并举，中央与地方并举。70 年代中国由中央调拨分配的产品数

量是 600 种，苏联是 6 万种。到了 70 年代末，苏联的工业格局是 4 万个大企业，几乎没有小企业。中国的工业格局是 4000 多个大中型企业，城乡小企业 34 万个（加上大队一级的小企业共 150 万个）。只有 3% 的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非典型计划经济”模式开启了独特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因此苏联的经济改革成败完全取决于国营企业改革，如果国营企业改革无法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营企业的改革事实是最困难的，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以及无数工人的福利。但中国在文革时期，大多数经济都不在中央计划管辖内，而是在中央计划以外。地方拥有相当大的财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甚至由独立的工业体系，在经济上可以自行其是。因此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主要由中央计划以外的地方经济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就是文革时期形成的“地方分权化”的延续。

不过现在军队掌握了政权，随着全国备战和三线建设的展开，重工业尤其是军工企业增长过快。1969 年国防开支增长 34%，1970、1971 年又递增 15% 和 16%。1969——1971 年，国防开支平均占到了基本建设总投资的 11%，严重挤压了民用工业的发展。再加上各地方利用自主权“大干快上”，导致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从 1969 年的 23.2% 上升到 1970 年的 32.9%，这挤压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人均粮食消费量 1966 年为 381 斤，1976 年为 383 斤；人均棉布消费量 1966 年为 20 尺，1976 年为 23 尺，而 1968 年每人仅仅只发了 9 尺布票。同时也给国家造成了不小的经济负担，1971 年底出现了“三个突破”：职工人数突破 5000 万人，工资支出突破 300 亿元，粮食销量突破 800 亿斤。这达到了国家负担的警戒线。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没有根本上的变化，而且工业体制受政局变化的影响要比农村大得多，因此在 1966——1968 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后，工业中的生产关系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也没有怎么改善。这种失望情绪要比正在捣鼓社队企业的农村强烈得多。

第三节 体制变化

前面已经说过，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是一个夹在平民和官僚之间两头受气的阶层。因此知识分子的对于文革“伤痕”的记忆也就更加深刻。他们会成为文革中激烈斗争的各派的替罪羊。他们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和比官僚还要“脱离群众”的地位使得他们在社会中几乎就是明摆着的“资产阶级”。由于缺乏防卫能力和保护他们的组织机构，他们是造反派批判“三名三高”的主要目标，他们也是比有保守派组织保护的官僚更容易被批判的目标，因

此他们会遭到造反派的发泄式打击；自然他们也会受到希望把斗争矛头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开的党政官僚和保守派的进攻，这是 17 年来官僚与知识分子的斗争的延续。抄家、审查、人身侮辱、焚毁书稿、“牛棚”中接受批判和“再教育”，无论这些来自哪一派，都成为知识分子无法磨灭的记忆。到了局势稳定之后，官僚的权力开始一步步的缓慢恢复，但是由于文革派把持了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领域，对于知识分子的压制还在继续。尽管毛泽东在理论上区分“知识”和“知识特权阶层”，但是实际操作中把二者区分开并不容易，这使得民粹主义式的反城市、反知识倾向在实际操作中难以避免。大量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生产劳动，甚至是遭受虐待，一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即使是少数能够回到城市中有一定的自由的知识分子也会发现自己无事可做。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早已终止，而理工科方面，只有与实践联系紧密的技术工作，如工厂中的创新和发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得到了华国锋的支持）等农业科技，以及涉及国家安全的尖端项目，如“两弹一星”，以及一些军事科技项目还在继续。夹在这两者之间的普通科研工作基本已经终止。

1968 年 7 月 21 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2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指示日期为名的，半工半读式的“7·21”大学。至于文革前的普通大学，由于文革时期几乎所有教育资源都被投入到了基层和农村，因此高等教育受到了冷漠对待。在教育革命中高等教育怎么搞也一直是难题。1970 年 6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学制“根据各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二至三年。另有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学习内容“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文、理、工各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招生的办法：“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1970 年 7 月 21 日，《红旗》杂志发表《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提出了“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大破

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有步骤的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正确处理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的关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1971年8月13日发表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成为教育改革的集大成之作。在城市教育方面，它提出“教育要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以厂（社）校挂钩为主，多种形式，开门办学，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医药院校应坚定地把重点面向农村。”

此外，上山下乡运动被制度化和强制化。这或许针对的是1964年以来两种教育制度并行的试验中半工半读与全日制地位不平等导致的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不平等的问题。上山下乡运动使得半工半读成了一切教育制度的特征。尽管这一度改变了教育资源长期过分倾斜于城市特权阶层和知识分子子女的状况，基层教育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高等教育却明显不适用于这样的体制，困难重重。工农兵学员知识储备的不足使其明显无法担当精英阶层能够承担的角色。最后许多更有条件的干部子弟凭借“走后门”进入了大学。这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文革中的基层教育和高等教育出现相反的局面，前者比较混乱但充满活力，后者则死气沉沉。

现在文化教育彻底丧失了独立性被完全纳入政治运作中，即后来颇为人所诟病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教授们最能发挥水平的地方恐怕就是按照官方的解释范式如“儒家和法家两条路线的斗争”来解读文史哲（这一直延续到今天，“普世价值”派即深受影响，即把中国现代史解释成“普世价值”路线与“毛派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和在政治运动中撰写批判文章。加入了著名的北大清华“梁效”（“两校”的谐音）写作组的著名学者就有范达人、何芳川、汤一介、叶朗、胡经之、冯天瑜等人。由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4人担任顾问（后有人讽刺其为“四皓”）。

文艺方面，随着文化激进派将“中国传统文艺”、“西方古典文艺”、“苏联社会主义文艺”、“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全都破除了以后，文艺领域几乎是一张白纸，一切推倒重来的局面。于是文化激进派进行的是重新塑造可被仿效的“经典”的探索。由于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几乎被彻底否定，“三突出”、“主题先行”这样的创作范式被公式化，命令化，成为僵死的“律令”。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文艺作品丧失活力。而文革派将他们的成果称为“样板戏”。《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的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首次将《智取威

虎山》等京剧评价为“优秀样板戏”。“样板戏”之名应运而生。1967年5月，在北京上海等地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活动中，陈伯达、姚文元等人对江青在“京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极高评价，称“其领导和发动的京剧革命，其它表演艺术的革命，攻克了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反动文艺的最顽固的堡垒，创造了一批新的革命京剧，革命芭蕾舞剧、革命交响音乐，为文艺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1967年5月25至28日，《人民日报》连续发出毛泽东关于文艺的5个文件，即《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1944年1月9日）、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年5月20日）、《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54年10月16日）、《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作为庆祝，样板戏在首都同时演出37天。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一文，第一次开列了8个“革命样板戏”的名单：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而比较活跃的现代京剧《龙江颂》未进入“8个样板戏”行列，后来的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平原作战》、《草原儿女》、《沂蒙颂》、《磐石湾》等也都属于“样板作品”。“样板”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了可供模仿、复制的含义。这种可复制性成为文革“大众文艺”的最大特征，除了对样板戏五花八门的移植仿制之外，绘画如《毛主席去安源》，歌曲如大量“语录歌”、“红卫兵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雕塑如《收租院》都得到了大量复制和普及。文艺生产被纳入政治运作中，它又极大地利用了传统文艺，特别是京剧、芭蕾舞剧的程式化、符号化特征。这种对古典的利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图解政治导致的僵化和抽象，因为一般不会要求京剧和芭蕾舞去表现如同电影小说中那样的人物形象。这使得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钢琴协奏曲《黄河》能够获得超越时代的魅力。

但是“样板”的塑造似乎更适合古典的艺术形式，小说和电影“样板”的确立就步履维艰。电影界从1966——1973年的7年间没有制作过故事片。尽管文革后期在小说上重新“发现”了浩然等人，但《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既无法突破前十七年形成的创造套路，也更没有什么兴盛的局面。电影界的一些优秀影片如《闪闪的红星》仍然遵循的是前17年的创作思路，而带有鲜明文革色彩的电影如《春苗》、《红雨》、《决裂》，却无法达到同样的水平，更不用说和样板戏比肩了。到1975年7月，毛泽东对这种状况都无法忍受，批示说：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逐步扩大文艺

节目。”后来他又强烈批评了江青对电影《创业》的苛刻标准。在“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背景下，1976年3月文化部还布置了20部“与走资派斗争”的创作规划，其中触及中央领导人物的多达8部。6月《反击》、《盛大的节日》、《千秋业》开拍，不过由于四人帮很快垮台，这些作品都被打成“反党影片”而流产。

由于70年代文革派逐渐只剩下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这两块阵地，因此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控制也就更加严密。这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尤其是当他们得知邓小平主张“拨乱反正”，对文革和反右中蒙受冤屈的知识分子一视同仁地平反时（但好像也只有对知识分子是一视同仁的），他们对邓小平改革的支持力度是任何其他阶层都不能比拟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对邓小平抱以了过高的期望。尤其是当改革开放中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严重下降，他们的民主理想也得不到满足时，80年代一次次的学潮再次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官僚制度上，经过“精兵简政”和全面放权，1970年国务院部委已经由90个减为27个，行政人员由6万人减至1万人。各级革委会就“精简”得更多。基于毛泽东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的批示，大批被打倒或“精简”的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但保留工资待遇）。这显然是以此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强迫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融合，尝试革命化的“五七道路”的方式。在一次已经失败的民主大跃进以后，这无异于又来一次削尊抑贵的民粹大跃进，能有多大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不过，随着党政官僚恢复自己的力量，对于这些“复出”和“解放”的人，最好的补偿方式就是封他个官做。因此，尽管上层机构在文革结束前依然简洁，但中下层的政治机构已经急剧膨胀，更不用说造反派组织与官僚的矛盾，以及造反派内部的派性问题导致互相扯皮，效率低下。尽管60年代末裁撤了大量备受诟病的干部子女学校和干部疗养院，如疗养院由文革前的10万个下降为1971年的2.7万个，但官僚的高工资和福利待遇、特供商店、疗养院等随着70年代老干部的“解放”开始恢复，腐化行为还在不断产生。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没有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因为这是受经济条件限制的，而是它没有能够使得劳动者掌握劳动资料的权力得到有效的政治保证。也就是说没有能够建立和保存常设的、独立的群众组织来作为保障劳动者的民主权利进一步扩大的基础，以阻止官僚把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变成垄断性的所有权。这些昙花一现的群众组织很多在持续的内讧中消耗殆尽了。在这一点上造反派当年的持续激进化，对于激进社会变革的不讲策略的狂热追求是要负很大责任的。最终毛泽东也只满足于一个经过思想整顿的党和一个经过了些许改造的官僚机构。简而言之，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那

么它没有能够进行任何有效的制度建设。

第二章 恢复力量

第一节 九届二中全会

1966——1969 年的政治运动最大的成果就是党内长期的权力格局与力量对比不一致的局面结束了，实力最强的军队终于坐上了高位。如果毛泽东满足于此的话，这意味着军队权力的永久化和中国政局的长久稳定性。但在毛泽东看来，这是由于运动走入死胡同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因此，毛泽东不会接受任何“阶级斗争结束，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之类的观点，因为这意味着对军队掌权这一既成事实的承认，而这个事实既无助于毛泽东激进的理想实现，也不比前 17 年党政文官主政时好到哪里去。因此毛泽东否决了陈伯达的有“唯生产力论”嫌疑的九大报告。林彪也明白自己现在的地位是毛泽东妥协的结果，因此采取了积极清洗当权派和造反派的做法来巩固军队的地位。现在是军队一家独大，党政官僚和造反派都受到压抑。因此，斗争还要继续。

随着经济形势逐渐好转，毛泽东开始提出让一些老干部恢复工作，以重建被文化大革命冲击得七零八落的党。对于林彪来说这当然不是他热心的工作。尽管军队在 1968 年血腥地镇压了造反派，但是在对待党政官僚的问题上，他还是能够与中央文革保持一致的。在中共九大上他就提出将中央文革小组永久化。但是 1969 年中央文革小组还是被撤销了。

那些把 1969——1971 年的政治斗争完全看作是毛泽东与林彪个人恩怨的故事的观点可以先放到一边，但是如果说这完全是军队与党，军队干部与文职人员的斗争也不完全说得通。因为文革已经给军队制造了足够多的分裂，林彪也利用文革清洗了许多军中派系，林彪是不是能作为军队利益的全权代表呢？而林彪忽左忽右的立场也使得林彪代表激进派（即所谓“极左”），毛泽东代表温和派的观点说不通。林彪对于文革发动的作用自不必说，他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富有煽动性的讲话也不必说，对于整垮刘少奇的作用就更不用说。江青也称赞他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文革”的代表。但是，1967 年的“5·13 亮相”导致党内造反派垮台，“7·20”事件后态度暧昧，1968 年后又支持了军队对造反派的血腥清洗，林彪又都站在了保守派的一边。由于官方历史在叙述文革时总是用“在林彪、江青一伙的

煽动下”来解释一切，因此导致林彪的具体作用可能一直不是很明确。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文革结束后）对林彪的指控包罗万象，实际上包括了中国共产党长长的思想与政治异端清单上的所有内容，其中最可信的内容是指责林表示企图夺取最高政治权利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人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林彪不过是一个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凡有利于他自己权力的任何路线和方针他都支持。”

但事实也可能不完全如此。至少是在1969年左右，林彪与文革派之间的矛盾确实是一个焦点。毕竟军队的清洗端掉了文革派的社会基础，这是他们非常不满的，而军队也不想再维持表面上的合作关系。林彪就曾评论说：“张春桥、姚文元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

而从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秩序已经基本恢复，经济已经好转，现在是请军队回军营的时候了。而为了稳定局势而对毛泽东进行的个人崇拜的狂热宣传也不再必要。1969年6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宣传上开始消退。

1970年4月初，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100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東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他在稿中删去的话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无用的”和“引起别人反感”因而删去的，几乎全是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主要是为四届人大的召开做准备。

在全会上发生了众所周知的“称毛主席为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事情起源于8月13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10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后来吴法宪在会议上以此为把柄激烈攻击张春桥。叶群、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积极支持,在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同时危言耸听地声称要揪出“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人。显然这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改变了全会的原定议程,甚至狂热地煽动“揪坏人”,矛头直指张春桥。江青、张春桥被迫向毛泽东求救。这一次对毛泽东的不合时宜的吹捧和对文革派的攻击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判了给林彪张目的著名理论家陈伯达。吴法宪、黄永胜等人被迫做了检讨。但是林彪自始至终拒绝做出任何检讨(也有可能是他根本就没有参与)。总而言之林彪集团的计划没有成功。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批评解释也很多。一种观点认为是,毛泽东不让林彪当国家主席,粉碎了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一种观点认为对毛泽东个人的过分吹捧阻碍了毛泽东重建党的目标,遭到反击,因为毛泽东说:“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是在反击林彪激进的外交政策,因为林彪主张与苏联恢复关系抗衡“美帝”,但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已经决心倒向美国。证据是新的外交政策宣布“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这是中苏论战以来的第一次;还有观点认为林彪的实际目标是反对“称天才”的张春桥。也就是军队在基层政权中取得优势后要把文革派从高层也挤出去,实现军队一统天下。因为张春桥是林彪1971年流产的政变的目标之一。

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其中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下是两个人的一段对话:“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

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林彪想要提升他的地位需要军队全体的支持。而现在林彪只是代表了军队中的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一个派系。因为军队共同的优势地位，他们会反对任何来自任何方向上的变革要求，这一共同诉求是可以保证林彪的位子坐稳的。因此林彪如果想保持现状是没有问题的。但此时四分五裂的军队是不可能支撑起他对更高的地位的追求的，这使得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无论想达到什么比现在更高的目标都会以失败告终。而这次失败又加剧了军队内部的分裂，使林彪的位子不稳了。因此这次冒进使得党政官僚和文革派都把它看作了是反击开始的信号。最终所有社会力量联合了起来要把军队赶回军营里去。

庐山会议的最终结果是毛泽东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开始“整党建党”，党组织开始被迅速重建了。从1970年12月到1971年8月，伴随着清查“5·16”和“一打三反”对造反派的打击，所有省份都在“批陈整风”中重新建立了党委，控制了革委会，群众组织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对于拿陈伯达开刀，很大程度上是这位文革派理论家“背叛”了自己原来的阵营，见风使舵地投靠了林彪的结果。由于二月逆流而被排挤的叶剑英的地位开始上升，对军队的影响力增强。对外毛泽东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攻势，先是斯诺访华，然后是著名的“乒乓外交”，然后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美国与中国越走越近。

第二节 批林整风

1969年军队掌权，结束了党内权力分配与力量对比长期不一致的局面，除了毛泽东外没有人能让军队退出政权。如果毛泽东想让文革不被否定那么维持现有局面是适当的。为什么毛泽东要强行结束军队专政？原因大致有几条：第一，“将军们管经济，经验少，胆子大”（陈云评价），军队在掌权中简单粗暴的作风（也就是照搬军队的管理经验）和建设上的急躁冒进造成的消极影响很大。既然毛泽东在高岗事件和彭德怀事件中两次压制了对军队对党政官僚地位的质疑，那就表明他实际上并不相信军队主导的体制能够完成工业化的目标。第二，虽然军队清洗了大批党政文官，但是军管时期清查“5·16”和“一打三反”给造反派带来的损失要比给老干部带来的大得多。事实证明军队的掌权对造反派非常不利——这是二月逆流以来就被反复证明的。如果维持局面，那么文革在名义上会被肯定，但

是造反派将永无出头之日；如果结束军管，虽然这更有利于党政官僚（这意味着否定文革乃至否定毛泽东本人的力量的增长），但造反派还是存在翻盘的可能的。最终毛泽东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了强行结束军队专政。毛泽东将打击林彪的手段比喻为“抛石头”（即直接进行任免），“掺沙子”（往林彪控制的机构里派人），“挖墙脚”（瓦解林彪控制的军事力量）。

林彪显然不能容忍毛泽东对他的步步紧逼。现在周恩来异常积极地帮助毛泽东做工作，显然党政官僚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击；叶剑英等军队温和派也不会支持他；至于文革派，在九大以后林彪与文革派的关系就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一度想通过江青与毛泽东直接谈判的目标也没有达到。因为庐山会议上两派的裂痕不是那么容易修补的。结果军队实际上处于包围之中。从毛泽东的穷追猛打上看，有了老干部和文革派共同的支持，他是要下定决心结束军队掌控社会的局面了。尽管军队这个顶梁柱坍塌所带来的结果不可预测，党政官僚与文革派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定论，但是现在是军队必须撤出的时候了。

在这种情况下，1971年3月林彪之子林立果制订了著名的《“571”工程纪要》。它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纪要》直接针对的目标是毛泽东，但是所要反对的是文革派，称文革派为“笔杆子托派集团”，“一小撮秀才”，认为“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也就是认为毛泽东导向了文革派一边。这再次证实了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手下的“表演”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高层的文革派，也就是军队在基层占据主流后把高层的文革派也清除出去，从而实现军队势力的彻底巩固。既然这个目标无法用和平手段达到，就只好用武装政变来进行了。

这份《纪要》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它破口大骂毛泽东迫害党政官僚，全然不提自己就是这些迫害的主要执行者，而且毛泽东实际是默许了军队为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大清洗。此时

在《纪要》中似乎对于党政官僚是持一种温和态度，提出“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这其实很好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结果得罪了多数干部，这就成就了一个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策略——讨好干部就能够取得政治代表性。由于文革期间大多数干部失去了权力和利益，只要是能够代表丧失权位干部群体的利益，就能够取得相当大的政治代表性，从而取得毛泽东身后中国政坛的主导权，这是文革期间新形成的“政治机会”。林立果自己看到了政治上的翻盘机会，但是他自己没有能力实施，从这一点上说，1975年的邓小平整顿和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在操作原理上与《“571”工程纪要》完全吻合。因此《纪要》对毛泽东和文革派的攻击几乎整个的被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照抄照搬，如对打倒干部、五七干校、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的评价，以及“民富国强代替国富民穷”的口号，后来有人说《“571”工程纪要》就是第一份改革宣言书。

在周恩来积极筹办四届人大的时候，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再次乘专列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经过一年来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他决定去南方一些地区边调查、边“吹风”，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这种在地方上争取支持的举动往往是中国政局变化的前兆，1957年鸣放前，1958年大跃进前，1966年文革前，1967年底文革运动开始退潮前，都是如此。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的20多天里，毛泽东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并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的主要领导人（主要是军队干部）谈话“交底”。主要谈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庐山会议的问题，对林彪、黄永胜提出批评。毛泽东还提出限制军队权力，“权归政，兵归营”。显然这轮工作下来军队各个派系都不再把林彪看作他们的利益代言人。9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11日中午，专列突然离沪北上，在12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使林立果等人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9月12日晚，林彪、叶群、林立果仓皇出逃，最终机毁人亡，即著名的“9·13事件”。

尽管一些人认为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可能破裂，但是这样的结局确实有些出乎意料。林立果属于一个天生的“保爹保妈派”——对于他来说父母的资历和权位就是自己优势地位的全部保障，所以他在政治利益诉求上与1966年的那些“联动”分子非常相似。非常遗憾的是，林彪与叶群作为父母很不检点地把他安插在空军里，吴法宪又乐意拍拍马屁对林立果授予高位，结果林立果“一年兵，两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很多攀龙附凤的空军精英争相托庇于林家铺子之下，这三个方面共同造就了林立果的行动能力。同时非常遗憾地，这三个方面都不足以帮助林立果提高其策略行动的水平，结果是林立果有能力策

划一次谋杀毛泽东的计划并付诸行动，同时却缺乏足够的水平保障行动成功。

总而言之，林立果本人做事的能力很低，但是他身边却聚集着一大批看起来很忠诚很能干的精英，这让他产生错觉，一种误以为自己很强大可以掌控一切的良好感觉，而这恰恰让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文革初期作为当权派体制产物的“联动”是如此，作为在文革中军队渔翁得利的局面的最典型产物的林立果也是如此。

不管林彪对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参与了多少，林立果确实葬送了林彪的后路，促使他的父母也不得不选择外逃并摔死于异国他乡。本来，庐山会议之后，林彪虽然阴谋败露，但是他本人表现仍然十分强硬，拒绝检讨和认错。这很好理解，因为他本人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摆在那里，毛泽东未必就会把他怎么样，就算像 1959 年彭德怀那样被打成“反党集团”，却依然能够保持政治局委员待遇，这对于身体状况极差本来就缺乏担任领导工作条件的林彪来说，甚至说不上是一种多么大的利益损失，所以，他才表现得格外有恃无恐。

非常不幸的是，林彪的儿子策划了一场为人们所不齿的未遂谋杀，这就断绝了林彪的后路——他再也不能认定自己是有功无罪的人了。作为一个政治谋杀案主角的父亲，要在当时的中国寻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去养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林立果身边曾经围绕着很多攀龙附凤角色的话，显然，这些人无非是希望通过与林立果的交往来积累社会资本，目的显然为了自己的升迁和前途。一旦形势逆转，那些积极分子会反过来以十倍的坚决百倍的主动去批判和践踏林家（四人帮倒台前后就有不少人是如此）。中国肯定不再是林彪能够安静养老的地方，所以，林彪即使吃了安眠药之后也依然坚持爬上了三叉戟飞机。

以林彪为代表的军队激进派的支持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必要条件。在文革初期，在保证军队不会压制造反派这一点上来看，林彪一直是倾向造反派的。到了 1967 年春夏文革由于造反派持续激进化而陷入胶着状态之后，军队干部大多数表现出强烈的反文革取向，此时林彪的态度晦暗未明，忽左忽右，无从判断。等到 70 年代初军队干部在现实政坛中间占据绝对优势之后，确实如林立果所言产生了新的政治机会，这个机会需要通过整肃文革派而赢得，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确实有热衷于把握机会的举措。但是，四分五裂的军队无法支撑起林彪去把握这个机会，而他儿子的愚蠢举动断绝了他的后路。

阴谋论认为是毛泽东或者周恩来耍手腕逼走林彪，林彪因此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并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这完全说不通，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拒绝检讨的强硬态度中间可以得到验证。毛泽东不会傻到不了解“逼走”林彪导致的后果和影响。要是硬要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林彪事件的话，很显然要把政治上的受益者考虑在内，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加速了让军队干部退出政治舞台的步伐并于 1973 年底进行了“八大军区对调”，终结了军队干部干预地方政治的局面，结果导致邓小平出山和叶剑英掌握军权，林彪事件之后政治上的最

终得益者是邓小平和叶剑英，但是，这两个人当时恰恰是最缺乏搞宫廷阴谋的条件的人了。

70年代外交的最大成果是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和与中美关系正常化。与美国关系的改善掀起了一轮建交高潮。中日宣布建交，仅1970年——1972年建交的国家相当于前20年建交国家的总和。毛泽东和人民共和国在西方国家得到了不少积极评价，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青睐。外交上的巨大成功为经济技术交流和对外贸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72年2月初，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中，提出从国外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化肥设备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当年内共批准进口14套化纤、化肥以及一米七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成为总价值达43亿美元的进口计划的“四三方案”中的一部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项目之一。尤其是化肥和化纤技术的引进对后来解决“吃穿用”问题提供了条件。但是中国为了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抗而实行的务实的外交政策似乎又是对60年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疏离，比如和美国关系的提升使中国最终失去了曾经付出巨大代价与苏联争夺的越南。

“9·13”事件后，全国展开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批林整风”运动。伴随而至的是对1969年改革的调整。尽管农业学大寨还在继续，但毛泽东在1971年12月批示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认真处理好集体积累与社员分配的关系，在增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增加农民个人收入；同时，反对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1972年周恩来和《人民日报》反复宣传禁止农村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工业方面，工厂中厂长和规章制度的权威在逐渐恢复。针对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量暴增的局面，冒进的工业建设开始收缩，产品质量也得到提高。简单来说，除了文化教育领域外，中国的各个方面都在向文革前靠拢。

但最大的动向不在于经济方面，而是军队干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和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政官僚在批判“极左”中开始复出。在反复宣传“党指挥枪”这个原则和“解放军学全国人民”这个古怪的新口号后，军队干部尤其是四野出身的干部开始逐步退出“三结合”。1972年8月，“支左”人员开始陆续撤回，周恩来正式宣布“三支两军”结束。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从而终结了早已受到沉重打击的军队干部干预地方政治的可能。这对于大多数被边缘化甚至被迫害的造反派来说相当于搬掉了一座大山，不过这既有利于造反派的东山再起，也同样有利于老干部恢复权力

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1月10日，毛泽东出乎意料地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第二天，《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在第一版用整版篇幅刊登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报道，通栏标题是：

“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毛泽东这种举动很有象征意义。而在追悼会上毛泽东说：“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它给全国发出一种“暗示”：老干部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应当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周恩来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提出：

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7月21日，陈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请求恢复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7月31日晚，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陈云、李富春、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公开“露面”，十分引人注目。邓小平在8月3日第4次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当天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毛泽东也给予了许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曾被说成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之一、“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他的态度，直接关系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与评价，所产生的影响和震动是不言而喻的。

到了1973年，经过“八大军区对调”与老干部恢复工作，虽然文革前的党政官僚还没有完全恢复实力，但是其力量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伴随而至的是已经很难推行下去的文革派改良主义政策开始被有利于党政官僚的体制所取代。从林彪倒台后一直到1973年，党政官僚开始利用经济政治调整的机会的积极抢占军队撤出后留下的巨大的权力真空，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实力，结果中国的体制也就更加向有利于他们的一方倾斜。这种更具有经济效益但是扩大着不平等的体制势必会引起新一轮的反弹。

第三节 中共十大

军队撤出政坛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就成为文革派与原“当权派”争夺的目标。实际上，到

了 1973 年，社会力量对比又回到了 1966 年初，而且重新开始了分化整合。但是，事实已经证明，在 1969——1971 年毛泽东在“斗、批、改”中曾经尝试的改良主义的效果并不理想，在官僚体制之下基本变了味。这反而又成为党政官僚恢复权力的最好理由。虽然毛泽东“解放”了一些老干部，但是他们心存感激的对象肯定不会是毛泽东而是在这之中积极工作的周恩来，于是他们有向周恩来靠拢的趋势。但是周恩来是否能够担当党政官僚对抗文革派的大任是有疑问的，毕竟周恩来曾经积极支持过文革。在刘少奇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已经消失的时候，党政官僚集团迫切需要一位更好的代表。

而文革派这边的情况要复杂一些。1968——1970 年军队的清洗已经使激进造反派和异端派受到沉重打击，短时间内要恢复实力是不可能了，更何况老干部们正在官复原职，文革前的秩序正在被逐渐恢复。现在文革派可以依赖的，首先是江青对于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教育领域的控制权。由于他们在其它领域丧失阵地，因此他们对这块阵地控制得也就越紧，知识分子所积聚的不满也就越强，这是第一个问题。但是这还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能够倚赖的是在九大中被吸纳进体制之中的造反派组织。但是文革派与基层造反派几乎没有互动的渠道，两者各自为战，你不可能指望这些社会底层起来的造反派斗得过官场上的老油条。而且多数造反派无行政能力，业务还得依靠党政官僚来干。因此他们也未必可靠，这是第二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当年将这些造反派组织全部吸纳进体制内，这个体制似乎也在消化吸收着他们，也就是说文革派和他们希望代表的社会阶层，即普通劳动者的联系是非常微弱的，由于中央文革小组被撤销，体制外造反派的群众组织也已经瓦解，文革派激进的平等政策与社会底层之间的互动非常微弱，使得包办替代主义时时可见。而文革派推行盲目追求平等的激进政策就更加未必能给人民带来实质性的好处，更何况大家已经对文革普遍失望的条件下。事实证明第三个问题是撬动文革派根基的最好突破口。

总而言之，文革派目前是一支缺乏组织性，缺乏整合，但是确实还能对党政官僚集团的权力起到一定牵制作用的群体。文革派真正能控制住的仅是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领域。而以这么一个领域又不可能发起什么进攻，而毛泽东已经放弃了“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想法，他所愿意做的只是保护造反派的现有阵地不会丢掉。虽说把毛远新派到了辽宁，但影响毕竟有限。现在的局面是传统党政官僚控制了行政经济领域而文革派控制了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正是在这种胶着状态下中共十大召开了。

如果说“团结”（用现在话说就是“和谐”）是九大的主旋律的话，那么中共十大就可以用“简、速、密”来形容。在 1973 年 5 月 20 日——31 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为大会做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并同华国锋、吴德一起列

席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王洪文负责的党章修改小组提出党章修改草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秘密召开。它只开了短短的5天，似乎破了纪录。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等13老干部。8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周恩来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主持起草的。该报告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等。

尽管对林彪事件进行了大费周章的解释，但是它注定不能让人满意，反而加剧了人民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的不信任感和虚无感。十大有利于文革派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充实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把批判修正主义列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长期任务；二是提出“反潮流”的原则，要求党员要具有“反潮流”的精神，做到“五不怕”等等。这明显是对1966年的“造反有理”的一种改头换面的提法，同时也反映了老干部的强势的“潮流”地位。毛泽东麾下现在有5位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和李德生。除此之外再加上朱德、张春桥、董必武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江青和姚文元被选为中央委员。

中共十大双方的地位都提升了，一方面是文革前的老干部大量复出，另一方面是文革派都成为了中央委员，张春桥当了常委，王洪文更是一跃成为党的副主席。但从长远来看复出的老干部人数越来越多，联系和组织越来越紧密，基层造反派组织越来越被排挤，形势对文革派不利。尽管毛泽东有重新转左的倾向，但是这毕竟不是1966年，毛泽东不可能再去鼓动一场造反了，更何况这时候或许老干部集团的政策似乎更得人心一些（但这主要是周恩来的功劳，而且这时候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的问题还未充分暴露）。而文革派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领域的地位依然稳固，“三结合”中当年受到军队沉重打击和边缘化的基层造反派也要求扩大权力。最终文革派还是决定回到最初的目标——文化革命上来。

第三章 再次较量

第一节 第二次文化革命

要合理解释林彪的背叛行为而不会使党的形象受损是需要想破脑袋的。已经被完全纳入政治运作的文艺和意识形态发挥了作用。1972年，郭沫若发表文章讨论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结果在争论中矛头集中到了孔子头上，也就是认为孔子支持奴隶制，是在“开历史倒车”。而直到60年代毛泽东都还赞扬孔子——尤其是在面对知识分子时。但在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很快，林彪与孔子就“不可思议”地被粘到了一起——尽管一个已经死去2年，而另一个已经死去2000多年了。

8月4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揭开了批判儒家思想的序幕。很快各种批判儒家、批判孔子，赞扬法家，赞扬秦始皇的文章开始冒出。尽管毛泽东与秦始皇的历史功绩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把林彪比喻为孔子就似乎不当——即使孔子是个“开历史倒车”的人。总而言之林彪成为了2500年来错误路线的继承人，媒体甚至信誓旦旦地说林彪把“克己复礼”的条幅挂在家里。文革中产生的“两条路线斗争”历史观一下子被延长了2000多年。文革结束后的官方结论认为他们在批判孔子时所说的“周礼”、“周朝”、“周公”是在影射攻击周恩来，即“影射史学”，这有一定道理，尽管参加过“梁效”写作组的一些北大教授说他们直到周恩来去世都不知道他们的文章与周恩来有关。所论述的对象还不仅仅是秦始皇和孔子，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都被卷了进去，如西汉的《盐铁论》也被认为是路线斗争，被骂了1000多年的曹操也被热烈吹捧。

但是攻势还不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教育领域批判也开始展开。拉开序幕的是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和“反潮流”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在教育领域激进的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成为“反潮流”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批判儒家思想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了1973年底，“批林整风”实际上已经成为“批林批孔”。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同一天《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政治系工农兵学员，干部子弟钟志民拒绝父母“走后门”的安排，要求退学、退伍一事。这一被揭发出的腐化现象迅速与儒家的家族本位思想联系在一起，上升为“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对高校推荐制度产生的“走后门”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批判。后来叶剑英“顶风作案”，送两个高干子弟上大学，被江青拿到中央政治局严肃讨论。在这期间，河南省发生了“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一个女学生因未答完英语考卷，被校方指责

而自杀，成为“批林批孔”运动中“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对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展开批判。而学校中的“批林批孔”运动已经扩展到了社会。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最典型的“批林批孔”语言，它声称：

为什么他拼命鼓吹孔孟之道呢？就是因为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是一致的，都要复辟旧制度，妄图把历史拉向倒退。

林彪在九大以后多次鼓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林彪把反动的“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他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狂叫“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阴谋篡党夺权，妄图实行独裁统治。……

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林彪说他是“勉从虎穴暂栖身”，“随机应变信如神”，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使用的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

凡此种种，都证明批孔确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是为了更好的批林。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

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革命，反对倒退**，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忱地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很快各种各样“批林批孔”的文章相继出炉。掀起“评法批儒”的浪潮。“梁效”等写作组也因此成名。其批“周公”，批“宰相”、“宰相儒”都有影射攻击的意味。北京大学哲学系的70级工农兵学员还出版了一本《论语批注》，对全书进行了逐条的注释、翻译和批判，成为历史上最特殊的《论语》译本。6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议上大讲“儒法斗争史”，又称“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重点是批党内

的大儒”。明显有把批林批孔上升为政治运动的意图。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不断升级，地方上在 60 年代末被军队强行压制的造反派再次展开斗争，派性问题爆发，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武斗。但是这场运动还是受到了限制，串联和战斗队都被禁止。也许“批林批孔”是毛泽东在 1969 年后唯一一次认真地考虑发动群众开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是军队专政年以来各地受压的造反派对运动讯号做出积极响应规模最大的一次。但总体来说，对于体制外它是一场古怪的有政治影射含义的官办政治运动，几乎没有触及到除教育外的现实问题；体制内它成为那些被吸纳进体制的群众组织再次斗争的借口，新仇旧账一起算。一开始造反派是要求为在清查“5·16”和“一打三反”运动中所受的冤屈平反，为限制官僚专权主张扩大群众组织的权力，恢复他们在革委会中的地位。但是很快（比 1967 年还快）他们就陷入无休止的派性斗争之中了。马克思说，“黑格尔在一处说过：一切巨大的世界历史事实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笑剧出现。”第二次文化革命产生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各地都发生了内讧和派性斗争，更严重的还不在这里。一些地方是工资长期不涨导致不满的工人趁机罢工，一些地方是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导致工厂领导趁机罢工，总而言之，“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导致了经济滑坡。6 月 18 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汇报说：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有所下降。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备影响较大”。煤炭比去年同期下降 6.2%，铁路运输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2.5%，钢比去年同期下降 9.4%，化肥比去年同期下降 3.7%。7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7 月 17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这是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10 月 4 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文革派对此非常不满。18 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1 月 12 日，毛泽东对江青的一封来信的批示中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自此文革派的活动告一段落。批林批孔运动也随之草草收场。但是江青并没有领会毛泽东对她

的告诫和教导，这使得文革派的前景更加黯淡。

批林批孔运动是毛泽东时代最后一场大规模政治战役。一方是在文革中受打击，如今开始复出的老干部，另一派则是以“四人帮”闻名的文革派。他们在反对林彪的斗争中暂时结盟并都得到了好处，而毛泽东也在尽量地维护两派之间的平衡。当他认为老干部的复出越来越难以遏止时，他希望通过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运动增强文革派的实力，一方面是扭转由于传统官僚占据了行政领域导致毛泽东中实行的改革政策出现变异，如“走后门”等现象。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加强文革派与社会底层那种非常微弱的联系，通过批判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来为文革派加上一分，使其能在意识形态领域之外扩展阵地。但是由于有我之前说的那三个因素限制，即文革派只掌握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领域，温和造反派被体制消化吸收，阶级与阶级代表联系微弱导致包办替代主义，结果这场运动只能通过借古讽今的古怪形式来进行。事实上文革派采用这种影射的方式进行攻击恰好说明了在社会力量对比中文革派所处的极其不利的地位，而造反派的闻风而动也没有使得他们能够恢复 1968 年以前的那股力量。这场政治运动最终因触发历史遗留问题，经济滑坡，毛泽东不再支持而流产。在这之后，党政官僚恢复实力的潮流已经势不可挡。

1974 年 11 月，广州出现了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它是民间左派对第二次文化革命的一次迟到的响应，也许是文革运动失败导致的结果使人们意识到了文革异端派在理论上一定的正确性，实际上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理论总结：

.....虽然锺志民同学的退伍的行动不过是李庆霖愤怒的呼喊（李庆霖因经济困难在写了给毛泽东的求助信后成为四人帮的红人——引者注）在特权阶层中引起的微弱的回声，但是在人民群众中这个回声却引起了连锁般的震动了。这一叛逆行动吓坏了一些人，鼓舞了一些人，有人切齿痛恨，有人衷心欢迎。这些互不相同的反响，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状况吗？

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便在实际上对这部份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

这种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注意这个地方，这是文革异端派最爱

用的词，从江青的《为人民立新功》中发挥而来——引者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荫及到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实际的世袭地位，并且围绕著他们的私利，改变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争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地剥夺这些同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们了。我们在本文里提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基础是从特权中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就是这个意思。

它还激烈的批判了“林彪体系”鼓吹的宗教式的个人崇拜，投机革命的行为，1968年以来对造反派的血腥镇压，“走后门”的现象，并赋予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以自己的理解，实际上是恢复了1966、67年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意义：

与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是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如说是为了锻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还有甚么能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的议论国家大事，批评错误路线更能成为生产力解放的标志呢？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并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这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没有过的，生气勃勃的，这是革命的奇勋。

但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

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也是在遭到剥夺的时候，才更感到民主权利的珍贵。尽管一九六八年把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革命造反派群众）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一个彻底摧垮林彪体系的群众运动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到来，他们必将重新恢复和发展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精神。

它提出建立人民民主制度才是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希望在法制的基础上恢复 1966——1968 年的民主和“造反”精神。并激烈批评了高层文革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包办替代措施。与以往异端派不同的是，林彪取代了周恩来成为他的首要靶子。值得注意的是它对造反派有所反思，即能否建立一种法制体系，使得造反派在参与政治生活中避免军队和党政官僚的打击报复？这套有左翼色彩的法制体系是要围绕着如何防止“官斗民”展开的。凭借相当直接的语气和不错的理论功底，它成为文革后期异端派的代表之作。此时运动已经结束，文革派不会轻易包容异端的再现，而刚刚夺恢复权力进行反攻倒算的党政官僚就更不会容忍。尽管被镇压（当时只是开批判会，1977 年其作者却作为“四人帮余孽”被逮捕），但是不能说他的观点没有得到高层的注意。因为与此同时高层也出现了类似的动向。

1974 年 10 月 20 日，毛泽东接见外宾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 8 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12 月 26 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了召开四届人大的“长沙决策”，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

资产阶级的。’ **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它正式完善了毛泽东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

显然，毛泽东还在尝试着不使官僚集团垄断政权的努力。但是高层文革派与基层异端派在政权合法性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冲突，使两者的互动总是举步维艰。但是当1976年高层文革派再次复出时，其转向激进的态度，尤其是“党内资产阶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确实也是吸取了批林批孔运动过于脱离实际的教训。实际上，这说明文革的理论经过高层和基层的互动，是完全有继续完善发展的可能的。可惜的是，这时全社会中占优势的是党政官僚当权派。这种社会存在这本身已经断绝了这种可能。

第二节 整顿与反击翻案风

到了1974年底，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体状况都已经非常糟糕。因此复出的党政官僚迫切需要一个真正维护自己利益的代表。毛泽东当然不可能，尽管周恩来在70年代倒向党政官僚的倾向非常明显，但是无论是他的身体状况还是他的中间派立场都使得他不可能担此大任。最终，邓小平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中共十大上邓小平当上了中央委员，并在1974年春出席了联合国的会议，正式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中国不属于那个早已不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属于第三世界。1975年1月邓小平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叶剑英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自此党政官僚基本掌控了军队。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张春桥的新《宪法》。周恩来在报告中列出的经济增长数字与西方观察家的估计接近，但是没有提经济上的许多严重问题。他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设想，正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两步走战略。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鼓舞。

但是最耐人寻味的是那部“简洁”的1975年宪法。首先，它废除了毛泽东1949年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观点，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从

纯理论角度理解可能更加接近马克思、列宁的原意，而且直接秉承毛泽东的长沙谈话的思路。第二，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肯定了已经成为事实的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第三，人民公社和革委会都被作为行政机构肯定下来。为了防止再出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现象，“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牧区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也被写入宪法。但是革委会的“三结合”变成了“都必须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已经出局的军队不必多说，但是群众组织如今也只是作为“青年代表”出现了。这反映了党政官僚的强势地位。

最值得注意的改变是人民的民主权利上，这也是后世争论最多的地方。宪法删除了1954年版中的“公民有从事科学研究，文学和艺术创作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和“居住与迁居的自由”。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与60年代以来的文艺激进思潮一脉相承。当然最著名的就是肯定了1957年鸣放以来，在文革中发挥到极致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其次就是在自由的一部分，加上了毛泽东自1956年就要求加上的“罢工自由”。

对于其意义褒贬不一，但是它后来几乎全部被抛弃，因此成为中国宪法体系中的“另类”。尤其是后来删除“罢工自由”和“四大”备受争议。一些人说中国的左派是主张“回到过去”，“鼓吹文革”，可是“老左派”在1982年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哪能自己罢自己的工呢？”删除了文革宪法中的“罢工自由”。这在改革开放语境下应该叫“‘左’的思想作怪”了，可这却是反对文革的。这也使我们反思，改革开放语境中的那个“左”与文革中的“左”究竟有多大联系呢？

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已经证明了当时的政治格局：29个部的部长绝大多数是文革前当权的老干部，多数与周恩来个人关系甚密，只有文化部还一如既往地掌握在文革派的手

中。莫里斯·迈斯纳评价说：“极左分子在当时的权力比表面上要小得多，更没有达到他们的对手在垮台后所说的那种程度。**‘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权力主要限于文化界和官方新闻界，他们充分利用这些媒介来夸大自己的重要性，使其大大超出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国家机构和军队的真正权力一直牢牢地掌握在文化大革命前的那些老干部手中。‘四人帮’在政治上的显赫思维，实际上还有他们的政治生命从根本上是依赖于毛泽东的庇护和支持，而此时的毛泽东已重病缠身，日渐虚弱了。**”

阴谋论者根本拒绝分析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就从“宫廷内幕”中推论说毛泽东要传位给江青。如果继承领袖位子的是一位国家机构和军队都不支持甚至强烈反感的人物，那么迎接这位领袖的后果可想而知。华国锋已经不完全地证明了这一点。阴谋论者自己就说漏了嘴：“**‘四人帮’要上了台，我们就准备上山打游击。**”哪里还用打游击，不能掌握军队的领袖的命运除了被政变搞掉就是当傀儡，没有第三条道路。

也不能说四人帮完全没有基础。在社会上，尽管他们声称要代表工农的利益，并在文革中确实也为争取工农的平等地位做过激进的努力。但是如今农民对他们几乎不了解。而在文革初期使得他们与基层工人越过官僚集团直接保持紧密互动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已经不复存在，这使得文革派与工人之间互不理解，各自为战。造反派的大多数早已被军队清洗。剩余的造反力量已经在这场持久战中透支了精力和热情，更多地采取了观望和等待机会的态度。而此时占优势的保守派是坚决支持老干部当权派的。尽管文革派还一直在从社会底层“发现”人才，如张铁生、李庆霖，毛泽东也提拔了陈永贵、吴桂贤等人，一些造反派还当上了中央委员，但是他们更像是“花瓶”。尽管王洪文还试图组建城市工人民兵，但是只控制了上海一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点也根本不稳固。总而言之，四人帮在斗争中离工人、市民越来越远，它越来越只能代表（这种代表还是不自觉的）那些凭借文革运动进入“三结合”，但如今早已被边缘化的造反派组织。后来四人帮倒台后也主要清洗这些人。

既然四届人大已经使老干部在国家机关和军队中占了优势，接下来就是对社会力量的争取和控制了。1975年3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对经济政治各个领域进行大整顿。在整顿铁路运输时，他提出：“**抓革命，主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健全规章制度……‘严’字当头，矫枉必须过正。**”之后展现的是邓小平一贯的铁腕甚至冷酷的作风，在对基层造反派组织进行猛烈打击（如徐州），坚决镇压了所谓“闹事派”后，强行压制了派性问题（但也有不成功的，如兰州铁路局反而派性大爆发，后来发生了上访人员大闹铁道部的事件）。

因互相牵制扯皮导致的交通晚点、拥堵问题基本解决。5 月份，邓小平又进行钢铁工业整顿，同样是通过铁腕打击派性，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劳动纪律的方式。并于 9 月份形成了《工业二十条》。这都是文革曾经强烈批判的。在残酷打击造反派的同时，4 月份中央宣布开展平反释放工作，长期被关押的干部 300 多人被释放，成为文革中“解放老干部”的一次重大行动。无疑这大大增强了党政官僚的实力。邓小平还继续引进国外技术产品，并提高知识分子地位以获取支持。1975 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11.9%，整顿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邓小平整顿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文革造成的既成结果是所有党政官僚，包括军队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这些人至少在感情上不再愿意承认毛泽东了，因此他们天然有需要去另外找一个“恩主”来作为他们的利益代表。那么这就造成了一个政治机会：**只要解放老干部，否定文革和造反派就能突破“山头”的鸿沟获得普遍的政治代表性，取得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政治主导权。**这是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早就指明了的。从邓小平最初的整顿，到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开展“揭批查”，再到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清理“三种人”，基本延续的就是这个思路。邓小平通过整顿行动镇压派性，解放干部，在获取官僚集团的政治代表性上抢得了先机和主动权，为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战胜华国锋奠定了基础。第二，整顿措施组织了工人进行生产。而文革的一个问题就是，曾经在文革中组织工人进行生产的群众组织和军队受到排挤和打击已不复存在，因此一些不成功的改革导致了散漫风气和无政府主义的蔓延，再加上官僚主义的复苏，导致效益低下。如今邓小平的通过强行压制内部矛盾的铁腕整顿来组织工人生产，无论长远看来如何，起码短期来说起到了组织工人进行生产的效果，当然是包办替代主义的组织。更不用说服务行业的整顿给人民带来的便利。这使得相当一部分工人、市民至少是暂时倾向于当权派。第三，邓小平的这种包办替代主义的组织性，恢复苏联模式的工厂管理，强化了党政官僚对于经济乃至社会的控制力，使其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官僚的利益与社会秩序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第四，通过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使得已经重新转向激进的，批判“党内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法权”的文革派无法争取到工人的支持，提前挖走了文革派可能的盟友，使其社会基础越来越窄，最终几成空中楼阁。

文革派当然不能容忍这一行为。早在 1975 年 2 月，根据毛泽东的提示，《红旗》杂志发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出**“在消费品的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其焦点正是社会不平等和官僚特权这两张极好的牌。3 月 1 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提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其

矛头指向非常明确。4月1日张春桥发表其力作《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提出“不论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的问题”，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将导致“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的产生。”这些文章与文革初期的一些异端思想如《论新思潮》和《中国向何处去》都非常相似，显然文革派自身不利的处境使其被迫转向激进化。官方历史说四人帮在倒台之前多么倒行逆施，但是实际上文革派在1974年惨败后在1975年初也意识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因此从左派的角度为人民的平等权利做过一些理论上的努力。但可惜笔杆子毕竟不是政治家的对手，邓小平在整顿中实打实的利益和恢复的秩序还是让多数工人市民至少在短时期内倾向于后者，尽管还没达到热烈拥护的程度。

针对文革派地位危急的情况，毛泽东终于不再保持中立态度而是再次倒向了文革派。尽管在复出之前邓小平赌咒发誓“永不翻案”，但是如今只有傻子才相信了。

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在全国开展了“评水浒”运动。这个讲话从小了来说，是在指责周恩来、邓小平的扩展党政官僚权力，打击造反派的措施，从大了说，是反对招安投降，主张继续革命，寄希望于造反派自身提高其组织性。

尽管邓小平不得不花大力气去和有毛泽东支持的文革派进行论战，但是这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社会上多数人已经倾向于邓小平了。由于自己的地位可能不保，文革派对自己最稳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阵地的控制也就越来越严厉甚至恐怖。这进一步激发了知识分子对文革派的不满。而文革派越来越严酷的文化控制所激怒的不仅是知识分子，更有广大市民。

现在毛泽东最后的底线是希望邓小平肯定文化大革命，提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结论，认为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似乎是预感到了造反派有被清洗的危险，毛泽东希望老干部“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

志就不犯错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毛泽东要邓小平“表态”的意义在于，毛泽东意识到造反派未能完成政治组织和整合，不可能独立掌握政权（否则他没必要让“第二号走资派”来给文革做正面评价），但它已然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平衡和牵制力量。原本在发展中国家，很难在精英阶层之外有能平衡制约的力量的整合和成长，中国是因为文革这样一个特殊事件，才出现了造反派这样的是能够部分地防止精英阶层的利益取向走极端的平民阶层利益群体。但是在官僚集团来说是胜利在望的时候，邓小平拒绝了任何可能制约牵制该集团的社会力量的存在，因为他现在最需要的是通过否定文革和造反派来获得党政官僚的对自己的一致拥戴。1975年11月，在了解到邓小平拒绝了对文革“三七开”后，毛泽东让邓小平“专管外事”。11月下旬，在专门召开的“打招呼会”上，毛泽东正式将邓小平的举动定性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各地开始开展学习，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可是，1966年会发生50天专政和“打击一大片”的悲剧的主要原因就是党政官僚作为政策的执行者考虑到政策本身的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如今他们已经恢复了权力，因此你不能指望他们还会去执行。尽管要求各地领导要“转弯子”，即希望他们能像当年的“亮相”一样支持造反派，但几乎得不到响应。造反派也进行了斗争但收效甚微。除了文革派控制的高校，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场政治运动就这样在冷冷清清之中进行着。

1975年末，毛泽东再次讲话，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谈及理论问题，这可以说是他对文革的最后总结发言，从而完成了自己从60年代开始思考的“继续革命”理论：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尽管党政官僚或老干部集团已经在除了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以外的领域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是谁也不会傻到忽视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的作用。而这两块阵地要想马上夺回几乎是不可能。而毛泽东也不可能同意他們把文革派打倒。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重病中的毛泽东去世。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日子不会太远，但是毛泽东不会轻易放弃他的立场和理想，文革派也不会束手待毙。而这就使这一段时间还是会充满变数。往往比赛最紧张的时刻，是一方只要拖到终场哨声响起就能胜利而另一方则拼命发动进攻而且还有机会翻盘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迎来了以悲剧性著称的 1976 年。

第三节 华国锋的雾月十八日¹

1976 年 1 月 8 日 9 时 57 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逝世。

周恩来逝世后，谁继任总理就成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继任总理的人所属的那一派很可能就是将来是能掌控政局的。现在的问题是，文革派既无能力也无实力压服国家机构中的当权派，更何况军队多数抵触，对政治家来说政权稳定永远要高于政治理想，因此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不会选择张春桥。但是毛泽东更不会选择邓小平。最后在这个历史关头被推上前台的是公安部长华国锋。

去猜测毛泽东和华国锋有什么私人交情的工作这里就不做了。中央文献版《毛泽东传》说得可能最为准确：“他是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人。”华国锋干过游击队政委，从大派系来说应该属于政工干部。但是他的出身与朴实的形象使他无论与党政文官还是与工农军队干部的关系都不算坏。尽管他对文革中的造反派没有什么好感，文革派也对他不感冒，但是至少从感情上这位湖南曾经的领导人支持毛泽东，尽管他未必认同毛泽东对于文革的理论 and 理想，但是他满足了毛泽东最后的底线：那就是他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6 年初，《红旗》杂志发表《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从毛泽东的指示发挥，提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

列宁曾经指出：“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也是这样吗？他们害怕社会主义革命到自己头上，触动私有制，触动他们所喜欢的资产阶级法权，触动他们要维护的传统观念，触动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同革命的矛盾，同坚持继续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的矛盾，也就越尖锐。……

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就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这也是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不能接受而要加以反对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三大差别。这些东西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地铲除和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一项长期的任务。

二月初，开始出现了一些悼念周恩来，批判四人帮的大字报，尽管不成规模，但是其煽动性的语言确实具有很大的分量。3月份广东甚至还流传出了一份《周总理遗言》。3月底，南京工人、市民、学生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首先达到了高潮。而随着清明节的临近，越来越多的花圈和悼念活动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4月5日清明节当天，由于前一天当局将花圈收走，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迅速演变成了一场近200万人次的激烈的示威抗议活动。晚上9点半，民兵和警察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镇压。但是由于民兵警察也同情示威者，而且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也采取了谨慎态度，因此未发生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多数人被劝说离开，但是最后拒绝离开的200多人遭到了殴打，38人被捕。是为“天安门事件”，后称“四五运动”。4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将“四五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同时，这个决议正式宣告华国锋就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虽说“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是华国锋后来的故意利用了毛泽东针对一次具体事务的评语，但是他的职务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他的接班人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逝世后的悼念活动中，民众也不是铁板一块。大致有3种因素：一是由于上山下乡运动阻断了城市青年人在原有社会体制中正常的发展和流动，一些学生认为邓小平代表的是一个阶梯型的正常社会，可以寄托他们的理想；二是文革期间党政官

僚、军队和知识分子及其子女所积累起来的严重不满，突出地爆发出来。而 70 年代许多高干子弟“老红卫兵”利用“走后门”返城上大学实际上也壮大了他们的力量。因此他们的诉求与当年“联动”的主张非常相似（简单说来就是“忠于马列主义和 1960 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只有在这一部分人中才明确涉及到对邓小平和四人帮在政治上决然不同的取舍态度；第三是普通市民的行动，这是民众觉醒的产物。不过邓小平的整顿政策只是让他们有所倾向，但还不是明确和坚定的支持。因为周总理的清正廉明形象受到许多人的自发拥戴，他们只是借此表达一下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糟糕局面，如人民生活水平停滞，思想文化钳制的不满，并没有特定的政治诉求。毛泽东批准的“反革命事件”定性，实际上是针对第二部分人的政治意志表述的；但文革结束后的表述，把三种大有区别的情况“一锅煮”了，说所有去广场的人都是“拥邓”，“反四人帮”的，这明显有美化新领导的意味。

尽管我们不清楚在 4 月份以后对于四五运动的后续镇压和逮捕上（后续逮捕 388 人）毛泽东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最后的时日里，文革派还是只能借用毛泽东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对“右倾翻案风”的批判响应者寥寥，愿意“转弯子”的当权派就更少。而此时，强烈的社会震荡以及前景的不明朗，尤其是对文革派可能上台的担心，导致了党政官僚当权派，领导人员们的罢工和消极怠工。就像之前说的，1975 年邓小平的整顿已经使得党政官僚更加强化了对于经济乃至社会的控制能力，至少是把他们的命运和社会捆绑在了一起。文革最高潮时官僚被打倒但群众组织或军队仍然能够组织生产。因此 1968 年杨曦光能够得意地说没有官僚生产照常，可 1976 年这两者都已经不存在了，仅有的工人民兵也实力弱小。当官僚由于担心文革派上台，自己前景的不明朗而主动旷工时，没有自我组织性的工人也就随即垮掉了，从而引发了 1976 年的经济危机。工厂停工、旷工、怠工的浪潮席卷所有城市，工业生产直线下跌。而管理层罢工导致幸存的造反派之间历史遗留的派性问题再次爆发，一些地方政府基本已经瘫痪。而政府的混乱又使社会犯罪日益横行，治安严重恶化，社会动荡不安。1976 年工农业总产值仅增长 1.7%。后来所谓“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主要证据就是 1976 年的经济危机。究其原因，邓小平 1975 年的整顿已经完成了把党政官僚和社会利益社会秩序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一过程，已经取得了当权派的集体支持。经过好几年对造反派组织和军队的打压下来，党政官僚已经逐步垄断了社会权力，除了党政官僚系统外社会上已经不存在能够维护住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的力量了。1976 年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从反面证明了整个社会对于党政官僚有多么的依赖。也就是说，1976 年的中国实际上已经不是跟文革派走还是跟官僚精英们走的

问题，而是在党政官僚的指引下往哪个方向走的问题。

6月份，中央宣布毛泽东将不再接见外宾。6月15日毛泽东对华国锋、叶剑英等人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显然，毛泽东很清楚党政官僚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但是他希望作为开明保守派的华国锋能够尽可能地保护文革的既有遗产，这可能是“继续革命”的唯一办法了。

悲剧还远远没有结束。7月6日，在四届人大后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一座工业重镇的毁灭使得经济形势更加雪上加霜。

1976年9月9日中午，各地广播电台宣布“下午4时有重要广播。”下午4时整，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在哀乐声中播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这场斗争的终场哨终于吹响了。

9月18日，华国锋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宣布了官方认定的毛泽

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理论贡献：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为我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做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

从当时中国社会阶层的力量对比来看，如果没有毛泽东，支持和反对文革的双方的实力差距是十分悬殊的。通过对 1976 年中国的形势分析，那种毛泽东想“传位”给江青或毛远新的故事可以扔到一边了。从华国锋的各方面情况看，毛泽东最后的愿望是希望他能够起到调和各派之间的矛盾，将派别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华国锋既不是革命领袖也不是久经考验的政治家，他只是一个官僚机构的看守人。这样的人是很难成为这个时候的中国的领袖的。毛泽东不指望华国锋能做什么，但是由于这种从地方提拔上来的官僚和中央老干部相比与文革派的矛盾要轻一些，故我称之为开明保守派（文革初期的陶铸、王任重是如此，除华国锋外，纪登奎、陈锡联也是如此），因此如果他能够保护住文革派不受当权派的围攻，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那么在党政官僚的主导下经济可以继续发展，而在文革派的监督和制约下使官僚的权力不至于膨胀到“变修”的程度。但是文革派本身的素质和实力堪忧，而华国锋此时对待文革派的态度却又暧昧不明。

当时中国的局面是，得到主导社会力量支持的人得不到最高领袖的支持（也就是得不到

执政的合法性)，而得到最高领袖支持的人却无法**满足强势集团的利益**。那么华国锋最终还是倒向了党政官僚一边，希望通过整肃文革派来获得党政官僚的支持。而直接原因是文革派利用其掌握的媒体提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遗嘱”，与华国锋正统的“**照过去方针办**”产生冲突。这让华国锋感到恼怒。不管怎么说，在毛泽东逝世后，以华国锋为首的同情文革的开明保守派与文革派首先发生了冲突。如今的形势是老干部当权派实力最强，而且可能**在其他两派的总和之上**；华国锋的开明保守派次之，他们暂时得到军队的支持，尽管军队可能随时会倒向老干部一边，开明保守派虽然经济政治基础与前一派类似但对文革持同情态度；文革派尽管在中央委员中人数不少但真正实力最弱，核心是三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激进知识分子（他们只掌管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个已经**没有多少社会基础的造反派领袖**（仅有上海的民兵）。尽管中央委员中还有支持或同情文革的人，但是他们也倾向于开明保守派，没有“死保”文革派的利益诉求，一旦局势变化就会倒戈（如陈永贵、吴桂贤、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不过从另一角度来说，他们虽权力有限，但人数不少职位很高，因此使得老干部很难通过投票的方式打倒文革派。而其它可能支持文革派的人中，随着林彪倒台和八大军区对调，除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一人外，造反派得到军队支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王力、关锋、戚本禹、陈伯达已经倒台；康生、谢富治已经去世。因此，文革派缺乏与党政官僚集团抗衡的真正实力。

如果要保障自己的地位，华国锋要做的应该是联合文革派去抗衡强大的老干部集团。毛泽东可能也是这么考虑的。但是华国锋考虑的是通过整肃文革派来获得官僚集团的拥戴，从而把整个统治集团团结在自己周围。这是林彪在1970年就想做而没能做成的。由于急不可耐的文革派率先打内战，引发关于“**按既定方针办**”还是“**照过去方针办**”的争论，直接促使华国锋决定与老干部集团合作打垮文革派。但华国锋的计划落空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希望通过整肃文革派来讨好老干部，从而获得政治主导权，但这意味着他与邓小平走到了同一条道路上，与邓小平形成了“竞争”的关系。但是，邓小平已经借着整顿抢占了先机，成为党政官僚一致中意的政治代表。而且华国锋身上有毛泽东和文革的包袱，他无法在评价毛泽东和文革的问题上走太远，否则他就否定了他自己。而邓小平所能提供给官僚集团的要比华国锋所能提供的多得多。这是华国锋失败的原因所在。

自1968年文革的热月以来冲到了激进的顶点的政治局势就开始向保守的方向回落，以后就落个不停，从激进到温和，从温和到保守。恐怕华国锋也无法扭转这一局势，但是他最终还是推动了那最致命的一落。不管华国锋是如何考虑的，1976年的10月华国锋还是选择了发动政变，还是选择了他的雾月十八日。

当权派中的陈云最初不同意采取政变而是主张民主投票解决，但是华国锋等人一口咬定四人帮马上就要夺取最高权力（后来证据仅仅是江青的几句话和上海的民兵武装），他才同意政变。除掉文革派的计划进行得异常简单。10月5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召开了排除文革派之外的政治局会议，制订了计划，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执行。10月6日凌晨，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清样的名义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来开会，3人随即被捕，江青也随后被捕。很快其他人如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也被逮捕。接着，上海市的民兵组织也被摧毁。这就是“10月事变”的全过程。

10月7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正式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证明自己从前任手中继承来的权力的合法性。10月8日，中央不顾毛泽东生前曾在火化倡议书上签字，做出了永久保存毛泽东遗体 and 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同时做出了编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毛泽东全集》的决定。10月10日，位于北大朗润园的“梁效”大批判写作组被北京市卫戍区解散。1976年10月2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大会。华国锋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这就是华国锋的雾月十八日。毛泽东时代就此结束了。邓小平的时代即将开始。

第四章 评价

第一节 清算

在此时华国锋与老干部集团还保持着合作关系。而他们之间的具体分歧有哪些可能还存在争议，比如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华国锋没有阻止邓小平的复出，也没有阻止真理标准讨论的进行。但不管怎么说，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开明保守派和以老干部为代表的正统保守派之间的最大分歧恐怕还是在文革上。华国锋肯定文革的态度是让多数人不满意的。而且不仅是文革，文革前的历史事件所造成的问题，特别是反右，都亟待处理。华国锋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无法和多数人想到一块去。

另一方面，实际上在80年代初以前，没有太多人怀疑过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他们只是主张对个体经营应该放松一些，应该稍微往后退一些。华国锋与当权派在经济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是，华国锋主张继续进行大型重工业建设，即雄心勃勃的“洋跃进”。即恢复一五计划模式也就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华国锋当时认为石油危机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会

很高，因此企图用“再开发十个大庆油田”的方式，以出口石油来换取外汇，然后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着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且不说这脱离实际，更意味着首先要把大部分被毛泽东分散到地方的经济权力再都重新集中到中央来，但地方分权化的格局在文革期间已经成型后，重新走向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在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这是完全不符合文革时期已经形成的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的。这也是华国锋后来下台的原因之一。而对于整个当权派来说，劳动者对他们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暂时的，尽管他们也同样倾心于一五计划模式，但这意味着效益增加的同时不平等现象尤其是官僚主义的问题日趋严重，这迫使当权派必须进行新的有利于劳动者的调整。更不用说文革中造反派所揭发出来的那些腐化堕落的行为基本都是这些人的“杰作”，因此他们要维护公众对自己的形象也必须进行变革。调整主要是要求解决“吃穿用”问题，增加轻工业和消费品的生产，也就是所谓“消费品补课”。70年代末国家不惜以建国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比大跃进创造的赤字还大）来生产消费品，改善人民生活。显然文革的冲击使得党政官僚不得不也向左靠拢一些。

总而言之，华国锋与老干部在经济问题上有分歧，但是这时候多数人都认为是毛泽东把体制“折腾”坏了，对原装正宗的苏联模式，也就是“一五计划”模式是毫不怀疑的。

但不是说华国锋没有努力去赢得更多阶层的支持。随着完整工业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尤其是国际局势缓和导致三线建设的必要性降低，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压缩日常用品消费肯定会引起社会的不满。1977年10月，国营企业的工人涨了10%的工资，这是20年来的第一次。当然伴随工资提升的是更加严格的劳动纪律和管理制度。尽管包产到户还未得到允许，但是对自留地和农村集贸市场的限制都已经放宽。总而言之，到70年代末，严密劳动纪律加物质刺激的管理措施已经完全取代了文革中的精神鼓励和开放管理。

在文化教育领域，分歧似乎也不是很大。文革前的文化制度开始恢复，当然邓小平复出后最大的措施是恢复了高考。知识分子开始逐步平反并回城工作。意识形态控制放松后，伤痕文学和新诗也开始出现。当然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的问题要复杂一些，谁也不能保证这么多人涌回城市都能找到工作。但是问题也在逐渐解决。而文革高潮时的异端派在得到平反后，许多人从极左跳到极右（如“北决扬”中的鲁礼安和白桦，“李一哲”中的王希哲），成为改革初期民主派的雏形，广东“79民运”和北京民主墙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

随着老干部集团实力的增长，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在50年代经济政治的体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也就是先回到一五计划的模式上去。尽管华国锋并不反对这一点，但是他对文革的意识形态的与历史事件判决的坚持以及随之带来的经济改革上的磨磨蹭蹭让很多人都感到不满。更不用说他的“两个凡是”给人们带来的反感了。毛泽东对于华国锋来说不仅是

他的合法性的来源，也逐渐成为他的包袱和累赘。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最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正式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胜利结束”。这个说法应该是正式抛出了“文革十年说”，进一步加剧了关于文革的具体所指的混乱。因此在这之前的官方文献、大字报和日常的词汇使用中，“文革”，尤其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毫无疑问地指的是1966年——1968年的那场狂飙突进的群众运动。

后来的两件事情把华国锋彻底孤立了。一件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个大家都熟悉。尽管华国锋可能没有直接干预，但是这却标志着倾向于文革的最后一个领域：意识形态领域被当权派拿走了。当行政权力和意识形态都掌握在当权派手中后，对于同情文革活文革意识形态的人的排挤工作就开始了。很快这些人被以与文革派有政治关系或“反对思想解放运动”为由赶出了意识形态的工作，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甚至一些人仅仅由于曾经在报纸上批判过彭德怀和刘少奇而作为“左”倾分子被剔除。

另外一件事就是1977年12月胡耀邦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前任郭玉峰由于反对解放老干部而被赶下台，随后被安上罪名开除党籍。胡耀邦迅速解放了大批老干部，大大壮大了党政官僚的力量，华国锋越来越被孤立。

现在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舆论上传统官僚都占据了优势。此时邓小平得到的不仅是官僚和军队，还有在“拨乱反正”中“归来”的知识分子的支持。而华国锋此时热衷的却还是继续整肃造反派来获取支持，也就是继续与邓小平在同一条道路上“竞争”而不是分庭抗礼，但是无论他怎么讨好老干部，他都不可能比邓小平走得远。在对“四五运动”评价越来越高的呼声中，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邓小平的决定性胜利。

就在文革结束以后，一场新的风暴正以“不叫做运动的运动”的名义推行着。这就是华国锋要求清除“隐藏的四人帮残余力量”的“揭批查”运动。这是自清查“5·16”、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后第4次针对造反派的大清洗。这一次虽然不像前几次打击面那么大，但它的火力十分集中，那就是在文革中为了理想或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心态起来造反的造反派。此时造反派严重的派性问题靠压是压不服的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从体制之中完全地赶出去。1976年10月高层的文革派刚刚被消灭，叶剑英就提出“要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清除其帮派骨干分子和余党，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揭批查”由此开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梁效”写作组中的知识分子。作为文革派的笔杆子，其成员写材料、揭发、交代、大会小会相结合进行公开批判、审讯、斗争，“全套作法与文革毫

无不同”，“以‘四人帮’之道，还治梁效之身”。（周一良先生语）

地方上的“揭批查”也迅速展开，我们以黑龙江的“揭批查”工作报告为例：

“与‘四人帮’和毛远新有牵连的人基本上揭露出来了，列为清查对象的 663 人，已查清 261 人，基本查清 169 人。与‘四人帮’和毛远新有关的事件，多数已基本查清。如：反大庆砍红旗，大反‘三五会议’，大批‘松涛曲’，冲击省革委八次全会，破坏四届人大代表选举，冲击省市委和省军区机关，围攻揪斗省市委领导；强抢省委文件，抢先点名攻击邓小平，抢先批判‘三株大毒草’，炮制‘黑大理论组’等黑典型等等。三、摧毁了毛远新在黑龙江的帮派体系。”

而在广东中山，形势更加给力：

“（1977 年）12 月 6 日，县委书记李耀祺（后蜕变为贪污分子）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中央 37 号文件的精神，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在县委、县革委的领导下，全县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便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起来。

.....工厂、农村、城镇、机关、学校处处是揭批‘四人帮’的战场。人们运用召开会议、办揭批专栏、写批判文章和绘制漫画等各种形式，口诛笔伐‘四人帮’。1977 年以来，全县中、小学揭批‘四人帮’的声讨会、批判会就举行 2300 多场，参加人数达 403200 人次；开辟批判专栏 2300 多个，写了批判文章 325400 多篇，特别是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战斗响后，各地中、小学揭批“四人帮”的热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而河南则宣布：“要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那样的革命气势，以当年控诉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阶级仇恨，以当年打仗、土改那样的革命精神，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绝不能心慈手软，决不可半途而废。”

河南文革还是相对温和的，但是河南省“揭批查”的规模却大得难以置信（云南“揭批查”规模比河南还大，但是云南文革比河南激烈得多，派性更严重），有地方竟提出“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的口号。河南干部被立案审查 4248 名，省委常委 14 人中处理了 10 人，占 67%，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 33 人中处理 23 人，占 70%。全省 18 个地市

委第一书记全部处理，地市委正副书记 118 人中处理 97 人，占 82.3%。比如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就以“准备上山打游击”的罪名被判 10 年徒刑。1978——1983 年，全国取消党员资格和清除出党共 13 万人，仅河南一省就有 10.6 万人被取消了党员资格，占全国的 80%（但河南造反派“突击入党”人数只排全国第 10 位）。当时全国惩办打砸抢分子 5000 多人，河南就有 1700 人，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赶在 1980 年 1 月 1 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生效前，河南在 1979 年底还“突击判刑”2400 人，即把在押人员强行压给低一级的法院判决，秘密进行，不准开庭，在审讯中不出示人证物证，亦不准上诉。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犯所谓“文革罪”的一度占半数之多。如果算上“不算做处理的处理”（如不评职称，不提工资，不许做公务员等等），有人估计河南受牵连的人数达 100 万左右。

而且，河南的清查基本是所谓“派性清查”，也就是一派清查另一派，把派性斗争和“揭批查”搅合到一起。河南被清理的干部基本都是造反派“二七公社”的支持者，温和派“河造总”和保守派“十大总部”的成员不仅未受处分反而因清查中“有功”而授予高位。举河南兰考县的例子，因为焦裕禄当年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但也得罪了不少人。焦裕禄的战友张钦礼在文革中得到周恩来的亲自保护，成为兰考县委书记，继续坚持进行焦裕禄开创的工作。但在 1979 年 12 月 24 日，他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判刑的罪名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反党乱军（因为兰考造反派组织支持张钦礼——引者注）；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 1200 多人被捕入狱。兰考焦裕禄纪念馆直到 90 年代才恢复开放。而在同一年，1959 年作为河南省委书记大刮浮夸风，制造了臭名昭著的“信阳事件”的大饥荒，在文革中被判为“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的吴芝圃得到平反，邓小平亲自致悼词。90 年代河南老干部给中央反映情况说：

在河南，文革期间坚持工作的，是老干部的多数，由于揭批查出了问题，把党培养几十年的老干部的多数损失掉了，使河南干部队伍伤了元气，给河南的工作带来损失。新任省委领导也感到河南“缺了一代干部”。

一些工作先进地区和单位，如兰考、林县、辉县等，文革中形势稳定的早一些，生产发展比较好。这本是好事，但揭批查时，反而被当作重点，领导亲自坐阵，大批大撤大换

班。例如，戴苏理去辉县坐阵，揭县委班子“紧跟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盖子”，县委班子全部批判撤换。许多当年跟着焦裕禄同志治沙造林，参加林县修“红旗渠”、搞水利工程的干部，甚至劳动模范，都被打成“四人帮”了。河南省 120 多个县，文革中闹得凶，比较乱的有三四十个，比较稳定的有五六十个，近 300 个大中企业，比较乱的有七八十个，比较稳定的有一百多个。揭批查中，对这些情况却完全不加区别，比较稳定的单位的干部同样被大批撤换、批判。在批判中，发生许多混淆是非的情况，例如对学大寨，不是批平均主义、大锅饭、割尾巴等，而是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批五小工业、批社队企业。这就不是批极左路线，而是批工作；不仅是批干部，连群众也批了。……这种错误的搞法，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连工作也不敢干了。基层干部有顾虑，怕犯错误。

而作家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也在此时期也引起了争论。由于写过迎合文革派的《铁铤传》，蒋子龙自然也成了审查的对象。于是他在《乔厂长上任记》中把自己的不满通过郝望北这个人物表现出来，以此表达自己对揭批查对象标准的理解：郝望北一没搞过打砸抢，二和“四人帮”没有任何个人联系，仅仅是一个造反派的小头头而已，这样的人不应当作为“揭批查”的对象。但是，1979 年 9、10 两个月，《天津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四篇 14 块版的批判文章，指责《乔厂长上任记》是反对“揭批查”，反对思想解放运动的。直到最后胡耀邦得知此事，《乔厂长上任记》才作为“改革文学”得到肯定。

“揭批查”运动到 1979 年才告一段落，在 1982 年整党之前，除广西外，全国被开除出党 13 万人，被**直接**处理的有 40 万人（官方数据，胡耀邦曾说受牵连的超过千万）。但是真正的风暴还没有来到。前面已经说了，由于华国锋选择了和邓小平相似的路线，两者形成了竞争的关系，邓小平有整顿，华国锋就有“揭批查”。那么邓小平就要进行一次更彻底的运动，其目的不仅是要把造反派斩草除根，而且是要把华国锋通过粉碎四人帮和“揭批查”运动而获得的潜在支持消除掉。

1982 年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看上去它很像对《五一六通知》的仿写：

在中央提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

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以后，对“三种人”进行了初步清理。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继续受到重用，有的还被作为接班人已经提拔或准备提拔。这些人人数不多，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对清理出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应加强对他们的思想工作，给以改正错误、弃旧图新的机会。

1983年9月20日，邓小平在与胡耀邦、赵紫阳、邓力群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三种人”：“这些人中间有的确实有点本事，能写能说，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会讨人喜欢，也会办事，容易取得人们的同情。……这些人可厉害呀，手段多的很。他们改换面孔以后，就欺骗了一些人，包括群众，包括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有的还在打华国锋的旗帜，在这旗帜下面聚集他们的力量。有的从当年搞极‘左’跳到另一个极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起劲得很。对这些人，只要我们稍一疏忽，他们就会爬上来。等到将来土壤、气候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会兴风作浪，乘机上台。所以对这些人的能量，对这些人对于我们党的危险性、危害性，千万不能低估。对这些人绝对不能信任。”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全面整党，用3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打击的重点就是“三种人”。邓小平在会议上说得就更彻底：“其中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这些人已经清查和处理了一批，有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已经有所改正。但是确有相当一批立场没有改变而在党内隐藏了下来。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

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

之后“清理三种人”运动在社会上展开。新上任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表现积极。且不说那个什么“帮派思想严重”可以被任何人利用，而且清理“打砸抢分子”时是绝对内外有别的。因为如果说进行了社会破坏，打人斗人，打砸抢的话，那么文革中无论保守派组织还是造反派组织这样的事情都做不少。更不用说那些在文革初期犯下打砸抢的滔天罪行的干部子弟“老红卫兵”们了。但是，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第一种人的表述：“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文革中打砸抢的暴行无论多么骇人听闻，只要没进入革委会，不是造反派，也就是不是“起家”的人都不在此列。得到了特赦令的实际上是保守派。无论是初期的血统论红卫兵还是后来的当权派支持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多数都免除责任。在文革初期打砸抢的高干子弟们被认为是“反对林彪、江青”而得到了保护，无论是作为党政元老的陈云还是在“拨乱反正”中解放大批干部的胡耀邦都多次表态说高干子弟、“老红卫兵”、“联动”分子不是“三种人”。对于高干子弟来说，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完文革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后，等待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是“官倒”的金光大道。而血统论骁将谭力夫一度试图证明江青支持血统论，但迫于舆论压力连自己都不得不改名。

总而言之，“三种人”实际上只有一种人，也就是1969年后进入“三结合”，被吸纳进体制中的造反派。后来邓小平也说：“这里面是讲了‘造反起家’嘛，是跟着林彪、又跟着‘四人帮’嘛！在‘文化大革命’中造过一段反，后来被打下去了，或者有一段时间他闹腾得相当厉害，后来变成逍遥派了，他没有起家嘛！”这缩小了打击面，不至于变成一场反攻倒算的大清洗，应该说是一个进步。但是这同时也说明了这场运动不是以公平的标准，根据参与运动的人在文革中的行为来判决，而是直接以派别来划线。因此运动的目的也就再清楚不过。它是有目标有针对性的单方行动，并非以事实为依据、以文件为准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清理。湖北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法庭上就曾辩护道：“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

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吧？”

结果，胡厚民因“认罪态度恶劣”被判处 20 年徒刑，和姚文元刑期相当，超过“林彪反革命集团”中的所有人，最后死于狱中。

其实，全国只有广西一地清理了保守派，因为只有广西是造反派几乎彻底失败，保守派“起家”了。广西保守派“联指”靠着官方和军队，杀得造反派“4·22”落花流水，组建了革委会。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在 1969 年局势稳定之后因种种原因又陆陆续续地丢了官，但在台上的也还有很多，派系斗争一直闹到 1983 年。到 1985 年还在台上的就成了清查对象。因此是全国唯一清查了保守派的省份。而“联指”要保的韦国清本人，虽负有造反派“4·22”数以万计的生命的罪孽，却没有受到一点触动，连检讨都不曾写过一张。

最终，造反派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彻底消失了。即使侥幸逃脱“揭批查”和“清理三种人”的幸运儿，也无法躲过 1983 年那场“严打”风暴（“林彪、四人帮残余分子”是“严打”的既定目标之一）。总体来说，多数清理在短期内似乎有一定的意义，它使政府部门重新整合成一个高度集中的官僚体系，避免了无休止的派性斗争和互相扯皮，在短时期内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它使得中国的政治格局长期处于单一集团一家独大的局面，使党政官僚丧失了任何接受监督和制约的可能。顾准当年就曾认为，“使武斗的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变成进步的动力。”不过官方选择的是彻底抛弃遗产，一切推倒重来。

因此，对待“清理三种人”不能一概而论。文革中造反派和保守派，包括被打倒的干部，其行为都不是那么“干净”的，军队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清理的结果却是首先不“干净”的保守派（50 天专政+“挑动群众斗群众”）清洗掉了之后不“干净”的造反派（批斗+武斗）中的各派。军队干部和“联动”分子则都免除了责任。由于定义太宽泛，“清理三种人”的运动成了一场持久战。直到 1989 年底，“清理三种人”的运动才宣告结束。一些人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时代至少是党政官僚集团要倾向于要对已经剥夺了财产的“地、富、反、坏”进行批判，其实只要看一看今天的某些人认为近几年“极左流毒、文革余孽沉渣泛起”是由于当年“清理三种人”不彻底，主张再进行一次“清理三种人”运动，甚至要求成立“三种人研究所”之类的言论就能够明白一些，其中的逻辑是一致的。

第二节 “异化”旋风

伴随着对造反派的清理的是高层的清算工作。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了如下判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改为无期徒刑）；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黄永胜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判处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判处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江腾蛟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审判中，对于林彪、四人帮的具体罪行如何追究成了一个敏感问题，最后邓小平提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这一条罪名就足够了。因此我们注意到在官方文革史叙述中，“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这样的词无论出现了多少次，它都是围绕着“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展开的。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宣称：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做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里正式否定了文革，提出了“文革十年说”和“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尽管把很多责任推给了林彪、江青，但是既要否定文革又要肯定毛泽东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最后采取了

最简单的做法，那就是照抄了 1956 年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 error。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决议》的评价技巧与 1956 年毛泽东针对苏共二十大而发的两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非常相似的。不仅是“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个人专断”、“个人崇拜”“逐渐骄傲起来”“破坏民主集中制”这些指控，连“中国的封建历史很长”，将个人崇拜归结为历史问题，结论的“功绩第一，错误第二”，“功大于过”都是非常相似的。

现在文革遭到了彻底否定。但是如果否定了文革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国家必须还是要有一套意识形态做基础。更何况一些揭露、反思文革的作品的意识形态与传统国家机器所宣扬的意识形态是截然不同的，这背后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也需要总结。这方面的主要工作当然还得从对马克思主义做出重新解释开始。仅仅以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无法说服人的，因为这里面几乎可以包括任何内容。真正为改革年代的意识形态添加进充实内容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重新解释的关键与核心就是人道主义的兴起。

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探讨在 70 年代逐渐升温并成为文艺和文艺理论界关注的对象。1979 年初，朱光潜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中最初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以人道主义来冲淡或否定阶级斗争的观点就逐渐成为评价文革乃至整共和国前 30 年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尽管这一时期还没有人试图用人道主义来评价中国革命。而 1979 年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文版出版，又使得这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又取得

了传统的合法性的外衣。随着对于文革从人道主义角度的“反思”的继续，同时也是受马克思《手稿》的影响，“异化”就成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命题。1983年3月14日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大会上，周扬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试图清算中国几十年来所谓“左”的思想路线的哲学根源。他说：

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下的异化现象，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顶点。各种异化现象，都是束缚人、奴役人、贬低人的价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剥削是异化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下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的解放，即全面的解放。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将使“人的本质力量，人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发挥和实现”，使“个性的全面发展代替旧的分工制度下个人的片面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目的本身”。他甚至说，共产主义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毫无疑问，这是从早期的马克思到成熟时期马克思的重要思想。……而以往人道主义者幻想在人奴役人的社会里，靠“理性力量”、“泛爱”、“美育”等唯心主义说教，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那只能是一句空话。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

……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由于民主和法制的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种相似之处。所以，“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用不着对这个名词大惊小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自然，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的体制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克服思想上的异化。现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不久将进行的整党，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

这篇讲话引起了极大的争议，3月16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这篇文章时，又附上了对它的批评文章。后来，胡乔木1984年1月3日在中央党校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激烈批判，即《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认为宣扬“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这一批判后来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都有鲜明体现。我们这里来分析一下周扬的观点以及它对文革认识的影响。

所谓“异化”是一个哲学概念，这里周扬解释的基本合理。简单来说，就是由主体产生出来的事物反过来压制主体本身。从理论上讲问题不大，而且其理论似乎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在表面上会有相似之处。但是实际上，落实到具体环境中，我们会发现，周扬的具体所指，是指林彪、四人帮利用权力去进行迫害和破坏活动，导致了一场灾难。也就是说，周扬这里的异化是指，认为“革命”是人民创造的。但是革命产生出来的新政权，新政府又开始迫害镇压人民，这就是异化。但如果具体到文革，那就是当年是我们这些革命者去革命的，但是现在革命反过头来要把我们这些已经做官当老爷的革命者打倒，按毛泽东的话说，“当了大官了，当然要保护大官的利益。……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因此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用人道主义去改变原有的意识形态，强调调和、包容与让步。

我们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我们内心的所谓“良知”还是外在的道德和法律都会使我们以人道主义的方式去看待事物。这方面大家都清楚。但是问题在于人道主义在客观冷静地解释历史时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说阶级之间要调和，要互相妥协，不要斗得你死我活。这是人道主义。这很大程度上是从发达国家的阶级关系上得出的结论。现在我们且先不说世界体系论对他的反驳，我们就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到底是在强调什么。实际上，阶级斗争论强调的是社会上的阶级之间的实力对比，这既有经济基础上的，也有组织上的和意识形态上。斗争是包含多种形式的，暴力斗争是斗争，和平斗争也是斗争，甚至意识形态上的也是斗争。正是因为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和多种形式，因此，在阶级矛盾不尖锐的时候，确实没有必要对每一场阶级斗争都抱以过分的关注甚至动用国家机器。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上纲上线”即是犯了这个错误。如果放到80年代的大背景下来看，提出让早已“异化”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利益代言人的统治者去“包容”，实行人道主义，不要动不动就动用国家机器去压制不同意见，这是有一定道理和意义的。

但也就是说，它首先承认了党政官僚已经异化，已经不能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这一事实（这是胡乔木所不能容忍的地方），然后再建议让这个异化的政权去搞人道主义。这里人道主义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否认了基于生产关系的社会阶层力量对比的客观存在以及每一个阶级都会争取自己的阶级利益这一客观事实。因此，周扬的观点又含有包办替代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面。总体来说，它是在“劝诫”已经异化了的党政官僚们讲宽容，但他的背后是承认了异化的现实，承认了包办替代主义。而这样的包办替代主义也就是劝告无产阶级放弃对自己的阶级利益的主动争取，有“党”为你做主，你只要劝诫这个党包容一些就行了。至于这个党是不是真的能为你做主，那就不好说了。当然，这里说的只是周扬文章中的“异化”问题，至于“异化”问题在社会上引发的思想解放浪潮，对民粹主义、乌托邦主义、理想主义乃至五四以来的所有激进思想的反思就又另当别论了。

尽管许多知识分子对“异化”进行了深入的独立思考，但是具体落实到对文革的批判上，官方“异化”观的影响始终挥之不去。这种官方异化观主导下的文革强调的是人的消极自由，强调文革对“局外人”的伤害，强调人有消极的权利。也就是说，文革的意识形态是“自己解放自己，绝不包办替代”，激进的意识形态要求所有人都必须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来，甚至有直接民主的倾向。这曾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革命还俗”后，人们意识到，还是要有自己的私人生活，还是要有自己的小圈子，任何时候都无法否认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任何人有时候都可能希望消极一下，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文革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它对“消极自由”，对“个人价值”的否定乃至践踏。因此，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伤痕文学在内，批判那种异化的“积极自由”，批判那种把每一个人都强行卷入的政治运动，希望能有自己的小日子，自己的小天地，自己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这对于当时已经被政治折腾得筋疲力尽，对政治的兴趣已经大幅消退了的中国人来说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

但是这种消极自由有它的前提。那就是社会上已经有够强的阶级组织能够保证我的公共利益，或阶级利益不受损害。因此我只要花出一点时间和精力进行参与（如选举和监督），保证这个组织不会使我“被代表”就可以了。但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自文革结束以后人们就被越来越打散。那些异化的，包办替代的组织被解散了（如人民公社）短时期内确实是好事，但是真正能保障我的公共利益的组织又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党”包办替代了我的所有“根本利益”，尽管我不知道这个“根本”是在哪里。那么结果就是，在没有组织性的前提下，我的公共利益就受到了另一个阶级的侵蚀和损害。在这里，人道主义如果还在阻止人去追求自己的利益，鼓吹消极自由，那么只能说这是一种“洗脑”。某种程度上我们看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这个情况。80年代一些异化的，有包办替代主义倾

向的组织和政策被废除，如人民公社制度，如官办式的政治运动（虽然还有但力度大幅减弱），人民有了真正属于自己个人的生活，感到心情舒畅。但是它是承认了党包办替代了全民的利益为基础的，因此，劳动者的阶级的组织性也被削弱了，阶级意识也淡化了。那么带来的结果就是，到了90年代以后，随着党政官僚和资本开始联合，就出现了一些劳动者权利受到损害的状况，如逐渐突出的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拆迁问题、新“三座大山”等等。因为他们这时候已经没有一个组织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或者把他们组织起来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总而言之，没有了组织性，消极自由也无法得到保证。那么，这个时候劳动者需要干预公共事务，要求改变社会力量对比，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这时候就需要积极的自由，需要普遍参与。在社会力量对比严重不均衡，不同阶级实力差距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讲一百遍民主、法治、程序正义等无法保证社会正义和公平，**需要的是争取利益的实际行动**。就像毛泽东所说，当群众起来的时候，你是站在队伍后面对他们指手画脚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前面引导他们呢？改变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的活动需要引导和组织，积极普遍地参与公共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建立维护自己权益的组织团体，甚至是政党。而在这之中，人道主义却可能会被用来作为阻止这一变革的工具。

落实到对文革史的叙述上，由于知识分子在改革后恢复了他们在话语权上的优势，而人道主义这种过分强调“个人经历”的意识形态导致了文革史就由两派激烈斗争的历史变成了普遍镇压的历史。这不是说个人经历不重要，但个人经历需要进行拼接和分析。而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感性认识则拒绝这种理性的连接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堆砌史实，最终非理性的历史解释是对社会实在的虚化和拆解——既然文革的对象是社会，那么分析社会才有可能分析文革——产生的结果就是要么把责任对象无限缩小，如林彪、四人帮（官方解释）或毛泽东（权力斗争论），要么把责任对象无限扩大，如民族（“劣根性”）、历史（“告别革命”论）。我在前面已经多次说了人道主义的滥用对文革史造成的混乱。

第三节 未来

在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之前，我们首先问一个问题：文革一共进行了多少年？

我相信大多数人脱口而出的都是“10年”。我在前面所讲的“文革”为了理解方便也都是指十年文革。对于文革的历史分期问题是解决关于文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点，也是评价文革中最容易引起歧义的地方。这也就是“文革十年说”和“文革三年说”的论争。

如果从形势的分析上来讲，1968年夏季自发的群众运动就已经受到压抑，到1969年大

规模的运动已经结束，社会已经基本恢复秩序，中共九大上军队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场政治运动的话，那么它最多到 1969 年已经终止。因此，当时的西方学者都普遍认为文革到 1969 年就已经结束。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描绘了当中国宣布文革为期 10 年时西方人的吃惊：“**经过提前的通盘考虑，邓小平宣布：文化大革命不像此前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在 1969 年中共九大结束的而是以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告终的！通过这个技巧有效地把文化大革命重新定义为‘毛泽东的晚年时期’，借此为他自己和毛泽东的政策分野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西方人并不能一下子接受“文革十年说”（许多人至今不接受），他们宁愿把它看作是邓小平的一个策略而已。

但是如果说“文革十年说”是华国锋或邓小平的一个策略的话，那么这个策略毫无疑问会导致文革解释上和理解上的严重偏差。不过“文革十年说”并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理由的。理由之一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还没有垮台，当然实际上隐含的意思是毛泽东还没有去世。可是政治运动都是以它的操纵者倒台而告终的吗？但是它还是有一些解释，比如它认为，在中共九大之后毛泽东继续推行了一些在文革中产生的观念，或者是在大跃进中就已经实行了的政策（如半工半读、经济放权和农村工厂）。而大部分政策被彻底废止是在 1976 年毛泽东逝世和文革派垮台后。

而“文革三年说”最重要的根据，是在这段时期内前所未有的政治操作方式。即所谓以“四大”为标志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相比之下，它的后继运动和事件，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经济整顿、教育整顿，直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无论是由文革派还是党政官僚发难，都不同程度地回复到了自上而下、形“左”实右、“运动群众”的形式；而毛泽东所号召的作为“造反有理”的新提法“反潮流”，则没有能够促进形成类似文革中的群众自发性造反运动。

“文革十年说”带来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它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定性不明。因为它说文革是一场“内乱”，可是“内乱”是评价，并不是定义。如果说文革是一场政治运动，那肯定说不通，因为在 1969 年后发生的政治运动都相当程度上独立于 1969 年结束的那场运动之外。而且，除了文艺批判运动外，没有一个运动能够把整个 10 年衔接起来。而仅仅靠一个文艺批判运动来衔接这 10 年又实在太片面。因此，在“文革十年说”的语境中，文革绝对不是一场政治运动。

那我们怎么理解呢？在“文革十年说”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把文革看成是一个时期，也就是一个固定的社会模型。因为如果说所有的“文革”提法都会带来时间上的歧义，

那么所谓“文革时期”这个提法中的“文革”毫无疑问是在指那10年。这样也就可以解释的通了。“文革十年说”实质上是把文革当作一种与现存的社会截然不同的一种制度，一种“荒唐的”，非理性的现象，一个固定的僵化的模型。它始终在越来越典型化、概念化、空洞化，模式化的漫画场面中为当代观众排演。文革被化约成一些鲜明生动的符号形象，如红宝书、忠字舞、抄家、“喷气式”等等，这些经过文字和文化生产者的刻意加工，经过官方和主流媒体所反复强化，已经成为游乐园微缩景观式的“文革历史”。而一些史书以专题的形式而不是以时间顺序来讲述文革历史就更强化了这一点。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杨克林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都是如此。从这个模型中人们可以提取出任何东西，因为它本身就是靠无数的“现象”拼接在一起的。对这个“现象”的拼接体当然可以从中提取出任何一小块做出解释，为他们想要主张的东西找出任何反面教材。也就是所谓“文革是个垃圾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我们可以说“文革就是文革史”，文革无论是3年也好，10年也罢，它都是一个持续变动的社会，一段极度震荡的历史。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念或许是一套模型或制度，但文革本身绝对不是一个固定的制度或模型。正是由于它始终处在变动之中，每一个事件之间都会有特殊的联系。而“文革十年说”将文革看作是一个时期，一个固定的制度和模型，实际上是打破了事件之间的联系。我们以一篇文章来举例分析吧。

然而拨开这些表面的迷雾，分析它们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和逻辑，不难发现，“文革”号称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反官僚主义非但没有削弱政治专制反而更加强之；“大民主”不但没有确立人民的公民地位，反而导致政府公权更加肆意扩张，公民私权更加弱化。这一切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切，群众运动、反官僚系统，不但不是什么民主，相反，是对民主的最大嘲弄。……

从享有这些恩赐的“民主自由”的主体看来，只有根正苗红、出身好的“红五类”才享有这些所谓的民主权利，而近百万被打倒的知识分子、上千万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不要说拥有这些权力了，连依据法律为自己申诉和辩护的权利也被完全剥夺。而真正的民主无疑是针对社会全体成员的。……

反观“文革”时期的言论自由，其实只是机械背诵社论和领袖语录的自由，哪里能表达

自己的真实想法！一个民族连说真话的权利也没有了，连自由思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今天竟然还有人说这是言论自由的伟大实践！再比如，宣传时要特别注意用词造句，一个用词不准不当、一次喊错口号、一次举错手就可能使一个革命积极分子迅速沦为破坏“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因为喊错口号、举错手等而锒铛入狱的例子举不胜举.....

我们看到，“文革十年说”导致将文革的终结点称为“结束”而不是“失败”，将文革看作僵化的模型而不是震荡与斗争的历史。这使人们更不可能真正总结文革的教训。就教训来说，由于造反派持续激进化，急躁冒进，在阶级力量不足的时候贸然夺权，这种全民动员的革命偏离了建立阶级组织和灌输阶级意识这两个最关键的目标。结果松散的组织 and 阶级意识的缺乏使得造反派无法完成激进的革命目标。由于紧密的阶级组织始终未能建立，群众组织陷入不断地分裂和直接民主之中；而过于激进，不求团结的目标也引起了保守力量的联合和强烈反抗，这两个原因导致了文革陷入了持久战甚至是“全面内战”。这给经济建设和大多数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超出了这个社会所能承载的广度与强度，最终失败。而在失败后，它又使人民对公共生活感到极端失望，造成了深远的消极后果。这一些造反派后来反思说造反派的组织力量最多只相当于遵义会议前的中共的水平：目标不明，不讲策略，各自为战。这无疑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当然造反派内讧除了造反派自身外，毛泽东、保守派、尤其是军队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确实有自己的独立性，至少大多数人拥有有限的，但却是空前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以为一下子就可以获得一劳永逸的“完全的”民主自由是书呆子的想法。如果说文革最大的局限是它是由最高统治者领导的革命，那么它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在这一秩序下“革命”原本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文革创造了一个突破口，但却由于种种局限没能好好利用。对于这一教训，后人却又选择了“彻底否定”，一切推倒重来，消灭了吸取其政治遗产中的积极因素的可能。在今天我们首先要明确的还是“失败”这一点，以及“失败”导致的“断裂”所带来的后果。

第二段，先不讨论“真正的民主无疑是针对社会全体成员的”是不是准确（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反对），但是所谓“真正的民主”，也就是从书本上看来的，理论上的民主，要去实现它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任何国家都不例外。如果你把打开了突破口的文革去和书本上看来的定义，概念去比较，文革当然是不民主的。就像我前面说的，那种一开始就幻

想着获得一劳永逸的完全民主的观点是很可笑的。历史从来不是发生在无菌箱里，民主从来没有标准范本。俄国叶卡德琳娜的启蒙，是有专制前提的启蒙；法国拿破仑的改革，是有专制前提的改革。人们并没有因此对他们的启蒙或改革视而不见。古希腊的民主制与奴隶制两位一体，劣迹斑斑，但后人并没有说那不是民主。某些人整天幻想着完美的“真正民主”，完全不考虑社会实践的作用与民主的渐进性。当曾经激烈批判乌托邦主义的人如果只有书本上那个完美的民主模型才叫“真正的民主”，那就是又将民主和启蒙当作一种固定僵化的乌托邦，那无形之中也就成了现有体制的卫道士。

第三段，文革没有表达人们的真实想法？我前面引用的很多大字报应该可以回答这一点。当然这种真实想法的表达是存在局限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其意义。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所谓“现行反革命”的问题。实际上，文革在三年中始终处于不同阶层的激烈斗争之中，尤其是当斗争逐渐失控的情况下（因为所有阶层都卷入了，自然也没有谁来“控”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教训），一些人为了斗争的胜利就会不择手段。“血统论”、“红色恐怖”、“上网上线”、对《公安六条》中“现行反革命”罪的滥用等等，都是如此。也就是说，是先有了不同阶层之间激烈的利益斗争，才有了所谓写错字，喊错口号就被镇压的“现行反革命”，而不是先有了“现行反革命”，才有了斗争。比如在二月逆流中军队镇压或分裂造反派为了显得“有理有据”就搞了不少造反派的“现行反革命”的“黑材料”，可是后来反击二月逆流，造反派重新取得优势的时候，这些“黑材料”又什么也不是了。我们要吸取的最大的教训是不要随意扩大斗争的强度，缩小斗争的社会成本，不至于不择手段无所顾忌。但是首先还是要明白斗争的客观存在。这篇文章显然把文革理解成了一派疯狂镇压迫害另一派的历史，而不是两派激烈斗争的历史。这是主流文革史观的责任。

还有，所谓“自由思考”。文革中确实有一些思想者，但是以当时多数人还没来得及“想到什么”就认为“连自由思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是不是太武断些呢？就如同我解释过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是当时的局限所导致的结果，但是它不过是以“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而已，一题多作的情况普遍存在。将毛泽东视为革命者、造反者的符号，视为他们行为的合法性的根据。当然其中的少数人则是可以挣脱这层局限或束缚，产生独立而有深度的想法（如杨曦光、李一哲），成为“当代的革命者”的。当然，我这里的“文革”指的是1966——1968年运动高潮时期，如果到了军队控制社会的1969——1971年和两派斗争转向高层的1972——1976年，那又另当别论了，但是原理是一样的。总体上来说它还是由社会力量的对比决定的。

当“文革十年说”既然把文革当作一个僵死的模型来看待，那么接下来还会产生一个观

点：那就是只要给文革说好话（比如本书）就是要“回到文革时代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从来不把文革看成是一场运动，看作一个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转化的过程，看成是一段激烈震荡变化的历史，坚持要把它看作一个僵化的模型。因此，谁要是给文革说好话，那他就是赞同批评者心目中的那个早已经被否定的模型，于是就产生了这么一个公式：

你居然说文革有积极意义？——你一定是想回到文革时代去吧？（或者，你一定是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去吧？）——你没有经历过，怎么知道文革中发生了什么？——文革中多少……被……，多少……被……，多少……被……（无数现象的罗列，此处省略至少 1000 字）——你居然想回到那个时代去，你是不是脑残？！（或者，你是不是文革余孽？）

我们不需要了解文革中的“上纲上线”是什么样的，光是这个公式就已经足够让我们了解。每一个人对文革的理解都可能是不同的，我们对不同人心目中的文革印象要有理解的态度。承认文革或者毛泽东时代有积极意义和要“回到那个时代”又有什么必然联系？！按照这个逻辑，那崇拜中国古代皇帝的人要泪流满面了，因为等待他们的都是一顶“想回到封建专制社会去”的大帽子。我不想回到古代去，可是这不妨碍我赞扬中国古代的成就。可是现实中，为什么唯独毛泽东的拥趸们会被扣帽子，会被认为是要“回到过去”呢？

这是因为，文革已经被“文革十年说”定性为一个与现实社会截然相反的一个僵化的模型，一个制度了，所以只要谈到一些积极意义那就是连带上了那个时代的一切，这种简单化的叙事产生出的“搞文革的那一套”这样的话语。但作为一个无比复杂的历史事件，文革从来就不只“一套”，“搞文革的那一套”的话语本身就是把文革看成是一个只允许有一种解释范式的僵死的模型，实际上就是以“揭示真相”的名义掩盖、遮蔽一个真实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一些人嘲笑毛泽东时代的搞的“忆苦思甜”活动，可是如今某些人的“忆苦思甜”不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吗？其原理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对文革的简单化叙事的结果就是，很多人说起文革，只能摇头瞪眼地惊叹“不可理喻”“荒唐”“疯狂”。这恰好证明当今主流文革叙事的失败。理喻是什么？理喻就是认识。我们之所以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正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人文社会现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我们决不可把“文革”越说越奇，越说越怪，越说越不可理喻，再把这个认识黑洞当作自己大获成功的勋章。而对这个“黑洞”的任何质疑，得到的回应恰恰是“文革式”的派别划线，随意扣帽子，观点被极端简单化，然后“不屑一顾”地驳斥之。无论那个僵死的模型是“地狱”还是“天堂”，它都会使人们先入为主从而轻率地否定对方，最终谁也无法获得经验教训。“文革”是上 10 亿大活人真实存在的 10 年，决不是一堆荒

唐的疯人院病历再加一个离奇的宫廷斗争神话。只要不强加偏见，只要不扭曲记忆，一个贫穷大国现代化历程中的多灾多难，就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事件更难以理解——从根本上说，“文革”就是由活生生的人来参与和推动，并最终予以终结的。今天，“文革”已经结束30多年了，已经退到可供人们清晰观察的距离了。我们需要更多视角与立场各异的作者，来拓展和丰富对“文革”的叙事，还文革一个不难理喻的面貌。这样做，可能会增加批判文革的难度，但只会使批判更加准确和有力，成为真正的批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文革长久处于“不可理喻”的状态，就会成为一截粗大的绝缘体，无法接通过去与未来。这块绝缘体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前的中国革命——文革就是从那里逐渐生长出来的；也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后的近30年的改革开放——文革是它的不可更换的母胎。钱理群老师说：

我们现在面临文革后期那样一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背后是我自己向何处去，现在可能看得更清楚，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地位、中国何处去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世界的问题。文革后期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原来这条路不能这么走了，现在已经成为全民共识，各阶层的共识，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不管什么动机，什么目的，原来的路不能走了，要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我觉得现在的历史和文革后期的历史基本相似，大家在思考，在聚集，在行动，这就是当下中国。

从这样一个意义来说，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的价值就很高了，因为他们思考的问题，他们的思想成果和他们所秉承的精神在今天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那个时候形成的，实际上，包括文革后期，不仅是思想成果、还有互相的分歧，这分歧其实延续到今天。所以我们今天来研究文革，来讨论文革，不仅是研究历史，还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实际上，要重视一点，毛泽东民间影响不可忽视。我曾经讲过，中国有三大民间思潮，一个是维权，一个是网络，一个是志愿者，这三大民间思潮里面都有毛的影响。**所以对毛泽东的评价和毛时代，包括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而现在对毛的态度跟每个人现在所处的地位是有关系的，跟自己的利益是有关系的。**

不同的利益群体对毛有不同的态度。

文革就是文革史，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段历史，它不是一个“时期”，他更不是一个僵化的模型和一套固定不变的制度。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在批判现实的同时也在畅想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但是我们无法在两个体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最后它就变成了一种假设史学，“假设有民主法治，什么什么错误就可以避免”之类的想象。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还要面对现实，还是要看实践。这些都要靠社会上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此的改变去实现，至少要靠不同利益指向的群体互相的制衡去实现。仅仅希望既得利益集团发发善心推动改革，那就和一百多年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什么区别。**最重要的在于，30年改革开放过于依赖体制内推动，当既得利益集团逐渐强大，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小时，寻求和组织体制外力量对改革进行推动就是必然之势。**体制内的改革和体制外的压力必须实现互动，把单一动力的“单腿走路”的改革变为“两条腿走路”的改革。如果我们把文革之类的历史事件看作是一个过程，那么这也许会为我们建立起“改革”这座桥梁提供启发。如一位学者说，“威权政府有时会借助非民主的手段为建立民主机制准备条件，因此与其指责每一个威权政府，还不如去观察在其治下出现了哪些有利于民主的条件。”而80年代以来对文革惨痛的教训却被做出了简单化的总结，即任何群众，或体制外力量的直接参与和监督都可能导致“动乱”或“民粹主义”。而唯一合法的监督，只能是由通过媒体和法律面目出现的党政官僚来执行。**这样的结论不是回答了文革提出的问题，而是使我们重新回到了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时所面临的问题而已。**

我们期盼对毛泽东晚年这段特殊的历史能够有更深入地和更具备理论性质的研究，为今天我们对当今现实的认知和把握提供更好的借鉴。至少，我们不希望它仅仅像一面涂鸦墙一样被肆意涂抹，以讹传讹，捏造歪曲。今天研究文革史，我仅仅是提出3条建议：

首先，承认文化大革命是当时中国社会矛盾总的爆发，这是文革研究的底线。第二，文革暴露了中国内部大量深层次的矛盾，其中多数至今没有解决，有些甚至更加激化。这是研究文革的现实意义。第三，研究体制外力量对社会变革的推动力，对今日社会发展有相当的意义，同时对避免文革中的局限和失误有所帮助。

有美国学者说，“如果说毛泽东没有找到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两大承诺的道路的话，那么邓小平干脆放弃了这两个承诺。”当然话也不是那么绝对，应当承认邓小平的努力为中国实现这两个承诺创造了基础条件。但也只是条件而已。至于如何实现，或许，我们还是

会在毛泽东那里，会在文革那里，至少是从文革的“某一套”里，得到一定的启发的。

谁都不会否认文革中产生的巨大问题和失误，但是，我们拒绝的是强迫的遗忘，而是进行反思，实现超越。再次引用莫里斯·迈斯纳的话：“无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有多么惨重，它确实把向当局造反的是群众的权利这一概念灌输进了群众的意识之中。当中国人民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这种权利是既非上面所赐亦非上面所能废除而为他们所固有的权利时，他们也许会再次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主张的那一幕。其唯一的办法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替代的方法。’”文化革命的模式或许不可重复，文化革命的行为方式或许应该讨论，但文化革命的原则和精神却一定不会磨灭。

鲁迅曾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当我们面临与 30 多年前经历过文革风雨的一代人相似的困惑与疑问时，这句话必将萦绕在每一个思考过“中国向何处去？”的人的心头。

本卷参考资料：

《文革资料汇集》（约 75 万字） 网络文章 春秋中文社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约 1600 万字） 水陆洲 整理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约 3000 万字） 宋永毅 主编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高皋、严家其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文化大革命简史》 席宣、金春明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年版

《大动乱的年代》 王年一 著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1966——1982》（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美）莫里斯·迈斯纳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册） 逢先知 金冲及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毛泽东传》（美）罗斯·特里尔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 王骏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电子版） 辛子陵 著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 吴焱金 著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09 年版

《不再沉默》 武彩霞 著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0 年版

《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周扬 等著 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1983 年统计年鉴》（电子版）

《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农村政治的民主化》 网络文章 作者：司养眼

《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网络文章 作者：甘阳

《说说林彪这个人》 网络文章 作者：老田

《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 网络文章 作者：老田

《谈谈七三年后邓小平的政治生涯》 网络文章 作者：老田

《就河南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向党中央反映的情况和意见》 网络文章 作者：赵俊峰

《“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 网络文章 作者：萧喜东

《文革就是民主吗？》 网络文章

《钱理群谈毛泽东的文革遗产》 网络文章 作者：钱理群

后记

记得大一刚刚入学的时候，因为很想体验一下北大的社团活动，但是又实在没有中意的社团，于是便报了马克思主义学会。原本是想去里面混混的，后来却成了我的大学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第一次去参加活动，印象至今仍很深刻。当时第一次活动的题目就是国史（1949——1978）。这个内容有多争议和多敏感就不必多说了。当时我们都对那位主讲人所讲的与传统观点偏差相当大的内容，尤其是对文革史部分感到震惊。而我刚好对这段历史相当感兴趣，和那位主讲人发生了相当激烈的争论。我当时听得有点蒙，感觉自己的思路在连续的冲击下已经混乱了。我记得当时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真相不在象牙塔里，也不在什么“机密”档案里，而在民间。这句话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就开始接触一些有关文革的书。我觉得国内学者的书受意识形态影响太重，只能做参考。不过像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简史》还是有一定的思考，其资料还是很丰富，很严谨的。后来在图书馆借到了一套《国外学者评毛泽东》的丛书。后来又看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外学者的观点自然是很新颖，但把我的思路搞得也很混乱。后来我开始上左派网站。网上多数左派的观点我都很反感（尤其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甚至是对文革的理想化），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们在资料收集和考证方面确实是下了大工夫。那些天天在网上和专家媒体围绕前30年历史的进行辩论的人确实搜集了不少材料。其中最有用的是《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是1966——1968年红卫兵自主编的毛选，收集了大量官方未公开的讲话和手稿。有武汉的同志把它扫描成电子版发到了网上。下载下来以后把毛泽东晚年思想也基本做了一个了解。经过又一个学期的当作业余爱好的整理和研究，算是有了初步的成果。不过感觉收获最大的还是那句“文革的真相在民间”的应验了。

大二第一学期，我终于重返学会。第一次学习还是讲文革史，请来的是一个老党员，结果把问题缩小成了党风建设，我当时就说，**要是不把文革具体的过程和事实讲清楚，在一个空虚的基础上大讲特讲文革有意义吗？**后来我在学会里“自告奋勇”讲了一次文革史。想起我第一次在学会中听到的就是同样的题目，当时还十分震惊，如今又由我来“震惊”一下其他同学，这似乎很有戏剧性。更有戏剧性的是在讲课过程中。我十分庆幸我在讲之

前先让大家发言谈一下对文革的看法。来参加讨论的基本都是新会员，甚至还有校外人员，于是观点五花八门，“封建复辟论”、“阴谋论”、“革命论”、“文化决定论”、“人性论”、“乌托邦论”、“政治斗争论”等等。我倒是非常感谢两位感情丰富，大谈“封建复辟”论的女生。因为在讲的过程中把握分寸时，我基本是以这两位女生的表情的丰富程度为尺度的。

进入到这个学期，虽然只过了半学期，但是成就也不小。一个方面，我去图书馆那间“小黑屋”，把 1966——1968 年的《人民日报》大致浏览了一遍。同时，我在图书馆中发现了一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收录了 1966——1969 年所有官方的指示、讲话、社论。我觉得这是这个时期除《毛泽东思想万岁》外我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有了很大的收获后，我开始准备学会的活页文选的编辑工作。我的任务是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史，也就是通常所谓毛泽东时代。尽管我认为现在来评价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机还不成熟，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在我搜集到的资料的基础上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因此我加快了资料搜集的活动，并在不断地修改我的观点。后来我在网上又发现了《文化大革命资料汇集》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前者约 75 万字，因为较精炼是我引用最多的资料库；后者长达 1600 万字，搜集了文革中大量的书面材料、回忆录和历史论述，尤其是文革中各省“全面内战”的细节和斗争形势分析，非常宝贵。过去我对 1966 年的斗争史比较熟悉，但对 20 个月的动乱史（1967 年 1 月——1968 年 9 月）中的形势缺乏足够的分析和认识。但现在对于各省的斗争的分析使我逐渐理出了思路。后来我还下了香港中文大学的 3000 万字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作为目前最权威的文革资料库，它对官方文献收集可以说是最全的。不少稀有的文献资料都可以查到。可惜由于立场原因，其对民间文革的关注不足，资料也偏少，更没有形势分析。《简论》和《文库》配合起来使用似乎效果更好。

在写作过程中，最困难的其实还是用什么主线把全书贯穿起来。后来我想到了比利时托派思想家曼德尔在《权力与货币》中提出的包办替代主义，以及文革《十六条》中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替代的方法。**”这使得我基本是以包办替代来贯穿整部著作。同时我还从费正清教授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中得到了启发，搞出了一个“反抗——镇压”模式来论述毛泽东时代以文革为代表的政治运动的一般规律。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不过水平有限，实际上除了我的观点外还大量节选了他人的论文和著作，尤其是莫里斯·迈斯纳教授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其它的由于实在太多不能一一标出，因此列在了每一卷的末尾。使我在这一征途中有所感悟和收获的有许多人，在此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